战俘回忆录

段克文

目录

另一版本的战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

作者：林同

前东北九省统一接收委员会纠察队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主任秘书段克文少将，不幸于二月三日凌晨零时廿分病逝纽约。消息传到香港，段将军生前友好无不感到悲恸。

段将军的大半生在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中度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出于爱国热忱，毅然投笔从戎，颠沛流离冀、鲁、赣、苏、皖、川、滇、吉等省，从事抗日救亡与戡乱作战凡十八年；大陆沦陷后，他在镇反运动中以“特务”罪名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此后在廿四年暗无天日的囹圄生涯中，他始终坚贞不屈；民国六十四年他自中共狱中获释后，冲破重重阻力，辗转到达美国，逾古稀之年犹孜孜不倦于中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坚持反共爱国立场，创办“探索”月刊，这正如老报人罗子先生所说“沉着坚定，忠诚不渝”。他不知疲倦地追求真理，在异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连段将军的敌人都不敢否认，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在人世间八十三个春秋，为炎黄子孙留下了赤胆忠心、坚苦卓绝、威武不屈、黄花晚节的典范；他临终前犹不忘祖国，遗言骨灰暂厝美国，俟共党亡国土重光后归葬吉林故里。

古人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段将军投身革命事业六十年，历经千难万险，但失志不渝，始终如一，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西安事变爆发时，他在杨虎城嫡系部队四十二师补充团政训室任中尉助理员，杨逆下令该团马上开赴潼关近袭中央军，他冒死进谏李团长莫作千古罪人，补充团因而按兵不动，使中央军樊崧甫师顺利开进临潼，也促成了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迅速归顺中央。民国廿九年他在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第二纵队任副司令时，发觉司令孙信符私通汪伪图谋叛变，遂下令各支队对孙部严加监视，保存了一支抗日武装部队。事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中了贼人反间计，差一点将他活埋。

民国四十年他被捕下狱后，大义凛然斥责共干，伪长春市公安局拘留所所长恼羞成怒给他戴铐，他猛然将对方撞倒，结果遭到拳打脚踢，双手背铐，双脚锁上廿斤重的大镣达五年之久，晚上则被狱卒用几道麻绳捆在铁栅栏上过夜。

他被判无期徒刑后，在长春监狱中戴着镣铐高唱黄埔军校校歌，以雄壮的"怒潮澎湃，党旗飞舞"歌声激励两位年轻难友团结对敌。

民国四十六年抚顺战俘管理所以参观为名，强迫被俘将领去矿山、农村向群众下跪请罪。他监认这是歪曲历史、侮辱人格之举，因而拒绝下跪。

民国四十七年战俘所强迫推行"交罪"运动，他坚称自己无罪。共干指挥十数人围殴，他屡败屡战，始终不肯下跪，最后被投入禁闭室挨饿。

在拘留所中，变节投敌的原国防部保密局长春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逼他检举同志，他答道："老朋友都已分散不知下落，新朋友都是商人，怎么检举法？"因而遭到毒打。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北平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关梦龄的狱中笔记，此书多处提及段克文抗拒改造、不守狱规、常被殴打侮辱、罚跪、戴铐禁闭等。据这本经前抚顺战俘管理所狱卒李占恒校订的回忆录记载，段克文在狱中对关梦龄等叛徒说："你们用我作进步的台阶，那错了！我知道你们是假进步，实际你们心里还同情我呢！"关梦龄说，狱中搞"交罪"运动，段克文每次都"以不变应万变混过了关"。（详见关梦龄著"一个军统上校的自述"）这证明段克文到美国后在"世界日报"发表的"战犯自述"并无夸张自吹成分。中共对段将军的评价又可见于文化艺术出版社为关梦龄这部遗作编写的注释："前后特赦或刑满释放的战犯八百多人中，只有一个段克文叛变真理，跑到美国去干他原先的特务勾当去了。"实际上，段克文是那八百多名战俘中最硬骨头的一个。那些耄耋老人中，有勇气申请出境的寥寥无几，来到自由世界后敢于公开揭露中共监狱黑幕的，也唯段克文一人而已。

段克文所著的卅万言钜著"战犯自述"，给世人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早在沈阳军区张正隆中校撰写"雪白血红"前十四年，他就向外界揭露了长春围城时的惨景：城内罗掘俱穷，饥民吃完了曲子面、树叶子、米糠、番瓜藤后，更出现格杀儿童煮食的恐怖事件。难免群逃到城外寻食时，共军卡哨开枪狙击，死尸遍地，腐臭难闻，饿死民众不少于十六万。

他揭穿了中共每年纪念的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的死因秘密。这个胡匪出身的"抗联"司令贼性不改，因调戏一名混血女职员而被段克文妻弟阎钟璋斩死。共军攻占怀德县阎家屯后，阎氏被灭门。如今大陆上的百姓委实不知道李兆麟"烈士"是死在"花下"的。

他揭露中共背信弃义的行径：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郑洞

国放下武器前，共方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可是共军开进长春后，长春市长尚传道、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以及参加“起义”的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居然都成了“战犯”；保卫大上海一役被俘的国军将领徐继泰，则被押解到海州，经公审后大卸八块处死，把心肝都掏了出来；军长刘秉哲、罗贤达在苏州监狱被枪毙。还有共干强迫那批五六十岁老人在零下廿度严寒中挑灯夜战等等虐俘行为，都是外界人士鲜少听闻的。

他揭露了港台两地出版的不少污蔑国民党、诽谤蒋公的稗官野史，多数是中共将战俘们的口供经过归纳、整理、分析后添枝加叶、颠倒黑白炮制而成的，旨在愚弄海外华侨、丑化国民党的形象。

他向外界透露了，在中共廿多年强迫洗脑后，狱中仍有不少人怀念领袖、守志不移。有一次狱中放映一部纪录片，当蒋公扶持蒋夫人下飞机以及检阅军队镜头出现在银幕时，不少难友热泪盈眶，散场时有人说：“好容易见到一次，心里真是热辣辣的。”事后狱吏追查谁说的，人们都拒绝合作。有个叫陈旭东的将官，在文革中一再表示：“一听到骂国民党如何罪恶滔天，我就不服。若没有国民党，中国就不会有今天。国民党对国家和人民的功劳是不朽的，绝不容许歪曲。”经无数次批斗后，陈被押送秦城单独囚禁八年之久。

一九七五年七月，段将军以政治难民身分移居美国。

《传记文学》

1991 年 04 月

前言

1975 年 4 月 13 日，我从大陆那一边走向罗湖检查站，要进入香港的时候，心中紧张的像打了个结似的。

我们这群一共十个中共称作“战犯”的人，经过二十五年来的拘押以后，竟“释放”了我们，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回台湾。

我们在北平统战部焦专员等人陪伴下，乘飞机到了广州，住了一天，又加上广州统战部的人陪送我们这耄耋之年的“战犯”乘火车到达深圳，照顾我们的任务就交由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他们在我们到香港以前，曾经简单介绍当地治安情况，并分配一些业务人员，对我们分组保护照料。

我们拿着简单的行李，过了大陆和香港交界的罗湖桥，我一看对面，嗬！黑压压的一堆人，手上拿着、肩上扛着五花八门的照相机、录音机什么的，拥向我们这边，跟着上了开往九龙的火车，车上，挤得简直连转身之地都没有。这个问我们此行的起因和目的，那个问我们在大陆拘押四分之一世纪的感想，有的问我们对大陆各种情况的看法，有的问我们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国丧之际赶到香港要去台湾？有的问我们在拘押中的生活情形，有的要我们发表对中共“释放战犯”的感想，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没等作答，那边又提出了一大堆，我们怎么能答得过来呢？像我，只能极其抽象、极其概括的答上一两句，有

时甚至是几个字。这我知道，问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可是时刻是那么匆迫，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尖沙咀下车，更是人山人海，围得简直水泄不通，若不是警察和中国旅行社人员，给我们筑起一道保护线，我们真要无法上汽车了。他们当然不是把我们这十个老头子当热闹看，无论从他们的急切表情，或是从一些听到的零言碎语来判断，都明显的表明，他们无非是想从我们口里、身上或是某一方面，能够了解不能从别的地方得到解答的东西。

香港抢劫凶杀之可怕及其特殊复杂性，我们在到达罗湖桥之前，从各方面的介绍和叮咛中，脑子里已经装得满满的了，并且考虑到自身已成为社会注目的对象，所以到达之初，我就简直不敢出旅馆房门一步，吃饭都是请侍应人员送来。去台湾的签证又没下文，成天只能在斗室之中转来转去，简直比在抚顺被拘押的日子还难过。

就是在这苦煎苦熬的日子里，盼望得到台湾签证的思虑，和如何答复从离深圳以来人们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在脑子里一直七上八下的活动着。台湾签证老是发不下，我也开始“不安于室”了。由“冒险”试探，逐渐到处乱闯起来。但不管是去买东西，中是在街上行走，只要一停步，总是有人像老相识一样会指出我是某某。于是先由打听“怎么没去台湾”谈起，话题总是归到前边所提的那些问题上去。这些问题，都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了的，如是，写“自述”的这个意念就迅速形成了。当然，那只是动机的一面。

香港这个地方我从前曾经到过一次，旧印象还在我的脑子里依稀可辨。今天一看，真是景物全非，变化确实不小。是的，在我被监禁的二十五年中，不但在中国，不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中国大陆从国民党手里转到共产党手里，现

在我又从一个控制思想的体制来到一个言论开放的社会，由新旧的对比想到人类的未来，我的思想能不波涛起伏感慨万千吗？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共产党经常宣称“改造罪犯乃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把范围缩小一些，罪犯的改造至少也是反映中国情况的一部分吧？长期坐牢（不，共产党叫做“长期强迫改造”）的本身就是不易为别人所知的痛苦过程；尤其“战犯”的改造，不但有其独特的内容，而且是改造措施的“代表作”，外人既不易接触，当然不是走马观花者所能领会一二的。可是，我们在“学习，再学习”中，也学会了一套“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凡是我们所接触过的每一事每一物，都几乎你不能抓住“苗头”，思考出“这是为什么和说明什么”的来龙去脉。今天我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历次参观以及阅读报刊所得，平平实实直言无隐的报告给关心世界、关心中国以及从深圳以来就这问这问那的人们，不仅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并且对我也是一件晚年难得的历史任务。因此我就把它视为职志，一心想完成“自述”的写作。

主意拿定了，对于在什么地方写，却又犹豫起来了。回大陆写？那里说话的特殊规律和分寸，是人人知道的，说出自己由衷的话，不是遭到无情的批判，就得再去坐牢。如果在香港中台湾写，一定会有人怀疑是出于某方的压力，充当政治喇叭。而且台湾的入境签证老是发不下来，香港的长期居留也有问题。想来想去，只有另找一个适宜的地方。幸好最后我接到了赴美签证，在去年 7 月 13 日飞离香港，来到美国。

因为我们去年 3 月被“释放”时，片纸都不准携带，历年的笔记及日记，一古脑儿交出去了。二十五年的历程，还得从头想起。我在年迈脑衰，对时、地、人等方面，难免记忆不清。

如果读者发现疑问的地方，还请来函指正。同时，我也考虑到在“自述”中提到某些问题时，会牵涉到很多人，他们有些还活着，为了顾虑这些人的处境和安全，不使他们遭遇额外的麻烦，就不能在文中明确指出其姓名和身份，这一点要请读者原谅；但是我所叙述的事，却是千真万确的。

在写“自述”以前，我先向各位读者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 68 岁，吉林省东辽县人。比较详细的学经历，会在后文中交待。过去二十五年来的简单历程，该从 1948 年算起，这一年长春失守，我辗转逃到北平，北平易手后改称“北京”。我在“北京”做了两年小商人。1951 年 2 月 2 日被共产党逮捕，押回长春，在公安局里面关了将近两年，这段拘押叫做“反省”。到 1953 年 1 月下旬，中共把我送到“长春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呆了两个多月，同年 4 月 8 日，他们把我送到长春金钱堡第一劳犯改造大队，整天干起烧窑制砖的活儿。

1955 年秋天，我再被关押回长春监狱，次年一月，又被送到吉林省“公安厅”看守所，5 月转送到辽宁省“公安厅”，9 月又转送到抚顺市原“日本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一住 20 年，一直到 1975 年 3 月被“释放”为止。

我在大陆 25 年被监禁期间，曾被强迫写了三次“自传”，三次都是“奉命”写的。现在我却要再写一遍，这一次我是自由的，下笔是自愿的，因为长春这个地方与我坐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就从长春写起。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目击长春围城惨象

日寇投降后，我被军统局派到东北行辕督察处，1946 年 3 月到了锦州，在东北保安局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作文强的主任秘书，负责办理该处的成立工作，但只做了一个月不到，就被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派为“东北九省统一接收委员会”的少将纠查队长，旋即进驻沈阳。

1946 年 6 月，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接任吉林省主席，我辞掉一切职务，随他去吉林市，与军统局就此断绝关系。梁华盛聘我为吉林省政府参议，并兼任省政府驻长春代表，所以我和家小从此一直住在长春。

1947 年秋天，我并一度兼任伊通县县长，但只做了 8 天。

到了 1948 年初，局势逆转，吉林市吃紧，吉林省政府跟着第 60 军撤退时贮存在吉林市的全部弹药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该处被共军不劳而获。

长春城内当时驻的是新 1 军的一个师，师长李鸿，奉命扩编为新 7 军，并升任军长，负责与 60 军共同保卫长春。长春的防务大致上分成两边，西南边由新 7 军负责，东北边由六十军负责。

时局逐渐吃紧，1948 年 5 月前后，长春飞机场随着最后一架飞机的飞离也宣告失守，这时陆空两路对外交通完全断绝，共军的包围圈也越来越缩小。

长春市没有城墙，国军的防御工事便顺着市郊地形建筑，来攻的共军，也大致顺着国军的防守线建立了一道包围圈，双方阵地之间，约有三四里路宽的无人地带。

由于上年秋天长春外围相继失守，进入市区的粮食逐渐减少，到了 1948 年春天，杂粮高涨到约百元东北流通券一斤（1 块流通券值法币 13 元）。

共军包围长春后，不准一粒粮食运到城内，城内的粮价逐日高涨。

长春曾是伪满的首都，建设很现代化，原有 60 万人口，局势动荡时仍有 40 几万，这些人完全靠城内的存粮供应，到了 1948 年 7 月后，粮荒已经相当严重，一般人开始想办法搜索粮食代用品。

在此情形下，人民便想出城逃难，起初，如果用手枪、望远镜等类东西，交给共军，还可以买通卡哨，可是手枪不是公开可以买到的，而且价格越来越高；望远镜市面虽有，也极其有限，价钱当然是水涨船高。不久这两种东西都被搜买一空，此路也就不通了。

有一天，长春周围五六十里包围圈的某个共军卡哨忽然开放，但是时间极其短暂，大家闻风赶至，就又关闭了。无数难民就拖着饥饿的肚子，绕着这个真空地带，不分昼夜，寻来寻去，希冀万一能找到一个放生的机会。

除了在卡哨偶然可以看到共军活动之外，其余都藏在青纱帐（按即高粱田）中工事里，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

难民哀恳说："我们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

共军的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

律。”

有的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其他人就再也不敢近前了。

难民身上带的零星食物，几天就吃光了，有些又回到城里，可是大多数人，想到回城后也难找到粮食，还不是饿死？所以就梦想有朝一日共党会开恩放行。却是在城外没有几天，就饿得没有气力，走也走不动了。

到了该年 8 月，我家眼看也有绝粮之虞，内人也曾带着儿子一起逃生，自然也被共军挡住不放，在真空地带钻了几天，回来后母子俩简直成了呆子，哭泣无言。后来我的儿子才说，死尸遍地都是，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到处腐臭难闻，真吓死人，母子俩回来后，很多天都精神失常。

这时城里有个传闻，说共军的一名连长，目睹奉命不准放人的那种惨状，心里极度不安，就自杀死了。大家听了这个传说，以为这下共军可能放行了，就又出去碰机会，结果仍然是不放，共军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奉了毛主席的命令，你们千万别再过来，过来只有对不起开枪了。”

这是城外的情况，回头再说城里。城里自然没有公开买卖粮食的地方，谁有一点余粮想卖，只有偷偷摸摸的做，而且黑市价钱随口而涨，高粱米最后过两亿元一斤，谁能买得起呢？于是纷纷搜罗各种可吃的东西。

第一种是曲子面，曲子是旧式糟坊制酒用的发酵品，到了伪满时代，已经没有人用它，在库房存放多年，现在拿出来充饥，几乎成了石灰质，又苦又辣，根本没有什么养份可言。吃了以后，人会全身发肿，初看好像是发胖了，其实已是死亡的前奏，过不了几天就死了。

然而就是这种要命的东西，都不容易买到，最后叫价到流

通券 1 亿元一斤。

树叶子早已被采光，米糠豆饼全成了宝贝，特别是豆饼，卖到 1 亿 5 千元一斤。山货行存着的牛皮马皮驴皮的皮革，更卖到两三亿一斤，买回家设法弄软了，再煮着吃了果腹。

南瓜藤也不容易找到，卖到几千万元一斤。我见到过一个老百姓，拿不知几百万元买了一段南瓜藤，也不管那上面有没有须刺什么的，就一下子塞进嘴里吃了。

当时的粮食价值高于一切，最好的钢琴、象牙键子，在街上只要 20 斤高粱米。一栋百来间的大楼，只要一袋大豆。可是谁会有高粱米或大豆？

我家住在闹市的背巷，巷口有个小孩，躺在地下凄惨的哀号："爸爸！妈妈！你们上哪儿去啦，我想你们呀！"他大概十四五岁的样子。有个人去安慰他，他总是不答腔。旁边有个卖水的说："孩子的父母为了逃命将他丢了，他只想他的父母，一股劲儿的哭。"第二天走到那里，他已经死了。这类事情很多，我不过在此略举一例而已。

这时主要的大街上死尸虽然不多，但是路过空房子、背巷子就要小心。所以我在必须走过那类地方时，只有低着头快步，深怕看到什么惨状。

城里的灾荒已经如此严重，共军还不时的向城里开炮，大家横竖已经饿得有气无力，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不过在这么惨的饥荒里，老百姓还没有聚众闹事的。据我所知，曾发生过这么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有个时候，街上出现卖熟肉的，没有皮，说是家里的狗肉。大家一见就抢购一空。有个外科医生也去买，一看是人的骨头，赶紧报告治安当局，把卖肉的抓到。果然卖的是人肉，他的办法是把小孩诱到屋内，一棒打死，斩头、剥皮、大卸八块，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居然做起生意来。治

安当局立刻就把他抓去处决了。

第二件事，是在 8 月的一天，四马路附近唯一的一家小饭馆，有一个顾客吃过饭算账时，把手伸向怀里做掏钱的样子，不到几秒钟，就碰的一声，一个手榴弹爆炸，把自己立时炸死，跑堂的和其他客人都受了伤。我走过那里，听到有人在议论：“他大概是死也要做饱死鬼，又觉得吃饭不付账，见不得人，所以干脆把自己炸死完事。”

新 7 军原驻长春，多多少少有点底子，比较不太紧张，60 军是由吉林撤退来的，没有存粮，完全倚赖空投和就地采买，每天经常有运输机运粮来。先投在郊外，但常常落入共军的阵地，后来改投城内，有时不免掉到民家，老百姓也就不客气的藏着自己吃。

运输机来了，共军就用高射炮打，运输机虽然飞得慢，可从没见被打下来过，但威胁总是存在着的，转几圈想法尽快投完就走。空投原先还用降落伞，后来就光用麻袋，也有压死人的事情发生过。我亲眼看到一个妇人正在屋檐下洗衣服，一下子就被砸死了。

8 月节，中央还空投过月饼什么的应节食物，吃过的直落泪，觉得中央政府实在想得周到。

燃料也成了大问题，后来只好拆空房子做柴火，先从市郊起，慢慢拆向市中心，转眼看冬季快到了，空房子已经拆光，便有人想撬起马路上的柏油当柴火烧，但这时已经到了围城之战的尾声了。

长春虽是孤城，实际上全国同胞都曾尽了一份经济支援的力量。因为城内粮食越来越少，粮食越涨越高之际，就地采购用的款项票面越来越大，最后只好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大面额的本票。

中央为了维持货币信用，准许大家向关内通汇，其时长春的一斤米价，汇到外地可以买一两多黄金。通汇地区从沈阳到广州都可以，所以说全国同胞都多多少少支援了长春的守卫，但附带的也造成了后方的经济紊乱。

据吉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当时长春市市长尚传道被捕后，与我一齐“学习”时的“坦白”说：长春饿死的约有 16 万人。记得长春被围开始时还有 40 几万人，到失守时仅剩 6、7 万人。除了共产党夏初开始围城，封锁不严，利用各种方法逃生，至多不过 20 万人外，我计算一下，他说的数字是合理的。

1948 年 10 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忽然 60 军的布防区域不准通行，后来不久就知道 60 军叛变了。这时新 7 军是打还是降呢？就成了关键问题。

我在被拘押期中，除了碰到尚传道外，还见到吉林省保安处处长李寓春，他们说新 7 军的军长李鸿是不肯投降的，但他那时患重病，已经身不由主，职权由参谋长史说代行。军中校级以下的军官也都不肯投降。

郑洞国是吉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集团军司令，召集大家开会，问大家意见如何？史说首先代表发言，说是全军将士都不愿再战，而且孤立无援，战既无益，就应放下武器。郑洞国当时把大腿一拍，含着眼泪说：“我革命几十年，想不到今天会落到这般田地！”

当时的司令部已搬进中央银行，取它是花岗岩建筑，准备死守。与八路军代表签字的时候，郑洞国还发怒地对空放了一阵空枪，大概是表示战至“最后”吧？

他和共产党代表签字的协议，全部条款是在报纸上公布了的，事隔将近 30 年，我已不能记忆全文了，但有一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共产党绝对保证当时国民党军政人员

身家性命的安全，愿意回家的可以遣送回家。”可是当我在吉林公安厅和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时相继遇到尚传道（从 1948 年一直关到 1965 年）、李寓春，还有“起义的”60 军 52 师副师长欧阳午，居然都成了“战犯”，使我大吃一惊，与签字条文对照，我的印象特别强烈！

人类文明发展到了 20 世纪，居然在长春发生饿死 10 几万人的惨案，共产党不愿旧事重提；国民党又因孤城失守，还者无几，外间知者不多。因为此一事件与我后来的叙述有关联，同时为了悼念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了 14 年，好容易盼到祖国光复，却遭此浩劫，无辜冤死的 16 万同胞，我作为身历其境的目击者，有必要也有义务，把这一事件概略地公诸于世。

第二章　从逃亡到被捕

1948 年长春的粮荒严重之时，我全家的生命也面临威胁，想要逃亡。但是看到共军放行之难，就顾虑重重，而且自己除所爱好的书画之外，别无现金积蓄，就是逃出去，生活也成问题。又一想：我没有杀过一个共产党人，为了向往抗日胜利后实现国内和平，不曾给内战添火，我这个两面派，共产党未必把我怎样，因此就因循下来了。

长春失陷的时候，我从原住所搬到一家古玩铺暂避，内人初时不肯离家，后来看情形不对，也就同往了。

这时见到新 7 军的队伍被共军押送出城，有些士兵将所带的东西如钢盔之类向地猛力一摔，愤然而去。

事变的第二天晚上，街上拉开了广播喇叭，大声呼喊说：“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反动派必须老老实实去军事管制委员会登记，凡有窝藏国民党反动派的，都要依法治罪。”自己一想，一下子当然也变成反动派啦！古玩铺的人也变了表情，非常惊惶。为了避免人家下逐客令，我只好又换了一个地方。

共军一进城，就下令“法币停止流通”，沈阳等地也是如此。这样就逼使法币像钱塘江潮一样涌向非共区，在那里又促成经济紊乱。说来真快，共军进城当时，马上成立了商店，无限制的收买各种物资，老百姓就搜求各式各样的东西去换钱，购买涌进城来的食品，不少人连电灯泡也拧下来去卖，就是一

个也照卖不误。我借住过的古玩铺就是这么办的。

那时我还没有走的意思，别人劝我：你在长春，不是无名之辈，树大招风，最好还是一走为妙。又听说我家已经被抄，回家当然不成，新地方也势难久停。这时幸好有个熟人说，他家小住在长春城外，要出去看望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同老婆当晚就住到他家。那是个大车店，有一排共军也住在这里，他们有事只是互相低声密语，看得出是有意避免跟老百姓交谈。

我好奇地问："老乡，你是哪儿人哪？"

他思量了一下，只说："远呢！"

那口音很不像中国人，但也不便再问。后来我到外边解手，有个人告诉我说：他们是"朝鲜"部队，首领姓金。以后才明白他们原来是金日成的部队，包围长春就有他们。怪不得他们的高层人物，后来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也曾对中共做过支援。"

我到公主岭停了 9 天，又到了四平街转了一下，在那儿听说阎宝航做了中共的辽北省主席，他原来是南昌新生活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那时我投考军校，在那里和他认识，后来在南京正训班受训，他当政治教官，大家因是同乡，我又在新生活视察团干过一段时期，私人交往还够得上"不坏"二字，所以就想去看看他，想能求得前进路上的方便。

他刚由郑家屯搬来，屋内还零乱不堪。我进去，听到他正在楼上讲话，声音很高。我向他的卫士说明姓名和来意，随后下来一个穿毛呢中山装，别派克钢笔，戴瑞士表，三十多岁很神气，自称姓袁，是阎的秘书，说阎正在开会，要他代见，问我有什么事情。

我说我过去是他的学生，由此路过，听说他在此地，所以来看看他，他就问我："你从哪里来，到哪儿去？"我说："长春

来，到沈阳去。”

“哦，那你在长春一定是为国民党做工作了？”

话到此处，我就据实以告。

他急忙问我：“你现在住什么地方？等阎先生有空儿好找你。”

我说：“住隆兴旅馆。我来就是看看他，请你代转达吧！”

出门之后，我才想起把旅馆名称记颠倒了。我一路都是用公主岭拣到的废路条的名字，在旅馆登记。这一次当然是照旧。那天晚上查店很严，就听八路军问店伙：“此地有个隆兴旅馆吗？”伙计说：“我们这里叫兴隆。没听说有那么个旅馆。”当时我已经躺下了，既没提到我的名字，我也就不管他了。

后来我逃到沈阳碰到军校同学崔文质，崔说阎宝航来沈阳劳军，见到他就说在四平到处找段克文，怎么也找不到，很着急。崔告诉我说：“他现在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原东北行辕），你该去看看他。”

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一进门他只带笑不笑地向我点点头，以手示意让我坐下。他正跟几个人谈话，其中有个我在西安有一面之缘的卢迪赓，卢向阎表示：希望能给“北平解放”尽点力。阎就得意洋洋的说：“这倒不用了，什么都接洽好了，几天就拿下来，听信儿吧！”回头就指我说：“你看，这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县长，如果不是今天，早就抓起枪毙了。”

他们要开饭，我说吃过了，赶紧趁机开溜。我这才了解他为什么在四平找我。那天晚上如被他抓住，我的脑袋立刻就要搬家。

回想从长春到沈阳途中，过了公主岭，不时看到一些人在丈量土地，进行土改。过了郭家店，我也在一个农民家里借宿。他家老少六口共分了 17 亩多地，还有一亩多稻田，他们对于领

得土地执照特别高兴。全家有两个全劳动力。晚上一家人盘算起，那块地明年种什么。津津有味，大作其久远之计。当时也正在开始进行斗争，他的大儿子，还背诵这样一句“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他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不久就要去参军。

在沈阳也有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我经过大广场的时候，场中一座耸立的高柱上挂着巨大的红色标语，有一条写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另外一条写着“耕者有其田”，这不是孙总理的话吗？可见得三民主义深入人心，连共产党也要利用呢！

随后我们辗转到了唐山，就是今年大地震的地方，我夫妻住在旅馆。晚上到饺子馆用餐，听到邻桌两个三十多岁的共军干部，边吃边闲谈。这个问那个：“你估计北平什么时候能解放？”那个哈哈一笑说：“唉，你还不知道？已经搭上线了。傅作义的条件，是我们政府成立后，要保证他有一席之地。我们正在考虑呢！”

到了 1950 年的春天，街头不准摆摊，正好我的儿子把留在长春朋友家中的一点字画什么的带来，我就在东单原使馆界跑马场新成立的临时市场开了个小铺，同老婆住在那儿，做古玩生意。早晨赶晓市，下午回来卖。李济琛、谭平山、吕方子等人，都曾是我的主顾。

我怎么会做古玩字画生意呢？那是因为当年在北平读中学时，有个同学家在北平开“大泉山房”，常去他家玩，我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学了些玩艺儿。

以后在长春，日寇投降之后，溥仪所带的字画，全部流落在市面上，这时我就收买了一点，见到不少真迹，再搞点参考书研究研究，也就似通非通了。那时凡是爱好此道的人，路过

长春，都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我也就以此为副业。现在到了北平，正好靠着这一行混饭吃。我把一张辽金画家张珪所画的神龟图卖给了“文物局”，就拿着当时的中共区流通券五百万元（等于现在五百元）做本钱。这一行在当时最倒运，赔得一塌糊涂。

前边提到的吕方子，他本是代表李济琛在香港办文汇报。北平易手后他常来，有时他也光顾我的古玩铺。一次我到他寓所兜生意，他正在同几个人闲谈，其中有一个人问他关于成立“人民革命军”为什么没听到下文的问题。吕的叙述很生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北平局势未变化之前，李济琛带他一早去鞍山会见毛泽东，张澜也在座，李本想在长江以南成立什么“人民革命军”投机。毛泽东出来，向他们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冷冷地握了一下手。李济琛刚开口提“人民革命军”，毛就去洗脸。边洗边说：“唔！那还成立什么人民革命军？用不着。赶快取消！”用手一指李，“你将来当人民政府副主席好了！”回头又指张澜，“你也当副主席！”这时听吕方子话的人，有人打断他的话，插了一句：“就是这样的？那还行？干脆拆伙算了。”吕眯缝着眼睛回答他一句：“事已至此，那可……不这么容易了！”这句话我当时觉得真是意味深长！

去年 4 月我到香港后听到有人说，这位吕先生，后来不知怎么在广西他的故乡被斗争跳水淹死了。接着文汇报就被左派接收了。

我在北平开古玩铺时曾碰到过一件趣事，事关张大千先生，很有意思。

那时的北平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也是我的主顾，他要买一张明末画家石溪的画，我没有，就到字画商靳伯生那儿去“串行”，他就给了我一个石溪竖屏条，在交待价钱时跟我说：“这

可是头等品啊，不能少卖啊！”回头徐悲鸿来了，就拿了去研究研究。

过几天徐悲鸿拿着画回来，问我说：“画是不错的，可是出了个怪问题，因为美术学院有位教授（原是徐的学生）也有这么一张画。”他觉得奇怪，要我一同到那儿去研究一下。我到那里一看，笔法大致相同，画上的题款虽有短行横题和长行竖题之分，字迹却一模一样，图章也是同样的。我也怔住了。仔细琢磨了一会。我向徐说：“这个生意吹了，我要把画拿回去了，”徐说：“怎么啦？”我说：“两张都是假的。”

徐的学生跳了起来说：“段掌柜的，这可岂有此理。这是张群到北平时，我们买了四幅，两张他带走了，一张给另外人买去，这张归我。有天晚上邀张大千来吃酒鉴定。你看上面还有张大千的赞语呢；连他都说是精品，你敢说是假的？真是胡说八道！”我只回答一句：“据我看，纸都是清末民初的。”没有再多说，我就拿起画走开了。

回头问靳伯生，靳听了一笑，打开暗屉，拿出一大堆半成品。他说：“全是张大千在万寿山搞的。这需要很长时间，经过多次填笔设色，找寻专家题款盖章，发霉变旧以后才能出手。”

“关于张群买画这段故事，大千也曾向我讲过，他们那样高高兴兴邀我吃酒作鉴定，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真的，题词赞扬一番，盖了图章。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张大千是名家，仿得又好，有时真比真的还高明，靳伯生那时就吃这个路子。

我回头把这段情由向徐悲鸿一述，徐不禁顿足说：“我和大千是同行，竟看不出是他搞的！”

张大千先生如见到这段故事，也许也要再笑上一次吧！

共产党进北平后，首先修浚城内下水道，然后就急忙招募

民工大挖护城河，和派遣军队掘深及整修中南海。据说中南海历年失修已形淤浅，而且水浊味臭，殊不卫生。据我当时在与北海分界的桥上张望，中南海的积水已被抽干，密密麻麻的军人大约有一师人的样子。正在若干加巧干，发挥“南泥湾”精神[1]。干了约半年才把池底又挖深了一米多。这些臭泥，都是昼夜不停用载重汽车络绎不绝地送到城外做肥料了。这当中，常听到“老北京”在议论：“下水道、护城河和中南海都是联在一起的。因为便于‘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能在清水里游泳，所以这是当务之急。”我不谙北平河道结构情况，只好“姑妄听之”。

我到北平之初，原住在西单石虎胡同周炎的房子。他在东北局势变化之前一直任邻近山海关的绥中县县长。本已在公安局登记，但在 1949 年春，又把老婆孩子留下看房子，自己逃往上海去了。他的老婆年轻漂亮，也许是周炎留恋难舍，到上海转一圈又返回北平。每逢节日或者出于临时的动机，公安系统就会通知他们：带着行李口粮按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集合。事后又放回来。所以他得意地说：“共产党真是有信用。说不抓就不抓。”等到我 75 年 3 月被释放到北平一打听，说是早在 51 年就被押解到绥中县开大会被“镇压”（即枪毙）了。

在石虎胡同和我同院而居的，还有我的军校同学齐兆理。他原在重庆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当总务科长，原籍河北，抗日胜利回到北平，经潘佑强老师保荐，曾在玉田县（或是丰润县，已记不清了）当过两个多月县长，据说是两袖清风。北平易手后，只是开个售卖日用品的小铺子混生活。50 年春，他的老婆张秀芳突然发现一名高级共干是她在山西读书时的老师。经这

[1] 中共盘据延安时，因地瘠民贫利用投奔的青年学生、文化人及干部、士兵等，开垦烂泥地为可耕地。将过程宣传为烂泥湾精神，后改“烂”为“南”。

名干部主动介绍，齐到税务学校学习。将来准备派到海关或收税机构当干部什么的。假日还到小铺看过我几次。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一切都在学习中坦白了。还受到表扬呢！只要能坦白，共产党是既往不究。你看我不是很自由吗？”

到 50 年末的一天，他老婆忽然哭丧着脸到小铺求我代卖一支手表。我一看是齐兆理戴的，急忙问：“这是为什么？”她说：“举行毕业典礼的前一晚，齐兆理被捕押解到玉田县，关在公安局看守所了。两星期前，我曾去看过他一次。”我就问“你见到他了？”她不作正面答复，只是说：“我明天还要去，所以托你卖这只手表。”我又问：“是不是有危险哪？”她勉强挤出笑容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大概不要紧！”但是，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判断：51 年这第一道大关（“镇反”）他是不易过的！

我到北平后，报户口是用段魁章这个名字。虽然不曾忘记，也曾到管区公安派出所简略地表白过“曾任过八天的县长”。那个所长是名年龄不满 20 岁的小伙子，笑着问我说：“你是接收大员，我们是早有了解的！你现在是主动向人民靠拢了一步，我们是极表欢迎的；共产党是坦白从宽，既往不究，你安心做你的生意好了。以后有事，要多联系！”

我后来搬到东单临时市场，虽然没去管区派出所谈什么，可是从所长到以下人员却有时主动找上门来，和我闲谈，谈东谈西，从不曾谈到我本身的事情。有一次这个大个子所长邀我到派出所和一名穿“解放军”服装的青年干部谈过一次话。在路上我动了思量：所长亲身叫我到派出所，是不是“有去无回”呀？到了那里，那名青年干部对我很和气。打听了一些生意情况，最后问我对“土改”的看法。我说：“古玩行的生意，现在最清淡，常是几天不开张，我儿子考进哈尔滨林业学校，连个

洗脸盆我都没钱给他买，生活很不易混。可是我又不懂别的，只好挺一天算一天。至于‘土改’，我认为自从井田制以来，土地就一直是个未得得解决的问题。对于‘土改’我虽没有实际接触，但我决不反对。”我在说话时，一直留神是否会有什么“突变”发生。等到我安然回来，我又责怪自己太多心了。

这是 1950 年 10 月间的事。

大约就从这时起，有一个操湖南口音姓孟的中年干部，常到我店里买些东西，自称是给公家采买，只要我说出价钱，很少打折扣。我旁边有个姓丁的摊贩，因为给龙云卖美金被捕了，他老婆看铺子，没什么生意，姓孟的就不时送给她一点钱赒济她。她同我谈起来，就说：“你看孟先生，又和气、又热情，多好啊！”我同意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转眼到了旧历腊月廿二、三，孟先生又来托我代买大批成套的古书，说是公家急于要成立图书室，务必把书目和价目单，在 2 月 1 日（腊月廿五）交给他。我说：“琉璃厂有不少古书店，何不到那儿去买？”他说：“我知道你生意不好，所以特意给你找点外快。”我真的正在没辙，实在感激他“雪中送炭”。我一整天跑了十几家古书店。他们的生意也正在没辙，我受他们欢迎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向我表示：“如果成交，可以按价给我提二成。”我告诉他们：“可以在一两天内等我通知再决定！”

2 月 1 日下午 4 时许，孟先生来了，一见面就急急忙忙地问：“单子来了没有？我还有事要到别处去，特地赶来作决定！”我说：“来了！来了！”他接过单子看了一下说：“你今晚还得费点事，把这些单子重抄一遍，除了把重复的择其一而外，价目你可以加上一成！我明天下班后带现款来，有多少算多少，全部成交，没问题！”出了门又回头嘱咐我一句：“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不要错过哟！”他走后，我就急忙重抄单子。总计约有

1100 多元，我至少可有 300 多元的好处，想起可以过个舒服的春节，兴奋得真是睡不着觉。

第二天，吃完早饭，派出所长拿着簿子前来查户口，也没说几句话，走了后，老婆向我要钱买米。我说："身上只剩 1 毛多钱，先不要忙。我现在就去通知各书店，等下午成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下午，我刚回到铺子不到半小时，那个所长又来了，笑容满面地向我说："那位解放军干部又想请你到所里扯一扯，你有功夫吧？"我说："那当然可以，可是我的爱人正在丁家聊天，我去找回来，就走！"他说："你去吧，你给你看铺子！保险不会丢东西！"我老婆等我钱买米，正在生闷气，听说我要去派出所，就一改寻常地闹起情绪来，丁太太帮我把她好歹劝回来，我就随着这个所长，前往派出所。一进门，所长就颜色一变地说："你被逮捕了！"两名便衣，给我扣上手铐，用手枪一指，"老实点，跟我走！不准同别人使眼色，也不准再说话！"出门一转墙角就上了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直奔北平市公安局草岚子看守所。25 年多的囚禁生活，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这一天是：1951 年 2 月 2 日——阴历腊月二十六日。

第三章　初上脚镣

到了草岚子看守所，首先进行全身检查，因为我身上除了1 毛 6 分钱和几支香烟外，别无他物，所以过程很简单。

一路上，从担心老婆今天怎么办着想，终于恍然大悟这位孟先生原来是共党的特务（不，他们叫做保卫人员）。他不是买书，而是用这套办法，把我栓住，免得临时不在，打乱了逮捕计划。

我觉得也未免太为我费心思了。我根本没有钱，大陆形势又已完全变化，我又能往哪儿逃呢？

不过中共为什么让我在北平“逍遥”这么久以后才动手抓我？我对这个问题思索了很久，后来了解当时中共参加韩战，眼看联军部队要过鸭绿江，全北方都震动恐慌，中共为恐临时措手不及，就把“日本战犯管理所”撤到哈尔滨，沈阳兵工厂撤到黑龙江，并且计划好往苏联撤退的路线，然后才开始“镇反”运动，清除异己，以免这些“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被抓进牢的。

进了监号以后，发现房间很小，除了一张约 6 尺长的板炕外，只剩不到 3 尺宽的地方聊可转身。门做得很牢，上面有一个小口，蒙着粗纱，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里面可看不见外面。

号子里另外关了三个人，“组长”姓周，是国民党的一名尉级军官，四川省大足县人，我看他带着脚镣子，猛吃一惊。心

想："哎呀！我将来是否……"

其中另一个青年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名，只记得他是浙江人，在"北平市人民政府"当职员，被发现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就给抓了进来。他当时正想戴罪立功，检举他哥哥私藏枪械。

我进来之后，组长就问我："你犯的是什么罪呀？"我说："我是国民党少将，罪恶一时说不清，将来当然要交代清楚。"这本是我一时含糊应付之词，哪知道，我却因此占了便宜，没在此处受到任何为难，这是我后来才理解到的。

晚上，看守一开门丢进一个大包裹，用手对我一指，把门又赶紧关上，我不明其故，组长开腔了："那是给你送的被子。"我一看根本不成个被子，一个又脏又破的布口袋，里边包着一团团的烂棉花，摊不开，只能当单被盖。

天气很冷，思前想后难以入睡。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号子里的组长，原先被押在"炮局子"监狱，因为在韩战期间，他因在监狱里有鼓动暴动的嫌疑，结果被送来这儿，带上了脚镣。

我问他："觉得怎样？"

他说："正在竭力争取立功的机会。"

腊月廿九，门一开又送进一个学生模样的青一。据他说，本来在甘肃天水什么银行当职员，是春节回家省亲被抓的。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自己也不清楚。组长目前猛揍了他一顿说："你这是向我们宣传共产党冤枉好人，真是岂有此理。"又揍了他一顿，然后就出去汇报。回来不大一会儿，有个看守进来，把那青年背着手给戴上了手铐，掐得紧紧的，肉皮压得很深。汗珠子立刻就从那青年额上冒了出来。他痛得哼呀哈呀的，通夜大家跟着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一看，那两只手肿得

鼓鼓的。组长这时改了口气，柔声和气地说："昨天给了你一点儿，都是为你好，请不要见怪。共产党是坦白从宽，据实坦白，起码先能把手铐争取下来。"其他两人也随声附和。那个青年说："只是在学校时曾跟左翼同学吵过架，在老师那里，曾说：'那人是共产党'。就是这个，再想不到别的了。"组长想了一下说："你不该避重就轻，不够坦白，应该自己承认是特务学生，向老师检举别人是共产党……"那个青年不肯承认自己是特务，组长又生气了。"拍"地几个耳光，那个青年也许看情势不好，就改口说："我承认就是了。"组长说："早这么说，不是就没事了。"门外早就有干部从蒙着一层粗纱的小口在张望，组长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不多时间，就有人叫那个青年出去。回来，他神态显得很自然，手铐也取下了。

这段经过给我的感受是：组长的暴行，干部是明知不问，组长的行为跟专制时代监狱的"炕头"（南方叫"水鬼"）差不多，我的心情因此极其复杂而沉重。

春节，难得有几个包子吃。想起过去在市场里看到有人被捕，家中从屋顶到地下都被翻炒，不知我家又是怎样，儿子已去哈尔滨，老婆这些天的生活不知是怎么过的？因而心如刀割，难以下咽。

大年初一，牢门哗啦一开，"碰"的一声又推进来一个庄稼汉模样的青年。他一边被推，一旁还问看守说："把我送进来，到底为啥？"

这傻小子被那"组长"揍了一顿，边揍边问："为啥？你自己明白，快说！"这个庄稼汉回答说："我过春节在亲戚家赌了小钱，一出门他们就把我抓来。"

组长说："春节赌钱的多着呢！为什么不去抓别人，单抓你？是不是当过宪兵、警察、特务？"

庄稼汉说：“这些我都没当过。不过……我只是在家乡被王凤岗[1]编为一名乡兵，哪犯什么罪呀？”组长冲他鼻子一指：“那就是反革命，你知不知道？”

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说法难解，很想接一句：“这个我可不明白！”但是话到舌尖又咽了下去。

过了几天，门开处看守叫我出去，然后用手向外边另一个门一指。这个我明白，出了门，猛见五公尺处，有个卫兵，端着冲锋枪对我高声喊：向左走！就这样地遵命转了几个弯，来到一个房间门口：“进去！背靠墙站着！”我一看一间大空屋子，很长，离我七八丈远的地方放着一张台子，后面坐着一个 30 多岁的人，旁边还坐着个女书记。原来这就是“审讯”。

他点完香烟，开口第一句就问我：“张国卿和王利仁到哪儿去啦？”

张国卿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王利仁是副处长，长春失守后两人都逃了。

我回答说：“张国卿在哪儿我不知道，只听说是逃走了。王利仁在北平‘解放’前，街上遇着他，后来曾到他的住处去过两次，但是他已经乘飞机逃走了，下落我不清楚。”

他又问：“王利仁当时住北平什么地方？”

我说：“住后河沿。”其实我记错了，实际上是北沟沿。

说到这，那名审讯员把手由左向右轻轻一摆，卫兵就下命令：“向左转，回去！”

回到号里，“组长”就问我到哪儿受审，我照实说了，他就说：“你是军统。至少你跟军统有关系。”

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这儿审讯的地方各有不同，你去的那地方是问军统案子的。

[1]据说抗战胜利后，在华北组织地方武力，假抗共之名，实际是共党的特务。

时间一晃，已到了 2 月 16 日，这天下午，忽然又提我，卫兵架着冲锋枪，叫我进了一间空屋。这回是叫我面靠左墙站着，并叫我："要老实点，不许回头！不许说话！"

接着就听着进来一个人，并命令靠右墙站着。

以后又进来一个人，把我那 1 毛 6 分钱还给我。他过去问那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我记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名字了。

"乓"踢了他一脚："他妈的！还不说实话！"

"我叫栗仲元。"

"你为啥改名换姓？"

"怕被捕嘛！"

我听到那名干部掏出盒子炮，把枪机一扳，对我说："左边那个过来！"就把我的左手和那人的右手捆在一起。又下令说："不准互相谈话。"出了大门，上了密封吉普车，两个人押着，一下子就送到前门东车站，上了火车。

在车上又发现多了一个拿黑皮包穿中山装的人，那两个押解我们的人，有事就和他低声密语，看来他是个头子。

到天津喊下车，这时天已经黑了，街上行人稀少，他们催我们快走。我们就用竞走式的速度前进。两个脓包落后有十丈远，紧跟着我们的那个右手插在衣袋里，故意顶出一个尖尖，以示他在握着手枪。经过一路上的自然活动，我和栗手上的绳子就松了。栗就向我示意，脱绳逃跑这的确是个好机会。可是又一想，前面是个什么去处，很是可虑，身上既没钱，不但没地方可投，如果被抓回，反而更糟糕。我便装痴作哑，不作反应。

跑了很长一段路，到了一个大衙门，原来是"天津市公安局"。先按了指纹，就被送进"号子"里。住了两天，又同另外

三个男女青年犯人，押上火车。2 月 20 日晚，到了长春，用卡车送到了公安局。原来那三名干部，就是由这里派去，到平津两地专程押解我们的。

长春市公安局拘留所，是个两层的圆形建筑，里边是一圈铁栅栏，隔成一间间的房子，好像动物园的空心鸟笼一样。看守在中间，上下各号一览无遗。

我被关进楼上的一个号子里。原有两个人，一个是 60 来岁的老年人，一个是 20 上下的庄稼汉，两人在那里盘着腿正襟危坐，动都不敢动。我进去，他们好像不知道似的，我觉得很奇怪，小声问他们："怎么这样坐法呀？"

那个老头儿用很怕人发觉的样子向我低声说："这是反省，可不能随便辞去啊！被人发现可不是玩的！我曾戴过纸手铐，那个滋味？哼！"

这个话很新鲜，我就问："什么叫纸手铐？你是干什么的？"

他用两个手指一比划，大约四五寸见方，接着说："这是这么大的一张纸条，上边掏两个窟窿，套在两个大拇指上帖住，老举着手，如果弄破了，就罚立正没完。我曾经当过保长。"

我说："是真的？你贵姓？"

他只是说："纸手铐是我在来的那个地方戴过了的。"接着是摇摇头，我明白他是不愿告诉我他的姓名。这给我很大警觉，说话和动作，都加深了一层顾虑。

我是坐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我看那个青年人，稚气未退又满身牛气，老是纳闷。在我认为有机可乘时，就低声问他："你是怎么回事？"

他低声嘀嘀咕咕地说："日本投降不久，一天夜里，老大哥跳墙进来，要强奸我的……我气急了，冷不防一顿棒子把他打

死，当夜就埋掉了，我就是吃的这个官司！”

我说：“你们弟兄，必是分了家了，你这大哥半夜跳墙，可真……”没等我说完，他俩都情不自禁的笑了。那个老头就问我：“你一定是从南方来的，他说的是苏联军人！”把大拇指和食指做个八字手势，“他们称苏联是老大哥，东北老百姓也跟着成了习惯。”

我说：“那应该揍死他……”他俩便急忙使眼色，制止我再说下去。

我在这个号子里住了 18 天，才被提审。审讯室是个普通式的长方形屋子。审讯员叫我坐在尽头一张小孤凳子上，开口第一句话是：“你想不到你会有今天吧？”

这句话很不好答，我只好顺着说：“是的，不曾想到我会被捕。”

他二话没问，用手一指门口，“去写材料。”

这个术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解其何所指。我问了一句：“怎么写法？”他“哼”了一声，“写自传嘛！从八岁起！”我才明白是叫我写“自供状”。

写材料室是个百来平方米的方形大屋子，一转圈都是桌子，有 20 人在写，我按照监写材料人的指定地方坐下后，想到两个问题，很难下笔：一、怕我和军统局的关系，要惹起疑窦，纠缠不清。二、想起北平的家庭艰难情况，一心热望交代完了就能回去才好。所以坐在那儿，对着摊开的纸，默然思考了一下。那个监写员跑过来往桌子上拍搭一掌，指着我说：“这不是你当家的那个时候，坐在这儿摆架子！给我写！”这虽然很够受，但我很识相，二话没说，拿起笔硬是开始了。中间，有时不知不觉停了一下，那个监写员又开腔了：“怎么？你又耍骨头啊？”有了这个经验，果然就提高警惕，很少停笔了。在上述两种顾

虑支配之下，军统那段经过根本没提，其他也是能简就简，重点只是放在“当八天县长”上面。一共写了 3000 多字，向监写员交卷，就回号了。一心妄想释放！

第二天一天没动静，我的想法趋于乐观。第三天，吃完早饭就提审。一进门，审讯员就怒气冲冲地说：“你想蒙混过关哪？县太爷！”随向门外一喊：“来，给他戴上！”进来的就是那个提讯员，他先搬来一个铁砧子，然后又一手提一个大脚镣子，一手拿一支大锤子，用下巴向我一呶：“过来，坐在地上，把两腿伸出来！”劈里拍拉，牢牢地给我砸上。审讯员对我一指：“回去！给我反省！”

这对我还是新经验，一出门便摔个大跟斗，摔得皮破血流。哗啦，哗啦走了没有几步，提讯员又咆哮一声：“你给我提着走！不许希里哗啦的！”

回到号里，两个犯友，吓得面色如土，一声也不敢吭！各号的犯人也惊慌地朝我张望，全所我是第一个戴脚镣的，这一戴，就是 5 年！

第四章　逼写自传

我砸上脚镣子以后，思想受到很剧烈的震动，心情非常沉重。家，这时已经无法顾及了。自己只能赶紧集中精神，开快车回忆过去。尤其晚上睡觉没有被褥，只能穿着衣服，在地上原包打滚。冻得难以入睡，思想就更加活跃，想到共产党定会根据“自传”进行调查，事关自己命运，再写时必须力求翔实。

写了 20 多天以后还不见有人来问，便请求重新复审，进行“交待”。

但是看守去了一会回来说：“早着啦！要好好切实反省，要‘竹筒倒豆’，不要‘挤牙膏’。还是反省吧！”

又过了几天，忽然被调了一个号。初到新号，六七个人都不认识，不免拘谨些，所以不敢贸然说话。

组长开腔了：“我们这是学习号，行动不必拘束，说话没有关系。”

我看他很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端详了一会儿，想起他好像有两颗爆牙，怎么不见了哪？唔！我突然想起，我当年在北平读汇文中学的时候，那时他在北平当“小二流子”，曾经来找我救济他。我那时是东北同学会负责人，同学会本身没钱，我还是掏腰包送了他块把钱。不错，就是他。

我就问：“你那两颗爆牙怎么不见啦？”

他一怔，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忘了，那时候我在汇文念书，你曾来找过我。"

他眼睛一瞪，冷笑说："牙疼，拔了。"然后，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儿？"

"我叫段克文。"

"哦，就是你呀！我早就听说，但一直没见到过——你要好好交待，大胆交待，不但要交待，还得要立功赎罪。没有问题。我叫关梦龄，原是长春督察处的督察长，那是长春的阎王殿。你看我今天不是自由自在吗？我这是五年计划，顶多五年。他们还能老押着我吗？"

他又说："长春易手之后，我也跑出去啦！我有点嗜好——抽白面（即海洛英）。到了吉林，一看走不掉了，就到公安厅自首。自首啊！就得打大衙门，占便宜。然后我就上街去抓人。"

我就问："你一个人怎么抓法？"

他说："干部在我后边远远跟着，我在街上碰到熟人，就大叫'喂，老张，你怎么还没走哇？'大家扯了几句，分了手。后边跟着的人上来就把他逮捕了。"

我问他一共抓了多少个？

他说："我那时时常上街，五六个总有吧！"

"学习"开始了，大家席地坐了个圆圈，他坐中间，他说："我们现在学习就是认罪，就是要检讨过去从头到尾的罪恶。就得要像枪毙自己那样，下决心，不能吞吞吐吐，藏头露尾。交待罪行，要把时间、地点、方法，和伙同什么人，都要交待得清清楚楚，确确实实，这才叫交待。"

于是就有人争取发言。我们六七个人里面，有一个家伙是锦州一个戏班子里的管事，因为家住吉林，回家去访问的时候，到了家不敢出门，藏藏躲躲，因此引起别人的怀疑，认为他是特务，所以他在吉林上车回锦州的时候，就有人跟着他，路过

长春，他就被逮捕了。

关梦龄就问：“你就只是这个事吗？”

他说：“是啊！我这就是大罪，因为我心里反对共产党，回到家才藏藏躲躲，这就是反革命嘛！”

另一个人我记得叫杨绍时，因为背诵毛泽东写的“沁园春”词，他自己也做了一首反诗，到处向人夸耀他的才华，因此就被视为反革命而加以逮捕。

还有一个中医（姓名已忘记），曾当过长春中医会的会长，也被抓起来了。

有一个叫林宝华的，原是在什么学校当数学教员，长春变色后，他改名叫杨玉华，和儿子在街上炸油条谋生。因为他改名换姓，被疑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抓了起来。他当时很紧张，一天要提审若干次。有时，回来还没坐下，又被提走。关梦龄也揍过他。还有一个姓戴的，一向在长春开店贩卖文具，因为代售过力行书店的书，遭到和我们同样的命运。

另外一个叫邹什么廷的，原是伪满特务，后来混进军统。在一次抓人的行动中，挨过一枪，成了跛子。他和关梦龄在过去有私交。关说：“邹的问题，政府已嘱他为邹代写材料，不必在会上交待。”所以邹就没有发言。

（上述各人，据我所知，杨玉华判了三年劳改，是最轻的一个。杨绍时判了无期徒刑，是最重的一个。其余的都被判了不等的刑期，只有邹什么廷的刑期我不知道。）

大家轮完了，目光都集中到我，有了在北平的经验后，我的发言大意是：我是吉林省驻长春代表，是国民党少将，罪恶当然很大，现在已经请求重新交待，决心要“倒筒”，决不“挤牙膏”。关梦龄说，不但交待要彻底，还得“戴罪立功”，讲完后会就结束了。

吃完晚饭，忽然提审我，我把带到一间办公室，审问我的人大约 20 多岁，后来知道姓郭，名字不知道，是主管我们的执行科科长。他把我写的自传往桌上一摔说：“你就是这点儿东西？不老实！”

我赶紧承认错误：“思想不成熟，确实写得太简单了。现在反省成熟，请求允许我再写……”没等我说完，他就接过去：“谁听你这油腔滑调？小侯（他叫旁边姓侯的人），把手给他扣起来！”

小侯过来把铐子往我手上一套，“咔嚓”！“咔嚓”！两声，猛力一掐，手铐压进肉里了，当时两手就麻了。第二天就肿得鼓鼓的，肉色变成暗黑。戴完手铐，郭科长就叫我：“回去明天去重写材料。”

我回到号里，发现各号的组长都已经出去开会。关梦龄回来后说：“现在有争取立功的好机会，大家要检举反革命。”接着听到有个号里的人喊：“报告，我检举一名潜伏的反革命！”接着就听到：“我检举十名，都是现行犯！”“报告，我也检举……十名……”

各号一片报告声，形成了检举竞赛。检举数逐渐增加，有的加到 100 名。

我的手痛得厉害，心又烦，没有开腔。关组长就质问啦：“你为什么不检举呀？”

我说：“老朋友都已四下分散，不知下落，新朋友都是商人，怎么检举法呢？”

他从铁栏杆缝里拿进一只鞋（大家的鞋都脱在门外），兜头就揍了我一鞋底，说我太顽固，“你还摆少将架子呀！”接着就左右开弓打我一顿嘴巴：“你检举不检举？”

我说：“我也不能像你那样上街抓熟人啊！”

话没说完，又捱了一顿嘴巴，这次比前次还重。

戴着手铐脚镣，抗又不能抗，躲又躲不了，只好识相："唔，想起了一个人，他是吉林铁路局局长名叫高 × 昆（现已记不清名字了），在北平东单牌楼跑马场看到他和小孩子搞模型飞机，但是下落不知道。"

他说："这不就是了，早这样又何必！"

这时外边已经停止检举了，大家开始写材料。我也把这一条写上，一共只有四十几个字。（等到 1960 年，那时我已经被集中到抚顺，忽然有人把我写的这份材料拿来给我看，问是不是我写的，叫我重新注明是哪年哪月，在哪儿写的以后也就没有了下文。）

在号中听关梦龄说，写材料时可以请求监写员把手铐临时拿下来，第二天我到材料室写材料，向监写员如此一请求，他把眼睛一翻说："你作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儿呀！嫌疼是不是？给我戴着写吧！"

这时科长进屋来，在各人身后一个个看了一下，就到我后面站住了，一声没吭，"碰"的揍了我一拳："你为什么停笔不写？"

我说："我没有停笔呀！"

他大发雷霆，拳打脚踢又揍了起来，我手一挣，铁铐压住的地方就出血了。（后来这地方就化脓成伤，今天我行文到此，余痛犹存。）

第五章　“竹筒倒豆”

我被揍倒在地下后，他又把我拖到墙角，叫我立正站着。我这时身体已软，手又出血，站到晚上，开始打晃。旁边的监守员，拿起大约半尺多长的铁钥匙（开监号用的），专打我的手。（他姓苏，我到现在仍记得。）我当时真是痛到了极点，又气到了极点，心想：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等我写完材料，看你们怎么办。（我始终以为我没有犯过罪的！）

一直站到天黑，才叫我回号吃晚饭。我刚放下食具，关梦龄开腔了：“你还不检讨？”

我那时还不懂这一套，不知如何下手，我就问了他一句：“怎么检讨法呢？”

“真他妈的！你，你要承认错误。指出自己错在哪里，更重要的一点，是保证以后不再犯了！”

我于是照葫芦画瓢地当众承认前一次自己所写的自传，是存心蒙混过关，才惹科长生气，对我的惩罚是应该的，是为我好。现在给我一点刺激，可以使我集中精神，把材料写好。然后，我表示：“我一定知过必改，绝不再犯。”接着大家就“打通关”式的进行帮助，那无非是：嘲弄、讽刺和表白他们自己的“大杂烩”，我就不细述了。

最后，组长指着我说：“他现在是反省，大家不要随便和他说话。”

我好容易才到了“学习号”，能稍稍自由了一下，哪曾想到只不过一天，又陷入草木皆兵的孤立状态，情形比以前更糟糕！

第二天，又提我去写材料，刚要坐下，监写员说：“你怎么尽想好的！还不到那原地方给我站着。”

我又站了半天，快到中午，原来的审讯员把我叫到审讯室，问我：“怎么样？”我赶紧说我错了，自我埋怨，科长是为我好，为了我能交待好问题，使我受些刺激是对的。

后来了解这名审讯员姓于，大约 30 不到，比揍我的郭科长稍稍大几岁。

他微微一笑：“你有这样的认识很好，肯虚心认错，总是对的。政府争取你，以后要好好地写。要竹筒倒豆子，不要挤牙膏，现在去吧！”

我在扣押期间，前后共“竹筒倒豆”式的写过好几次自传，因为所述都是个人的亲身具体经历，所以能记得清清楚楚。同时也怕共产党发现所写的某地方与事实有出入，那反会给自己惹麻烦，所以我写的一切都经过再三核实。

现在由于篇幅所限，我虽然把内容浓缩了，但是和事实绝对没有出入。因为这个自传与我后来的遭遇分不开，所以我今天有重述的必要。

共产党要我写的自传规定从八岁开始，但是年少时代的经过与本文无关，不需赘言，所以我就从“九一八”事变时的学生时代开始。

现在我就向各位也来他一个“竹筒倒豆”吧！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北平汇文中学念高二。我是东北人，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横行霸道和故乡父老所受的凌辱，在我少年心灵上早已是满腔悲愤。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北平，不出几天，东北大部分地

区就沦于日寇之手，学生运动蜂涌而起，跟着东北义勇军也纷纷成立。在 10 月末的一天晚上，我下床收拾行装，把下铺的同学郝继隆惊醒（汇文中学的宿舍是两人一室，分睡上下铺）。

“老段，你干啥？”

我说：“我今夜就回东北当义勇军去。”

他毫不含糊的说：“我也去。”

他是山西平遥人，我说：“你家里不知道，那怎么行呢？”

“那么，”他反问我：“纫秋（我的妻，名叫梁纫秋）同意你吗？”

我说：“已经商量好了，她说：‘如果不让你去，那就太自私了。’”

郝继隆说：“救亡人人有份，你没权利拒绝我，我非去不成！”这时他已穿好了衣服。

我看他热情难却，便一起去前门东车站。在那里会齐了我事前约好的几个人，搭车到辽西的打虎山站下车，投入东北义勇军第 4 路，司令是耿继周。

耿继周看我们是学生，就叫我们在司令部帮忙。

我俩在新民以西到打虎山一带活动了一个多月，发现义勇军的成员大多是惯于散漫的农民，离开田园日久，衣食发生了问题，纪律就渐渐废弛，愈来愈变质，有的就干脆成为“官准立案”的土匪。那种情况下，既不能集中，又没法训练，我觉得那样搞下去，我们的抱负将难以实现，我便和郝继隆私下研究了一下，两人决定回北平继续念书。

小雪初晴的一天，我俩到了白旗堡车站附近，乘间溜到车站路警室候车。忽然来了两个带枪的，进来就把枪对准我俩说：“不准动！”然后先让别人出去，一个家伙在门口举枪监视着，另一个人开始剥掉我的大衣、上衣、毛衣、裤子，一直剥

得只剩贴身裤褂。我的一支小手枪在大衣内也随着一起被搜去了。

刚开始去剥郝，就听车站路警在门外说，“列车快到站了，”那两个家伙就转身跑了。那时正是严冬，我冻得哆哆嗦嗦，上了车，同车的人送了些衣服，才勉强挨到北平。

复学以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汇文中学是知名的贵族学校，我们穿的都是洋服革履，打扮得油头粉面。我感到国难当头，不是救国青年应有的表现，这一切都要不得，便把头剃光，穿上布大褂儿，和同学们各方奔走呼号，有时骑着自行车下乡，号召民众起来救国。

这时候在北平念书的同学会负责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清华大学的鞠宸东、北京大学的李维廉和慕贞女校的杨秀贤。）东北同学们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我们去见张学良，他就批准现洋 5 万元，交北平市政府市长周大文拨发，因此我在同学中也崭露头角。这时学校里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进行军事训练，我又当上学校的军事训练委员会委员（校长也是委员之一），同时又兼任学生军的中队长等，共在校内校外担任 11 种职务。

我在汇文读理科，希望将来给从事实业救国。旋因经济来源断绝，加上纫秋生了小孩，家庭负担日重，就不能再继续读汇文了。所以在高三那年我休了学。只在北平图书馆自修。后来进了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读政治经济系（校长是张学良，秘书长王卓然代理）。这时候已经是 1934 年秋天了。

那年冬天街头上贴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政治队招生广告。我因对南方和国家的政治情况根本无知，看到是“军官学校”的“特别训练班”，又是“政治队”，自己揣摩，定是为对日抗战作准备，而且写明每日发津贴 20 元，一年毕业

后以中尉任用，这都很合乎我的要求，我跟老婆一商量，觉得既可遂我抗日的志趣，又可多少节省点钱供作家用，时间又不算久，觉得非常合适。于是就去报名。

报名的有几千人，初试只取了 70 名，我居然被取在前 20 名之内，然后全国各处初试合格的集中到南昌复试，又刷掉一部分，共取了 140 多人，一起到江西省星子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施以入伍训练。半年后，在 1935 年秋天迁往南京，改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政训班。

1936 年春季毕业，核准编为军校第 11 期政治队，主任先是酆悌，后是潘佑强。毕业之际，多数同学参加了复兴社，我也是其中之一。

毕业后全班人马被编为新生活运动总会视察团，团长是钱大钧、副团长刘翔。视察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六个省市。我先在团部当宣传股兼交际股股长，视察上海后，我请求到第一队当视察员，该年 8 月工作结束，10 月我被派往陕西，到驻在朝邑的 42 师（师长冯钦哉，杨虎城嫡系部队）补充团政训室当中尉助理员。

这一年 12 月 12 日下午 2 时许，我正在给干部们上课，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忽然总值星官苗子雨（营长）进来向我耳语：“团长有命，赶紧下课吧！”

我看他神色有些仓皇，知道有异，出得门来，经我再三问他，才知道蒋委员长在西安出了事，该团奉命马上开进潼关。这时，已经开始整装，重机枪正在准备上驮载了。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的思想顿时“开了锅”！真是万感交集，涌上心头！

我的顶头上司——少校训政员，姓胡（名已忘记，团里的人都背地叫他“阿胡”），江西人，是军校三期生。

这个部队，本是杨虎城的嫡系，对于中央派去的政工人员，特别是落落寡合的“阿胡”，视为派来监视他们的特务，都敬而远之。我到那里虽然只有两个月左右，但他们知道我是刚毕业的学生，语言、习惯又很相近，所以上自团长李景山、团附赵百朋、赵文灿、以及营长连长等，都处得很不错。许多话，他们不跟“阿胡”谈，却可以跟我说。

这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行动虽很紧张，但都表现出不愿意去潼关的神情，不是唉声叹气，就是趦趄不前，我觉得西安事变的情形虽还不太清楚，但如果恶化下去，国家等于自取灭亡，个人一切也随之毁灭，忧心如焚，盼其好转，但自己地位太低，又觉无能为力，徒叹奈何？

出得门来，遇到团附赵百朋，问他情况，他说：“就我自己来说，真是官身不由自己呀!”这时另一位团附赵文灿也到了谈起来，他也认为去潼关的事关系重大，至少应该看看情况再说。我主张：事情关系国家兴亡，他们应该和团长商量。他们听了很是踌躇。

这时我们三个人就去找营长苗子雨，苗认为：团长是我老师，如果我去和团长说，他们倒可以在一边帮腔。

团长姓李，50 多岁，山西人，汉学颇有根底，我有时候请教他，次数多了，他说：“不必老那样‘报告团长’，你称我老师我倒高兴。”所以私下我就称他老师。

这时我表示：“去是可以去，但是你们一定要进去帮腔。”他们答应了，我就鼓起勇气到团长室。

敬礼后我就说：“现在外面情况我多少知道了，我很年轻，说话对不对请老师不要见怪。当日我到团部就想到可能就是此地的主人，能把我送回家乡重见父老，现在傅作义在百灵庙刚打退日寇，狼子野心的日寇正在准备卷土重来。如果鹬蚌相争，

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乘机蠢动。今天我团如果开往潼关，各路中央军必然蜂涌而至，战端一开，就可能酿成大内乱，伺机而动的日寇，亦必前来坐收渔人之利，则中国国亡无日了！后世史家，究其始机，老师恐怕要落为千古罪人。同时我因孤力作战，虽有潼关之险，亦势难持久。如果不去的话，老师虽可能要受过，但是西安情况很有好转的可能，那么，中国化险为夷的一线转机，就是老师给留下的。”

此时，两位赵团附进来了，我继续说：“我觉得个人安危事小，国家存亡事大，老师读书明理，当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我冒昧陈词，不知对不对？”他们两人从旁插嘴说：“段助理员的话有些道理。”

团长就问他们两人：“你们意思如何！”他们又不约而同的说：“事情关系太大，值得考虑！”团长沉思了一下之后，就摇电话给师长说：“报告师长，你如果看在老朋友的面上，让我回河东（山西）老家，从此退休；如按军法，就是杀我，我也不去潼关。”然后眼泪汪汪的说：“告诉外面卸装，说潼关暂时不去了。”

我们在旁边非常感动，表示要和团长共进退。团长对我说：“你回去吧！事情就是这样的啦！”

我回去一夜未眠，第二天，赵百朋说：“老段，中央军樊崧甫师团已经进了潼关到达临潼啦！”这时全军都欢笑颜开。过两天，补充团被调到大荔师部后，团长就调参议，另外一位姓王的接任团长。不到几天，冯师长就正式起义，并且活埋了杨虎城派去游说的军需处长，以示与之断绝关系。

12 月 25 日下午，蒋委员长脱险后，全城挂旗，军民欢呼，都说中国现在得救了。

第二年春天，我接到命令，要我去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

开学后不久的一天，蒋委员长在降旗时说："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日寇已经在卢沟桥发动战争，向北平进攻，我已派了七个师北上，战端一开就要抗战到底。"大家听了非常激动，一致要求下山抗战，我觉得蒋委员长确是中国的救星，只有他能领导抗战，他是我心灵中的唯一主宰，内心景仰无比。

蒋委员长安慰大家，不要自己打乱训练计划，要大家下山时再下山，各人才慢慢安定下来。

庐山结业后，我被派到 57 军 111 师政治部，该部原在河南漯河驻扎，我赶到那里他们已转陇海路东开，一路上我在后闻风追赶，一直到江苏南通才追上。

此时南通有些学生——徐惊百、孙卜青、张继岚（女，南通张孝直的长孙女）、孙振中、邹强、王衍、王觉、陈瘦秋、周培炎、薛鹤年、吴直等十余人，请求参加救亡工作，政训处将他们编为 111 师政训处义勇宣传队，派我为队长，当即出版阵中日报，报导战时消息，并成立话剧团，对部队和民众演出。他们除了只领军队给养和服装外，不领任何薪饷，而工作极为认真和热情，大家相处很是融洽。

一天，我到师部联络事情，遇到北平汇文中学和东北大学的老同学王振乾，回到政训处曾提及此事。过了几天，复兴社小组开会时，秘书叶崇统对我说："你说的那个王振乾，原是共产党，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是主要人物之一。通缉在案，你要注意啊！"这件事，我当时曾想：现在既然国共合作了，只要大家能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努力，又何必旧事重提呢？他是我的同学，我不该出卖老朋友，想起他胸前符号已改为王维平，我就遮掩说，他究竟是在师部工作，还是外来办事的，我还不清楚，等以后再看看（其实他是在师部当秘书）。我就这样敷衍过去了，

上海失守以后，部队沿江向西转进。在扬州作了一战，然后转驻宝应。这时，我已发现徐惊百、孙卜青、张继岚、陈瘦秋等都是共产党，不论在工作上或思想上，都已发生明显的分歧（应该说是对立）。这时队员只剩了 9 个人，除了阵中日报还可以勉强维持外，其他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我到淮阴招来三名新队员，他们竟群起反对。理由很奇特，说宣传队是由他们成立的，所以新队员也只能由他们延揽。这么一来，对立就更表面化了。1938 年秋天，部队由苏北西进增援武汉，他们要介绍另一共产党钱薇阁入队，我不同意，遂形成水火。在这之前，我为了避免摩擦，曾请求王维平出来和解。结果，我把两个密不相通的中共地下小组给接上线了。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促成明暗联合阵线，共同反对我。

有一天，行军至安徽嘉山县东高庙地方，我召集了一个野地会，我发表的大意是：“我们在思想体系上尽管不同，但都是在救亡抗日道路上聚集在一起的，我觉得我没有作过违背这个前提的事情，当前情况既然难以继续下去，我决意明天离开宣传队，如果你们认为我不爱国，你们可以随意指出，也可以用手榴弹在此地把我炸死，就说我是自杀的！”

他们听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发言，我当即向师政训处请调，第二天由新来的秘书龚晓清兼宣传队队长，我遂到 665 团当代理训政员。

在西进行军途中，全军三分之一以上患了恶性疟疾，我也是其中之一，途中获知，武汉已弃守。全军到合肥后又开回苏北，接着转进山东鲁南地区。因为我在淮阴养病，遂流落苏北。

是年冬天，军校同学唐旅程到淮阴担任苏北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淮阴弃守时，我就跟他一起跑到泰州。

89 军军长兼苏北青年团筹备处主任李守维，以三民主义青

年抗日义勇总队这个名义，在泰州号召成立队伍，作为该军的补充部队。支队长黄家驹派我为支队附，到他家乡召集人马。

不久义勇队名义撤销，黄任仪征县县长，部队尚未正式成立，我便去兴化，江苏省国民军训处当少校处员，主编国民军训及教战两刊物。1940 年 2 月，我被调到 89 军任中校科长，在尚未办完交代的一天傍晚，正同朋友们在河中划船消遣，忽听岸上有人找我，我搭腔后，他说："韩主席找你，快去！"我与韩德勤不相识，官又小，但从来人的神色语气来看，显然是真的，我就跟他到了那里，见有唐旅程在座，我明白了，事情的发生是与他有关系。这时韩向我说："江南浦东的一股抗日队伍被日寇压迫太紧，活动地区太小，他们就乘船到江北来，因为事前没有通知，他们在启东登陆时，与地方守军保安二旅旅长张翼发生冲突，战斗已持续一个来月，越来越大，我派 89 军政治部主任李歧鸣和保安处长顾锡九前去，没调解成功。现在经唐旅程推荐，所以派你去。"我说："他们都调解不了，我人微言轻，怎么行呢？"他说："因为这股部队原是由在江南作战时流散的东北军组成的，首领张大同是黄埔四期，也是东北人，他们对苏北情况不熟悉，派去的人他们不信任，所以你去准行。"

在韩德勤这个圈子里，只有我这一个东北人，我看事不能推，就答应"试试看"。他马上写了："兹派段科长克文视察东南军事，希各地军政机关等予以协助"的手令，并发给我 500 元法币，当晚即上汽划子，自兴化出发。到东台后，改坐摩托卡到南通吕四镇（海岸渔场），见到保安第五旅旅长孙信符。据孙说，双方伤亡很重，我只能从火线边缘通过，但亦很危险。次晨他派了 6 名枪兵骑车送我，刚进入离海岸不远的火线地带，双方就一齐向我开火，把摩托车打翻。我高叫："我是韩主席派

到启东来调解的，不要打枪!”南方军让我一个人举起手到前面去谈话。我依法照办，说明来意后，他们就带我到启东见他们的首领张大同，他们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第四纵队，我当即把韩的手令给他看过。

然后我说：“我本是国民军训处少校处员，现在调升 89 军中校科长，尚未到差，以我的职位本来不堪当此重任，但韩主席对此军事冲突，忧心如焚，认为敌寇当前，深盼即速结束这一阋墙之争。韩主席知道你们都是东北人，所以才派我来此，你只要肯停火，我可以住在此地当作人质。”

张大同考虑了一下，出去一会儿回来问我：“如果对方停火，我可以答应，但同时对方要后撤，中间要有缓冲地带。”我说：“我马上去保二旅，征求张冲青（张翼别号）的意见，并用电话请示韩主席后决定，我想不会有问题。”

这样双方火拼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韩德勤下令把江南队伍调到吕四镇和海福镇一带，接替保五旅防务，司令部驻吕四，听候改编。

过了十来天，有一天晚上，我在司令部和张大同正在聊天，忽然闯进一股枪兵，并且放枪威吓，将张大同挟持下海。原来是一个浦东土著的大队和张大同的卫队一同叛变又逃回江南了。

剩余部队的支队长徐承德、李文元、阎增等接我到海福镇开会，大家同心要举我为司令，我确实觉得难以胜任，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支队长们无论如何也要抓住我不放。旋经韩德勤命令将这支部队改编为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第二纵队，保安五旅旅长孙信符兼任司令，我为副司令，负实际责任，司令部仍设原保五旅旧址。

一天，我的副官尹鸿义说：“司令，不好了，孙信符是汉奸。”我说：“不可胡说八道!”他把一包文件一边打开一边

说："这是他们搬家时，随着一些东西忘在抽屉里的。"我接过一看，内有派令状两张，其一是："兹派孙信符为和平建国军第 6 路司令。此状。主席汪兆铭。"另一为："兹派张能忍（保安第十旅旅长）为和平建国军第 6 路副司令。此状。主席汪兆铭。"另外有汪精卫的特务头子丁默邨给他们的多次信件，内中要求他们在三月某日举事，并规定送弹药路线以及臂章符号样式、旗语、灯语、号音等等。顶头上司竟是汉奸！我真是大吃一惊，但我冷静下来按照具体情况判断，张能忍本人未必知道此事，可能因为他们有私交，孙信符遂假借他作资本而已。此时正是三月初，我召集支队长开会，并未说明孙的叛变可能，只以日寇有进攻孙部模样，恐其战斗力不强，指示部队对孙部采取监视态度而已，后来孙部未曾举事，想是与此有关。

我在与日寇战斗中，腿部曾为弹片划伤，初不以为意，后来在视察途中忽然严重起来，遂在实业警察大队部（棉垦公司的私设组织）请大夫开刀治疗，过几天我回到司令部，忽然想起该项文件忘在警察大队部床下，急派副官取回，发现显然经人打开看过，我仍不以为意，想不到这一疏漏使我几遭杀身之祸。

民国 29 年 5 月 18 日，我忽然接到韩德勤电报，电文是："段副司令克文，兹有要事面谈，即速来省，并报启程日期，主席韩德勤。"

我虽然对命令中预报启程日期有些怀疑，但也未深究，第二天就和税警总团丁旅长乘汽划子到了兴化。上岸后马上去卍字会见韩。他除了一般敷衍的话外，未涉及什么"要事"。孙信符的这包文件我一向是随身携带的，此时本想交给他，但在座都是不认识的人，我已知孙信符是韩的亲信，怕被别人发现，使韩难为情，我在告辞时，要求另约时间和他密谈。他说："后

天下午还是在卍字会见面。”

我出来后找唐旅程商议，他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只说：“你把文件交给主席算了，不必多管闲事。”第二天一早，我又到了国民军训处找参谋长雷丰恒，他说：“此事有问题。孙信符是你顶头上司，以后会有人说你想当司令，伪造这些文件来陷害他，无证应对，就不好办了。你最好拍个照，留作证据。”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找不到照相机，只好到照相馆去拍，次日（5 月 21 日）我去拿照片时，出来十几个手持武器的人，把我押到一所孤楼关起来。

不几天，日、伪军袭击兴化，在撤离的船上遇到唐旅程，他说：“没有问题，主席会放你，是一场误会，不必着急。”

到东台后，我偶然听说唐旅程应邀去沙沟见 89 军军长李守维，吃完饭乘船归途不出三里路，就被截住枪杀了。我当时想：出事地点离军部不到三里路，如果是土匪抢钱，他的财物皮包却完全未动。而且往来船只那么多，何以单独他的船出事了？并且正是发生在我被扣押之后，所以我当时怀疑是与我的问题有关。后来从我的结局看，我就肯定了这推断是正确的。至少是韩德勤授意，由李守维干的。

我一共被扣押了四个月另一天，从来不闻不问。过不了多少天，就送我到另一个特务连看管。起初对我关押很严，由于突袭跑散后，我仍自动回来；而且我的情况他们都已渐渐了解，对我很同情，因而对我的看管松弛起来，只要不离岗兵视线，我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这一天吃早饭，我又被转押到一个新的连部。连长叫曹得胜。此时正是黄桥事件，89 军与新四军冲突，李守维军长被水淹死，东台也被新四军包围，韩德勤感到自己安全成问题，那天早上出来视察阵地，他看到我说：“你怎么还没回去？”我

说："主席无令我怎么能回去，"他说："过几天你去副总司令部当少将高参，你同意不？"我说："当然以主席命令是从。"他临走时还问我对于与新四军作战，有何高见，可以写一个报告给他。

韩走后，曹得胜请我到阵地去看做得好不好。路上，他对于韩还不知我是否已回部队这一点，很表惊疑，让我注意。我看他不是有意试探我，而是出于真挚的同情，使我很受感动。回到连部，他把李排长叫来，要我搬到该排去住。那个地方是一座孤立宅院，三面是庄稼，一面是芦苇塘，相当安静。

那一天是 9 月 21 日（阴历八月廿日），天将黄昏，我正在给韩写作战意见，忽然来了一名传令兵，高声大叫"报告李排长"，说：

"连长有紧急命令，叫你派一班人，戴帽子，不扎皮带，拿着锹，赶紧到连部报到。"

他出了门还回头重复一句："这可是连长的紧急命令啊！我可传达了。"

李排长把人派出后，略加思索，就带起盒子枪走了，大概是到连部去看动静，我也觉得这么晚带铁锹出去事有蹊跷，我就用示意的口气，叫我的副官张克斌去买香烟，他看我桌上还有好几点，点了点头，表示心中有了数。

他走后我出门在河堤上徘徊，只要我在门岗视线以内，他们是不管的。

过了一会，张克斌回来说："大事不妙！我遇到一个老乡（兵），我说给司令买香烟去，他说：什么四令八令的，还不赶快跑！我问：怎么啦？他往那边一指，我顺着方向一看，派出去的那一班兵正在挖坑呢！"

我问他："挖几个？"

他说：“两个。”

“挖了多深啦？”

“一尺多深了。”

我听了这话，叫他还是进院去不要慌张，听我的指挥，这时我身上只有 16 元，我给他 10 元，自己留 6 元。

不久，李排长回来，天色已经要黑下来了，他说：“这时候，有饭就吃，有觉就睡，还是早点休息吧！”我觉得他言词神色果然不对劲，我说：“我正在想主席交给我的任务，马上就回去休息。”

我注意他进院后的举动，他不但没有解下盒子炮去休息，反而低声要卫兵把后门关上。

此时正值换岗，一个新兵吊而郎当刚巧站在门外，李排长在院内低声叫他：“进来！”

我这时顾不了体面，快步走向门旁偷听，李排长说：“你可要看住他，跑了就埋你！”

我明白了：这坑是为我俩挖的。

不等岗兵出来，我给张副官做一个“走”的手势，就进了离门不远的交通沟，这是有名的“里下河”地带，农田都是挖河底垒成的块田。跑不了几十步就得淌水，我本来不会游泳，但是不能不跑，跑了一阵子，发现后边有手电筒乱射，声音嘈杂，我更不顾一切向前狂奔。

前面遇到一条大河，望不到岸，我一步步前进，越走越深，水没口鼻，周身憋得发麻，恨不得喝一口反而痛快。我忽然觉得河底有草，我俯身把草铺在一起，蹲在上面，猛一挺身冒出水面，才缓口气，来回几下，遇到几个漂来的玉米杆子，就一把抓住，依赖浮力勉强前进，还没上对岸就累得躺下吐水，那是海水倒灌的水，磷质特别多，真是难受。

我想到“抗日救亡”竟落得这个地步，真是悲愤灰心至极。

我本从东台东南逃出的，天色刚亮，发现东台在我的东南面，正是一个晚上绕东台整整跑了半圈，相去才仅二三里路。

这时正好遇到一座大堤，我掉头向西方急奔，经过一个看庄稼的楼子，看帐子里睡了一个人。我当时穿的是绸质便衣，恐怕老百姓看我满身是水，一定起疑，我过去一把把他抓住，喝令不许动！拿起他的破衣裳一边换一边说：“你要动我就打死你！”临走时我对他说：“我的衣服比你的好，我是跟你换的。”

我顺着河堤走了一段路，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向西走，从仙女庙过江，经镇江到上海。

到上海后，我的喉咙完全哑了，经朋友葛佩乾、汪兴文、武谟宣等给我延医治疗。我越想在苏北这段几乎丧命的遭遇就越气，我一定要到四川去告韩德勤一状。

朋友们为我筹了 1000 元旅费，我就经香港，广东省的淡水、惠州、韶关及贵阳等地，到达重庆，此时是 1941 年 1 月。

在重庆住在朋友陈开国处，他是重庆三青团书记。但住在那里久了不方便，他遂把我送往一间破庙栖身。

我在重庆曾找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控告韩德勤，等候四个多月，结果毫无下文，眼看所带钱财物品已用光，不能再呆下去。遂去河南洛宁找潘佑强（他彼时当补训处处长），我在那里又患了足疾，经过三个来月治好后，潘老师介绍我去西安游干班当教官。

我在西安遇到汇文老同学郝继隆，谈起来，知道他在西安秦丰烟草公司工作，他说总经理王源凌也是东北人，现在正需我这样的人，到南方抢运进品原料，待遇不错，薪资外实报实销。

我虽不谙此行，但想起以往伤心事，我也乐于就此改业。

一去就被派往广西柳州接运由香港进口的制烟原料，以后改从缅甸仰光进口，我遂转往昆明，正打算去仰光公干，太平洋事变发生了。

为了抢运物资，公司派郝继隆到昆明，我怀疑公司是派他来监视我的，我想以我自己的资历，如今为大财东跑腿，实在犯不上，遂辞职而去，郝当时极为难过，我一言不发的坚持到底。

从此我就流落在昆明自己做起生意来，混得还不错，到 1943 年初，潘佑强到昆明任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副教育长，下榻在我家中。我见我抱了一个将满月的弃婴抚养，很觉奇怪，怀疑我与这婴儿有历史关系。询问之下，我说明不忍坐视这小生命垂危不救，同时也免得回家寂寞的实情。他可能对此留有印象吧！到了 1945 年初春，潘回到重庆，曾打来一个撮合婚事的电报。

我的妻儿在七七事变后，由北平回到故乡东北，想起他们在日寇铁蹄下过着那样凄惨的生活，我实在无心也无资格谈这个。但潘是我的老师，如此盛情，我不能不去重庆敷衍一下。谁知道一去竟使我和军统局扯上关系，在“特务”名义下被中共拘押了 25 年。

战时重庆旅馆很不好找，听说军校同学符 ×× 住在新世界旅社，常不住在房中，我就在他处下榻，两人见面谈起一别十年来的个人情况，他了解我对江苏情形比较熟悉，而且在那里有旧部属，他在这方面问了不少问题。

过了几天，他告诉我说戴先生找我，我没有姓戴的朋友，颇觉奇怪，符告诉我戴先生就是戴笠——戴雨农，我心想我又没有犯事，他找我做什么？

符说，盟军计划在苏北登陆，因为我会点英语，又在苏北

有关系，很需要我去做联络工作。

我这时才知道符是军统人员，是张发奎那个战区的外事处长，来重庆办事。江苏事件这时在我脑中重又浮现，我已成为惊弓之鸟极不愿再回到那地方去，我也不愿再搞政治工作，尤其是军统局的秘密工作，外间的传说很有恐怖性，我没有受过这种训练，而自己的个性又觉得不适宜，所以心中很踌躇。

符 ×× 以国家大义说服我，我看目前情况，德国已战败投降，日寇也作垂死挣扎，如能早日结束战争自是好事，我终于答应考虑。

符说："这还有什么考虑的？我们是同学，不应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袖手不前。我们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心想，既然可以做些事情，又可以恢复旧职，就答应下来。第二天他带我去重庆曾家岩见戴笠，戴说得很简单："你对江苏熟悉，国家需要你，军统局派你作少将专员，蒋委员长派你去苏北当宣导委员，你也可以用些人，战时你在那儿负全责，时机迫切，你尽可能快些出发。"

以后我保荐江苏老朋友陆中强，同学李艾三为上校组长。在 1945 年 7 月末，我们三人到了西安，想由陇海路去苏北，有一天，正在和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文强接洽安全及道路等问题时，忽然外面欢声雷动，原来日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赶到苏北时，大局已定，遂在徐州、海州等处打了几个转。两个组长，李艾三回商丘省亲不知下落，陆中强去江苏省政府另找出路。

我一个人在年终时到了上海，军统局在法租界杜美路设了个办事处，我将此行写了报告送去，心中想此行任务可以算完结了。就等待批示离开。

直等到第二年即 1946 年 1 月，一天忽然接到通知，戴笠要

见我。我按约去，出来的不是戴笠而是人事处长龚仙舫，他说：戴有急事外出，委他代见。他除了表示，我此行等于白跑一趟，就只问跟张学思有什么关系（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日寇投降之际，曾在重庆发传单要求释放张学良。）我当时很吃惊，我和张学思是北平汇文，南京军校两度同学，他怎么知道？我只好据实以告。

龚叫我当天就去北平，找文强报到，并谓飞机已准备妥当。我自己私事也来不及办，傍晚时分就到了北平和文强见面。他刚由锦州回来，因与俄军没有办好交涉，还不能正式接收，所以要我在北平先等一下再说。

不久，我得到戴笠的电报，叫我策动张学思，并答应代请释放张学良。

我以为张学思还在重庆，至北平才知道张学思是中共辽宁省主席，我觉得此事关系重大，思绪立时就波涛汹涌起来：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接着国共又要起摩擦冲突，实在与我希望中国能够进入和平建设之愿相违，我如去策动张学思，等于是给国共摩擦又添了一把火。可是：如果拒绝，岂不成了抗命不前？眼看要和久别的妻儿见面了，如受到纪律制裁，未来真是不堪设想！又想到东北父老在日寇铁蹄下过了 14 年苦难生活，如果再在东北发生战事，岂不又使他们刚跳出油锅，又下了火坑？而且张学思的思想，我是知之有素的，能否使他转变，自己也确实无把握。真是左思没有路、右想又不通，愁肠百结，难以自决！

闷坐愁城，苦思了几天，终于下定决心不去做这件事，给戴回了一封“容相机进行”的敷衍电报，就一心想摆脱这个是非漩涡。

因为我在朋友家，成天愁眉苦脸的沉思默想，不出去作任

何活动，连从上海来找我的尹鸿义也生了疑心，痛哭流涕的又跑回上海。从朋友招待的前后差别，我发现我的老朋友至少也疑心我在故人面前要什么瞒骗招摇的勾当，但我又不能吐露内情，只好由它。

是年二月，文强和俄军办妥交涉，我就随他到了锦州。那时要组织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文派我担任秘书。只是做了十几天事务性的筹备工作。接着熊式辉在沈阳成立东北九省敌伪资产事业统一接收委员会，我担任少将纠查队长，业务是纠查接收中的违法犯罪问题。刚成立不几天，就传来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我觉得这是我离开军统局的好机会，就暗中做离开的准备。

进驻沈阳后到六月间，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接任吉林省主席。我就抓住这机会，先叫我所保荐的两名上尉督察，自动请长假去职，然后我就正式离开军统，从此断绝了关系。到吉林后，梁华盛派给我三个工作，第一个是吉林省警务处副处长，第二个是吉林省督察处副处长（处长由某师师长兼），第三个是吉林省政府参议。因为前两个有实际职务及工作，我不愿再搞下去，只担任了参议。

可能是看我对于前两个工作不满意，旋即派我为吉林省政府驻长春代表，办理省政府在长春的各类事宜（其中包括接收）。到 1947 年 7 月，由于伊能县长王竹章负伤请辞，梁华盛派我去接代，我到伊通 8 天后，去大南屯与驻军开会，在返回任所路上，伊通已再次陷入共党之手。我遂返回长春，照顾逃来的民众和部队，以后长春外围逐渐落入中共之手，长春成为孤城，围城惨剧接着就上演了。

一筒“豆子”就这么“倒”完了，读者所看到的就是我为中共所写“自传”的节略，除了非必要的细节有所删减以外，

我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添枝加叶，损我光明磊落的本色。除了“自传”以外，中共还要我写了一份社会关系资料调查表，作为从各方面调查研究的依据，因为没有重复的必要，所以在此从略。

我在狱中把“自传”写完后，心里颇觉平静，当时我认为就我个人经历来看，我既没有贪污，也没有法外行为，对人民更没有犯罪。同时对共产党，我没有破坏，也没有杀害过共产党员。我自己为了国家和平，不愿增加国共摩擦，总算付出了个人代价。我在江苏和共产党人打交道，那时虽是国军政治部人员，我不但没有危害他们，反而被他们挤出宣传队，从而流落在苏北。

而且我在“自传”中交代的一切事物，当时都有确实人证，例如：王振乾在 1951 年是“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曾泽生部）军部政治部主任；周培炎 1945 年在重庆当邮务员；张继岚 1943 年在昆明见过两面；王觉在日寇投降时在安徽阜阳中学当音乐教员。这些人都健在，绝对可以证明所述是实。

同时我也想到“七七”事变以来，共产党曾“郑重”声明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愿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而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始终拒绝汉奸汪精卫的威逼利诱，同意和共产党合作，坚持抗日到底，终于取得抗战胜利。我救国无罪，我没有违背人民利益，我曾下决心，将来我要为中国人民的美好前途奋斗！

自传写了 25 天才写完。枝枝节节毫无遗漏。审讯员看了，还说写得很潇洒，很风趣。我虽有“受宠若惊”之感，但他不对我的案情作任何评论或透露，也使我失望。不久，我很快就懂得了他不过只是起“机械人”的作用，上边没有指示，他若乱说乱道是要犯错误的。这“错误”二字，在共产党几乎是

“纪律”的同义语，他可吃不消的。

第六章　“红楼梦”

这时“号”里又送进来一个人，自称马尚，是由长春监狱解来的。有人问他判了没有他说他因中统特务嫌疑，判了七年，已经快二年了，再过五年就可以出去，言下露出一片希望。又有人问他为什么戴上了寸步难移的小脚镣？他好像自己也莫明其妙似的含糊其词说：“是最近犯了错误。”

又过了些天，到四月下旬，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忽然一个一个指定我们带着随身东西出号，最后就只剩马尚一个人，他可能是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仍是若无其事似的坐在那里。我们临走时回头一张望，全拘留所也只零零落落的剩下几个人。据我后来到长春监狱所知，这些人在不到一个月后，全被处死了。马尚在临刑的时候，曾愤怒的指责：“七年是你们判的，为什么又处决？”当然这是后话，我在此就便插一句。

我们出了鸟笼式的拘留所，走了不到五十公尺，就被带进一个孤立的红色砖楼，纷纷关进相对的监号里。哨兵就在靠墙的回廊里来回巡逻。

屋子很小，七个人对面坐着，中间只能空出不到三尺的地方，晚上相互颠倒而眠，每人不过有四个拳头宽的容身之地。除了睡觉就得坐起来反省。后背不准靠墙，前面要盘腿。若是身子摇一摇，被哨兵发现，他就“恨铁不成钢”地批评：“……你为什么不争取？那样不老实，你能集中精神反省吗？……”

我们整天像佛像一样坐着，久而久之，那种骨酸筋痛的滋味，真是只有天知道。共产党发明的这种“慢功”，实在比“压杠子”、“灌凉水”还难受。至少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天气渐渐转暖，原包的棉衣裹在身上，不仅热得难熬，而且大大小小的虱子成群结队的大批出笼了。头发上的小虱子（虱子幼虫）白花花的成了串儿，身上之痒我现在真还找不出什么恰当的词句来形容。这些小虫子到处乱钻乱窜，你若一张口，它们都要钻进牙缝去。我在后来换单衣时，翻开棉衣一看，真要吓死人，衣缝都满满的，连针褶都看不见了，一堆一堆的往地上掉。这种精神肉体的痛苦，真是无法言状。

但是我一心在想：共产党按照我所写的材料把我调查清楚后，会宣布无罪释放，我会“光彩地”走出公安局大门。因此，对这一切痛苦，我自然看作是“无关宏旨”的等下去。在这所红楼里，我这个梦是作得甜津津的。

我们每星期至少可以有一次放风（二十分钟左右），到外面见见大阳，或者就地活动活动。这当中，我发现我们原来所住的拘留所，又换了一批新犯人，挤得满满的，至少有六、七百人之多。这，我才明白：我们调走原来是给他们腾地方。隔不久，又换一批新的。而我们这边，除了有特别的“单独拘押”之外，从来没有“新货色”掺进号里来。当时我觉得很纳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举世闻名的“四二六”全国大镇压大屠杀，随着“镇压反革命条例”的颁布而开始了。连以前曾经自首登记的，也一律在劫难逃。中共政权成立以来，一方面通过各种办法搜集材料，一方面在报上经常刊登人民对中共“宽大”政策的“批评”，认为由于中共太“宽大”了，使得社会上许多“坏人”得以继续活动，影响安宁。并登出老百姓传诵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的“舆论”，预先给“大逮

捕”、“大镇压”（这是大屠杀的雅语）作准备。是的，共产党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

有一天，我忽然在晒太阳的场台，看见前吉林民政听厅长兼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穿一身破旧得不成样子的棉衣服，也在另一边活动，我大吃一惊，彼此暗暗遥相点头，但不敢交谈。我想：“他是郑洞国放下武器时签订‘协议’中列为‘保证安全’的优待人物，竟然落得如此地步。”共产党所签的协议都可不算数，我对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大把握了！

又过了几天，红楼的窗子忽然封闭起来，扩音机喇叭放的是坏留声机片子的噪音，音量开到最大，吱嘎吱嘎叫个不停。管理人员的表情非常紧张，哨兵也端起冲锋枪加紧巡逻。稀听到一队一队的群众喊着“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很明显的是向公安局对面的“中山广场”集中。队伍过完了，就听到有人高声喊叫“大会现在开始！”马上是一片沉寂，接着是一个讲话声，只能分辨出有一个是四川腔，声音很激烈，但是听不清。然后，听到有人在破声高叫：“押上来！”这时，我们号里的人，面色都变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他，用眼睛说话，互相告诉外边是要杀人了！从宣布罪状占很长的时间来判断，只觉得要杀不少，但是究竟多少，谁能估得清。最后，经过一阵口号声和夹杂着不少辆汽车的马达声。就隐约听出队伍离去的声音，但不是来时的那股劲了。

像这种情形，隔不了多少天就发生一次，这当中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依我的旧印象，罪犯在处死的时候，常要呼喊不服的声音。可是我一点也听不到，难道这都是些软骨头或者是自分应死的吗？我老是不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看到街上游行的罪犯，凡是处死的，都在上五花大绑时，还要在脖子上，勒上一道活扣，一发现他要出声，后边的刽子手马

上把绳子一紧，把他舌头都给勒出来，休想吐出半个字来。到此我才明白，他们是绝不准呼冤，不让群众留有不服或同情的印象啊！

就在这“镇反”高潮中，有一天忽然听到隔号推进一个人，声音很年轻，满口东北土腔。看守警告他：“不准乱说乱动。”那青年马上回一句：“你不要跟我喳喳呼呼（是张牙舞爪的意思）的，少来那一套！”接着是下面的一段对话：

“你犯罪知道不知道？”

“你说！我犯什么罪？”

“你是蒋介石的徒子徒孙，他撕毁双十协定，你跟他反革命！”

“你狗屁！那是蒋总统！抗战一开始不久，你们就指桑骂槐高喊打倒顽固派，准备向国民党进攻。国民党在前方抗战，你们就在后边乘机缴枪，你说，你们的武器是哪里来的？谁破坏协议？你们的头子毛泽东亲口说的要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你连这个都忘了，你就是背叛！”

乒乒乓乓一阵拳打脚踢！还听到压着喉咙骂：“你到现在还抱着蒋介石的灵牌不放！”

“干革命嘛，我甘心为蒋总统而死！”

这时我们号里人，互相点头相视，坐在我对面的 ×××（这个人的名字，现在还不能说），从放在膝盖上的手，伸出了个大拇指。

“好！你出来！”

“出来就出来！把我像他们那样送上刑场，我也不会颤头（畏缩的意思）。”

马上一阵“咚咚”的脚步声，随着管理人员一同走了出去。以后的情形虽然不得而知，我想第一步他是暂时被关进禁闭号

了！

他们走后，我的思想几天不能宁静，我觉得这位青年敢于坚持信仰，敢于说出自己的话，实在太伟大！太可敬！同时在对比之下，我也感到自己太窝囊！太那个！不，直说吧，太惭愧！蒋先生继承孙中山大业，历经艰苦才把中国统一了，百折不挠的领导抗战也赢得胜利了；结果出了一群贪官污吏和像我这样胡涂思想的家伙，弄得功败垂成。我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在现实教训之下，真是惭愧无地！悔不当初！

过了些日子，又提我“谈话”（这是当时的习惯语——审讯），审讯员没说几句话，就叫我重写一份自传。这个我明白：他们是要用此来对证一下，看看是否有出入。这回与前者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我写的时候，手铐可以暂时解下去。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监写员绝对不让停笔，怕“想点子”。反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这回又是重写，更是“驾轻就熟”，个人私事和枝枝节节，都毫无遗漏，用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写完交卷了。

过了两天，又提我。审讯员一边开我的手铐，一边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纯粹是个阿 Q!”然后就叫我“回去好好反省，相出问题来要马上交待！”

回到号里，对于这两句话，我的思想就转起圈子来了。第一、阿 Q 传这部小说我是读过的，但拿我来比喻，我觉得许多方面又像又不像，究竟是指的什么？我一直想不透。第二、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越想越觉得必须交待；不然，将来很可能出了大麻烦。

原来日寇投降之前，军统在哈尔滨曾有个地下小组，组长是张伯生。日寇投降以后，他公开

出来活动，就在当地发展吸收了一些组员。文强第一次到

锦州，曾去电叫张到锦州来开会。后来，张在哈尔滨上火车后就失踪了。文强怀疑这个小组必是有共产党渗透进来，所以就用“全体工作可嘉，希即一体来锦受奖”的电报，把他们骗到锦州全部扣押起来。因为当时人手不足，文就派我和毕仲良侦讯其中是否有共产党人？后来毕有事他去，我无论个别审讯或是当面对质，一概找不出线索。这当中，我发现，现有人数照名单少了两个人，经我追问，他们告诉我，阎钟璋和一个混血女在路上还没到。

我一听阎的名字，猛吃一惊，我再追问家乡住处和年龄相貌特征，原来他是我已经离婚 20 多年妻子的弟弟，当时他还在初级小学念书呢。

我再追问阎何以参加该小组和何以未到的原因。我进一步知道：阎在日寇投降前，本是在哈尔滨江上当连长，日寇投降后，他听说“八路军”在经过他的家乡（怀德县，朝阳坡，阎家屯）时，因遭到抵抗，八路就攻进去，把他的伯父、哥哥和族中一些人给枪杀了。浙以他参加地下小组，非当行动队长给亲人报仇不可。正好这时从黑龙江森林里钻出了据称为东北抗日联军首领李兆麟，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名义在哈尔滨公开活动。这个协会用了个中俄混血女职员，生得娇媚动人。李一见倾心，进行百般调戏。但她不齿李的行为，遂与她的相识阎钟璋谈及此事。阎见有机可乘，就怂恿该女假约李兆麟私会。此女住在水道街，李把车停在远处街口，就偷偷摸摸去赴约。该女还准备了些酒菜，李更加神魂颠倒；就在醉醺醺“欲行好事”之际，阎出来一顿刀子将他杀死，把李尸放在床下面，整理好房间，打扫好血渍，两人才扬长而去。由于哈尔滨风声正紧，他们为了安全着想，所以不便在哈尔滨上火车，现正在途中，不久就会到此。

我把侦讯结果和凑巧情况，向文强作了书面汇报，文对他们不经事先请示批准，就擅自行动极为不满。

若不是现行案件或者没有其他线索可寻，非直接究问不可的，共产党向来不作正面侦讯。我把这个问题作了清楚交待之后，就一直没有下文。只是后来到抚顺以后，同犯（在以前犯人互称“同学”，到抚顺后改称“同犯”）倒是纠缠不休过。

第二次自传，也已交上了几个月，仍然一点儿动静不见，我心中就渐渐惶惑起来。正在这时候，又把我调到另一个号子。屋子相当大，晚上睡觉很宽敞。原有七个人，除了两个傻子，余者不是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就是在某某机关工作的年轻小伙子。他们讲话，活动都比较随便，有时还逗两个傻子取乐。但是我只要一张口，一活动，他们就立刻喊哨兵或者向管理人员汇报，并且加上“蓄意煽动”或是“图谋不轨”之类的词儿，整天老是如此。我心想：共产党找不出我的罪证，就想出这个花招来收集材料准备整我。我就开始反抗起来，不准我靠墙，我就躺起来着。不让我说话，我就大声背起古诗来。要不然，就故意向他们找话说。他们自然更加要报告，有时还向哨兵等递字条子。

有一天所长提我到他的办公室，怒气冲冲的说：“你这么大的罪，还要胡闹？你打算跟那七八十个一道去吗？”这个，我一听就明白！这“七八十个”是他们最近大屠杀的数目。加上过去几批，至少已有四、五百了。据我后来所知，上自国民党军、政、党、团、警、宪、特，下至保甲长，自卫队官兵，和“会、道、门”首领，很多都劫数难逃。

我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义务遵守这一套！”

“你是国民党！”

“国民党是孙中山的信徒，没有国民党抗战能胜利吗？你

们也宣过誓，要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我若有罪，你们也有罪！”

“你当县长，反人民！”

我说：“当八天县长不假，为了救济逃来长春的难民，我各处借粮借款，现在还欠我四百多万元（当时的法币），这是有证有据，经过当事人具结证明了的。你们可以出布告，叫人民检举我。如果指出有半点罪行，我甘愿自裁！”

他气极败坏的又要给我戴手铐，我就猛力一纵向他撞去，结果撞到墙上倒在地下。这时过来几个人把我按住，扣上手铐，又连拳带脚揍了我一顿。我高声反抗，他们就捂住我的嘴，怕号子里听见。……最后他们把我送回号子，让那帮家伙看住我，我自然相应不理。那帮家伙看我一切都不在乎了，也就渐渐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这手铐的一颗牙齿失了灵，一伸动就可以打开。在晚上我就干脆解开，睡个舒服觉。甜蜜蜜的睡到半夜，忽然被开门声惊醒。我睁眼一看，所长正在指我的手。我就把手铐给他表演一番：“你看，它的牙齿不管用，那不能怪我？”他二话没说，就叫我跟他下楼到他的办公室，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个新手铐试了一试，一边说：“你不是要图舒服吗？”一边先把左手铐上，扭到背后；又把右手从脖子旁绕过去，卡喳一下子，斜背着铐在一起了。这可绝得很，谁能受得了！我就大吵大闹，乱撞起来，把头撞个大包。他看制止不住我，除了在我脚上又加上一个有二十斤重的大镣子，手上也加上一个大手铐。我的刑具这样一而二，二而四的翻起番来，我当然更不老实了。他们把我拖到一个空号子，用几床棉被把我的身体裹起来，然后用几道绳子把我捆在铁栅栏上，所长叫别人去睡觉，搬个凳子坐在我旁边，一个人监视着我。我真气得要死。

动又动不得，挣又挣不开，时间久了，气力已尽，就渐渐打起瞌睡来。

天亮以后，他把我解下来，开饭时喊个犯人来喂我。也是我饿了，高粱米，大咸菜，吃得特别香。睡觉时，躺下就无法起来，而且身子胳臂这样里出外进，压得真是疼痛难忍。只能斜着身子靠墙打打零碎瞌睡，这种折磨实在永生难忘。除了那个犯人按时来喂饭之外，谁也不打照面。我没有对象发泄胸中积愤，就只成天自己生闷气。从进公安局以来，就一天也没好受过。在写“自传”以前，我还以为他们耍野蛮是出于向我要问题的动机；现在都早已交待清楚了，他们还在搞松一下紧两下的名堂。我是政治犯，若不然就放，若不然就杀，为什么百般虐待，肆意凌辱，越想越气，就站起来，稀里哗啦走上一番。大概是到了第四天（实际日数我当时也搞不清），所长又在栅栏外出现，看了一会，他把门开开，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下楼的时候，他居然在后边扶起我来了。到他的办公室，他现出一副温和的面孔，一声不响的把手铐和另加的脚镣都解了下来。在回号的路上，他说：“现在把你转到另一个号。”我先到原来的号，取出当褥子铺的棉衣服，转到一共有五个人的号子里。他为什么出尔反尔的把所加刑具解下去。我始终也不解其妙。

在这个号住得比较久。其间曾发生几件事：

一天，忽然有一个从来不曾见过的人提我的审。他穿着一身便服，开口就问我在北平家里还存有什么字画？我一想他如果不是公安部的，就一定是文物局派来的。总之是抄了我的家，特来对证一下，是否还有没抄到的东西。我怕给我老婆惹麻烦。就告诉他：除了张珪（辽金时代画家）画的神龟图卖给文物局和陈淳（明朝人）画的拂琴图卖给了香港吕方子而外，家中尚存元朝梅道人的墨竹，明朝董其昌所写的颜体大字秋声赋和清

朝宫廷画家丁观鹏所临的九歌图了（都是真品，或是溥仪在长春流失的清宫旧藏）。另外还有一本宋版册页（也是溥仪所失的清宫旧藏）。只二尺长和一尺宽的篇幅，印了全部妙法莲华经，字体只有苍蝇翅膀那么大，没有一笔脱漏。它不但是绝世精品，而且在世界印刷史上也有绝高的文化价值；当年在北平我怕在小铺里有失，就放在朋友处保管，我老婆也不知道。我唯恐给朋友找麻烦，这一节我却没说。直到去年释放时，我才打报告捐献给文物局（另详）。话问完以后，我回到号子里，揣摩他们为什要调查字画这个问题，我综合近来的情况，就感到凶多吉少。这是读者可以理解的，我就不多费笔墨了。

没隔几天，审讯员又提审，说是我老婆因为生计无法维持，申请跟我离婚。我觉得我的问题不是短期可以解决，何必让她再受苦，我立即同意了。临画押时，审讯员曾交待：离婚案暂由政府保管，可是事后一直没给我。我在号子里，把这件事再和调查字画以及诸般虐待的问题联系起来，觉得死了也好，免得活受罪。这种思想就或高或低的，在头脑里演起走马灯来。

犯人的衣服都已破烂不堪，久而久之就从衣边上拆下乱线来，我们再一条接一条的捻在一起，这是为了解闷，也可以用来补衣袜。但是没有针，有的人就从吃饭的筷子上劈下一条小边来，把线拴在一头当针用，可是线结通不过。这时我的小聪明就来了。我把鞋底上的小钉子取下来，水泥地上磨成三角尖，然后用它把竹条钻个小洞，磨成针，穿上线一试，和真针一般无二。大家都高兴，我就得意地把这项工作包下来做。我认为筷子还是照样可以用，我给每人做一个，后来被发现，又给我戴上了手铐。过了两个月来才解下来。

一直到 1952 年秋初，他们才不像以前找麻烦，从此也很少叫我到办公室去（到那里多半出事），我觉得问题也许有头绪

了，就安静的等候命运的决定。

我在这所红楼里，约住了 20 个月。前期我一心指望“光彩释放”，后期我的思想逐渐走向“望乡台”。直到 1953 年 1 月，事实揭晓，通通成为幻梦！

第七章　判刑

1953 年 1 月 28 日清晨，所长忽然提我和另一名叫冯耀山的犯人——伪满时代的富商。叫我们拿着随身东西到他办公室去，所长一声不响的搬来个铁工具，把我的镣子拿了下来。冯看看我，高兴极了，以为我们两个人要“释放”了，我面对当前环境，确也是这么想的。

所长很开心的问我：“怎么样，你现在感到很高兴吧？”

我说：“当然啦！我已经带了两年了嘛！”

这话是顺口说的，展现在我心头的却是一幅“光彩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情景。

正在这样半失神的想着，所长向旁边站着的两个看守一示意，他们把手往衣袋里一插，用不是我所预料的口气对我俩说：“走哇！”

出了公安局大门，不但不见看守有什么交待，反而在后边很不宫气的指示起路线来了。几个转弯到了长春人民法院。我才恍然大悟，鬼门关已在眼前了！

一进房门，看到一个像工友模样的青年在那里拾掇屋子。看守跟他一打招呼，他“哦”了一声，似乎说：“我知道啦！”

我们在一间小屋子等到将近中午，来了个人，又给我带上了手铐，领我上了楼，房子里有一张破烂的木桌，几个人在那里乱哄哄的，根本像不知道我进来似的。我看不出有送我去

“开大会”的苗头，反而使我产生了安全感。其中一个来到桌子后边，原来他就是进门时所看到的那个工友模样的青年。他叫我离开桌子两步远站住，然后开腔问我：“你都犯过什么罪？”他看我答不出，就继续说：“你从八岁说起，都干过啥？”

我说：“你要详细说还是简单说呢？”

“要简单明了！”

我就把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干过什么，把过去经历重说一遍，我有时涉及细节，他反而要我简单一点。

我说完了，他开腔问：“就是这个吗？”

我说：“就是这个！”

“不对，还有吧！”

“都已说了。”

“你在公安局劈筷子，破坏公物为什么不说？”

我一下子摸不看头脑，只好说：“对，这事我有。”

他脸色一冷，用缓慢的口气，一个字一个字从嘴巴里吐出来说：“现—在—判—你—无—期—徒—刑。”

我听了大吃一惊，他继续说：“你服不服？你可以考虑，过一会再做答复。”

世界上那有这种法律，指不出我犯了什么罪，拿“劈筷子”做题目就判我终身监禁，这简直是疯癫症似的开玩笑！真理、人权，被践踏到如此程度，那大批大批判处死刑的人，用什么“罪名”“整”他们，就可想而知了！

我一下子气愤得要爆炸，他看我眼神不对，就赶紧叫我往后站。我猛一转念，想起他在法院门口和押我们的看守打招呼的情景，必是他们前一天开过会，先用这个“大帽子”压住我再说。这个念头一闪现，就觉得若是牛脾气一发，就更给他们有所借口了。

我冷静了一会就说："我服。"

他于是拿出一张已经写好了的小表格，叫我按指纹表示认罪，我一看上面写有"特务"二字，我才知道我的案子是为这个原由。

我临转身走的时候，听到他说，"你到长春监狱如果不服，可以上诉。"我回头问他："判决书呢！"他说："以后发给你。"可是二十多年，我始终连判决书的影子也没见过。

我随着看守下楼，又遇到冯耀山，他说："我被判了刑，我算完了！"我问他何以完了，他说被判无期徒刑。我说："我也同样完了。"他摇摇头，长叹了口气。

我说："你为什么判无期？你只是个商人，又没有干个别的？"

他吞吞吐吐的说："崔智光（国民党长春市督察处处长，后调沈阳督察处处长）跟我在长春拜了把兄弟，后来他在北平秋捕前，把一百两金子交给我代为保存，就是为这个。"

我俩坐在那里再不吭气，各想各的心事，不久来了一辆囚车，看守把我的手铐解下来，送上囚车，一下子就把我们送到长春监狱。我们都被关在第六监，但不同号。

长春监狱的监房是六角交叉式的，看守在中间一转圈就可以看到六个监房，另外还有一个三层楼的大监房，以及各种工厂，包括麻袋厂、橡胶厂、电木厂等。监狱周围方圆二三里路那么大，四面是一丈三、四尺高的石墙，上面还有电网，而且隔不远就设了一座岗楼，特别森严，两旁都是堡垒式的碉楼。

我进到号子里，感觉还很轻松，可以随便讲话，坐着也可以靠墙，不必那么规规矩矩，比公安局松多了。大家谈起来，我了解共产党判刑很荒唐，有人说："你还到过法院呢、我们这里很多人是这么判的：张三、李四叫出来一大堆，然后宣布由

×××到×××几名，判死缓；由×××到×××几名，一共多少名判无期徒刑；再由×××……（由25年一直到××年的有期徒刑），这名堂叫作宣判（即宣布的判决）。根本不发判决书，以前虽曾发过，但后来有的又搜了回去。”

我问他们外面“镇压”的情形，几个后期进来的人异口同声的说：“哎呀！那是大批的，成群结队的，三四十，六七十不等，光是装犯人的卡车就有一大串；开大会一到就是几万人，杀一儆百，敲山镇虎嘛！开完大会，还要经过大游行，才送刑场枪决！游行时，那个强音喇叭叫得像发疯，使你毛骨悚然！不但长春如此，全省、各市、各县都是这样！”关于确实的数字，他们的同答是：“谁有心去记它，反正有几百人。这只是指长春一地而言，要把全省加在一起，恐怕至少要几十万人。”中共对此向来是不公布的。就在我到长春监狱这期间，几个，几十个，还在继续处死呢！

我们号里共有11个人，睡觉是最困难的事，11人只有顶多不过三十方尺的空间，坐都坐不下，更谈不上睡觉啦！头脚互相颠倒侧着身子睡，比挤沙丁鱼还紧，一个人占的地方顶多不过五吋宽。特别是虱子比长春公安局还厉害。夜里临睡前，每人都要把裤带解下来，经组长汇齐放到门外去，吃饭时，单有送饭犯人给送进来。除了“放风”之外，临时要大小便，很难报请开门出去解，很多人都往帽子鞋子里大便，使得全室臭气熏天。

各监号都是人满为患，据说“镇反”以前并非如此，以后很多号变成两层楼，都是这么挤，屋子里空气之臭无法形容。特别是戴链子的，成群结队一走起路来，哗！哗！之声，既刺耳又吓人。

到监狱第二天一早，把我提出去，又给我戴上链子。回到

号里，同犯告诉我，凡是无期以上的都要戴，我一看全监共有三四千人，至少有五分之三戴链子。共产党判刑形同儿戏，大家都心中不服，我当然更是如此。

就在我戴上镣子那天晚上，忽然又提我到了监房办公室，里面有三个人，中间那人是管教科科长，他说："你判的刑服不服？"

我说："我既没杀过共产党，也没有和共产党作战，更没有破坏，对一般人民我不付有过任，共产党若讲真理；就应该释放我，判我这么重的刑，我有些不服。"

他说了一大堆话，我只记得他大概说的是：共产党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刑期是活的；长短在乎自己争取，如果好好改造，很快就可以改判，否则，还要加刑。说来说去，是好好认罪，好好改造等等话。也许他们情知这种演剧式的判刑，是不能使人心服的吧！

所以在这一段时期，这一类的话是干部老挂在口头上的。用以安抚犯人的情绪和一般大众的心。他们也用暗示的方法告诉犯人不要让家人知道判决的刑期，大概自己也知道这种胡乱判刑一通，而且重的超出常情的事实如果传出去，一定会引起人民的反感。干部们常跟犯人说："判刑多久有什么关系！刑期是活的，长短在争取，别把它看得太严重！也别随便告诉家人，只要自己好好改造不就行了？"

我的亲族来看我，有的问我刑期，我就不敢告诉他们，只是含糊的说："判了一段时间，谈这个干嘛？"这样他们当然不会满意，来信时总会问起，一直到我后来去劳改队，这种情形一直继续，但我就是不敢明说。一般犯人接见亲族的时候，旁边一定有干部看着，如果一旦说了就犯了"错误"，要吃不了兜着走呢！还是短刑期同犯出去以后，才慢慢把 ××× 判多久、

×× 判多久的事传开来。

提审以后，我回到号里，大家问我和干部谈话的情形，我说了后，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是老套料子，听都听腻了！"不过对我来说，对于争取减刑，确实燃起一片希望。

没过多久，我又换了个号，里面一共有 12 个人，比以前还挤。在旧历正月十五那天正吃早饭的时候，管教科长拿着名册到各号点名。他走了以后，号里的人惊惶的说："今天又要杀人了！"

我听了以后心中发毛，一问之下，同犯说："他来点名必定有事，他是来验明正身的啊！"

我问："他在点到我的时候，有什么表情没有？"

他们说："你放心，不像有你。"

我自己也以为判决才几天，怎么也不能加刑这么快嘛！

刚一吃完饭，我就听到几个号开门往外提人，至少提走五六个，同犯都不敢作声，只是呶呶嘴示意。

当天中午们"放风"时，除了知道新从公安局解来的一名和尚，也一同"回老家"以外。发现关梦龄也解来了，这家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为自己求生不惜带领共产党在吉林街头抓人的败类，现在竟也被解到此处，他心情的沉重，是可以看出的，他自己以为"戴罪立功"不出五年就可释放。过了不多天，却判了十五年。

一天，门一开又推进一个人，神情恍惚失常，衣服背后用粉笔写了个"二"字。他惊魂未定，是刚开完大会由刑场回来的，我们问他，他说："十几个人由后面先开始判，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无期徒刑是第三号，哎呀！我是第二号被判了个死缓，第一名判了死刑，马上执行，我就给送到这里来啦！"

我们问：“你是什么罪？”

他说，“我是一贯道坛主。”

我们问：“为什么要判这么重的刑呢？一贯道又做了些什么事？”

他的解释是：朱毛进入北平以后，举凡“国庆”“劳动节”等日子，均是下雨天气。北平传说毛、朱二人有一天去故宫，正逢大雨，毛泽东看朱德是一条水牛，朱德看毛泽东是一只乌龟，传言不胫而走，毛朱大怒，说是传言由一贯道造出的，因此共产党在当时就大肆逮捕一贯道。

我的看法是：这些传言大概是抵抗份子不满现状的反映，是否和迷信骗财的贯道有关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我在长春监狱后来又了解到一种情况，据一个判死缓的说：在“镇反大屠杀”期间，各重刑号往往一个一个被提空，他所住的两个号就是一个一个往外提，最后到了只剩下他一个才停止。绘影绘形叫人听了真是谈虎色变。

我在长春监狱一共蹲了两个多月。这期间，我对自己的判刑，曾费过不少思考。论理我是应该被释放的。如从长春公安局的遭遇来看，我已经做了死的准备。他们究竟为什么出乎意表的判了个无期徒刑？并且不是以“吵监闹狱”为借口，而是以“劈筷子”做题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思来想去，所得的解释只有以下二者：

第一、从北平被捕一直到判刑，我所接触的一切事实，要说共产党对国民党讲宽大，我确实找不出任何根据。正相反，不管有无罪行，都一概从严！全国“镇压”了几百万，而全国在押的又何止几百万，这就具体说明了这一点。话要说同来，我当初指望“光彩释放”，当然是无知的梦想（不，我想起了是阿 Q）；而我在东北（特别是在长春）又不是无名之辈，许多民

众对我是知情的，若杀我，就不能不出布告；要出布告，就必须指出我的具体罪行来。指又指不出，假造又不行，所以先判我个无期，容待以后相机处理，无酬苦役既可奴隶般的为共产党创造一份财富，入笼之鸟也不用担心跑得了。一举三得，此着当然绝妙！

第二、从我的自传里可以了解，我和共产党打交道。只有两次；其一，抗战初期在 111 师宣传队和共产党人闹对立的问题。这些人证俱在，我是无罪可指的。其次是策动张学思的问题。这个关系非常大，是问题的重点。张学思在东北易手时是“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后来虽被调任“海军学校”副校长，但总是共产党内的上层人物。他们必定向他调查，他也必定证明绝无其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三番两次向我进行专案审讯——详后）。如果把我杀了，就表明张和我有关联，他们是不致这样搞的。共产党的判决，都要经过党委的容批，由于这一点，所以他们给我扣个“特务”的空帽子，判上一个不发判决书的无期徒刑，是既妥当又没有轻饶，谁能问他从严不从严呢？再说：如果举不出具体罪行就给我硬扣上“公然反抗”或“吵监闹狱”的罪名，那就从“反抗什么？”和“为什么吵闹？”这两个问号上更反证他们无理，共产党不会傻到这种程度。劈半根筷子，也算是“破坏公物”，拿这个题目作文章，当然是名正言顺的。总之，是由于我没有罪行和张学思这个关系，所以我才没见“阎老五”。也因为我是国民党，所以绝不轻饶我。以上是我自己的体会。我到现在仍认为是不错的。

第八章　争取

1953 年 4 月 8 日，号里点了 100 多人的名，包括我在内，叫我们收拾东西，这时候卡车已准备好了，狱中干部对我们讲话："今天政府给你们一个机会，送你们到一个地方，你们要争取，要好好改造。"干部并且警告我们："你们在车上不准抬头，不准讲话，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如果违反就要开枪！"

我们就在车上躬着身子像一群猪仔，也像一车死尸似的被送到市郊东北方的劳改队——正式名称是长春金钱堡第一劳动改造大队。

这个劳改队是一个制造红砖的窑厂，一共有四个大窑。整个劳改大队因此分成四个中队，每中队负责一个窑，全大队分两处住，我这个中队和另一个中队所共住的监舍是一座旧式的四合院。过了两进，两个大院子，四面都是监舍，监舍里面有两层铺，一个中队有五六百人，两个中队一千一二百人就挤在这些铺上，每个人可以分到四十公分宽的地方睡觉。

监舍附近有一层电网，每个窑场周围六、七里路还有一层大电网，正是大电网套小电网，电线上不到 100 公尺，就有一个警卫楼，并装了探照灯。

劳改队的指导员在我们到达后向我们讲话，除了"刑期是活的，长短在争取……"这套话外，就介绍劳改队编制和工作情况。队上的中队长、小队长、中队指导员都是政府干部。各

工作小组组长照例都由干部指定犯人担任。这是队上最基层单位，按照干部指示去工作。

讲完后，我们就进入监舍安顿，新来的人加入到四个中队的各部门去工作。我分配到第一中队，一进这窑场，使我最注意的就是，戴镣子的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干这么重的劳动，还得戴镣子，使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这个窑场当时是用旧式手工制砖，我第二天就参加一个制坯小组做和泥工作。这时候长春的气候是开始解冻又未解冻的样子。雪地白天化了，晚上又冻上。我们得从地下未冻层挖土，从冰盖下掏沙子。并把河中融化了的水挑上来和泥，和泥是一种极为艰苦的工作，得把裤管卷起来，打赤脚用脚板踩，还得用工具把泥巴一点一点的翻多少个，翻了踩，踩了翻，至少要整三四次才能供脱坯的犯人使用。

我原来体力就不强，在公安局蹲了两年多，身体瘦弱不堪，做这和泥工作，真是又冷又累。而且脚上还戴着镣子，精神与肉体的痛苦真是无法形容。

劳改，劳改，就是劳动改造嘛！「刑期是活的，长短在争取」，为了这一线似真似幻的希望，只好咬牙坚持下去。苦撑一天，明明肚子饿了，饭还是吃不下。晚上一头倒向床上，筋疲力尽，马上入睡。

很快到了“五一节”，这一天停止劳动，照例要开全体大会，冰天雪地，大家坐在地上开，台子上扯的横幅，上边写的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奖惩大会”。按照司仪的安排，大队长开始讲话，大意是：“罪犯们！好好听着！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无产阶级最光荣的节日，劳动是工人阶级的光辉本色，今天能让你们罪犯来参加，也是你们的光荣，这个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劳动是可以改造人类的，你们罪犯要通过劳

动改造，共产党是不愿意杀人的，你们都是罪大恶极、该杀不杀的，政府送你们来改造，你们应当感恩的。你们统治的那个时代，监狱关的都是好人，现在无产阶级的监狱关的都是坏人。刑期的判决是反映你们罪行的轻重，服刑的长短完全在于自己争取，你们能够争取，能转变立场，这就说明你们肯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愿意悔过自新，政府是要加以奖励的。如果抗拒改造、不争取，那是自绝于人民，人民就要给以应有的惩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会也是一个奖惩的大会……还有现在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政府要改善你们的生活，每天吃三钱油，每两天吃一次细粮……还有现在这个窑要改变成机械制坯，今年的任务是十亿块砖。这也是给你们改造的机会，大家愿意不？”

“愿意！”“拥护！”

话讲完后，大家一阵鼓掌，预定的犯人带头呼口号，接着是宣布奖惩名单，有的减刑两个月，有的记功，有的得物质奖，有的受到提名表扬，有的争取到下镣子。这时候我才明白：在劳改队即使能争取到最差的奖励——下镣子，都不知要付出多大的血汗代价。至于惩的方面这一次只宣布了记过的。

这一天还发给每个犯人红玫瑰色的单裤挂，以后大家穿着，远处一看真似遍地一片红花，犯人叫它“血布衫子”，洗了几次，颜色一掉真是难看。犯人从春到秋就是穿这件衣服，过不了几个月就衣不蔽体，比叫花子还难看。

5 月 1 日这一天饮食改善，吃了点肉，大家皆大欢喜。同时心里也想到以后机械制砖可能不要花太多力气，大家这就动起了幻想。我个人也觉得如果做得好，就可以减刑，内心又抱了一线希望。

过了“五一节”，机器房建好，由手工制砖改为机械制砖。原来的手工作业场改造成七八十个干燥砖坯的大架台，每个架

台有两米半宽，三十公分高，两百多米长。两个架台中间铺上小铁道，一直通到机器房。我们这座砖窑虽在伊通河右岸，但近处土已挖空，须到五、六里地以外用铁道斗车去运土，推到机器房。

这时候开始制坯，我被派做码坯（郎是摆坯之意）工作。当湿土和沙拌好放进机器以后，出来的就是砖坯。十四个坯放在一个板上，一车八板推到架台前面。

每个架台前面有四个人，两人是码坯，两人是抬板，抬板把坯板抬下后，码坯就得立刻往架台上摆。板车一辆接一辆来，做码坯的根本无法停手，不然后面一摆成长龙，前面取完了，就要来回跑着去拿，愈积愈多那可就惨了。

摆坯子还不能乱摆。上架台的湿坯子一个咬一个，方向距离要绝对正确，既要通风干燥，又要坯子不能裂缝。如果一个坯子倒了就会联倒一排，不仅要受处分，而且也要检讨没完。

干码坯的一天工作 12 小时，昼夜两班，我一个人当一班要码 1 万 3 千多个坯子（一个砖坯重约六斤半，总计要搬等于 42 吨重的泥土）。这种工作既不能蹲，又不能站，老是躬着腰做，只要十分钟就骨痛筋酸，十二小时的罪可想而知。小便可以就地解决，大便去厕所太远只得忍住，有时就弄到裤子里。有一次职工窑的工人到我们这里“参观学习”，看到我们码坯手法这么快，对我们“称赞”不已，谁知道这是给“逼”出来的成绩呢！

做夜班，更是苦不堪言，汗流浃背，都是打赤膊干。成堆的蚊子扑上来，咬得脸上、臂上、腿上、身上大疱连成片，连个应付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忍痛供它尽情“打牙祭”！特别是到后半夜，疲倦不堪，体力又尽，真不如就地暴卒死了好！但是想起“刑期是活的，长短在争取”，就又拼死命咬牙干下去！

这时又发生个大问题，监舍跳蚤之多，猖獗得吓死人。晚上就像军队作战的散兵群一般出动，被上、褥上黑呼呼爬来跳去，咬得混身是疱，只能到天快亮等它们吃饱了跳不动时，才能勉强蒙眬一阵。后来监中晚上值班的犯人在屋子地上摆几个水盆，次早水盆上面就是黑黝黝的一层。你知道吗？夜里还换过几次水哩！

我的亲族给我送来一床新被褥，不到一个月，光是蚤粪就使被褥里变成紫黑色了，拿去用热水一洗就粘在上面，比脸上的重雀斑还多，我一直把它留起来做“劳改”纪念，“释放”时不准带出，只好忍恨丢下了。

在劳改队中一天劳动十二小时，睡觉八个小时，吃三餐饭去了一小时，下班后还要学习二个小时，中饭后要抢时间打个小盹。早上连洗脸时间都没有，我曾一连两个月没工夫洗脸，瘦骨嶙峋，弄得真像鬼一样。

一名姓张的犯人在僻静之处，一边用拳砸自己的脑袋一边生气说：“看你还敢反革命不？”我看见以后，劝他不要这样想不开，他说：“受这么大的罪，真不如死了好。”

劳改队中的犯人死亡率非常高，全队三千多人，超过五十岁的很少，可是经常死人，过了三天没有人领，就抬到西河套埋掉，犯人把这叫做“送西河套喂鸭子”。我做坯算是快手，有时候近处哪个存积板子码不上去，常叫我去支援，连干部都承认我“能干”。

从前在码坯时常倒架，前文已经提到，只要倒一块，扑咚一下子就不知要倒几百几千块。我在码坯时想出一个方法，在架顶上头构搭上一块坯，使砖坯互相固定就不会倒了。

从河底取沙子，在出水时，常被漂散。我提出建议，改进工具和操作方法，用长杆锹捞，也解决了积沙问题。

有了这些“小发明创造”，我觉得也算对生产做了小贡献，而且码坯的表现也不坏，我不免沾沾自喜，一心盼望到“十一”奖惩大会上，会有好事临头。

队中伙食在“五一”大会后确实有了改善，隔两天不是吃白面馒头就是吃白米饭，油水也多了些，偶尔还吃点肉，对于体力确实有补益。

这时队中又开始评“工级”，预计每人每个月可以发三到五元“赏金”。我可以得到三元，但是过了两个月，不但“赏金”根本未见，连吃的也不声不响的恢复了老样子，成天高粱米、萝卜白菜，油水根少，体力又渐渐难支了。

七月底忽然下了一场暴雨，河堤决口，冲进四座窑场。我们在事前被送往长春监狱，河水一退，我们立刻回去收拾现场。此时正是东北大雨滂沱的雨季，我们除了吃饭睡觉以外，一分钟都不能停，连学习都停止了，我们“抢修”制砖设备，满满七、八十个架台冲成烂泥巴的砖坯，都要扛的扛，抬的抬，送上积土场。其劳动强度比正常制砖又高得多了，我总是咬牙拼命坚持下来。

我所盼望的“十一”奖惩大会终于来了、大家也认为我表现好，很有奖励的希望，我心中的想法当然不用说了。

大会开始后，照例是先由大队长讲话。它的内容除了结合本年水患，要全体犯人努力争取完成本年任务外，其余大意不过把上次大会的旧话，加以翻新罢了。

接着宣布奖惩名单，一这是大会的高潮，我的心脏跳得蹦蹦的。当然，每个人都是这样。

在奖的方面：有刘坤等七八人，减刑自两年到几个月不等，刘坤原来是判十年，已经服刑一年多，再这样减两次，就可以“回到人民行列”了，“刑期”真是“活的”，顿时在每人眼前

浮现出强烈的希望！另有记大功的，记小功的，表扬的，下镣子的，得物质奖励的，台上摆了一堆棉被、毛巾、背心…等等，当场就点名发下去，特别是那两床新棉被，真是羡煞人也！我，从减刑，一项一项盼到最后，都落空了。可是，并未灰心。这回争取不到，看下回嘛！有成绩摆在那里，慌啥？

惩的方面：有一个被抓回来的逃犯加刑二年，其余也有加刑几个月的，除了加刑以外，都不宣布任何理由。在宣布记大过时，我的名字居然摆在第一名！这是重如泰山的打击，我直接的感受是：共产党找不出处我死刑的理由，竟然搞出这一着，准备再大过两次就加刑处死呀！我顿时感到天昏地暗，思想上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大包袱！

会后，我去问中队指导员，他要我自己反省，无非又是那一套刑期是活的，以后你要争取立功就可以功过相抵等等摸不着头脑的话。

过了几天，有个姓吕的同组犯人，和我私谈时曾说过："你在劳改队表现很不坏嘛！也没见你犯过什么错误，为啥记大过？真叫人纳闷！"这句闲话后来被人在"冬训"时"反映"了，他除了在中队会上受到指导员的指名批评外，还在小组会上检讨个没完，我更是倒霉，这事竟成为"冬训"时攻击我的主要题目，此是后话。

这时我又起过自杀念头，但以死得没有价值，还要留下"畏罪自裁"的污名，觉得犯不上而打消，只好本着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三缄其口，静待其究竟吧！

到了 11 月，天气已经上冻，砖坯事实上已不能做，这时候只剩下了四个工作。第一件工作是积土积沙，积土要用斗车到五里外取土，一个窑地有三四十辆斗车，走起来像一条长龙似的，上坡要用人力往上推，往前走一寸都得付出全身体力，下

坡更危险，滚的像火车一样快，稍不注意就有生命危险，到了地头，还得赶快卸。

装车时，就得刨冻土，一车车往上装，一秒钟也不能停，头车一走，二车就得跟上，很多人带着镣子工作，想想古时奴隶劳动绝对比不过今日这般艰苦。

积土工作在整个冬天都要进行，最后终于堆成六十米高，两百米长，六、七十米宽的小山丘。积沙的情形和积土差不多，只是由河里往上捞。

由于饮食粗糙，又无油水，人人都想吃肉，有时在河里或土里挖出一些青蛙，对大家真是最美的食物，偷偷弄个火一烤，其香味无比。

有时候野兔、野狗被电网打死，这种食物经火一烤，虽然没有盐，吃得还是很带劲。

第二种工作是继续清理夏天河堤决口时冲坏的砖坯泥巴，这些泥巴在冬天一冻比石头还要结实，得用十字镐一镐一镐的刨，二、三十磅重的镐刨了几十下还刨不下拳头大那么一块，我这种体力能刨一块下来，就很不错了，有时一天要刨十二小时，真是苦不堪言！

在冬季，要在摄氏零下二十到三十度寒风中干，只要刨一、二十镐，棉衣就穿不住，弄得混身是汗，只好穿短裤挂干，有时还得赤膊干，但停几下，又冻得厉害，汗水都会结冰！

有一次大队长对这种情形曾发表一套高论：“劳动人民在你们统治的那个时代，汗水掉在地上一摔就是八瓣子，你们今天这一点算个啥！”

我心里想：难道今天劳动人民的汗水就掉不在地上了吗？就变成铁打的摔不碎吗？我对人民犯了什么罪？今天汗毛上都结了冰，争取的第一个结果却是记大过。但是这种话只能留在

肚子里，到学习时，还得把大队长的话原样搬出来：“劳动人民在我们统治的那个时代，汗水掉在地上一摔就是八瓣子，我们要立功自赎，争取新生！”

第三个工作是把架台上的湿坯调换一下，把里面湿的调到外面来，把干了的再收藏起来，这也是一件繁重的工作。

第四个工作是要把二十四个窑洞里烧好了的砖全部背出来。窑洞里热度高，一进去就大汗淋漓，可是一出窑门又寒风刺骨！

把砖运出来，要分一、二、三等和等外品，马上垛起来，然后再装铁道斗车。推到离砖窑约三里路的储砖场去。这个储砖场一眼望不到边，成了砖海。

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高大厂房，楼房宿舍以及其他建筑用砖，基本上就是由我们这个劳改队供应的。平地建起那么大的一个独立工厂区，这三千多名“罪犯”的贡献，可不算小吧？以此度量全国，那就更可观了。据我后来所知，全国凡是极需体力的笨重劳动，如：制砖场、打石场、开煤矿、开铁矿、修铁道、修水库、农场和其他基本建设工程等单位，都有大批犯人参加，甚至整个包办。再加上其他各式各样的工程，全中国当时从事“劳改”的犯人至少在 300 万人以上。（共产党对这类数字是绝对不公布的，各省市县都有劳改队。吉林是个中等省，像我们这样的劳改队就在 30 个以上，以此类推。这还算是最保守的估计数。）

这虽是一种无工资报偿，而衣食待遇又是最低的劳动，但因每个人都处在热望争取释放和惟恐犯错受惩，以及其它一时难以说完的诸种因素交攻下，每个人都是认真地，百依百顺地尽心竭力地干。那时局势方定，百业待举，依我看来，这些“劳改犯”应该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事业的一支主要基本力量。

现在就用最保守的估计数字来算一笔简单的账：如以一个“劳改犯”一年平均至少创造 2 千元（包括应得工资）财富计算，（实际上何止 2 千元？依劳改队的标准来看，全队一年生产 10 亿块砖，每块砖平均值 4 分钱，总值就是 4 千万元，全队 3 千犯人，每人平均就生产 1 万 3 千元）全国三百万犯人全年所创造的财富就达 60 亿元（合美金 30 亿元）之多。我记得共产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投资是 766 亿 4 千万元，每年平均是 153 亿 2 千 8 百万元，“劳改犯”生产的 60 亿元就占其中 39.2%，由此可见对中共的贡献该是多么惊人。有的同犯这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犯人的祖国，尤其是国民党犯人帮助建设的祖国。”我是没有理由反对的，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一切工业基本上都是草创，犯人劳动大军确实是一个基本力量，所以任何罪犯哪怕是跑到天涯海角，共产党也要费尽心力把他抓回来归案法办。因为这可以一举三得：第一、奴隶劳动大军的人数不会减少，只有增加，而且判得越重越好，多一年就多一年无偿劳动；第二，可以不断肃清与共产党对立的份子第三，从这些罪犯身上，用“提着瓜秧找瓜蛋”的方法，又可以找出其他抵抗份子，所以有的犯人叫它作“一箭三雕”，真是再恰当也没有。

犯人的劳动所得是列入国家预算的，像我们这种劳改队就是“国营机构”，据在队中会计部门服刑的同犯说：在劳改队的会计账簿上，所有犯人都是列明拿多少薪金的，每一个人都有劳动代价。但是干部到期并不发给犯人，只是和政府算账，表现自己的功绩和成就，然后就解缴国库，“点滴归公”。

到了 1953 年冬天，吉林省公安厅派了一个处长到我们第一中队，再让每一个中队派代表去听训话。他利用晚上学习时间，讲了两晚上，除了对劳改队一般情况作评论以外，主要意思是

讲政府对犯人刑满释放后的就业问题，已经作了非常妥善的安排。国家已经拿出很大一笔资金要将许多农场和各式工场，改成刑满犯人就业的地方，那里面有家庭式住房，可以把家人带去住，也有单人宿舍，一切用具也备办的妥妥当当，职员待遇按社会上一般标准，有钱可以存到银行，以备将来需要。

这一番话真是口蜜腹剑，阴毒之至。总之一句话，犯人释放以后，如果干部“劝”他到“新人村”居住，他就甭想回家。我们队上有一个曾是电影从业员的犯人，释放期到了，却一直不肯接受干部的“劝告”，结果就是走不出劳改队大门。最后他只好同意了，就被送到“新人村”去，以后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个叫刘剑秋的文艺工作者，释放后也被弄到“新人村”居住，后来他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和一个朝鲜爱人结婚了，在那儿安了家。

“新人村”这个名字倒很动听，只是进了这个大门就甭想再出来了。一辈子都得过着半隔离、半管制的生活。1954 年的“五一”节，奖的方面只有一个人减刑两个月，得物质奖励的还比较多，再下来就是下镣子、记小功或表扬等等。这一天对我是平平安安过去了，但从这个时候起，我发现干部不再跟犯人提“刑期是活的，长短在争取”这个话头了。

这一年的“十一”奖惩大会，只有劳动最为突出的我们判刑十五年的组长减刑两个月，其他方面跟以前差不多。

在惩的方面，只有潜逃不到一天的电工犯人杨绍源加刑两年，他的潜逃跟我扯上了关系，所以我得把这件事说清楚些。

是年的 7 月末一天夜里我做夜班时，忽然曾在长春公安局跟我蹲过一个号子的电工杨绍源来跟我搭讪，他说要借我的帽子用一下，这帽子是我的家族送来的，样子很新，又能防雨，

又能遮阳，我问他：“借帽子干嘛？”他说：“8 月 1 日要演剧，剧里要用到。”我思量时，旁边犯人也在一边怂恿，我想演剧是“公益”事情，就把帽子借给他了。

到了天亮收班时，队上的大喇叭忽然响了起来：“电工犯人杨绍源注意！电工犯人杨绍源源注意！队长命令有紧急事情赶紧到队部报到！”我心想必是电路出了问题要他去修，等到收工时才知道他已经逃跑了。在此同时，队里指导员及小队长来找我问借帽子的事：“你是不是和他约好的？你帮他逃出去的？你和他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密谋？要赶紧交待！老老实实的交待！”

问我的气氛又紧张、又激烈。我只是就实情说明我和他只在长春公安局蹲过一个号，除了知道他叫杨绍源外，别无所知。并且将借帽子经过，一五一十都作详细的“交待”，并举出同组的犯人为证。

他们又把我半押解的带到队部，很多干部分别问我，他们并且询问有关犯人，我这时候心里的负担很重，若是杨绍源没有下落，我这关系就摆脱不了啦！

下午时分，看干部说话的语气和神色，知道杨绍源已经被抓到了，他坐了一阵禁闭以后又出来做电工，他逃走的经过也就散布开来。

原来杨绍源拿了我的帽子后，就在场内黑暗的地方换上准备好的便服，拿着队长的手电筒，冒充干部，大大方方的混出了警卫岗哨，跑到长春市他未婚妻家里，找到他准岳母，说要逃走。他准岳母叫他到公园去等，然后出去为他筹钱，这时他的准大舅子知道了就报到公安局，杨绍源就在公园里被捕了。

在大陆只要出了事，不管是说错话或是做错事，就是夫妻、亲族或朋友都必须互相检举，一旦事发，这些资料就永远跟着

你走，到死了还要保存起来，不知到什么时候，扯到旧案并发，所以谁也不敢“隐瞒”事情。

所幸杨绍源被捕了回来，从他的口供里自然可以证实同组犯人和我所说借帽子的真象。所以加刑判决书，才只提到“……骗取段克文帽子一顶，混出岗哨”等语，没有追究我的责任问题，使我松了一口气。不然，我要冤沉大海，有口难明。我心中暗想：“好险！没有沾包！”（沾包为大陆工业术语，生铁厂掏溶铁的器具叫包（勺状），如果动作稍慢，生铁则凝于包内摆脱不掉，即为沾包，以后被大众用为普通语。）

这一年夏天给我留下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就是正值工忙的时期，一日三餐都是吃的一眼可望到底的清水稀饭，碗中只有稀疏的几个红色高粱米粒，水清得可以照月亮。肚子喝得胀胀的。出工后几泡尿，就饿得像霜打的黄瓜。半个月左右都是骨瘦如柴。有犯人曾写下这样一首打油诗：

思悠悠，恨悠悠，
碗中景色惹人愁，
红花朵朵照明月，
浑身饿得剩骨头。

过了两个月，虽有些改进，但是也只能在中午吃一顿干饭。

到了 1954 年冬天，因为不必往外清除旧泥巴，工作较为清闲些，但是共产党不会让你吃闲饭，这时省里忽然派来一群干部，由公安厅一个处长率领，到我们这个劳改队进行“冬训”，其主要内容是各自检查在劳改过程中都犯过些什么错误。全劳改队一起投入了这个“学习”，白天每个人先进行自我检查，晚上就看电影，接受启发辅导。

主持我们中队的是吉林省公安厅科长和吉林监狱的科长，

他们第一个就发动我“检查”。对此他们费了一些功夫。先由中队长找我去，问我一年多在劳改队的感想和心得。我自己不好提什么“发明创造”“码坯快手”等等，只有先承认自己必定有缺点，不然怎会记大过呢？他们接着就问我怎么知道有缺点？

我心中想：共产党一向不让人摸清底子，“冬训”要搞什么名堂，当然也是深不可测。而且为什么第一个就找我？我确实有些“发毛”。我就把那句话再颠倒一下说：“记了大过，当然就证明有缺点嘛！具体问题，容我反省一番，再作报告吧！”

最后，中队长要我能做到深入反省，认真检查，这样犯人才能通过检查，政府也会满意的。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检查好了，对自己的改造是有好处的。我心想：“到劳改队第一下子就不明不白的整了我一个大过，现在又想叫我当众‘自供’取得‘罪证’，准备加刑呀？我才不上这个当！”所以我口头上只是含糊其词的答应“一定好好检查”。

接着小组就开第一次会，有一个犯人忽然声色俱厉的高叫：“我要检举段克文，他为什么和那个姓吕的犯人串供，对记大过不服？难道政府还会冤枉他吗？他是反改造！要提出来老实检查。第二、段克文有一次把一块好砖一下子摔成好几瓣，他恨人民政府，拿这个来发泄！这是破坏国家财产！要老实检查，彻底检查！”

这个犯人平日本来和我感情很好，怎么忽然会这样捕风捉影，无端进攻了呢？看他的表情，他是一口咬住不放了。我忽想起在开小组会前一天，他被认为是积极份子，同一帮犯人被召去开会，结果今天竟有此事，这当然是上面授意，这使我思想上的包袱背的更重。

第二天叫我上台当众自我检查，我就用上文所述的“改造八股”再加上“我是国民党的徒子徒孙，我的反动意识比别人

深，当然没有改造好，记我大过是政府要督促我和警告我好好改造。我武官是少将，文官是省政府代表，当然是反动罪魁。至于摔砖一事我现在还想不起来，容我切实反省。至于串供，我不能推到别人身上，那是因为我反动习惯太深，爱和别人闲谈。”等等。

当然大家不满意，全体一致举手大叫：“根本没有检查，全是胡扯，没有认错。”干部问大家是否同意，大家轰然说：“不同意！”

过了一天再“检查”，我仍是旧词翻新，软磨硬泡，大家还是“照例”不通过。

那天晚上两名干部把我叫到一间空屋，开口就说：“你为什么不好好检查？在这个重要关头为什么不争取？”总之是要我举出事实，承认错误才能使大家通过、政府满意。

我这时确实连觉也睡不着，左思右想，现在终于到了最后关头！

从第四天起，把我的问题搞一段时间之后，就分别叫别人来检查。直到第九天，我还是老样子打转转，攻我的人也有气无力了。两名干部就把我的问题“挂”起来，以后再说。

有一名好打架的犯人大致是这样“检查”的：“我是土匪出身，杀人放火耍野蛮，我都干惯了，有人挑我毛病，我就‘碰！碰！’给他一顿拳脚。一直到现在，我还要跟他拼命，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当然这是我野蛮成性，今天我向大家‘检查’我保证以后坚决不犯，你就是骑着我头上拉屎，也不会有二话，认罪要以实际行动兑现，我以后坚决做到这一点，做不到誓不为人。”

大家没有意见，一致高喊“通过”。

“冬训”一共进行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与我们同院

的杂工组开会，有个犯人叫杨守田平常他对“改造”表现“抵触”，会中有些犯人高喊：“给他戴上镣子！关禁闭！”干部马上照办，把他推进了禁闭室。

这个禁闭室是第一进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进去像狗窝似的，坐起来都不行。过了四天的一个早晨，忽然来了些新犯人，外面很快搭上台子，马上举行大会——“冬训奖惩大会”，集合时，组长坐在我旁边，偏偏两面又都是有力气的人，我一看，心中顿时疑虑难安，不知道这一关过得了过不了？

奖的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惩的方面，除了宣布潜逃不到一天的杨绍源加刑两年以外，就提杨守田。这时有四个人捉着他面向台子五花大绑的站在中间，全场四周警戒森严。我这时心中直嘀咕，是不是也要叫我？

这时法院来的宣判员站在台子上宣读杨守田的“罪状”，大意是：杨守田一贯对抗改造，屡教不改，杨守田曾在劳动时告诉同犯说：“我们现在都是给共产党干的，共产党现在剥削我们。”进行现行反革命、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着即立即执行死刑。

宣布完“罪状”，接着就有四个人把杨守田推到墙角，“啪”的一手枪，打得他脑浆迸裂，血流遍地而死。紧跟着就是安排好的人高呼口号：“拥护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

然后就是公安厅派来主持冬训的某处长向“观礼”的犯人训话：“人民政府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对抗改造，死不悔改，”他用手一指杨守田处决的地方，特别大声说：“这就是下场！”

“奖惩大会”收场后，大家都面面相觑，闭口无言，各想各的心事。我的想法是：若不是在“冬训”一开始就消极对抗，坚持不给自己乱扣帽子，编造假事实，这回一定要作为证据，

同杨守田一道去见阎老五。但仍不知到什么时候，又会找到我头上。我因此吃不下饭，羸弱不堪，老是忧虑万状，惶惑不安，一直到一年后，我才发觉我的这些想法一方面是正确的，一方面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认为共产党要整我、杀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为了随时利用我们这些国民党人做政治筹码，而没有杀我们。因此才想不通。

参加这次“奖惩大会”的一些新面孔犯人原来都是全省各监狱、各劳改队派来的犯人代表，回去要作报告，把处决杨守田的情形传达给全省各个在押的犯人。这叫作杀一儆百！扩大效果嘛！

在冬训开始之前一两个月，就有零零星星的干部来找我话东说西，在我看来都是无关重要的事。在冬训之后，就有时三五成群的来，都是生面孔，一般都是其中为主的人和我谈话，有时还作记录，其余的都像若无其事的在旁听，其内容不外：“劳改”的情形和感想？在共产党里都认识些什么人？关系如何？有联系没有？

特别问得详细的，是不管在大陆、台湾或海外，我都认识哪些国民党高级人员？关于这些人的生活爱好和在大陆上有何亲友及社会关系（包括在共产党内的）都问得面面俱到。对于共产党人，我除了加上在判刑后知道的一些新情况外，基本上都是像在自传中所写的，作如实的答复。关于国民党人，我早已处于隔绝状态，就只能以揣测之词应付了。共产党的这些举动，我也曾那过不少脑筋去研究。也是到一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得到答案。

1954 年年底，工场已经开始生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那一班做夜工，回队去吃饭，走到队本部的时候，忽然在电筒照射之中，听到一排轻机枪响，接着是一个人“哼”了一声，犯人

以为夜里枪毙人，吃了一惊，但是不敢停步或交头接耳。到第二天才知道是一名朝鲜籍犯人被关在禁闭室，他老是想家，精神上已成病态，就戴着镣子拆墙，大队部通知警卫在外等候，等他一探头，没加任何警告，就用一排机枪打死，从那以后，犯人夜里在监舍内连窗子边也不敢看了。

1955 年初春，我在场中劳动时，忽然大队部派来一名干部，要我立刻到大队部。我刚到门口，那儿停着一辆卡车，带我的人要我上车，我戴着镣子根本上不去，这时队里出来两个干部，把我拖上车子，他们在我两旁一边一个夹着我坐下。后来又来了一名干部，拿着函件，放入手提包中，即命车子开走。

我这时心中直犯疑：这是要把我押到什么地方去呢？又是要搞什么呢？眼看着车子是往城里开，更是莫明其妙！到了长春市，看到一队队的学生，居民在街上走过，拿着旗号，像是到什么地方开大会的样子。我心想今天真是要出事了！

在车子驶向中山广场的路上，路过一个公安分局，车子停下，坐在我旁边的一名干部跳下车到里面去。我想大概是在此打电话通知说我已押到了。既然事已至此，不能“颤头”（浑身哆嗦之意）！

干部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出来上车，车子再开到旧市政府又往右手走，我在长春住过几年，街道很熟，我一看这是要去长春法院！果然，正是到了二年前判我刑期的地方。门口停了很多车子，我从车上往下跳，干部一把没拉住，我摔了个跟头。他们拖起我进了法院，竟看到里面有穿护士服的人。拿着公函的干部先进去，一会儿出来就走开了，两个干部把我带进 X 光室。我心想把我枪毙，为啥还要照我的骨头！只好听他们摆布，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照完相后也没有动作，坐在一个小角落里等着。

不久干部问我饿不饿，我说也该是吃饭的时候了，他就去整了一盘炒肉丝，一盘包子馒头，这东西我被捕后连见都没见过，好吧！死也做个饱死鬼！

我一口气把所有的东西吃光后，又在那边傻等，不久把我送到一个有医生的地方，医生什么也不说，只是把我的胸部敲敲打打一阵，然后叫我躺下，又把肚子摸了一阵。我的念头这时有了点变化，要我死大概不会再费神仔细检查这些吧？

检查完了，两名干部就带我出了法院，我回头一看，门口挂的牌子竟是斗长春市人民医院内科门诊部原来这地方已从长春市人民法院改为医院了，一字之差，使我多了一场虚惊。

在门口，送我们的车子已经走了，干部叫我上电车站去，我穿着破旧不堪的红棉衣，戴着镣子在街上走，我觉得我对人民问心无愧，所以泰然昂首而行。不久就有人认出是我，很多人围了来。他们的表情除了惊异就是同情，干部虽然把他们轰开了，但我此时也百感交集，不觉的暗自吟了一首打油诗：

大街傲步戴镣行，问心无愧对此生。
顺逆人心才为定，是非史家自有评。
樊笼岂锁为民志，桎梏偏增济世情。
中山信徒知取义，大同世界必完成。

25 年来，虽然牢地都快坐塌了。但因接触大陆情况日多，更了解了人心向背，从而在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孙中山先生世界大同的理想，就一步一步更凝聚在眼前。它使我在不眠之夜手抚身心创痛，受到无限的鼓舞！无限的慰藉！同时也痛恨自己在抗战后期的思想实在太幼稚！太糊涂！

到了市郊，下电车走回劳改队，路上想到这场虚惊，自己也暗自好笑。但为什么忽然把我送医院检查身体呢？而且劳改

队三千来个犯人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事，我确实难于理解。后来想起在杨守田事件后，干部问过我为什么这样瘦弱？我曾答说可能有病。但我也不敢相信，这话会与这事发生直接关系。不过，从此以后，干部们对我的态度确不像以前那么凶恶了。甚至劳动时，大队长也借个题目和我攀谈，其他干部有时也“口头表扬”一番。

1955 年夏天，共产党规定：凡是无期徒刑和“死缓”都不能押在劳改队，所以我又被送回长春监狱。

我在劳改队一共呆了两年多一点，在“刑期是活的，长短在争取”的耳提面命下，我确实使出“吃奶”的力气去争取。结果除了镣子原封未动和身体羸弱不堪而外，所争取到的只是“大过一次”！

两年多的劳改生活中也领教了“学习”的滋味，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经验”说给各位听。

劳改队以劳动第一、学习放在其次的地位，除了每个队中挂一份人民日报供犯人阅读或是选择某些社论由犯人在中队朗读外，晚上在小组中大约有两个小时的固定学习。

学习第一步是看重“认罪教育”，这都是在小组中，在报上找题目，或在大队长或队长讲话中找材料，进行讨论。犯人首先要毁灭自己，过去认为对的东西，不管对国民党，对自己的，或是对家庭与社会的过去历史，都要加以彻底否定，这叫做“转变立场”。犯人除了把国民党说成是十恶不赦的祸害外，还要把自己说成猪嘴獠牙，犯下滔天大罪的罪人，该杀不杀，对共产党、对人民要感恩图报，要终身认罪，要老老实实地，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转变立场。共产党把这叫做“倒旧瓶装新酒”，旧的倒不出去，新的装不进来。

我们组里一个犯人在共产党进吉林之后只是管理市场的小

职员。被判十五年，他自己也举不出什么罪。他在小组中的发言，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典型”，我到劳改队才开始学习，乍听起来真是新鲜已极，到现在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说：“我的父兄都是残酷的，杀人不见血的土豪劣绅，我也是喝劳动人民的奶滋长大的，不但不知道感恩，而且一心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疯狂想要往上爬，在管理市场做小职员时并不满意，还想做大资本家，我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份子，我是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蔽其辜的大罪人，共产党人民政府对我该杀不杀，刀下留人，这是无边的宽大和天大的恩德！我要把我的父母和国民党看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我要对自己瞪起眼睛来，像看着敌人那样来改造我自己。我要拥护共产党，我要拥护人民政府，我要转变立场，我要把屁股坐到无产阶级这边来，我要老老实实的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这些话里从没有半个字说明自己究竟犯的什么罪，这是典型的“改造八股”，每个人都一样，谁也免不了，要说得斩钢截铁，咬牙切齿，刚开始说的时候，自己觉得很别扭，可是说久了就自自然然变成真的了，一旦说错，自己还觉得言行不切合实际，大家要指责你上次是怎么说的？拿这一套话来批评你。

由这下去，话就改不过口来，张口感恩，闭口图报，久而久之就落实到规规矩矩驯驯服服，低头认罪，艰苦劳动，这就落在“认罪”要求的重点上来，妙也妙在这里。这还是事情的开始，我们通过 25 年无休止的学习再学习，一再深入，一再巩固，已经步向“不但活看要认罪，而且死了也要认罪”的途径，那就更是妙不可言了！

第二种叫“远景教育”，又叫“形势教育”，这种教育一直到我拘押后期仍然在进行，内容大概是重要的干部在“报告”中，先从分析国内外形势入手，进一步指出当前形势是一片大

好，由这就开始讲共产主义，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创造，以后由列宁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再发展出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今天的地球已“红”了几分之几，不会很久一定是世界一片红。这番话给所有犯人的印象是：共产主义是将来世界的必然前途。

这种“形势教育”不但在劳改队要搞，全大陆成年成月的都在搞，搞的人要大声赞扬社会主义一片光明，无产阶级的力量所向无敌。谁要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被历史巨轮辗得粉碎。

第三种是学习“宪法草案”，全大队都确实认真严肃的讨论过宪法草案，犯人自然是“一致赞成”，都说：“谁说中国没有沃律，你看这不是基本大法吗！”可是除了在政府结构上最初有所实行外，其它就只有天晓得，或者毛泽东晓得了！

后来也曾学过“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草案”。我们劳改队反正是以劳动为主，对这些学习是马马虎虎的，对“远景”只是留个印象而已。

我在劳改队两年多，深深领会到共产党善能用暗示等等方法，使你产生一种错觉，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满怀希望和自我陶醉中，我除了在劳改队开始有所领悟外，再通过 25 年的切身体验，我实在佩服共产党在这一方面的确高明无比。这也算是我的额外“收获”吧！

第九章　草菅人命·狱中惊魂

由劳改队押回长春监狱后，我被关到第六监一间比较大的号子里，号中有十六、七个人，说起话来也比较自由。

这个号里人多，身份也复杂，有些是三教九流的人物，像毒贩、江湖郎中、一贯道徒等等应有尽有，从谈话中也能了解他们被捕的原由，和他们干这一行的在大陆被消灭、改造的情况，加上以后在各地参观的心得，知道中共在肃清“烟、赌、娼”三方面做得很彻底。从而我觉得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因为受到一套法律程序的限制和社会组织松弛等关系，是不容易做到这一步的，但是在一个什么都是封闭、管制的社会里面，人民如果不照共产党的命令去做，就要犯“错误”，肃清这些社会遗毒就很容易了。

例如我这号子里姓孔的犯人有一次闹情绪说：“从安东公安局把我解来，他们就不把我的手表还给我，听人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怎么不还我的表？我在这里上了几次报告也不理我。那是瑞士名牌表，现在至少可以值两三百元，这成什么话儿？”我说：“共产党不是说不贪污、不勒索吗？”他赶紧使个眼色不让再说下去。

我转而打听他为什么判的无期徒刑，谈起来，知道他是因为贩毒。据他说：大陆易手以前，他就在东北共区向非共区贩毒（鸦片），不但他做，共产党更是大批的搞。

他说的话和我被捕前后所了解的事实是相符的，他们的干部在某些场合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共产党这么搞，主要是套取政府区的物资，扰乱政府区金融，是出于政治目的。共产党夺权以后在大陆内部就开始禁毒，这些老毒贩无路可走，就到北韩去贩运。姓孔的因此在安东被捕，判了无期徒刑。

中国从 1842 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变成鸦片荼毒大陆同胞的公开市场。国民政府成立后，曾经颁布严法以期禁绝，但是东北、天津、上海等地有各国租界，这些帝国主义者可以利用这些基地和各种特权，无法无天，不休不止的向中国各地运销鸦片。特别是日寇侵略东北后，更是变本加厉，所有占领区内，可以说是鸦片世界。抽的、吃的、注射的各式各样的烈性毒品，无孔不入的流向非沦陷区。加以共产党也大量向非共区运销，同时后方的云南在龙云的特殊势力下照种不误，堵也堵不住、禁也禁不了，如此就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毒气弥漫了中国的大地，其祸害之深，是世人皆知的。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政治环境改变了，他的要求也改变了。对于这么多不能干活的吸毒鬼，感到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必要”，于是就大力展开一项“肃毒运动”，不但禁止种植、运销，而且发动群众互相监督、检举，然后施以严刑峻法，这样没有多久鸦片烟毒就肃清了，在一九五四年以后，渐渐看不到吸毒的情形。

不过我被“释放”以后，这一年多时间里，看到很多有关中共在云南种植鸦片，往邻国运销的报导，我根据以前的经验来判断，相信其可能性很大，共产党为了达到某一目的，什么手段都会使用的，就好像它以前在大陆颠覆国民政府一样。

在“赌”的方面，到我“释放”时为止，大陆上虽然还有偷偷摸摸的小赌存在，但是大赌场已经绝迹。“娼”的方面，在

我从长春逃到北平居住的一段时间，曾经看到取缔娼妓的情形。北平前门外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娼妓区，共产政权成立，就从八大胡同开始下手，把许多老鸨子、乌龟头分别逮捕，并令妓女公开检举控诉，罪恶重大的就枪决。共产党同时把妓女集中，有技能的分配工作，没有技能的就训练她们，并且在报上宣布自由择配，只要两相情愿就发给结婚证书。没有多久，街上便看不到妓女式的女人活动了。

在我前文叙述中曾提到一个一贯道教徒被判重刑的事情，我在监狱 25 年中，相识了不少这一类三教九流的犯人，我也愿借这个机会谈一下共产党肃清“反动会道门”和“医卜星相”的情形。

“会”是指黑社会的帮会，如青帮、红帮等；“道”是指像一贯道这种怪异组织；“门”，望文生义，大概是指各类门派吧！这些组织除了结成小集团，取得小部份人的非法利益以外，只有助长社会腐化、迷信和纷扰，纯粹是政治的蛆虫、社会的渣子。

就拿一贯道而言，他们出的小册子内容荒诞不经到了极点，纯粹以敛财骗人为目的。他们的鬼办法，是由最核心的主持人——“坛主”，物色聪明的年轻人（叫作“三才”），极端守密的把各种乩语祷词训练成熟，就用他去主掌乩坛，对于任何人，任何事，都能见景生情地假托某某神、某某仙，写出恰如其分而又怎么解释都可以通的乩辞，用以敛财。此外，也使用迷信骗术治病，如在日伪侵占时期，北平西城一个大院内，召集许多被迷的男女，脱得精光，过了多少日的荒唐生活。诸如此类人所不齿的败坏行为，据我在被捕之前所知，简直不胜枚举。后来从报刊和电影上，又看到“三才”当众控诉和公开表演揭露的罪恶秘密，真是令人咋舌。一个“坛主”的金条竟是成堆，

而“道首”的金条更是车载斗量了。这种不法组织，曾经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到 1953 年以前，就被共产党肃清了。

另外，关于“医、卜、星、相”等类的骗财行径，也在大陆上被消灭了。这里所指的“医”乃是对江湖郎中而言。他们的最大本领是投师学成一套招揽顾主的伎俩和售卖假药的歌诀。不但本身是骗人，所售的药既不治任何病症，而且于身体只有害处。至于卜卦、算命、看相等等，也都是属于江湖术士的范围，他们除了藉骗钱寄生而外，最易诱惑人们的思想陷入迷信、侥幸、贪婪和消极等等的迷途。使人忘掉自己的努力，把命运寄托于铜钱、“八字”或面貌、骨头长得如何。这些人在中国为数原来不少，他们不但自己不从事劳动生产，而且会拖住许许多多人的后腿，使不求进步。后来，他们有人把投师秘传的骗人诀窍，毫不隐讳的揭露出来，这些人从此也就更没有活动的余地了。

其他如会馆，宗祠之类有同济作用的组织，今天在大陆也不存在了。但今天在大陆上，偷盗行为还是时有发生的，特别是扒手，更是猖獗的很。这些，容我以后再详述。

闲话表过，现在再回到我在长春监狱中的折磨生活中去吧！

我在六监没住多久，就搬到四监更大的一号去，裏面两层都睡人，我睡的下层共睡了 20 多人。我挨着一个小偷睡，他是山东石岛人，名叫宋宝宾，他有时说话颠三倒四，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刑期本来只是半年，因他胡闹，后来就加刑五年、十年，一直到二十年。

有一天看守把我叫出去，要我了解了解他是真呆还是假呆？他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是否有觉悟！

我和他一谈话，他就一会一个报告，一天不知要写多少次。我不跟他谈话，他也要写报告。

到夜里他就跟我吵起来，我也不去理他，天亮了他又去报告。看守把我叫出去给我换了个四五十斤重的镣子，走起路来空咚空咚山响似的！

我真是不懂，既然要我了解他，他一报告我，为啥就给我钉上这么大的镣子。

有一天夜里，看守在早两三个钟头就把我们叫起床，他的神情很紧张，不准我们乱说乱动，大家也不知道什么事，有人说昨天号子里搭了台子，搭台子就是开大会，犯人在这方面是很敏感的，知道又要出事了。

到了早上七八点钟，看守通知我们这个监号集合，我随着出去，看守却指着我说：“你不要去。”

我斜对面号子里也留下一个人叫黄炳寰，这人以前是吉林省警务处处长，以后曾在锦州做少将兵站总监。现在整个监号里就剩我们两个人。

我们彼此看看，用眼睛说话，心中直犯狐疑，特别是我这号里的人出去时，看我的眼神真是永诀的表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外面大会开始，看守来提我们两个人，我心想这一下真要完蛋了！他把我们送到第五监重刑犯的小监号里，重刑号就是有判死刑可能的号，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人认识我，神情一抖，意思是怎么你也来啦！我坐在里面只好听天由命。

不久，隔壁号子里提人，只听到有人叫：“出来！”接着就是一阵故意用重脚步走的铁镣拖地声，到了监门时，听到好像有人把他架出去，他说：“不用管，我能走！”

这时外面大会在进行讲话和喊口号。

快到中午，门一开，看守叫我出去，我以为要去开大会，

结果又把我送回原号，不久大伙都同来了，每个人脸色都不对，过了很久才恢复正常。

我和黄炳寰为什么要单烛留下，为什么送到重刑号？而后又送回来？这问题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我和黄都是少将阶级，对我们优待？还是故意让我们感到死的威胁？这问题一直到我写此文时仍然得不到答案。是的，共产党办事，是很难叫你摸着底的，他们自己也不例外。

事后我一打听，原来今天大会上提了 12 个人执行枪决。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这 12 个人在监号里面“封官加委”，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这个帽子很大，原来这 12 个倒霉鬼都在一个橡胶厂劳动，休息时间胡扯说笑话，一个说：“看你！长得像个县长。”这个回答说：“我要当县长，就派你做警察局长。”这一来七嘴八舌，一连扯进去 13 个人，每个人全都当了口头上封的官，他们的刑期长短和居住的距离，都相去很远，就是将来出去，又怎么能聚在一起从事活动？其中一个人一反映，这 12 个人就被找去问话，他们在“坦白从宽”的妄想下只有承认，就这样被判决：“在人民监狱封官加委，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几句玩笑话就要了他们的命！

我不但在此时感到惊恐万状，就是从在长春公安局后期开始，每天都觉得有不测的可能，劈了几根筷子都判无期徒刑，芝麻大的事都能要命，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心里慌乱，睡觉都不安，这种情形不但是我一个人，所有犯人都是如此。

这种镇压手段，恐怖政策，是要使所有犯人就范，共产党没有法律明文，没有问答审讯，没有辩护制度。可是它还称之为“依法判刑”，法在何处谁也不知道。只有一个“镇压反革命条例”，可是其条文解释的范围谁也摸不着边，他爱怎么办

就怎么办，所有生死大权全操在党委手里，公安局和法院只是前台机构，党委决定生死的标准要看他如何考虑，我被捕以后，所看到的犯人，没有一个真是得到宽大的，共产党明明是残酷已极，但是犯人一张嘴还得说："我该杀不杀，人民政府对我宽大无边"的满口感恩词。

这个大号，上下两层，共有五六十人，有一天，我不知不觉用鼻哼起黄埔军校校歌来，想不到竟有两位比我年轻的同学也随着哼了起来，声音非常有感情、有力量。

有人问这是什么歌，我们只答说是过去流行的小曲，我们哼着校歌，三条心就结成了一条心，"怒潮澎湃、党旗飞舞"的母校，展现在眼前了，这对我既是极大的鼓舞，又是极大的安慰！想起我军校同学在校长蒋公的领导下，三十多年来，我们不是为了自私的动机，而是为了解救中国人民，铲除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对日抗战，总是前仆后继，打开血路，奋勇前进。他们不曾顾惜自己的牺牲，而只是以六亿人民的自由幸福为念，这种精神与业绩，必将与日月同光，照耀史册的。今天，我虽然身陷缧绁之中，想到我们三个人的团结精神，想到还有更广大的同学在继续奋斗，我藐视身戴的刑具，我鄙视极权统治的嚣张，我在黑暗之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光明未来，看到了人类自由平等、和平幸福的世界。樊笼再坚，锁不住我拥护正义辨别是非的心灵；铁幕再牢，挡不住人民反抗奴役推翻压迫的冲杀；吾校的精神一定会发扬，孙总理的理想必定会光大。我想到这里，觉得周身是轻松，是力量，眼前的这一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同时，我也自恨当年的思想胡涂，给自己造成今日的后果。这种惨痛的教训，我要终身记取！另外，我也痛恨那些根本不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放在心上，贪污腐化，倒行逆施，把

利益抢归自己，把艰苦推给别人，贪生怕死，朝秦暮楚的家伙，他们是孙总理、蒋校长的可耻叛徒，也是我们同学同志左右的少数败类。只能给革命造成一时的挫折，绝对阻碍不了洪流的前进，革命大业一定复兴，八亿人民必然有重见光明的一天。漫漫黑夜必成过去，青天白日必然普照大地。

尤其使我最难忘的，每当我们三人目光相遇时，都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互相信任和极其关切的热情。如果人多挤在一起时，我们不是暗地里紧紧的握握手，就是故意用肘碰一下，表示我们“亲爱精诚”的革命感情。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还能这样保持坚贞不变，给我的鼓励和安慰，在我此生是最真实、最强烈、最有力的。特别是当我搬出监狱去公安厅时，我从他们的表情更看出他们内心的极度关怀！他们真是我的好同学啊！我今天挥毫至此，他们那种激情的面容，又复映现在我的脑际，我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他们以后的下落，我虽然不得而知，可是他们的声音容貌，他们的名字，永远记在我的心头、我要把这种记忆化为力量，继续奋斗！

第十章　恍然大悟

1955 年快到年终的时候，对面的大号忽然空了出来，陆陆续续往里面送了些新犯人。这些人有的是长春监狱来的，有些是劳改队来的；有长刑期的，也有短刑期的；有的官至少将，有的是保甲长。身份虽然复杂，但都是过去在国民政府系统工作的人员，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在生活方面，这间大号也有显著的改善，干部给他们买了围棋、象棋、扑克牌；组织他们唱歌，起床后也有专人照顾他们作体操、户外运动或者打排球等。同时女监中也有人来和他们一起学习。这个号子的显著不同使其他号的犯人觉得奇怪。1956 年元旦，这个号单独吃饺子，使其他号的犯人就是闻到点儿汤味也垂涎欲滴。

这号子里面也有我认识的，包括前长春团管区司令李树桂和前文已经提到的黄炳寰和关梦龄。

元旦晚上深夜时分，看守忽然提我到监狱办公室，狱长跟我一个人单独谈话。

狱长先拿了两张照片给我看，我说不认识，他冷笑说：“你跟他们很熟悉！”

我再端详了半天仍想不起这两个是什么人，他就不再提这事，把照片往桌上一放，就跟我扯起“改造”的感想来。

我明白了：他是拿相片做“引子”，声东击西。我就说：“我在长春公安局的时候自分必死，但是如拿劈筷子作根据就判我

无期徒刑，我是不服的。”

狱长解释了很多，仍然是“刑期是活的，长短在争取”这一类话。他说这是对我的一些测验，不必太斤斤计较于劈筷子，只要是自己肯于改造，共产党是会注意到的。

他又问我对共产党的观感，我说没有看过共产党人贪污，是我敬佩的。他再问我对毛泽东的感想，我说有些我佩服，有些我保留。

他跟着追问我佩服的是什么？保留的是什么？我说毛泽东的持久战，矛盾论确实有其见解，前者对于中日战局之分析是有预见性和实际性的；后者，也确实下过一番研究功夫，但是我在应用方面还摸不着头脑。至于在保留方面，我认为毛泽东的一些话很不兑现，他当年向国民党争民主自由，现在是不是民主、自由了呢？

狱长说：“现在有许多党派参加，不是民主、自由吗？”

我说：“共产党自称是政治的领导核心力量，其他当然是跑龙套。”

这些话扯来扯去，扯了三四小时，快到天亮才放我回去。我回号子里一躺下，就有同犯用手脚碰我示意，起来后大家也是用眼睛说话，表示他们的关心和好奇。

第二天还没吃早饭，又提我到监房办公室，监房主任一句话没说，就把我戴的四、五十斤重的大镣子拿下来，随后只说一句：“从今以后，好好改造！”然后就叫我回号收拾东西。

我走出办公室门口，两脚轻飕飕的，带了五年的链子，使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还没有“争取”下来。今日竟是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去掉了，真是又高兴，又茫然，一路走起来，真是飘飘欲仙！

收拾了简单东西，看守一下子就把我送到对面那个令人羡

慕的大号子去。进了号子，气氛完全不一样，干部的态度非常和气，照顾也求周到，经常领着大家活动，号中的人心里都纳闷：这是为什么？但总是很高兴的。

在大号里大约过了七八天，看守就叫我、黄炳寰、李树桂、关梦龄、刘荣第（前长春市参议会参议员）五个人收拾东西。我实在不知怎么回事，就低声问关："你看这究竟是怎么同事？"

关梦龄反问道："你看呢？"

我说："看样子不是去公安厅，就是去法院。"

关说："看情形绝不是坏事！"

东西收拾好，等了两个小时，要我们出门的时候，干部又用手铐把我们铐起来，然后交待说："你们不要乱想，没有关系的，因为怕你们多心，这样免得在路上出事。"

我们在监门口上车时，干部们又来帮我们五个人拿东西。

上了车子，果然不出所料，把我们送到吉林省公安厅。上了楼，一名科长跟我们讲话，他满脸堆笑的说："你们改造的成绩很好，为了提高你们的生活，现在给你们吃中灶，这里有发给你们的脸盆、牙刷、牙膏等，你们现在或许会有些想法，但是你们跟实际生活一接触就会明白。"我拿着脸盆感慨万千：五年来，脸都很难好好洗一回，现在忽然拿到这种东西，而且是崭新的，真觉得是在作梦一样。我在开始用的时候，还觉得不好意思动手。

从公安厅办公室出来，干部帮忙拿着东西，把我们送到一个新建的看守所，那里已经有了两个人，一个是前吉林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一个是前吉林省师管区司令兼保安副司令李寓春。

我看到他们很觉惊奇，前文已经提到过，他们都是在郑洞

国和共军在长春所订放下武器协议里明文规定列为保证身家安全的。为何还蹲了这么多年监狱不放呢？我和他们都是老相识，特别是李寓春还是李树桂的顶头上司，可是他都装着不认识我们。我想了一下才明白：他在过去 7 年（他们从长春易手就坐牢）的囚禁中，一定是饱受折磨，深具痛苦经验，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变化摸不着头脑，故而装痴作呆啊！

随后看守发给我们每人一床新被，分配的住屋是大屋三人一间，小屋二人一间。过了两天，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大光，伪满时期国民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由长春监狱解来。另一个是于泽霖，前国军 105 师师长，由吉林监狱解来。

这时干部把我们九个人集合起来向我们交待说，现在干部的伙食都是定量的，怕我们吃太多了对身体不好，所以也是定量的。为我们做饭的厨师是特别挑选出来的，据说是长春市的“劳模”。他的饭菜确实做得很好，每天都换新花样，三餐吃的都不错，早上一大碗白米稀饭，两个小面馒头，配上小菜。中、晚餐是一大碗白米饭，加一菜一汤。有时还吃面条或油饼。这样他还怕做的不好，频频向我们征求意见。干部也问：“如果有什么不妥，可以告诉炊事员改正。”我们当然是说：“蛮好！蛮好！”

我们到此之后，所穿的红色囚服也换掉，穿上了和干部一般的灰色便服。关梦龄有件自己的棉袄，舍不得丢掉，但背后用油漆写的斗大的“犯”字，用汽油也洗不掉，干部就找一块颜色相同的布给他缝起来。

处长级的人员也时常以考查的姿态出现，对我们嘘寒问暖。另外还派两名科长专门照顾我们。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措施，大家虽然纳闷，但是生活兴趣却也渐渐提高了。

没过几天，看守所中的干部就急急忙忙的组织我们去参观，

经两名科长的提议，我们就举李寓春做组长，犯人组长一向是由共产党指派的，这一回允许我们举手，也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事。

我在牢中关了 5 年多，一直没有机会和外界接触，现在要去参观了，我倒有一些好奇心，想看看共产党统治了 7 年以后，长春到底有什么新样子。

我们参观的单位包括长春百货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糖果食品加工厂、益发和面粉公司、光学仪器厂等。参观时都是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作详细而认真的报告。

第一汽车制造厂建立在市外约十余华里的乡下，规模相当大，所有厂房宿舍几乎全是用劳改队生产的红砖建筑的，周围约有二三十英里。那时还在试产阶段。负责人领我们参观时，夸称苏联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进步的，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是无私的。技术工人也都是派到苏联学习同来的，因此产品也会是第一流的。

机器中有一部份特别精细而显眼，我就问："这也是苏联做的吗？"那个负责人沉思了一下才说："这是美国的，我们有时也得用一点他们的，这是从香港进口的，但是没有苏联的好。"可是平心而论，苏联的机器是极其粗糙的。后来中共跟赫鲁晓夫搞翻了，他们又转过口来，说苏联尽拿劣品向中共推销。

参观百货公司的时候，我们到每一层楼一停步，售货员就上来搭讪，把货品不厌其详的介绍一番，但并不要我们买，很显然是事先已经作了安排的。

参观时有人看出我们不是一般顾客，也有人认出尚传道和我，我们只好转头他顾。

到了光学仪器厂时，负责人特别强调 K8 玻璃，说这比某国的王牌玻璃还进步，只有在毛泽东领导下才造得出来。反正

我们不懂，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

参观面粉厂时，负责人强调毛泽东的公私合营政策。原来这个厂是私营的，以后中共加些资金，盈利由中共、物主、工人和公共基金各占四分之一，名曰“四马分肥”。负责人说在毛泽东政策下，公私合营是正确的道路，这就给后来的“资木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布下迷魂阵，引起民族资本家及其从业员的错觉，为毛泽东的策划铺平了道路。

糖果加工厂是一座半手工、半机械生产的工厂，在参观制造小糖片部份时说，这是该厂特制的一种产品，除了糖以外还加上三道年（打蛔虫的药），小孩子既吃糖又治病，这是毛泽东关怀人民健康的具体表现之一。其实据我所知：大陆在几十年前就到处可买这种药了。不过那时是在药房，而不是在糖果店，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有提到“这是什么关怀民瘼”的话。

另外我们还参观了五里堡生产队，仍然是过去的生产形式，还不是高级公社。负责人强调的仍是在毛的领导下，生产成绩提高，人民生活改善，谁家买了几床新被，谁家买了部自行车，都如数家珍的表上一番。但是从来不提农民的收入究竟有多少？就是在以后 20 年的多次参观中，一直也只是讲百分比，而不举具体数字，这也许是为了对外保密吧？

最后我们去参观小型国营农场，这地方叫洼中高，离长春几十里路。冬天该场也没有劳动，只是整理一下让我们参观。场内一切建筑都是旧样子，在大约三四里路的范围内，很少看到机械。场长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他只是把改良种苞谷介绍了一下。这座农场新设了一个小型气象站，他说这是人民政府在农业上的新措施，所以他们就率先实行。

总之在参观过程中，凡是中共自认为有某些成就的地方，都把它和毛泽东连起来，以显示毛泽东多么“伟大”。

参观来去途中，我们 9 个犯人乘的是一辆特备的公共汽车，另外还有带着长短枪的干部，乘另一部吉普车。有一次经过野地时有群大鹏鸟在停留，他们就下车用步枪打了一阵，那些鸟好像若无其事似的，在远处自由游来荡去，可见干部的枪法实在太差。

我们参观时所用的中饭都是干部准备好带着的，吃起来没有定量限制，有个犯人因此吃得特别多，我们都向他打趣说："你此番收获可不小啊！"

参观完毕，我们在看守所里要座谈参观的感想，要把过去的大加诋毁，而把新的大加夸扬一番。例如在长春被围期间，面粉厂有些破损，发表感想时就可利用这一点说是以前被国民党破坏的，现在毛泽东领导下不但修好了，而且发展起来了，我们几个在长春的人更得承认这是自己的罪恶。

参观期间，我们乘汽车在市区内兜圈子，游览市容。就是这么一转，把我被共产党搅昏了这么多年的脑子一下子变得清醒过来，原来车子经过大街时，见到横扯着几幅大标语，每个字有两尺见方，写的是："热烈欢迎和平解放毫湾！"这！这！我从劳改队以来直到这次所怀的闷葫芦，一下子就揭开盖子了！为什么我费了 5 年的九牛二虎之力都争取不掉的大镣子忽然无缘无故给拿下来呢？为什么被记大过后，和正在被指令当众检查之际，又忽然用"挂起来"不了了之？又为什么忽然把我们集中，逾格优待，还急忙举行参观？我明白了：在"当众检查"以前，都是按原定计划来"整"我。后来毛泽东的指示到了，跟着一切就变了样，我在前文所说的"我的想法既正确，却又错误"就是指的这一回事，现在一切都明白了。

那时正是朝鲜停战协议刚签字不久，毛泽东自夸为"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精选出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不但一下子乖乖被联军俘了若干万，而且全体一致宁可背井离乡去台湾，也绝不回大陆，那么聪明的毛泽东，一看国民党和蒋总统是人心所向，“英勇无敌”的“解放军”也靠不住了，如果再对台湾动武可能要吃大亏丢大脸，“纸老虎”就要被揭穿，所以才想出这个“软招子”，诱台湾上钩，照他的话叫做：“和平解放台湾”。

可是，他在大陆屠杀了至少 300 万人（这是我最保守的估计），使台湾和海外华侨，都受震动！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事不好办，所以就对我们这极少数活着的人下功夫，准备用我们做政治上的筹码，他是拿我们当“记吃不记打”的猪！把我们优待一下放出来，既可做给台湾和海外的人们看，好使他们产生一种不正确的幻想；又可在台湾“上钩”以后，用我们当展览品向各方显示他有诚意“言归于好”，把人们诱进圈子，然后再找机会下毒手来个一网打尽。毛泽东对于他的出生入死拼命打天下的“老战友”如刘少奇之流，都毫不容情的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水世不翻身，怎么忽然对于他认为“不共戴天”的国民党人，“讲起宽大”，搞起“优待”来了呢？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全体中国人民寄托真正希望的台湾，巍然屹立在东海，毛泽东又不是发疯了，怎么会这样优待我们呢？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的花招，这种历史经验，难道还没尝够嘛？再反过来说一句：倘然台湾真不存在了，不但我们必然被送上断头台，凡在他势力之所及，所有他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敌对的人，也就是争自由或坚持独立思考的人，可别想还能会有一个人幸免。把你戴起大镣子送去劳役终身（这也叫“强迫改造”），那还算是天大的恩典哩！以上是我在看到横街大标语时的直觉想法。但紧接着，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洛希洛夫访问大陆时，毛利用和他谈话的机会，特别提出“我们欢迎和国

民党有第三次合作”；并在“人民日报”公布，这就证明不是我个人敏感，而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我用这句旧词，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肮脏的眼光，诬蔑毛泽东的好意？但我的脑子还有思考的功能。撇开“为什么当年在大陆上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而偏要对台湾一岛讲起善意？”这个一想就明白的道理不谈，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过去两次国共台作的史实和结果，我能不回忆一下吗？

第一次合作之前，共产党的成员，在全国一共也不过 100 人左右，自己根本没法活动，孙中山先生误信了他们效忠三民主义的表示，才允许他们参加国民党。可是北伐刚到长江，他们随着国民党的发展，造成势力就暗下毒手搞叛变，妄想推倒国民党了。共产党是藉国民党“从小到大”发了家，反过来就想推倒国民党，独吞胜利果实，他们的诡计没得逞，还反咬一口，说是蒋委员长如何如何！

第二次合作开始时，他们的党员和全部武力一共只剩了 3 万多人。真是到了穷途末路。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蒋委员长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领导全国军民决然宣布对日抗战，历尽八年的艰苦奋战，坚决拒绝了汉奸汪精卫多次“和平反共”的可耻游说，外抗强敌，内防国贼，终于赢得了抗战胜利，根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得了联合国的创始地位。蒋委员长对于中华民族所立的伟大功勋，和共产党合作的政治风范，在八亿中国人民心中，在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心中，应该是永垂不朽的。

可是，就在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进行八年的浴血奋战中，曾信誓旦旦郑重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又干些什么勾当

呢？说起来不胜枚举，我只回忆三件为一般人所忽视或遗忘，但共产党人自己无法否认的事就够了。毛自己说：从 1937 年到 1945 年抗战胜利为止，除了 200 多万民兵不计外，光是正规军就发展到了 120 万人。我翻遍“毛泽东选集”除了最初几篇是论述抗日战略战术，其余都是拿抗日做幌子，实际是别有用心的指桑骂槐，矛头指向抗日的国民党而外，谁能找出一句话是他报导抗日的战绩？指出 117 万武器有几件是从日寇手中夺来的？和他们捕获了几个日寇俘虏？事实是国民党在前去浴血奋战，他们在后边下冷手——缴枪！他们不是游击日寇，而是游击国民党，共产党管这叫做“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啊！这是其一。

第二、游击战争和破坏交通是共产党的拿手杰作。我还清楚记得，到抗战胜利那天为止，在沦陷区的所有铁路，从东北到广州，日寇一直是运兵自如而畅通无阻的。如果共产党具有抗日救亡之心，他要在日寇后方认真把铁路破坏一下（在有碍他们的发展时也曾有些小破坏，但绝不进行大破坏，以阻日寇的兵运，或把敌人惹去打共产党），抗战又何至延长到八年之久？中国人民的牺牲又何致那样的惨重！中共书意放日寇打国民党，日寇占点占线他占面，他不愿日寇败退藉图乘机发展势力，这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吧！可是日寇一投降，不到几天工夫，共产党就把铁路破坏得千疮百孔，铁轨一堆一堆用火烧软，电线杆一个一个砍断，连电线瓶子都一个一个砸得粉碎，他们的本事这时候才拿出来了。他们蓄意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蓄意利用抗战“壮大”自己，蓄意在战后推翻国民党，这总没有辩护的余地了吧？

第三、我当年对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曾产生过一种错觉，以为他真想避免内战，把中国推上和平建设之途，这一着不但骗

了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也骗了许许多多天真的外国人士。我经过 5 年的镣铐锒铛才有所认识，而这些外国人士，有的直到今天，还在莫明其妙。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已经部份的给自己揭了底，他是用这个希望和平解决国事的假姿态，骗取“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换取“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加倍努力”准备推翻国民党。我还记得在那个“会谈纪要”（即双十协议）里，明文写有国民党愿本着“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并同意“迅速结束训政，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请问对于这些，今天统治大陆的中共敢说一个字吗？不但如此，蒋委员长为了尽速恢复国内和平奔向建设的前程，率先整编国军并裁减了大批现役军官。各位还记得那些被裁军官不肯转业而到中山陵请愿这件事吧？蒋委员长这种公忠体国的伟大精神，口头会说得天花乱坠的毛泽东能作到万一吗？可是毛泽东不但不裁减他已同意了的军队为 20 个师，反而用残酷斗争的手段大肆而无限制的扩充武力；不但蛮横的要求把热、察、冀、鲁划为他所统治的独立王国，并且要求把晋、绥两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置于他的半统治之下。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把他的军队得按照他规定的地方去驻防！他还要求他的军官得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各军事部门的工作，（控制整个国家军事机构），他的编余军官得一体任用。我的天！这不知比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还厉害多少倍！这是明载于毛文的附注，不是别人瞎说吧！要不照办，就是蒋委员长撕毁“双十协议”，“挑起内战”！事到今天，请“国内外广大的中间份子”好好想想吧！到底是谁不顾人民

的死活，硬要挑起内战？毛泽东的话，向来是阴阳两面，非得经过长时间，谁也摸不清他的底，要不是共产党给了我 25 年毫不含糊的认真学习、改造（海外叫做“洗脑”），我到今天还不可能懂得他这一套哩！

我在前面提到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一文中“部分的给自己揭了底”，那么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到重庆前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文中所泄露“见首不见尾”的一句话：“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这是一句什么话？请想一想：“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这是根据一个什么秘密（未经中国参加）协议（大概是雅尔塔协议，我已记不清了）而来的。当年参加这个协定的人，岂料想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阴谋及其深远恶果吗？当然，我所要指出的不是在此。毛泽东去重庆是谈和平建国，为什么在临行之前要喜不自胜地谆谆告嘱部下要“配合……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呢？这句话道破了毛泽东的底细，说明了问题。三岁小孩子都会明白；他是在告诉他的部下：“我去重庆，是麻痹中外人士，把局势尽量拖一下，你们配合苏蒙军从黑龙江进抵长城这个大好形势，赶紧建立靠拢苏蒙的根据地，把苏蒙军所缴获的日军武器全部接过来，占有整个东北，这就‘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他要从后门引虎打内战的心肠已昭然若揭，不是我诬蔑吧？

我还要在此顺便多说几句。当年苏军从东北掠去了大批大批的机器物资和强奸了无数的妇女同胞，我虽没有根据说这是在中共的怂恿之下干出的，但我记得一件事：约在 1947 年，中共曾对美兵在北平的“沈崇事件”，那样振臂高呼问得震天价响，为什么对苏军强奸那么多女同胞的兽行，却只字不提呢？后来竟连打死苏联兽兵的青年都治以重罪，我就有充分理由，

说这是中共默许苏军那么干的，至少也是闭起眼睛装着没看见。这是什么样的正义感？这是什么样的是非标准？尽管有些人硬是血迷心窍，甘愿做他的应声虫，我却休想办得到！

我的话中，引起一些往事，说得有些多了，也有些乱。我要说的重心是：国共前两次合作，都是共产党小国民党大，它投国民党的机，它处心积虑，抓住机会，坐大成势，就一下子要“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国民党了。今天，他已完全占据了大陆，国民党只是退守台湾一岛，忽然又要搞第三次台作，毛泽东安的是什么心，是谁都能见其“肺腑”的。

读者在此，可能要发生两个问题：其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这一办法，其理由、其必要为何？其二是，既然是毛泽东的决策，要把我们释放作为政治筹码，为什么又迟了 20 年呢？关于这两个问题，我现在只能笼统地作答：就我的切身领会，毛泽东的算盘珠，20 年来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推来搬去的。最后，才不得不把算盘一拍，全体释放！这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内容，我一时怎能说得清，写得明呢？容我在后文慢慢交待吧！

在吉林省公安厅看守所除了参观之外，两名科长就给我们安排“学习”，要大家从书上、报上找题目讨论。

我记得当时正在建武汉大桥，我们就拿这个做题目“学习”。从军事、经济、政治观点讨论这座大桥的功能。大家“尽情发挥”，以达到一定认识的标准。

学习时也可以自己想题目，我曾提出“中国新文学改革的意义”。

这些“学习”是没有系统的、临时的，和以后势如洪水猛兽的“学习”完全不同，大家都在磨时间——就是在等，等结果，等中共“释放”我们。

结果一直没有下来，此时天已经暖了，到了五、六月时间，干部们买了些花草蔬菜种子给我们，在看守所内的院子里种。

由于我们常常自由活动，对看守所的情况已有所了解，所里面的房间都是小号，顶多住四、五个人，一共有四、五十个号，我们是单独在一个角落裹，与其他号隔开。但我们在院内活动时，可以从窗口看到其他号内的情形。

据我每天观察，这个看守所里面关的大多是省级份子，也有一些犯错误的共产党人，像以前我在金钱堡劳改队时的生产科长就被关在一个号子里，他看到我连忙低下头。

我们这一个看守所人满为患，这并不是反常现象，因为当时大陆上自中共中央所在地开始，到省、市、县、公社，都有看守所。每一个所都“客满”，看守所本来应该是短期审问犯人用的，但是我们这里有人已经关了很久没有被处理过。看守所并非监狱，而它已经是这种情形了，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见。根据我亲身经验，每个监狱和劳改队动辄关了上千名犯人，比看守所多的多，整个大陆真不知道总共关了多少人？

我们这一批人在看守所集合以后，我就是和刘荣第相处不好，以前在长春公安局我们也曾共蹲一个号子，那时就经常吵架，他本来判了十年以上徒刑，就因为他老向干部反应情况，在长春看守所和监狱里面又成天写材料，因为这个，他减了很多刑，他原来是长春一家饭馆的少东，从日寇占领、光复时期，一直到中共进入长春初期，他都是以饭馆为根据地拉拢认为对他有利的人，他因为有这种投机本质，所以在长春时老想在我身上打主意，我因此最瞧不起他。

离开长春监狱，他就到处破坏我，现在到了吉林公安厅，他还是成天打“报告”整我，我当然免不了和他吵架。有些干

部、科长就来解劝，有个干部说：“你不要跟他吵，说不定那天政府还要派你们做很好的工作呢！跟他吵干嘛！”这是干部言谈间自然的流露，我们每个人这么想，干部也是这么想。

到了六月末，种的芹菜刚长出一两寸，忽然一个处长和科长找我们集合开会说，这地方又小又挤，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准备送我们到沈阳去。其中一个干部在告诉我们以后说不定大家是同事这话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示希望我们能对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这样人民（共产党在某些地方多是这样称呼自己）会高兴的。由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中共集合我们的动机，以及以后为我们安排工作的远景，虽然这是私人谈话，但也可以流露出共产党由上到下的想法。

同时另一名科长告诉大家说：“段克文最不喜欢别人提他在公安局的情形，希望大家以后能注意（当然指的是刘荣第）。”自此以后，他就不再在我身上打主意了。

不久，我们坐普通硬席列车从长春到沈阳（另有软席、卧铺之分）沿途干部都很客气，照顾也极其周到，但我们去上厕所时，总有一名干部不言不语的把脚伸到门缝中不让把门关紧，我们虽然不解其意但也由他去。

到了沈阳，我们被送到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这是一个大院落，比吉林的还大，我们住在其中的一个部份。我进了号中一看，其中一个人我认识。但他说：“我可不认识你！”有些人在共产党监狱蹲出这样一个经验，遇着熟人，多表示不认识，免得出岔子。我却钉住他不放说：“你不是欧阳午吗？不是李嵩的副师长吗？60 军起义时军长曾泽生把你们师长李嵩扣留了，是你把队伍带出去起义的，怎么关在这儿呢？”

他无言以对，嘟嘟囔囔说：“我犯了错误！”其实他把队伍带出后，就被送到军政大学去“学习”，到那里不久，共产党就

找个题目把他押了起来，等到这次集合，才又把他送到沈阳来。

号中还有一个叫郑明新的，他是军校三期毕业生，国军的副军长，原来驻防营口，担任该地的警备司令以后，原部队就调走。后来伪满时候被国民政府收编为师长的王家善叛变投共，郑就被捕，以后被判了 5 年（由判刑之日算起），也集中到这里来。

还有一个叫李仲章的，原是重庆日本问题研究所（名称我已记不清楚）的研究员，这个所的所长是王芃生。李的任务是购运有关日本的书报杂志。

李是个投机份子，抗日胜利后到上海，钻进一个左翼团体，跟周恩来也取得联系，拿着周的信到东北，跟哈尔滨共产党地下活动负责人取得联系，他被派到营口活动，驻军师长王家善叛变。以后王“起义”，李认为他有大功，但王不承认是李活动的结果，所以李就和共产党闹了起来。共产党不但不承认，反把他押起来，判了 10 年徒刑。

李仲章一直不服，他跟共产党干部说可以去向周恩来求证这件事。在看守所中他老是为此事嘀咕，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是吃王莽饭，给刘秀办事，结果落得这个下场！”他一拍大腿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在我们九个人集中到沈阳看守所以前，这里已经有 21 个人了。除了我上文提到的欧阳午、郑明新、李仲一章外，还有军统东北区副区长陈旭东，整编第 × 师师长杨文璪，他在山东泰安被俘以后，被中共用民船从渤海押到东北来。此外还有重庆兵工厂厂长王建民，第 × 军（广东部队）参谋长陈燕茂、第 × 师副师长张国泰、沈阳市在乡军人会秘书萧兆麟等。加上我们九个一共是 30 个人，但是其中一个人因为重病，始终没有见过面。

“学习”时两号并成一号，活动时到院子里也可以互相聊一聊，这个“学习”和在长春的差不多。有时闲着没事做，干部也让我们种点像蕃茄之类的菜果。

到了当年九月中的一天，忽然集合我们，一名公安厅处长来说，这个地方不雒宽敞，他们已经为我们在抚顺找了一个又大又宽敞的地方，他把这地方描写得好的很，并且说，这是经过国务院特准以后，才准许我们搬过去住。

后来他又问我们对于住在沈阳这一阵子的意见，大家也只是随便应付几句，倒是李仲章“一针见血”的说：“你们这样押着我们，六、七个人挤一间屋子，睡地铺，要学习，吃的是高粱米饭，我们对这些都是有意见的。”那个处长听了很尴尬，不知如何作答，只好以冷笑应付了之。我们在沈阳吃住的确不好，伙食虽不定量，但每天要吃一次加豆子的高粱米饭比在长春差多了。离开沈阳前几天大概伙食费有些结余，吃得都是腌鸡熏肉之类的东西，过不几天，我们这群就被送往抚顺。

第十一章　阶“上”之囚

我们这一群在沈阳上车后，都不知道会到抚顺什么地方去，每个人心中的想法不一。干部们描写如何如何好的情形，在每个人的脑海中组成了不同的画面。

汽车快到抚顺的时候，一名陪送的干部指着一个山头上的一座宝塔说：“我家就住在那下边，你们以后也住在那附近。”大家急着引颈往外看，也看不出什么苗头，只好姑妄听之。

等车子行进到那座山下时，这才看到一片灰色建筑物，占地甚广，中间有一座耸立的瞭望楼，还看不出是什么所在。到了门口，才发觉原来是座大监狱，墙是用灰砖砌成的，有一丈多高，上面装着电网，转角处有岗楼和哨兵。这里的特色是干部都穿着军装，那时中共还有军衔制度，这些干部有的戴上了大肩章，表示他的官阶。据我们后来所知，他们若非遇到重要事项，是不会佩戴军衔的。

我们从旁门进到院中，干部已经临时摆好几张桌子，我们就开始办理登记手续。然后就按登记的顺序把我们 29 个分配到四个房间中去住。每个房间里面是面对面的大板炕，被褥虽然是旧的，但都新裁洗得干干净净，并且另加新被套和被褥单。枕头，枕巾也是新的，这些年来从没有睡过枕头，看到它就会想到也许今天就会睡个更舒服的觉，做个更美的梦！

另外有两间屋子摆了像麻将、围棋、象棋、乐器之类的东

西。还有两间就是吃饭的地方，四个人一桌，桌凳都摆得很整齐。所有这些房间都还摆上盆栽花草，这样的待通可说是特殊又特殊的了！在住所另一头是厕所，装着新式的抽水蹲式便器。但是因为每间房夜间都要锁门，所以在每个号里，都在墙角处设一小木板房，里边放着便桶，第二天早晨，由犯人轮流值日，两个人抬到外边去倒。

我们安置好了以后，送我们来的处长级干部还跑来慰问一番。管理人员说话时也是极尽和气之能事，我们不找他，他们也决不来找我们，有什么活动，也小心翼翼的不露管理身份的痕迹，接着凡是吸烟的，每人每月又发香烟十包。

还有干部进来主动叫我们玩室内的麻将、棋类。开始时我们还有默拘束，但从来也就放开了，能玩的、能弹的、能唱的，各尽所长“享受”起来了。还惹得干部在旁鼓掌叫好。

到了过中秋时，不但吃到海参，而且还发了不少月饼、水果等应节令物品。这种轻松空气有时是干部们有意造成的。有一次一个犯人把出外大小便顺口说成是“放风”，一个干部很着急的说；“你怎么把这个名词用到这里来？以后千万不要再这么说!”就可见一斑。

我们这个院落很大，所有监房都是平房，中间有装着玻璃窗的走廊相通。我们住的地方还算是小的，互相对面，只有 8 个房间，其他地方有的一排就是四五十个监号。监内设有操堂、医务所、疗养室和相当漂亮的理发室及俱乐部。

我们在监中住了不久，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拘押日本战犯的地方，名叫“沈阳军区战犯监狱”，又名“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后文简称“管理所”），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有两块招牌呢？关于这一点他们不曾解释过，据我想：对于判过刑的来说是监狱，对于未被判刑的则是管理所，我们后来被称为“战

犯”，也许与这一来历有关。其实这个字眼加在我们头上是名实不符的。

这座监狱是伪满时期建造起来的，东西长 1 里路，南北长 2.3 里路。在瞭望楼以北的半边，此时已划归辽宁省抚顺监狱，押的是一般犯人，那里的监房和工厂年年扩大，比我们这边大了四倍多。

伪满时期这座监狱押的是犯法的伪满官员和日本中上级干部，是那时候的高等监狱。国民政府时代改为普通监狱。中共来了以后，又用它拘押日本战犯和伪满高级官员，现在又加上我们这些国民党“战犯”。

当时关的日本战犯约有一千多人，伪满官员约有六、七十人，包括溥仪、溥杰，“国务总理”张景惠，“警务总监”齐知政，“×× 大臣”张焕相等。

日本战犯除了有一小部份是中共从山西解来的外，大部份是被苏俄军队在东北俘虏后押到苏境，不久又交给中共的，，溥仪以下等人也是苏俄解回给中共的。

日本和伪满战犯在韩战时期当联军打到鸭绿江边时，中共曾一度把他们疏散到佳木斯，哈尔滨一带，韩战停战协议签字以后，又解回抚顺。前文已经提到，沈阳兵工厂也是那时迁到黑龙江的。从这些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是如何惊慌了，他派出“志愿军”是既冒险而自己也没什么把握的，但终于取得了停战协议。所以毛泽东对自己的这句诗：“无限风光在险峰”是极为得意的。

1956 年夏初，中共一下子把屠杀中国同胞的日本战犯放了一千多人。只留下五六十个，其中大都是经过沈阳军事法庭判了不等刑期的。如伪满国务院副总理（或是“办公厅主任”，我已记不清了）古海忠之这个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号施令

残民以逞的祸首，也只判刑不出 20 年（确实的刑期已忘记）并于（1965 年？）提前释放了。我用此比比自己和其他的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据我们后来所知，中共对于日本战犯，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不但管理所的干部大都选些会说日本话的人，而且饮食起居都一概保持日本方式。医生有三四个，女护士有十几名。日本战犯的学习活动，都是通过他们选派出来的头头来传达施行。（这个办法后来也用到我们身上——详后）他们平日的生活待遇，在当时比一般社会生活水平是高得多多的。尤其释放时所发的物品，都是上等毛毯、皮鞋之类的东西。谁都知道，毛泽东向来是反对什么“人情味”的，他的一举一动或是用一文钱，都有他自己的目的的。那时正是韩战之后不久，把这些自知对中国人骂都犯下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日本战犯，在百般优待下又很快放了回去，他们在千知罪万感恩的反躬自问下，是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伟大”和“毛泽东万岁”的。不但要为中共大作宣传，并且也会给日共增加社会力的。这一着确实有效，据毛泽东自己亲口所讲：除了只有一个战犯又投靠日本旧阵营（据说是在什么法院供职）外，其余的都不曾走上与他设想相反的道路去。中共干部并举出前日寇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为首所组成的“中归联”（“中国归来者联盟”的简称）在日本的左翼活动为例，到处极尽宣扬之能事，特别是向我们更加不厌其烦的讲！

利用战俘达到政治目的，这也是毛泽东一生的杰作之一。自从在江西起，他就对国民党搞放俘，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另据原是张学良的特务首领陈旭东在“战犯管理所”揭露说：共产党所以在陕西和张学良搭上了线，就是由共产党释放了一个原东北军官名叫王（或李，我已模糊）福源的所引起的。他从

国民党中那些胡涂家伙身上搞这一套确实拣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便宜，转过来又同日本搞，当然是“驾轻就熟”了。后来，他又对印度和越南等国家搞，自然如出一辙。再看，在韩战中，中共也曾俘虏了一些美国军事人员。他们把这些人说成是：“空投细菌灭绝人性的美帝空中强盗”和“美帝空投下来的特务”，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大肆宣传，并把这些人判刑，以表明只有中共是敢于和美帝不共戴天的。可是尼克松应中共的邀请访问大陆之后，美国这几名战俘马上就藉词释放了。可惜有一名在事前不多日子就已自杀身死，否则毛泽东又可多一名政治筹码了。

在这以后，我们中曾有不少人认为：把日俘、印俘、越俘、美俘统统都放了，为什么扣押我们已达 20 多年还不放呢？所以有人愤然暴露这样的思想：“扣押比放了放心，关死比扣押还放心”！其实，他太不理解毛泽东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了？在毛泽东而言不是什么放心不放心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武力手段之外达到政治需要的问题。这一回不是把我们一下子全“释放”了吗？若不是经历 25 年痛苦的切身经验教训，我将和许多人一样是不会得此教训和认识的。这一点，我倒要真正感谢毛泽东了。

我们在到达“管理所”的当时，因为处在与其他监所不相往来的隔绝状态，我们还不知有日、伪战犯。由于“管理所”至少每周放电影一次，大家到俱乐部经干部分配为三堆坐着，我们从举止、服装和形态等等方面，才辨别出哪一堆是些什么人。其中溥仪最惹人注目，不久就被认了出来。

我们到的那天晚上，就到澡堂洗澡，两个池子，虽然只是水泥做的，但是相当大，水也很清，从到辽宁公安厅以来，这是第一次洗澡，身心顿觉舒畅。后来所长问我们对澡堂设备有

何意见，我们中有人说没有淋浴，觉得不方便，所长马上就令人装好。总之共产党这时是极力争取我们的好感。

我们监所院子里也种了些花草。到了十月天结冻时分，干部们用冷水浇冰场，问我们谁会溜冰，全队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二人曾经学过，但也生疏了，干部就对我们现场指导。

这时吃的也很好，有六、七个厨子专门“服侍”我们这三个团体。每天变些花样，几天就吃一顿水饺蒸饺、鸡、鱼、猪、牛肉经常都有，鸡笼里的鸡经常不断，有时还被黄鼠狼拖得满院都是鸡毛。吃的方面只有一个地方不习惯，就是早上喝一碗酱汤，原来这是配合日本战犯的习惯，后经反应上去，立刻就换了稀饭小菜。作为犯人来说，我们生活确实略得上“惬意”，若不是毛泽东的命令，当然不会如此。“学习”，也并不认真，还是那句话：磨时间。

我们队里面，李仲章还是在闹情绪，他还给周恩来写了信，问他为什么不承认在上海时的勾结？现在把他和我们关在一起，同样对待，他是不服的。他这么一来，所长马上找他个别谈话。我们在隔壁听到他高声阔论，侃侃而谈。他回来后只是说，所长很安慰他一阵，并且告诉他：“你放心，你对人民有一些好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有一天下大雪，外面非常冷，我们正在俱乐部开会，忽然接连来了两批人，他们带着行李，冻得哆哆嗦嗦的。从俱乐部门口经过，彼此都用极其惊异的目光互相打量着，想从对方找出自己极欲了解的事情。与此同时，又从北平到了 20 来人（也是像我们那样在 1956 年 1 月从就近各处集合的），他们都被安置在第三、第四两所，大约共有 300 多人。

他们进来的第二天，我们就被命令搬到第四所靠澡堂理发室那一端三个房间去。跟新来的人住在一起。我们当时是不准

彼此交谈的。有些人如果发现有认识的人，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写材料、检举他们认识的过程和彼此都有过那些活动？这种作法我以前还不懂，现在才了解他们是免得被对方先检举了自己反会处加被动的不利地位。是的，在共产党控制下，虽是夫妻父子彼此都要贼目鼠眼地监视着，不然的话，一旦出了什么事，那要“沾包”没完。更何况是过去的相识？这是经验教训所炼成的结果，所以对任何人和事都要像如临大敌似先做好防御工事，然后再说。

日子久了，渐渐能彼此交谈，才知道他们有一批是从武汉来的。也是 1956 年元旦左右，从各地监狱和劳改队像我们那样集中的。当时，也同样举行过参观和提高生活待遇。据他们说：武汉生活费用较低，吃的比东北还好了许多。另一批是从南京来的，这一批我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

南京来的这一部分，原是由山东禹城“解训团”（这是一个简称，原名我已记不确实了，大概是“国民党解放军官训练团”之类）押解到南京军法处看守听。他们管这名堂叫做“上调”，在乍听起来还以为是“上吊”，很吃一惊，经他们说明，才知是上调南京准备审判的意思。

山东“解训团”的成员都是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江南名次战役被俘的军政人员。据说实在苏州拘押了一个时期，在那里曾有两名军长级的军官（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想逃走，被共产党立即枪决了，后来就统统集中在禹城。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占有全部大陆，所以对他们还是很优待的。不但从各地采办鸡鸭鱼肉吃不完，只要不出大范围，行动也不严加限制的。但是将、校、尉的待遇是有明显区分的。自从国民党完全退出大陆之后，他们的利用价值减退了，不但待遇大为减低，而且也要参加劳动和严格要求纪律了。

大概是在 1951 年大“镇压”开始前后，就一批一批把他们“上调”到南京去。共干当时禹城“解训团”内向他们宣布：因为他们“学习”很有成绩，所以政府要“释放”他们并给以相当的工作。同时还为他们大开筵席以表祝贺。可是一出了大门，枪兵对他们端枪做好预备射击的姿式，把他们上绑并戴上手铐，押上火车，一直送到南京军法处看守所押起来。除了睡觉之外，成天得盘起腿来反省；就是换换腿，不经报告批准都不行。既不准和别人交谈，也不准向别处看，正襟危坐，确实和庙里泥像一模一样。那种滋味，谁要是不能领会，请他如此坐上四个小时，就可以知其大概了。事情是如此诡谲莫测，不但他们说起来，都为之变色，连我们听来也为之毛骨悚然。但这种经验教训，凡是在大陆的人们，都是有其一定感受的！据他们自己推测：原本都是准备送到雨花台处死的。但据我的经验判断，只要国民党不垮台，他们就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毛泽东是不会批准再杀他们的。这也许就是他们被调到南京后又“变了卦”的原因吧？

他们一直这样蹲到 1956 年元旦，也从没有经过任何闻问。正在做“阶下囚”时，忽然一下子又被以“上宾相待”，难怪他们都个个惊慌失措起来。是的，共产党做事情，向来是神鬼莫测，任何人也难于摸底。刘少奇都摸不着毛泽东的底，更何况其他了。

现在言归正传。伪满这个摊摊，现时又搬到我们原住的一所。全所共编为六个队，即：辽宁队，武汉队，南京队，北平队，伪满队和日本队。我们辽宁队，日本队和伪满队每人前已发给一套量身定制的蓝色新棉衣和一套发给以前日本犯人剩下的卫生衣裤。南京队，武汉队和北平队到此，也照发一套同样的新棉衣。但卫生衣裤就没有了。

1957 年元旦，因为南京武汉两队都是刚来的，日本队言语隔阂，伪满队又没搞过文娱，所以管理所就安排我们辽宁队筹备演出。时间很仓促，我们 29 个人全体出动，临时现抓，只演出小话剧，相声、双簧、活洋片、平剧清唱等等小节目。我和关梦龄搭档演的相声，使得大家哄堂大笑，后来 20 来年中，每次都少不了。时常一天演五六次之多。实际说来，这也只是强颜欢笑，大家的心情均在纳闷着：为何还不“释放”？

共产党对于犯人过春节是很注意的，不管在监狱或是劳改队都是如此。因为这个节令最易惹人动起思亲念家的情绪，所以他们就尽量制造欢乐的气氛，用以转移愁闷的心理。我们在春节前约两个星期，就在管理所号召之下，除了日本队外五个队就把一切活动都集中在大排各自的节目上了。共产党的规定，春节放三天假，再借用两个星期日，就要搞五天文娱（在“文化大革命”时改称“文艺”）活动。除了三餐之外，整个上下午和晚间，都要分别集合到俱乐部去开文娱大会。一连搞五天，真是搞得筋疲力尽。到深夜，一头卯到床上就进入睡乡。什么家庭呀？什么亲人呀？什么这个那个呀？谁也没工夫去想了。

在正式演出的前几天，先要彩排预演，经过管理所审查。他们对此时是严肃认真，丝毫不苟的。几乎所有重要干部都全部到场。举凡台词、动作和节目次序的编排，都要按照“指示”去办。例如：提到毛泽东或共产党，手式和目光都要像仰望太阳那样，向高处使劲。如果要演关乎国民党的角色，“大反”（就是大人物）要求须做出“阴狠”、“毒辣”的表情，“小反”（即中小人物）要求须做出流氓或小鬼的丑态。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他们叫做“自我控诉”或“自我教育”，也就是要从思想情操上叫我们进行“自我破坏”。总而言之：是自己骂自己、自己整自己、自己污辱自己。这是自己的周瑜打自己的黄盖，

导演者成了孔明。所以每个细节都一点也不放松！

在春节前两天，就开始大包其饺子，把各号的学习兼吃饭的桌子搬到走廊里，能赶皮的赶皮，能包的就包。除夕还守岁和吃夜饺子，干部还不断地来打趣，说这问那。这五天的饮食，是够得上丰富多彩的，连海参也上来了。不过，我们辽宁队，在这个春节确实是够忙的。因为管理所照厨师们的节令习惯，春节期间按例使他们回家团圆，如是这个“光荣”的炊事任务就被我们“争取”来了。所以我们 29 个人，就厨房和演出两头跑。

元旦过后，除了各小组（也就是各个监号）和各组员要“打通关”式地发表个人的感受，接着就得学习人民日报总结一年来各方面伟大发展和展望一片光明未来的“元旦献辞”。这已经形成一种“公式化”，春节时也当然如此。不过，这次的春节是否从人民日报上学习过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是，在座谈春节感想时，我还记有以下几类说法：一、犯人能够过这么丰盛的春节，是史无前例的；二、有的人说：自从“归案”以来，第一次过春节时就看见舞台上横额写的是“庆祝一九五 × 年春节文娱大会”，结果那个“五 ×”就像号码机似地一直加到“五七”而他还是“依然故我”，看样子，他也许不能再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五八”了；三、也有的说：他过去在家也不能过这么好的春节，共产党确实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共产党真是与人为善；四、还有人说：共产党一贯优待俘虏，他过去老不明白，这回他却亲眼看到是真的了！可是，他还是没说出，他究竟明白了什么？五、也有的干脆说：春节过的好是好，但是再叫我过第二个，我却不情愿。在这类座谈会上，一般都是各讲各的，别人很少提意见。

春节过后，我从地方报纸发现这样一则新闻：有个贫雇农

在春节发表感想说，过去他给地主当长工，在春节还能大吃几顿肉，可是如今却解不了馋，于是乎：“仍然一幅奴才像”，“这是自己阶级的可耻背叛”，“对共产党毛主席忘恩负义”，“不是觉悟不够的问题，而是有意无意鼓动农民不满的问题”等等之类箭头，就一齐围攻他，掀起了大批判！最后他承认自己没有文化、学习不好，现在觉悟了，地主给他肉吃，是为了暖他的心，好从他身上谋更大的剥削，他恨死了地主，从今以后一定坚决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向旧社会展开无情的斗争等等，这才渐渐收场。我们看了当然各有各的想法，但是谁都不肯说出口。

第十二章　思想初检

战犯管理所和一般监狱或劳改队在“组”和“队”的组织方面稍有不同。监狱、劳改队或看守所中每个小组只设一个组长，学习、生活“一把抓”。管理所中每个小组要设两个组长，一个是学习组长，他的任务是：一、传达所方关于学习的安排；二、掌握（即“主持”）小组学习会场，整理开会纪录，做出书面总结向所方汇报；三、及时向所方反映各个组员的思想动态；四、负责反映一般情况等等，一句话，它是在思想控制方面的基层工具。共产党总是注重“抓思想”的，他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另一个是生活组长，他的任务是：一、主持每周举行一次的小组生活检讨会，凡是组员间发生什么磨擦或是谁违犯了什么纪律，以及一般生活问题，都要在这个会上解决，然后由他做出同样的汇报；二、经手发放生活日用品，如手纸、学习纸、肥皂、牙粉、牙刷、毛巾、服装、香烟等等，都由他负责调查和发放；三、关于劳动任务的分配和安排等等。这两个组长的铺位都是设在一进门的左右两边，不论黑天白日，四只眼睛把组员看得点滴不漏。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方都了如指掌。

另外，每个队，除了专任一名干部担任指导员外，还从犯人中指定一名比较可靠的人，担任“大组长”。指导员除了直接掌握全队的思想问题和搜集情况反映外，并时常到各组进行学习指导。大组长是对全队较大较重要的学习和生活问题，进

行“一把抓”。凡是开大组会或是联组（即几个小组）会，都是由他主持。是学习和生活组长们的犯人“顶头上司”，也就是全队犯人的犯人头头。

一般犯人都要在互相反映情况的同时，还要遇有重要思想活动时，作自我的思想汇报。不论组长或一般犯人们，要是不能作到这一点，指导员或科长等在某些场合，至少要提出不指名式的批评。他们说“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不想这个，就想那个，有的人现在姑且不点他的名，老不反映情况和作思想汇报，思想是有问题的，这至少不是靠拢人民而是消极对抗的表现，现在提出警告，以观后效”等等。凡是没有或是不常作汇报的人，听了这话就会觉得是指自己，这你就不能无动于衷了。有的人因而被逼就作了假（即捏造）汇报，但是一露马脚，就常遭到指名的批评。这意味着在自己的材料档案上又要记上一笔帐，并且还要在小组会上，受到同犯的批评。常常弄得草木皆兵，惊慌不安！自怨自艾，搞成思想负担。

我们在到管理所之前，犯人之间都称呼“同学”，到此地之后，就不知不觉改称“同犯”了。

过了春节，经所方指示，在各小组中曾一度进行过个人的思想检查。在走廊里还设置“墙报栏”，自己可以用 32 开的学习纸把思想写出来，如果自己批判不了，同犯之间可以互相进行“与人为善”的帮助或批判。我记得队中一些人，曾检查出以下几类的思想。简述如下：一、万历自称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后来曾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给张学良当过特务第三团少将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奉命冒险同东北向日寇做情报工作，结果流落在东北。他觉得他没有对抗过共产党。判他十五年，他不认罪。

二、杨文璟是整编师中将师长。许多中将都是拘押在北平，

他认为他不该关在抚顺。

三、王光复是东北讲武堂八期骑兵科毕业。后来在国军某师当过副师长。共产党占领沈阳后，他在街头摆小摊卖布为生。那时共产党曾多次邀请他出来担任骑兵教练任务。他都托词拒绝，是因为他不甘国民党的失败。

四、黄炳寰曾是陆军大学毕业，锦州战役，他任兵站总监被俘后，辗转送到佳木斯军政大学担任教案的编写工作。他借着眼疾就想不干，是他思想反动坚持不肯变节。

五、许权是军校四期生，在共产党进兵西南时，他正担任某军事运输学校（已记不清）校长，共产党某高级干部（名已忘）曾是他的旧友，除了常邀他在家聚餐外；并恳切地邀他担任工作。他的答复是："当寡妇还要守三年才改嫁，现在国民党还没完，你不能马上要我变节"，这是他思想反动的具体证明。

六、有个人暴露思想根干脆，他说："秦始皇是焚书坑儒，偶语弃世，今天我认为差不多！"并且写出墙报来，惹得满走廊都是批判他的文章。一直到去年大释放前，他历年都敢于暴露不少"反动"思想，因此他常写自我批判，一写就多少天。

七、我自己曾检查出有"五大罪人，一个问心无愧"的不认罪思想。简言之就是 我是国民党军校毕业生，不到十年时间就由中尉跳到少将，可是日寇投降后我消极后退盼望和平，对国民党当然是一大罪人； 共产党又判我无期徒刑，当然没有罪也有罪； 在我到东北后，不知有多少亲友投奔过我，我都对他们一概"挡驾"，自然落得一个"六亲不认"的罪名； 妻儿家人，既没因我而一天当过太太、少爷、小姐养尊处优过，还搞得衣食无靠四方零散，当然我是他们的罪人； 结果把自己搞得镣铐锒铛大坐其牢，自己对自己也无疑是罪人。除此以外，我既没侵犯过任何人丝毫的利益，还为别人的美好未来，尽了

我能尽的心和力，我在任何情况下都问心无愧。对此我在小组曾作过“沽名钓誉，伪充好人”的自我批判，别人也不曾深究过。

入春后，所长和科长曾接连作过几次报告（在这种场合，日本队向来是不参加的）。除非有特别缘故，他们作报告向例还是从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归结到“当前形势大有利于你们的改造”上。（这一大段，基本是要照稿宣读）然后再引到具体的主题来。

那时的所长是个北方人，他的讲话，我尚想起有这么一段：据他自己说，他过去也曾在国民党阵营干过工作，“不过没有像你们的地位那么高”。又问我们：“我的工作人员对你们有什么污辱或虐待没有？”有些人说：“没有！”他很觉高兴。又说：“你们改造这些年，一般地说，都改造了 2 千多天，或者 5 万多个小时，时间是一秒一秒地过去，照照镜子也一天比一天老了。黑天白天，行动睡觉，都盼望出去。政府这次集合你们，是为了你们的加速改造，什么叫加速改造，这个意义你们要好好领会。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在这样大好形势下，你们要再改造不好，我就要发脾气了！”从他的讲话里，给我的印象是：我们不久就要出狱了。

管理所科长至少有四个，我不确知的原因是因为所里的组织对我们是保密的，据我估计，所长之下设总务和管教两科，每科至少还设一名副科长。称所长、科长时要冠以姓，各队的指导员，称某某科员，其他看守人员则称某某班长。在某种场合，都统称“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名字一概不向我们透露，以上都是所里明白规定的。不过，日久天长，许多干部的姓名，也都为不少人所知道，但是谁也不愿说。

有一次给我们讲话的这名科长姓金，朝鲜族人，精通中日

两国语文。他当时在管理所的地位仅次于所长。过去日本战犯的改造，都是在他主持设计之下进行的，他们都以金主任称呼他。大家心目中都以“改造专家”看待他。他确实能干又认真负责。一般说来他也确实有办法能抓住一些人的思想感情。他这次讲话主题是介绍日本战犯的改造情况。大意是：日本战犯从苏联解到大陆时，因为苏联根本没有“改造”这项措施，所以都仍保持“武士道”、“大和魂”的忠君思想，每晨还要面向东方对天皇遥拜。并认为侵略中国是人类争取生活空间（因为日本地少人多）的自然要求，根本不服气。中共在尊重他们的生活、语文习惯和尽量给以革命人道主义待遇的同时，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认罪、交罪的过程，他们开始找到了真理，逐渐认识了天皇是吸吮和压迫日本人民血汗的大地主和大罪魁，他们不但不再向天皇遥拜了，而且觉悟了他们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确实对中国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日本队称战犯管理所是他们新生的摇篮，中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因为他们的改造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人民政府就一律释放。你们也已改造了六年以上，你们不会比日本战犯落后。这点我们是深具信心的！”

这名科长也同样强调“加速改造”这个字眼，并且指出“这是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你们采取的伟大的英明措施”，意味着我们可以尽早同到人民行列，“共产党要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希望我们也能早日为人民服务，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这段时期内，作完报告后，往往还要我们即席发表感想。如是，有的人表示：“我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希望，我不认为自己会比日本战犯改造得落后，我要在‘加速改造’的英明措施下，快马加鞭，争取新生，决不辜负政府的期望！”

又有人表示:“我们如果改造不好,所长都要急得发脾气。今天听到科长的教育,我又找到日本战犯做榜样。我对‘加速改造’有所理解,决定大步向前,力争上游,一不让所长再发脾气!”也有人表示:“过去几年我真如青蛙的冬眠,今天听到科长教育,我才得到了春醒。日本战犯的改造道路,也就是我的改造道路;我一定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现场发言的人相当多,事隔 20 年,我今天能有印象的,只能举出以上几个人了。

我们这时的日常起居是:早上五时起床,接着是洗漱、倒马桶,并在大操场集合作早操,然后同来听广播新闻和打扫室内卫生。7 时早饭,8 时开始学习,中间休息 20 分钟和作广播体操。12 时中饭。下午全部时间是自由运动,有的打排球、网球、篮球、羽毛球,有的散步。我们还举行过全体运动大会,包括上述的球类比赛,和百米、三足竞走、跳高、跳远等等项目。奖章都是我们自己用纸做的。下午六时开晚饭,饭后进行自由文娱活动,吹打弹拉或者打扑克、下棋。特别是对于康郎棋,不少人很发生兴趣。晚 8 时半锁门就寝。

第十三章　参观认罪

一晃到了 1957 年四五月间，科长又给我们作了次报告说，为了我们“加速改造”，国务院拨出一笔专款，把我们组织起来到抚顺、沈阳、长春、哈尔滨和鞍山，进行大参观。这当

中，他又提到日本战犯如何认罪，如何进步。他们到他们当年残杀中国同胞的地点——平顶山——参观时，被老百姓一指控，他们马上就一齐跪地请罪。“你们不是愿向日本战犯看齐吗？人家日本战犯，确实心口如一，说到做到；改造不是空口说说就算了的，应该有实际的表现才行。一点你们应该好好领会。”他的讲话，很引起我们的深思。平顶山惨案，是这样的，当年日寇侵略东北后，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武力，有一次经过平顶山，打死了几个就近的日本人，如是日军就出动大批部队，把平顶山一带老百姓集合起来用机枪全部屠杀造成这件惨案。

这个科长讲这故事时曾惹起我们对日寇的仇恨。但是他强调的是日寇请罪，无形中暗示我们也该这么做，（我们对中共暗示的方法是有一定的经验）他不只是说说而已，是有其特定目的的。

参观开始时，我们先到抚顺煤矿，据我看，基本上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只是把过去规模恢复起来，比较突出的发展，就是又勘探出新矿脉，可以继续再开采一百年。又参观了阶级教育馆，其中有模型，和各种表格、毛语录等等，这种馆共产党

在各城市都有，内容是集中说明资产阶级如何压迫无产阶级，日本人如何压迫工人，帝国主义如何欺凌中国同胞等等。

教育馆里面解说员对我们的说法则不一样，他描写国军接收抚顺时如何欺凌人民，从表情可以看出她是有意要我们在此认罪的，而这时候好多架照相机也在旁准备好了。站在队伍前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跪下，其他人也不得不跪，这么一来，闪光灯劈哩拍啦的照了一通，我不愿跪但也只得跟着蹲下，这种照片当时不知道印了多少张出去。

接着我们曾参观一个在抚顺之东约 20 里的生产队。管理所给我们准备卤鸡、咸蛋、面包等。临出发时科长又强调一番日本战犯如何能体验到“被害者”的立场，如何认罪的事。

以我的常识判断，我们这样一帮人，乘着六七辆公共汽车以及干部们的小轿车和吉普车忽然到那里，一定会有许多人出来围观。可是到那里，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大人小孩都像是没有发觉这么回事似的，连望都不望一下。从而我明白了：这是早在事前就已有了布置的。参观完了，就在一个空场上吃饭，饭后就地集合，科长就介绍生产队长为我们作报告，他是照着已经写好的稿子念的。先介绍队史：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互助组，生产队，初级合作社，一步一步发展到高级社的。然后讲到现在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过去生产发展不大，是因为组织小，现在比以前都强多了。谁家安上了玻璃窗，置了几床新被，全队有几辆自行车和几架缝纫机，都能如数家珍地表上一番，以做证明。最后是新旧对比。过去在日伪旧时代农民是过的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国民党来了，就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并举出一首歌词为证：“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遭了殃；不抓兵就抢粮，弄得大人不安宁，小孩子成天哭嚷嚷！”……“因为毛主席共产党到了，我们老百姓才亮了天，

翻了身，当家做主人。”等等，等等。我是东北人，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家乡这么久，就是在长春围城那种惨状下，我从不曾听到有这样的歌词。但是现在他却能成套地念了出来。他的声音好像因为忆起往事而难过，他的眼睛却慢慢地从队伍这头看到那头。这是要求我们认罪的时候到了！

这是一种“赶鸭子上架”的办法。为情势所逼，先是从队伍前面的或是当组长的跪下，接着就稀稀拉拉地只好“从高度上”看齐了。我所以用这个字眼，就是许多人是蹲着，不能叫自己站着形成“突出”啊！我蹲在地上时，感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可是找不到，真是还不如被枪毙了好，免得受这么大的污辱、我对中国人民，对东北同胞，特别是对当前的干部我究竟犯过什么罪？腐败的满清政府是怎么推倒的，北伐和完成统一是由谁领导的，八年抗战打倒了日本侵略者，铲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取得联合国的崇高地位，又是在谁坚持之下争得的？这不是国民党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明证吗？今天就因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拿日本战犯作暗示，逼使我们走这条路。如果不遵行，就是“坚持反动立场”、“不认罪”和“甘做反面教材”，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野蛮刑罚！这是对于我们的人格和历史，一种毫无道理的凌辱！要说我们和共产党曾敌对过，犯了罪，就干脆把我们治罪（事实上都已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了）或者逼我们向共产党下跪，为什么要拿我们300多个50岁以上的老头子，作惨无人道的表演呢？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谁能找出这样嘲笑人类文明的创举呢！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在以后还组织我们进行家庭访问，叫我们挨门挨户去下跪、对于这，我干脆拒绝了，“谁有罪谁就去，我没罪！”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就是死后又怎么能不刻骨难忘啊！

参观回来的路上，大家的心情大大不像以前那么舒畅，除了组长可能是注意搜集反映材料，眼睛到处乱转外，个个都在沉思着。我的思想也转动起来，我认为共产党叫农民莫明其妙地认为国民党必是“罪恶滔天”，从而从人民心头破坏对国民党的好感，另外又可给农民打气，使他们到处当奇谈、笑话讲，把国民党搞臭。总之，一句话，共产党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论软的、硬的、这样的、那样的，写在纸面上或是讲在口头的，只要抓住机会，不顾一切，不择任何手段。他们导演这个名堂，是经过周到思考和精心设计的。够得上，做得到“稳、准、狠”！做一个共产党的犯人，那滋味……唷！真是无穷！

在抚顺还参观了近郊的大伙房水库，有两个犯人过去曾在那里劳动过，他们说：这个大工程除了一部分职工担任往堤上运土工作外，最重要的挖土、积土工作基本上都是犯人劳动。

“大伙房”这个地名的由来，据传是薛仁贵征东时在此扎营吃饭，所以叫做大伙房。离抚顺市约十几里路，在浑河流域中比较狭窄的两山对峙的地方，按当地气候言，七、八两月正是雨季，下大雨浑河涨水，抚顺就受很大威胁。在伪满时期有一次涨水，两岸人口牲畜的死亡数以千计。现在抚顺变为工矿基地，人口已在一百万人以上，所以浑河修水库司以减低水患对抚顺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灌溉附近稻田，同时又可以供给抚顺和沈阳的工业用水及生活用水，还能发 5 万千瓦的电，所以在苏联专家建议下就在大伙房修建水库。

我们快到水库时，看到公路两旁都是犯人在劳动，临时工棚满山遍野随处都是，少在两万人以上，而且身体都是强的。

堤的心墙是用水泥灌注的，余者完全用黏黄土，表面砌以石块，坝长约 3 华里，坝底宽度约 200 多公尺，顶约 10 公尺，坝是里陂外陡，用土量极大，土要到其他地方去找，苏联专家

要求土要晒干碾碎，过筛后才能使用，在坝旁堆的黄土堆像金字塔一样不知有多少。

共产党自谢这是全国第一大坝，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附近设有展览馆，有专人解说水库兴建的过程和功用以及施工细节等。

建造的主要工作是积土，全由犯人做，犯人一天工作 12 小时，劳动量极大，黑白天换班干，一切按苏联专家的要求，都搞到合乎标准了，再运到坝顶用羊角碾压过，再用机器压实，就再建第二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犯人的祖国又可以得到一次体验。

抚顺参观完后在报告会上，科长还说我们能够“主动自觉”地请罪，足证我们转向“被害者立场”是有了初步的表现，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巩固下去。还奖勉有加，我的天！

在小组会上，我曾提出：这样的参观简直是精神虐待，有个家伙居然指桑骂槐的说：别人跪下请罪，有人竟然是蹲着，那是“坚持反动立场”，是“害草之马！”我真气得要爆炸，可是他又没有指名，我也接不上腔。组长在总结中指出：“段克文公然拒绝家庭访问，这非常不好，以后要注意！”我举手争取发言，他就来一个“散会！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准备明天参观沈阳！”

我在会上所提的意见（当然不只我一人），可能是发生了点作用，在沈阳、哈尔滨和鞍山参观时，就没搞这一套，可是后来，一直到释放前还是经常来，而且显然是设计好了的。

我们是坐中共安排好的火车去沈阳参观的，这是一列专车，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它就在车站等。

在沈阳，我们这一群“战犯”参观了沈阳机械厂（又称中捷友谊厂）、电缆厂、工业展览馆、农具制造厂、农业展览馆、

沈阳工人村等单位。到了参观地和在抚顺见到的差不多，都是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介绍当地情况，强调新旧对比，苏联援助。

沈阳机械厂是个旧厂，我自己虽然工业知识不够，但看过这个厂后，发现它只是恢复旧有规模，机器有所更新，并没有多大扩建。

我们到电缆厂参观时，正是共产党强调苏联的援助，它说，苏联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上第一等的，援助是无私的。实际上这一座电缆厂也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旧厂，在苏俄的帮助下，有了一些发展，能制造各种漆包线，纱包线。有一架机器把几十条细铜线，同时通过纸浆机，再经过干燥，就制造出纸包的细铜线，中共把这当作苏援的证据，特别向我们说明。

工业展览馆中陈列着辽宁各工厂的产品，种类虽已不少，但只能从对比中，看出恢复和发展的过程，并没有特别精的，顶进步的也只能达到半自动的水平。据我们后来几次参观，就有进步了。

到农具制造厂时，他们特别把一个淡水帮浦说成是世界的尖端产品，诩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并且保密得很。给我们表演时，这东西看来不过是约 1 呎多的一个圆形结构，有 3 吋厚，放在浅水裏，一通电可以把水汲高一丈多。在我看来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不过是应用一般原理而已。共产党往往故意把某些事物神化，这也是常有的，例如把祁 ×× 的“速成识字法”神化，一个木匠把旧木尺改良成用分划可以计算数字的尺，中共就大吹大擂一阵，其实比社会通用的计算尺又笨重又落后多了。中共这时还特别强调一种叫双轮双划犁的优点，这东西很笨重，可能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既未调查研究，也未经过实验，只说能深耕，毛泽东就下令全国大批制造，大量投资，干部们特别说成是毛泽东发展农业的重大英明措施，对农业的亲

切关怀。在农业社、生产队首先都要把这东西摆出来赞扬一番。可是后来经过实地试验，它不但用加倍的畜力都拉不动，而且结果是减产，因此农民还是使用中国的旧犁，把这种笨东西放在农具棚里供人参观，花的金钱物力当然不计其数。以后“人代会”提出质疑，毛泽东还为此事受到指责。

农业展览馆中除了食物、水果、农作物展品，还有很多表格图片，是一般性的以外。其中吸引人们注意的是民间发明创造和改良的农具，不管是交通工具，或农业生产上的各种用具，有些相当精巧，表示中国人的智慧是高超的，例如播种机用机械代替人力既均匀又整齐。这就很不错。还有一种工具，只要把形式改变一下，就可以当独轮车、井上的汲架和耕种的工具三种用途使用。能工巧匠在农村中真是多的很，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已经做了不少不朽的贡献。

“工人村”是中共进入沈阳不久，为了表示“工人翻身当家作主”和鼓舞工人的工作情绪就开始建设的。它离工业区不远，全是红砖建筑的三四层楼房。没有电梯，但是房屋很多，“工人村”是中共展览的橱窗，常有中外人士去参观。我的感觉是：房间一般都很狭小，夫妻两人住的屋子，除了一张床、一张吃饭兼学习的桌子和放箱子的地方外，可供活动的空间很小，假如有三四个人，转身都不方便。厕所是几家台用，厨房也很小。“工人村”附近还设有小学和中学，里面有风雨操场，办的都不错。

沈阳参观完毕后，我们坐火车直去哈尔滨。在马迭尔饭店下榻，它是出名的高等饭店，那时候多半是招待外宾及中共高级干部用的。拿外国的标准而言，也够得上是头等的，就我本人而言，过去还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旅馆，据伪满队一个姓于的曾在哈尔滨当过伪满省长的说，过去连他都不能常来。现在这

家旅馆腾出一层楼给我们住，我们在里面都很享受，连哈尔滨出名的白鱼和小牛肉也专为我们做来尝尝。

哈尔滨市的重要负责人就在楼下戏院为我们作全面情况的报告，然后就进行参观，包括量具刃具厂、电机厂、亚麻厂等七八个地方。

量具刃具厂的产品是制造机械加工的工具，这是一座由苏俄帮助建造生产的。量具方面能制造各种精密卡尺，刃具方面能制造 0.25 毫米的小钻头，工厂规模不小，生产品种也多。

电机厂也是苏援新建的，还在扩建中，当时已有部份开工，可以制造 5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及 1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他们说，正在试制 1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五年之内可以制出 10 万千瓦的。当我被“释放”时，在报上看到他们制造 20 万千瓦的双水内冷发电机，自评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发电技术。

量具刃具厂、电机厂和我们没去参观的锅炉厂，一直是中共向外宣传夸耀的成就之一。亚麻厂也是苏援项目之一，生产过程相当自动化，产品也都很好，消防水管等，都能制造。中共特别介绍一架产品号码是一号的机器，说苏联援助真是无私，他们连编号第一号的机器都没有自己留用而交给了中共。

我们那时了解，苏联顾问地位很高，中共唯命是从，他们吃住都是最高级的，还两边拿薪水。

儿童公园顾名思义，是专为儿童而设的，其中有一样中共强调的是儿童列车，说这是苏联工程师找来废锅炉改成一列儿童列车，强调苏联对中国儿童福利的关怀都无微不至。列车上的司机和乘务人员及站上站务管理都由儿童担任，搞得井井有条，乘客也没有违背规则的，对儿童教育而言也是很有意思的措施。

在游览哈尔滨江边公园时，中共介绍几年前洪水泛滥，在

毛泽东的关怀和傅作义的领导下，把 50 年来最大的大洪水给治得驯驯服服的，总而言之，他们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一有机会，都要高高抬出。

在游览哈尔滨公园时，我感触最深的，是在我自传中提到为女色丧命的李兆麟；竟然葬在公园一进门的显眼之处，还立碑写上“李兆麟将军烈士之墓”。为女色送命，也可称为“烈士”，这倒是天下创闻。并且摆在公园供人“瞻仰凭吊”，我觉得中共可能因为这个丑恶内幕知者不多，就掩饰劣迹而为之标榜吧！

哈尔滨市内仍是旧观，郊外各种工厂和文化机关成立了不少，据那个姓于的伪满省长说，哈尔滨比以前大了一倍，这话大致是不大离谱的。

我们到农业生产队参观，程序和过去一样，不必赘言，这是一个经营一般农作和蔬菜两种生产的队。那时天还相当冷，但是队上有玻璃暖房，也能生产夏天蔬菜、黄瓜长得很肥大，还送了我们一篮。

这次参观中，我“争取”到一个家庭访问，这家住的房子很好，人口也不少，妇女们正在做饭，家长是个朴实而不善言辞的老头子。谈起来，我问他“成份”，他说以前是富农，我听了很惊疑，他自己解释说:“我儿子是共产党干部”，这表明如果他没有这个“宝贝”儿子、早就扫地出门被清算斗争了。

参观哈尔滨“烈士馆”那天，据称是他们的例行休息日，为了我们而特别开馆。因为这个地区靠近苏俄，而且是五方杂处又接近森林草原的边远地区，所以在伪满初期，有些共产党人就以交通方便的哈尔滨做为中心活动过，主要是建立靠近苏俄的基地。后来被日寇相继扑灭，到日寇投降时，全东北根本已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了。“烈士馆”陈列的材料，是以图片、遗

物、雕像和文字说明为主体，内容主要是介绍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和李兆麟等人的事迹。

前面三个人都是共产党潜伏在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事败被杀。他（她）们为抵抗日寇而牺牲生命，我是相当佩服的，只是关于李兆麟，他虽然后来躲在森林、草原里不敢出来，但他终究没向日寇屈服，我也怀有一定的敬意，不过他为了要奸污一个在他所办的中苏友好协会中做事的女部下而送命，文字说明中反而不敢提及只字，称他为“烈士”我是要保留的。

在此同时，我也想起：在九一八事变后，有一位叫邓铁梅的民族英雄，在辽东以岫岩县为中心，曾领导民间武装，对日寇进行多年坚苦卓绝的壮烈战斗，战至最后被可耻的叛徒出卖，而至死不屈地在日寇屠刀下从容赴义，她的伟大形象活在每个东北人的心中，对于这样的中华好儿女，在这个烈士馆竟然只字未提，我觉得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差得很，要叫他承认不是属于己方的优点，或是不掩饰属于自己的劣点，真是比登天还难。不信，就请翻阅全部“毛泽东选集”或整个“人民日报”查查看，若是有，不是陪衬自己，就是别有用心。这样，哪能不天下大乱？如果能从事实出发，真正以民意为依归，自然天下太平。

参观完了，由馆长作总介绍。话音刚了，就有些人要争取发言，管理所干部急忙喊：“天不早了，赶紧上车回去休息。”参观遂告结束。

离开哈尔滨的前一天晚上在饭店楼下戏院曾召开一个晚会，主要是听我们的感想，第一个发言的是伪满时在哈尔滨当省长的那个姓于的，他表示对共产党很感激，像马迭尔饭店现在都用来招待我们就是一个好例子，说明共产党对我们既宽大又优厚，他随后又述说自己以往如何当汉奸、如何欺压人民，表示

自己认罪。

我们之中有个人叫姚步烈，他在步烈两个字上做文章，他说之所以后来改用“步烈”这个名字，就是志在追随孙总理，学七十二烈士要救中国人民，今天哈尔滨能从帝俄、日本手中夺回，他觉得过去烈士热血没有白流，对共产党能招待参观表示愉快。

他的语意，连台上的干部也明白：中国有今天，国民党革命历史是不可泯灭的，他们面上颇为尴尬，只好默然。

其他各人纷纷发言，不外阿谀之词。

第二天，我们到了长春。住在长春招待所，房间也是现腾出给我们住的。

在长春，仍按成例由吉林省负责人作总报告。然后只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地质宫两个单位。

第一汽车制造厂此时已正式生产，其它都是老样子，在参观过程中忽然有人问我：“你现在怎么样？他们已经不跟你闹了吧？”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吉林省公安厅中一名干部，他说：“你好好改造，很有前途。”我再仔细一看，以前认识的吉林公安部门的干部都穿着便衣出动，来“照顾”我们。由此可见，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如此。不过，我们还无由发现而已。

引导我们参观的还是以前的旧人。据该厂的工程师介绍说：汽车制造是一种综合工业，在外国，一般都和其他厂合作，例如汽车上用的玻璃制品，几乎都用外厂的成品来装配，而在大陆上就得由自己来解决，不能让开车的人从里面望出去，不是地面凸凹不平就是变了形，造成错觉出岔子，现在该厂的出品，经过破坏试验等等程序，已在康藏公路上（康定到拉萨）行驶，证明比外国造的还要好。

在汽车厂中消磨了一天，回到招待所吃饭，这时候外面人声乱哄哄的，原来是长春市民围了来看溥仪，因为他在长春当过伪满皇帝，市民们要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风声怎么透出去的？原来我们辽宁队中的刘荣弟在长春开饭馆时有个伙计，现在招待所当服务员，认识刘荣弟，发现了我们的身份，很多人知道溥仪也是关在抚顺和我们在一起，因此透露出去风声就传开了。从这件事发生以后，伪满队参观时上下车都不从正门进出，尽量避免人群注意。

地质宫是长春地质学院附属的地质馆，这地方原是给溥仪另建的皇宫旧址，因为日寇后来穷途末路，房屋只搭了大架子就停了工，共产党把它修好，改为地质陈列馆。

地质宫规模很大，我们参观时看到探勘地质的各种机械、仪器和矿石展览物。共产党仍然强调苏联“无私”的援助。我不懂仪表，但看看也颇现代化，有人工地震、勘探石油等仪器，可以说都是外国进口的，种类繁多，解说员虽细心介绍，但我们不懂，只是“走马看花”而已。

矿石陈列室是由一名女干部作说明，她强调油矿和铀矿在中国藏量之丰富，并展出土法生产铀的锅勺。从展品的繁多来看，中国的地下宝藏，确实无矿不有。真是称得上“地大物博”！

后来我们理解：共产党对地质探勘极为重视，各地有不少地质研究机构，在探勘上共产党分重点和普遍两种，一般先用飞机载仪器做飞行探勘。如果发现有开采价值的矿层就进行重点探勘，此外由各省地质部门，在辖境进行普遍探勘的同时，还发动人民报矿，不管你认不认识的矿石，都可以拿去报告请求研究。共产党自诩地质探勘比日本人高明，因为日本人占据东北多年，仍未找到丰富的矿藏。据说中共现已做出中国的全

面地质图。

从长春直接坐火车到鞍山主要是参观钢铁厂，据介绍人说，它也是在苏联援助下，在毛泽东领导下，完全恢复了生产并且发展扩大。

在钢铁厂中参观高炉和无缝钢管厂等，日寇投降时，苏联从鞍山搬走不少机器，国民党接收以后，只有很小一部份进行生产，共产党在这一方面发展比较快，现在成为重要的钢铁基地，共产党称之为“钢都”。不但恢复过去规模，确实有新发展，如无缝钢管厂就是新厂，以前不能生产。

我们在钢铁厂参观了一天，走马看花，到下午三四时即上火车回抚顺。参观活动也就告一段落。

我们参观完毕后要开大会及小组会。开大会由科长作总结报告，他说参观所费达几十万元（详数已忘），这笔钱可以买多少辆汽车、盖多少栋楼房。他强调组织犯人参观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只有共产党加速改造犯人才会这样，这都是毛泽东的指示。

接看是开小组会，无非发表感想、检讨等等不必细说。

参观气氛一过，我们大家都关心到释放的问题，我们的眼睛、耳朵都集中在留神什么苗头，我也是如此，看看到底跟我所估计的是否相符？

第十四章　“否定”前半生

1957 年 6 月底，有一名科长对我们讲话，在结尾时忽然面色严肃的说：“有人存这样的想法，说参观完了，就可以释放回家了，这话是哪儿来的？真是岂有此理！政府为了他们加速改造，做了多少事，可是你们并没有改造，还不回去！”话声一毕就此散会。

这番话等于在所有犯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出了会场个个低头不语，到了监号人人陷入沉思。

大家的想法当然是：共产党真是难以捉摸，既然花了这么多人力财力物力，干部也屡次暗示我们可以释放，而现在又来这一套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话讲过多少天以来，每个人都心情沉重，见了面也只是用眼光交换意见，那是说大家想的都是这一回事。

我在就寝后从脑子也一直在想，从日本战犯在释放前那一次大参观，和我们当时的被集合，以及当前的大陆内外现况串在一起来研究，我大致可以摸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在我们集中不久，和苏联的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发表要和“国民党第三度合作”的当时，确实是准备释放我们作为“和平解放台湾”的一个姿态，他当然明白“和平解放台湾”会引起一些所谓民主党派的反应。因为这些家伙不是国民党的叛徒（如“民革”），就是利用当时形势向共产党投

机的政客（如“民主同盟”等），总之都是背离国民党存心向共产党讨点好处。今天好处没讨着，毛忽然要与国民党“第三次合作”，如果成为事实，这些家伙不但里外都见不得人，而且他们本身的地位又往哪放呢？毛泽东当然懂得他们肚子里是什么货色，所以就利用共党内部整风的机会，召集他们开会，并发表“恳切的讲话”（因为各“民主党派”会后接着就闹起事来，所以共产党经过多次删改和加工，才在几个月后，发表名为“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会议记录文，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邀请他们参加和帮助共产党整风，以示对他们的重视并合作无间。

毛泽东的苦头，他们是吃够了的。趁这机会如是就大唱“开放民主”、“一党在台上，一党在台下”等等的调子，要跟毛泽东先讲好价钱再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头下，报纸也广为刊登他们的言论，这时匈牙利革命事件发生，全国起了波动，毛泽东乘机下手。利用人代会开会的机会，指使在人代会占绝大部分的共方代表在分组讨论时把这些人揪住，一个个进行围攻、批判，记得仅是批判罗隆基就批闹了很多日子。天天开会，一条一条质问。一人难当众口，只好俯首就擒。与此同时，又对章伯钧、章乃器、龙云、陈铭枢、谢雪红，展开同样的围攻。真是做到了“批倒、批臭”！各“民主党派”在毛泽东的加压下，又把上述这些人，搬到各党派内部大整一气，然后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打入冷宫，使进行切实反省，不准参加政治活动。还要定期写出检讨，彻底承认错误。说不上到哪个时候才能“摘掉帽子”？记得龙云就写过多次检讨，直到他死后第二天，才“摘掉帽子”，弄得他的老婆哭笑不得。共产党每年都在报纸上宣布：有 ×××、×××“掷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已成为“不成文法”的法律了。

从这以后，“民主人士”都停止了吸收党员的活动，有人说：他们是“混吃等死”，这确实是他们的实际情况。像章伯钧的那个小组织，竟交由共产党中央委员季方作“领导人”，其情况可想而知了。

除了“民革”而外，其他各派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一体摘了牌子。他们的领头人物，在共产党需要时，也只能以个人名义摆出一下。到我们被“释放”为止，“民革”的牌子所以还能“丧打游魂”似的扛着，我认为那不过是留着给台湾看而已。他们的本钱是出卖国民党，如果没有台湾屹立在东海，他们那块“招牌”早随着其他党派一齐完蛋了。

因为这次风暴的影响，毛泽东对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意念，也就暂时消沉下去，从而也就影响到我们的“释放”。大参观的计划是在事先一定时间，就已筹备妥当了的，不能不实施，但问题却发生了变化。可是，从此 20 年以来，毛的算盘子始终在我们身上拨来拨去，这也就表明他对于台湾问题，也始终在心头转来转去。这从我以后的叙述中，可以逐渐说明这个关键。

“释放”问题搁置之后，共产党对我们的“改造”方式，另换了一招。要我们成立“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除了各队（日本队除外）的大组长，另外还指派了几个犯人为学委（主任委员也是由委员中指定担任），此外，又设墙报和体育两干事。墙报干事专管审查和搜集墙报来稿和张贴等事项；特别是在某种运动发生时，墙报就成为批判闹斗的工具之一，所以他非常重要。体育干事，顾名思义，谁都可以了解大概。

学委会是犯人中的最高组织，关于文娱活动，学习布置，批判斗争，都由学委会在管理所指示之下办理。从犯人的立场而言，他们是代表犯人在运动中向所方“表决心”，在大会上致颁辞答辞，逢年过节上“感谢信”等等，简言之，就是所方

的应声虫，从某种意义而言，学委会是最低层的控制者。学委可以到任何一组参加学习指导或提意见，所以对我们的控制监督又增加了一些作息不离、如影随形的监视人，在以后的年月中，学委会起的作用不算小。犯人头上罩着层层罗网，共产党确实有一套控制办法。

在监狱的后门外有一块菜圃约十亩左右，原来是日本战犯作课外活动之所。主要作业是由五名专业工人进行。到这时候，管理所要我们不能再那样光是玩球了。就发动我们："如果有愿意到那里参加劳动锻炼身体的，可以去。"大家当然一致"争取"。菜园工人就由五名减到了两名，其他全是犯人劳动，工人名义上是技术指导，实际上是菜园劳动时的指挥者和监督者。我们从此就取消了下午的体育活动，而进入下午全体劳动的阶段。

与此同时，干部又发动我们在院中的西北角修建一座冬日能生产蔬菜的大暖房。说是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后来大家也确实精勤劳动，可是生产的蔬菜却不知哪里去了！

记得在修建暖房时，我们还吃过一顿红烧鸡。从此以后，我们的伙食就江河日下。据说：以前的伙食是每天每人 18 元，现在是 12 元了。食粮仍然是不定量。共产党花一文钱都先从效果的估量出发的。台湾的问题搁了浅，我们的"释放"成为不可能，伙食和日常活动跟着都变了样子，这就使我们渐渐得到一个经验，如果在这些方面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苗头了。

在辽宁队、北平队、武汉队和南京队的伙食降低不久，我发现一个秘密，除我之外，任何犯人都不知道，这可以称得上是"独家新闻"吧？因为当时四个队住的地方又缩紧了，每个号子要住 12 人。干部把辽宁队搬到了三所，在四所的监号就腾

给了伪满队住。中间用两扇屏风挡起来做界限，但是照常走人，到开饭的时候，才不准通行，并有一个班长在那里巡视。我们四个队的饭，是从三四所之间的大走廊送来，而伪满队的则从理发室那头另行送去，避免被我们看见。一天，我从理发室回队晚了，路过伪满队，正赶上厨房给那里送饭。那名班长马上怒颜恶语地喊叫我“快走!”我往菜桶里一看，和我们原来的伙食一模一样，有鱼、有肉。这事我一直闷在心中不敢跟别人讲。若是一传出去，我就准要“沾包”。我们四个队始终以为伪满队的伙食是和我们同时变坏了，而伪满队也仍然以为我们吃的还是老样子。“一道屏风两不知”，共产党真是什么招儿都使。我们八年血战打倒日寇和国贼，今日，在共产党心目中还不如日囚和汉奸，我也确实心怀不平。可是，直到两年后溥仪列为第一批特赦，我才大彻大悟道：尽管是“三朝皇帝”的大罪魁，但因他在“政治”上还有“使用价值”，所以整个伪满队跟着吃小灶；台湾问题暂时搁下不能谈了，所以我们就又被打入“偏宫”；（如果台湾这个战斗堡垒不存在了。我们……我们至少要“上调”准备杀头。）共产党的头脑永远是这么冷静的，绝不感情用事或者墨守成规。要用着你的时候，什么都不在乎。到用不着的时候，那……我还找不出这个字眼，请读者自己去安排吧！啊，话还没有交待完，事到 1959 年溥仪被特赦之后，厨房师傅就被解雇（只留一名作监厨），伪满队也马上和我们“同吃（吃的一样）、同住（屏风撤除）、同劳动（溥仪去后他们就去包办大厨房）”了。这种无情的事情，足以说明问题的。

日本队的情形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从伪满队的例子来看；从共产党对待日本队比伪满队还留心来看；从 1956 年伪满队参加厨房劳动，日本队忽然单独自立伙食，并从他们的厨房透出诱人香气来看，推知日本队的伙食始终是高标准。特别是

1960 年。我们大厨房忽然摆起大块又肥又嫩的猪肉和成堆的水果、海鲜及肉类罐头，大家高兴的了不得，说共产党办事真叫你猜不透，现在竟然又要给我们这样的好东西吃了！从那天起，日本队忽然连着两三天，水银灯照得耀眼生辉。原来是日共来此拍制日本战犯的生活实况电影，携回日本去宣传，附带的也把我们的大厨房拍了几个镜头，作为中共“革命人道主义”同等待遇的证据。猪肉我们是吃到了一点，但是罐头没吃着也不见了。我曾向伪满犯人打听过，他们只是笑而不答。原来是从日本队那里搬来摆摆样子，拍完电影，又原封送回了。怪不得我们常在日本队所倒的垃圾里，看到上述各种罐头盒子。一直到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后，我们到那里去收拾房间改建图书室，还曾在某些角落发现这类不曾打开的罐头，可见他们是吃得不爱吃了。这就不是我主观推侧，而是证据确凿了。

从这时起，前后还有两个显然不同之点。一个是，以前发的服装，无论单或棉，都是蓝色的干部眼，除了左边兜上，挂一个写有姓名、号码的符号外，其他和干部完全一样。但以后除了内部衬衣仍然是白色的外，都已换成黑色的。样式也与一般大不相同。这是一种特定的战犯囚衣，我们一穿就是 18 年。夏天在劳动中穿黑色衣服，烈日一晒，真好似针刺一样，痛苦之极！在个人接触时，我曾多次向干部表示：一样花钱，为什么不做蓝色或者灰色的？我们都是老年人，夏天晒得真不好过。他们只是笑而不答。

夏衣，基本上是一年一套。冬衣，起码四五年才换一次；结果是补丁叠补丁，跟叫化子一样。再一掉色，更是难看，经常由长改短，怪状百出。星期天发针线，几乎都在缝缝补补。但是遇有外面人来参观或是我们到外边参观时，但是特别是接见家人时，干部就命令换上干净衣服，就以我们在衣服不够穿

之中，还得想办法保留一套能见得人的衣服。我们称之为“大礼服”。

第二个不同是：以前不论在公安局看守所、监狱、劳改队或是到抚顺初期，犯人之间都互称“同学”；自此以后，我们成了“战犯”，就以“同犯”相称了。好像我们曾互相在一起做过什么案子似的。

接着我们就展开研读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 ×××”，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是要从我们的头脑中消除对他的景仰，要我们从灵魂深处，毁灭我们过去的历史。同时在科长的“辅导报告”中又提出要“彻底否定前半生”，这就是要我们把前半生都批评为完全不对的，所以在同犯的内心深处颇感不平，可是在压力下又无法不去“照办”，加以上有学委和组长监视，旁有同犯“检举”的威胁，表面只有迁就。

学习当中开过几次会，要大家“暴露思想”。有一个叫黄淑的（过去当过军长）曾“暴露”说：在苏州监狱时，对被共产党扣押心怀不平，盼望美国来投原子弹，和共产党同归于尽。

另有一同犯（恕不指名）说：现在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要说我过去杀过共产党，也是因为两军作战，我不杀你你就杀我。大家互杀，你不犯罪我犯罪，这不是胜者为王吗？

还有一个叫李益智的同犯说：我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行伍出身，我能当到中将师长（在厦门被俘）说明我对于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今天叫我完全否定前半生，我真恨我改造不好，我改造不好，所长就要发脾气，我怎么办呢！

自从有两次提到“所长要发脾气”，所长以后再也不出来讲话了。如果不是他感到“光打雷，不下雨”，有些不好意思，就是他的脾气真的一下子变好了。

在这个过程中“暴露”了各式各样的思想，现在也记不清

许多了。

关于“否定前半生”，确实起了作用，以后凡是提到过去的，就得披头盖脑把自己臭骂一顿：××× 是大祸首，我是小×××。我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把中国人民弄得“糠菜半年粮”“饥寒交迫”，就是我这一类人干的，我是有罪的。

这么一来，尽管内心不同意，但是表面就成了一种风气，凡是说到过去的事，都得“加帽”，例如提到自己过去当学生的时候，也得说：“过去我当流氓学生的时候：……”如不这样，就没有否定前半生。总而言之……凡是提到以前，都是该杀，都该千刀万剐！

在开小组讨论时，有人刚谈到“抗日”二子，马上有人插言：你过去是抗日吗？你是给 ××× 打天下，那里是抗日？爱国？恬不知耻！这说法真奇怪，把抗日说成给 ××× 打天下，共产党也说是抗日，那不是共产党也给 ××× 打天下吗？

至于我本身，我在小组中公开表示：没有人能指出我有罪，我无法否定前半生，这话一说，他们也不再惹我。

总结说来，共产党的目的是达到了，因为所里面多数人口头上都否定了前半生，以后要改口就困难了，于是管理所中的气氛渐渐陷于一面倒。

记得快到 1957 年的 10 月 1 日时，管理所中凡是能够演出文娱节目的人都停止劳动，集中力量参加排演。

文娱节目中有平剧演出，队中有些人会打锣鼓家伙，一经排练真还像个样子，有个同犯叫叶桀强会做头盔，他一传授，几个手巧的人做得跟真的一样，戏衣用干净的白布画出来，老远望去也是描龙绘凤，金碧辉煌，跟真戏衣一般无二。

同犯中的魏季良、胡汉文等都是老戏迷、老票友，生、旦、净、末、丑和文武场样样精通，由这些人自导自演，以后居然

还吸引了外人来参观。

除了平剧以外，还演话剧、歌舞、相声、双簧、快板、歌咏等。这些东西主要都是歌颂共产党，诋毁国民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平剧就禁演了。

这当中有个“挑袍”戏码，描写关公身羁曹营、心在汉室，很是反映了大家的心情，戏已在彩排了，结果因为共产党怕大家发生消极情绪，马上制止演出。那个提议并主演的同犯当时虽没遭到批评，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却在别的题目之下受到猛烈围攻。共产党就是这样，平时被记上一笔黑账，到一定时间之后，才藉别的题目找你清算，把你搞的焦头烂额还不知为的是什么。这是常有的事，过后你才慢慢明白，所以这种狠毒手段，真使我“五内永铭”，深以为戒的。

演出文娱节目对“犯人”来说，是件苦恼的事，因为一逢假日，节目就得演，特别是春节，一连要演五天，忙得不得了。

到了 1958 年开春，队上又展开了学习“社会发展史”阶段，其基本主题是要表明：劳动创造人类、创造一切，社会发展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最后必然进入社会主义。管理所在这一方面很认真，我们也就按着章节，照讲义逐步学习。

前一阶段的学习是要我们“否定前半生”，背叛我们的政治系统，这一阶段的学习，则是要我们产生一种意识，认为靠拢劳动人民，也就是靠拢共产党，是光荣的。而社会主义是人类必趋之路，其它都是错误的。前者叫做“洗旧瓶”，后者叫做“装新酒”。这是出于整套计划，不是随便想想就干的。

到了这一年六月间，人民日报上的大字标题“还是人民公社好”引起一股大风潮，这句话只是毛泽东在山东参观一个什么高级合作社时说的。我们当时还以为这是一句评语，哪知把“还是”二字去掉就成为“圣旨”，在全国立刻雷厉风行起来。

自从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出了右派闹事，他就不再发表任何长篇讲话了，像人民公社这种关系到全国 6 亿多农民命运的大运动，也不过讲这几个字而已，这个调调，既可显其威严，又可交给下面去做，他高高在上总其大成。

与此同时他又召唤河北应举公社的一名代表到北平中南海，毛泽东并且招待家庭便饭，毛给这人几个苹果，这人就把它当成“恩赐御物”，星夜赶同去，把苹果高高举起向农民说：“这是毛主席的最大关怀！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响应恩人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于是就掀起了人民公社的高潮，各地高级社也跟着彻锣打鼓喊“人民公社好”、“公社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天桥”、“是东方新升起的太阳”，很短时期内，就把高级社合并为公社了。

人民公社的内容，是在“政社合一”和“一大二公、事情好办”的说法下，要做到：一、散居的农民，要合并为有规划的居民点；二、各个家庭不要开伙，要一律参加公共食堂。这就是从居住和饮食方面，更严格更周密地控制人民；亲友来往或生病、生孩子，都要受到严密的限制和监视。三、学龄儿童不由父母照顾，统统送到学校去寄宿，骨肉拆散，交给共产党接收下一代。父母只是生育“接班人”的机器。也许他们知道人民对此要抵抗，于是就在人民日报上大登什么“公社远景规划”，把这种抵抗情绪转引到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上去。说在三年之后，一个人每天能吃多少肉、蛋、水果和牛奶？每个人每年能买几双皮鞋？又能住怎样漂亮的新房子？等等。彷佛这种农民所不曾想和不敢想的天堂，只要实行公社化，就会立刻出现在眼前。

可是，农民并不是昨晚都死光，今早又都重生出来的。从

无情的历史事实，他们所受的足够的教训是无法或忘的。当年发动他们进行“土改”，发给土地执照，“土地还家”了，子弟参军了。好梦也做得很甜了。只是几年工夫，通过生产队，农业生产合作和高级合作社，由土地入股，车马入股，除了只剩工分（农家凭工作得积分称为工分年终结算，依工分多少分钱）以外，什么都没了！据我们被“释放”的最强劳动力回来亲口透露，他无论冬夏成天辛苦劳动，到年终也不过只能分得 120 多元钱。他体力强，吃的多，弄得老婆、儿子、儿媳们都和他闹分居。他家是住在土地肥沃之区，其它农民分到的钱就司想而知了。这都是农民的切身经验教训，他们是代代相传，刻骨难忘的。农民的消极对抗的情绪，不是“远景规划”就能转移的，也不是那帮敲锣打鼓迎公社的人所能掩盖得了的。1959 年开始发生的粮食大减产和全国大饥荒，就是这种对抗情绪的具体反映和结果。“公社远景规划”，后来就只字不提了。除了供人参观的公社或生产大队外，农民住的房子不但仍然如旧，而且有许多不是东倒西歪，就是修补得如同铁路装甲列车所涂的保护色那样黄一块黑一块的。特别是人口日渐增加，多少人挤在一起，每晚睡觉睡不盖的时候，那种心情是人人可以体会到的。集中的居民点，不是说说就可以办得到的。又加人民抵抗，所以根本无法实施；至于学龄儿童要送到学校寄宿，那么，共产党本身也得这么干，这种割离骨肉之爱的荒谬措施，遭到党内外的双重抵抗，而自动消灭。公共食堂一开始就惹起居民的不满，纷纷提出意见，共产党在报纸上大叫大嚷：“这是党的政策的考验，一定要坚持下去！”又搞一阵子“党委书记挂帅”，不久，也寿终正寝了。

大减产、大饥荒是极其严重的，它给共产党的冲击也是极其猛烈的。若不是刘少奇搞出一套“三自一包”（自负盈亏、利

伯维尔场、自留地及包产到户）这个补救办法，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大饥荒发生以后原有“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制”，改成强调“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就是说：公社和大队两级年终提存很少，基本上是归生产队自己分配，也就是基木上恢复到生产合作社的状态。这样一来农民生产情绪有所提高，产量也逐渐增加了起来。按照共产党所发表的数字，我约略记得全国粮食增产比当年好像增加了两到三借（详数已忘）的样子。那么农民的生活程度是不是也相对提高了两到三倍了呢？据我亲眼目睹和报刊所见，我只能说农民生活在某种方面（如窗户上装上玻璃，衣服比以前整洁等等）有所提高外，基本上还是以前的老样子。而且种种限制，却比以前大大增多了。以年来计算，每个人只能买十来尺布，每人全年的食用油脂也只规定有几两，肉类就只有几斤。家里发生婚丧大事，只能以香烟糖果招待亲友。我们有一个同犯，刑满“释放”后，为他儿子结婚，杀了一口自养的肥猪，竟受到一连串的批斗，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吃大喝!”可是从北平到各省的共产党高干，竟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宴会一到就是几百几千人。光是残羹剩饭都得用汽车往外拉。如果是老百姓就是“铺张浪费”，他们则是“革命的必要”。

话说回来。那么农民分配的结余都到哪里去了？我从报刊所载或直接接触方面举个例子，想来是可以说明问题的。第一、随着农业生产的增加，大队和公社的“公共积累”又跟着几何级数地大幅度增加了。这，当然是从每个农民身上来的，这个数目也当然可观。第二、我们后期曾种有许多果树，秋收的果子，收购站只付管理所 7 分钱一斤，可是他们一转手就卖 1 毛 8 分钱，多余的 1 毛 1 分钱，除了业务开销，当然是上缴国

库了。我们“释放”到北平时，在街上购买的普通苹果是 4 毛 5 分钱一斤，可是我们从报纸上所留的印象，生产队卖给国家的上等苹果，也只是 1 毛多钱一斤。这可具体说明，农业产量增加了，而农民所得为什么还是迟迟不前的缘故。第三、我们“释放”后，曾在天津参观一家手表厂，据介绍，他们所制“海鸥牌”手表，国内价格是人民币一百二十元。可是我到香港买了一只同样牌号的，只花港币七十元（还打九折），合人民币只有四十元左右。这样的差额是相当吓人的。仅从以上三点来看，农民生活水平的不能提高，那就理所当然了。

根据以上这种情形，我得出一个“大逆不道”的看法，奉行“真正马列主义”的中共，他是绝不会让人民有富裕可能的，因为要是人民富裕了，就要懒怠干活，就要不听使唤，就连征到的兵也会贪生怕死不愿上战场了。共党也绝对不会放宽各种生活限制的。因为限制一放宽，人民就能互相馈赠，私相密语，布票粮票一取消，人民就有了行动方便，这些都意味着共产党失去了“分而治之”的控制权。那还了得！反正他们有的是词儿可作借口。这一点绝不能放松。不信，你就再等二十年看看！中共在“高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时，曾震天价大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日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了工农业都有了些儿发展的今天，就又变成“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要忘我劳动，努力生产，支援世界被压迫求解放的人民”和“无产阶段的解放，有待于全世界人民的解放，然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哎呀，我的天，这一下子可真扯得够远的了。

我写到这里，迷信共产党的人，或许还有某种说词。那好，“当场出彩”的节目还在后头呢！

第十五章　思想大检查

1958 年开春在“大跃进”声中，我们也受影响而整个投入生产劳动，以前下午的体育活动被取消了。管理所的科长这时也得参加“大跃进”，他率领所中身体最好的犯人，到二三里路外的山边去打井，昼夜不停的把井打好，围着井的二三十亩地就改成稻田。这块地方就成了我们的劳动场所。

后来管理所又在这一块田附近向四面扩充了好几块，一共有四五十亩，水稻能收获一万五六千斤。

我们一面劳动一面学习，到了“社会发展史”快学完时，科长就开始作报告，大意仍是从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对于我们的改造十分有利。在这一套陈腔滥调之后，他说出的话却为暂时风平浪静了一阵的气氛煽起一把狂台。他说：“你们学习了‘人民公敌 ×××’，从思想上开始肯于否定你们前半生，又通过了‘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开始认识到劳动创造一切，从而认识到社会发展必经之路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你们旧的反动的世界观开始向新的革命的世界观转变的时候，进行一番思想大检查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然后他指定先由个人在小组中进行检查，如有必要，再在大组或全体大会中进行。于是“思想大检查运动”就此展开了。

各小组首先从历史检查这个方面展开，这时所内走廊里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有的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太

抽象，有的对于“大跃进”表示怀疑，有的暴露自己思想，也有的批评检举别人，我也不得不把自己是“五大罪人”再翻版一次。

有个叫路秀山的同犯曾在英国留学，当过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他在大字报暴露他有赞成“海德公园的民主思想”。有的同犯没有思想但也不得不写，就套用说他也有海德公园的思想，有人便问：“你去过海德公园吗？”

他瞪看眼说：“去过！”

问的人说：“海德公园在那儿？”他说：“苏北的海州到山东的德州这一块地方，不就是海德公园吗？”

这个笑话传遍了管理所，还被编为相声材料，也是一绝！

个人在小组中进行检查时，大家全举手抢着发言，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个自称是国军少将的万历，是大家检举的对象，因为他的“文化”很低，写的字连小学生都不如，大家心里都想这种人怎能当少将？

万历在刚到管理所进行“思想初检”时告诉大家说，自从共产党占了东北，他在鞍山开理发馆，把国民党证件藏在理发镜后面，以后一个运动来了，他的太太检举了他，被捕后，证件也搜出，被判了 15 年徒刑。万历在这一次检查中说：小时候家贫，到理发店做学徒，长大了在张作霖卫队连里当兵，后来张要挑个会理发的就选上了他，他得到张的欢心，慢慢就当了少校承启官（内传达），以后辗转到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当了张学良的特务第三团少将团长，后来张派他同东北从事地下活动，他到安东、南满一带工作，东北失陷后就被捕了。

我们队中有些东北军的老人，像陈旭东就是替张学良管特务的，另外，还有几个是讲武堂出身。他们说：“从来没有听过张学良第三团有你这个团长，一定是冒充的。”

万历否认，陈旭东说：“张学良的人事手册在我手上，其他人说的都对，就是你不对。”

万历只好承认是冒充的，他说他只是少校，为此，大家又要他重新交待，翻来覆去，一直花了十多天，最后才弄清楚原来他并没有给张作霖理过发，只是在妓馆为妓女“梳窑头”。

张作霖第一次进关时，万历混进张军当过交通兵上士，干了没多久，就跑到营口开暗娼窑子，因为与嫖客打架受伤，被送到新民监狱。碰到九一八事变，他乘机跑到北平，凭着会几句日本话，关里关外便跑动起来。他在北平找了几个妓女，到牡丹江开妓馆，有一个妓女要从良，他就把这名妓女毒打致死，因此被送进监狱。他在牢里不知怎么搞通关节，得到了假释，如是就在监狱门口开了个杂货店，凡是探监的都得买他的东西才能拿进去。这么一来他混得更不错了，娶了后来检举他的老婆，也成了“勤劳奉仕”的头子（即日本人之劳动服务的召集人）。等到日寇垮台，他跑到鞍山，又为共产党的市长组织特务连。国军进驻东北时，他没有跟共产党走，留下来和一帮人在铁岭开源一带弄了一群人，他当“建军”的参谋长，事未成就散了。他又到抚顺弄了个汽车站长当，其实一辆车也没有。然后到沈阳，看到在乡军人会的招牌，又起了主意，去见秘书萧兆麟（也在押）说他当过特务团长，是在乡军人，现住在抚顺。萧就派他当抚顺分会主持人，他摇身一变为分会主任，跑到抚顺市政府要土地设会，市政府便拨了点土地给他。

万历看到报上说何应钦在一闭京，他又想出歪主意，因为何曾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他就给何写了封信，何的秘书回了一封不痛不痒的信，他却拿着这封信到处招摇，把少将牌子也挂出来了。

因为他挂在乡军人会牌子，有一个属于第 60 军的军人经过

抚顺，跟万一接触，这个人身上带了个空白的派令，万历弄到手，刻了一个假图章盖上，冒充 60 军某师副师长，乃真正的副师长也正巧在同队中押着），国军退出东北时，他跑到鞍山开理发店，把证件藏起，以备“重操旧业”。

总而言之，他真正的最高军阶只是交通上士，其他历史则是一片肮脏。

共产党把他的历史搞清楚以后，就派了大批人马进行专门调查，发现他是一个骗子头。照说调查清楚以后应该把他释放或是调离我们，但是并不然，他不但没有提前释放，也没有到期释故，一直到 1975 年才和我们一起“释放”。

万历在管理所从此重操旧业，专门为我们理发，其手艺之“痛”，让人不敢领教，唯恐避之不及。大家都说：“张作霖的土匪脑袋，就是再有瘾，也不会找这么一个家伙，理得痛的要死！”

万历之后，大家又“检查”一个叫黄鹤的人，此人当时不到 40 岁，他说他也是少将，是在伪满时跑到关里，以后到了河南，因和汤恩伯的一个干女儿有裙带关系，就在汤手下当少将高参，专仿敌情工作。国军退出大陆时，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南下工作团”，以后因为被发现隐瞒历史而被拘捕，判刑 8 年。

这事漏洞百出，大家步步追问，真相也就相继查出。原来他在伪满时当警察，因和其他警察打架，又跑到关里保定一带当伪警，最高当到巡长。整了几个钱，到天津胡作非为，却被天津地痞骗得精光，这时正好日寇投降，他住在小店中，偷别入担子上的钱，回家的路上碰到万历“建军”，黄鹤就跑去说：他有多少人和枪，如是就被派为大队长（其实大家都是光杆），他回了家没什么混的就又跑到锦州去，造了假关防，冒充国防

部战地第六组少将组长，在锦州大肆招摇撞骗，被国民党发现逮捕，认为他有共产党谍报嫌疑，把他送到北平草岚子看守所。案子未审定，共产党进了北平，他从看守所出来就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在一个剧团中工作。在南方他又重施故技，到处诈骗，由于胡作非为，共产党把他送到佳木斯，在批判中发现，他隐瞒了国民党“少将高参”的身份，遂被判刑 8 年，送到锦州农场劳动。到了 1956 年 1 月，共产党为了要“和平解放台湾”找国民党人做政治筹码，遂把万历、黄鹤也集中起来。一直到这次检查，才搞明他的真正身份，只是一个伪巡长。他所接受的待遇和万历不一样，他是刑满到期就释放的（后来有不少人刑满也不释放了）。

通过万历、黄鹤这两个例子，大家在思想上起了两种反应：一、把人所不齿的“乌龟头”、“骗子手”放在我们一块，心情很是不舒服，可是离又离不开，躲又躲不掉，只好成天硬着头皮打交道。二、共产党自诩的调查研究，真是天晓得；这证明毛泽东在“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里所提到的“平反”等等，都是地道的鬼话。想到成千成万落地的人头（包括历年各次运动的刀下鬼），想到信口判处长期劳役的冤狱，都是这么滥搞的。共产党对于生命和人权，真是太……唼！

话说回来，我们小组把万、黄两人的问题搞完了，其余的都很简单。我在检查时，指导员从旁“指示”反而不要我详细讲，我当时以为他们是怕我抬出“无罪的事实”，事后证明，却是另有名堂。

全队三百多人，除万、黄二人外，都过了关。运动尾声中，科长做总结时提到：“大家的检查，都做得不错。有人表示：在检查中检出一些罪行想交待，我们认为这是要求改造的表现，你们赞成不？”谁能说不赞成，只好说“赞成！”唔，原来“思

想检查”是先行，是试验，真的东西现在才拿出来了！

第十六章　交罪认罪

自从“释放”问题搁浅之后，共产党对我们这些“战犯”就采取了有计划的措施，通过“人民公敌 ×××”、“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大检查”的阶段，在管理所中就轰轰烈烈的进入“交罪运动”阶段，逼我们真正向中共低头屈服。

运动一开始，主管学习的科长首先召集了各队他认为可以参加的人开了个会，他在会中说了些话，大意是：“脑子不是真空的，旧的倒不出，新的装不进，通过了‘人民公敌 ×××’和‘社会发展史’这两个文件的学习和思想检查，思想虽然有所转变，但这只是皮毛的，也就是说，不是彻底的，不是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交心’，没有真正把罪根挖出来。能把罪行都交待出来才是真正交心，才是真正把罪根挖了出来，也才是真正的实际表现，思想才能快马加鞭走向进步。我找你们来，是希望你们好好考虑，做出榜样！我以前曾跟你们讲过日本战犯如何认罪的事，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还不断向管理所写信交罪，他们认为如果不把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交清，死不瞑目，你们应当向他们这种认罪精神看齐。”

科长一说完，我就举手争取第一个发言。我说：“以前我以为我的情况很特殊而复杂，政府需要长时间才能调查清楚，我到现在已经被捕七八年了。我以前曾经说过，时间越久，我越不认罪，因为时间越久，政府就越能调查清楚。我愿意公开挑

战，和他们比一比谁的罪小。现在集中这么多人，既代表了国民党的许多方面，又有不少和我是旧相识，我要向他们挑战，请他们尽量指出我的罪行。”

我话一说完，科长脸色都变了，他一声不响，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另外一名姓吕的同犯接着发言，基本上跟我说的一样，他也表示不认罪，另外他还说：“共产党有百分之一的‘空子’他都要‘钻’。”这个话我到现在还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们俩个这样一发言，使得别人也变成有气无力的只是表示一定尽力交待罪行，按时间、地点去逐项反省检查，确实改造自己。

科长等大家发完言以后作结论说：“段克文这个人，你不让他讲也不行，对他这种具体人这也是应该的。”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话，可是我知道他心中非常生气，把我当作是这个运动的绊脚石，但我的思想准备是：真金不怕火炼，这是我表示态度的时候，一切听其自然。

运动一开始仍和以前的程序一样，小组检讨，仍是那一套，干部又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老调，要大家想新的罪。按照规定，“交罪”要填写正式文件，要把当时的环境情况（历史背景）和犯了什么罪？是主动或是被动？何时何地发生？用什么手段？被害者是谁？有谁参加？现在能找到什么人作证明？参加这个菲行的人现在还有谁在大陆？在何处？参加人姓名，年龄，当时职务，相貌特微，历史情况，在大陆上有何亲友等都要交待的清清楚楚。

反正我们已经当了“战犯”，为何还要交罪呢？第一、可以用我们所交的个人罪证，逼迫我们低头认罪服罪，因为是要长期扣押，必须要你心服口服，否则你可能不老实。一句话：用压力迫使就范。第二、由所提的材料可以按图索骥，又搜捕一

些人。第三、可以把我们的思想矛头倒转来，朝向我们本身，免得我们去“胡思乱想”、免得针对共产党！所以这绝非心血来潮一时想出来的，而是精心策划和设计出来的。

交罪一开始，大家不痛不痒的拿“鸡毛蒜皮”的事去应付，像“奸淫妇女”、“贪污公款”之类事情。干部立刻说，你们这算什么交罪？像“奸淫妇女”是你们那时代常见的事，而且那时候也有这种女人，对你们来说就是“嫖娼”！“贪污公款”算什么罪？那时代贪污是腐蚀国民党集团，也可以算是为人民立功，这种罪人民不接受！你们应该交待怎么杀害革命烈士？如何破坏革命等等事实。接着他说：大家暂时停止交罪，回去好好反省三天！

以后这三天就在反省，行走坐卧都是低头思沉，互相很少谈话，其实都是在想如何过关，我也是跟着学样子，以免招惹意外麻烦。

这时所中的各组组长和学委也聚在一起开会，会后传达：要各组“包条”，即每组负责交罪行若干条，组里的个人也要“包条”，每个人都要报出条数。我只好报了五条，大组长骂我：“你真是顽固透顶，别人都报三十条、五十条，你只报五条，是不是要做反面教材？”

可是就这五条我都想不出来，只好边想边编，绞尽脑汁，编了些：我在 ×× 年为了要收取别人更高的租金，赶走一个菜农，使他年老失业，陷于饥寒交迫。另一条是把少年时与发妻离婚，说成是虐待妇女，又编了一条在年轻赌钱时，把一个人赢得在回家的路上跌死了，这是血债一条等等之类。你别看就这么几条，编造时还不知得费多少思考呢！既要说得像真有其事，又得叫他“查无实据”。反正凑条数，但求过关就行。

有些人编得真高明，我到现在还辨不出是真是假。有一个

邓君麟，说他以前当军长时，残害过一个女共产党员，挖了个坑，临要活埋她时，她怀中所抱盖的那个幼儿，还问她妈："妈妈！我睡那一头？"他凶残成性，叫人赶紧填土活埋掉了。他说得那么具体而又逼真，当时大家极为动容。科长也拿此做号召，说邓能把血淋淋的罪行都赤裸裸地交出来。这才是真正向政府交心，这才真是转到"人民立场"。如是又跟着掀起了"包条竞赛"。你包二十条，我就包三十条他又包五十条。把这说成是靠拢"人民立场"的表现，交罪还要"包条"真是天下奇闻！

关于邓所交的罪行，我们事栈后仔细想来，觉得很有问题。第一，幼儿对于环境的反应是极为直接又极为敏锐的。在那种慌张激动的情况下，他母亲的精神反映当然也是极不正常的。小孩子在这时只会惊啼，那能还会像平常在家临睡时，问她妈妈这样的话呢？第二、邓交了这样一条血淋淋的罪行后。果然所方和同犯们谁也不再问他什么别的了。因为大家以为这样的罪行他都敢交，当然不会再有隐瞒的了。我很怀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编出这样一个"顶门杠"（即用它一下子顶住）来。他是外表极为"忠厚"而又文化不高的人，但以木匠出身能当到军长，自然有他的一套。

交罪运动开始不久，还有个名叫周凡的战犯曾被小组批判纠缠了很久。但可能是共产党避免在扩大场面下追究，引起对他们观感不利的反应。所以并未把周送上交罪台。原来周凡是李弥兵团的一个师长，在淮海战役形势显然恶化之际，李弥来到周处，周遂率孤军与共军作最后抵抗，保护李弥出走，后在大势已去之下，周遂与共产党正式签订协议，放下武器。按照共产党的宣布，周至少是应该立即受到遣送还乡优待的。但他一直被关在山东"解训团"。后来在"镇反"高潮中，他被门（解训团的大门）里摆宴欢送，出了门就上绑加铐地解往南京

“上调”，听候军法处分。要不是因为“和平解放台湾”而中途“变了卦”，他就要随着先后被“上调”的一百多人，早就被“镇压”了。

集合以后，周凡有很长时期不得安宁。尤其发现李弥在云南缅甸边境组织武装与中共继续战斗，小组不是今天问他对李弥为何那样忠心？就是明天追问他是否和李弥有何密谋？周又说不出所以然，真是伤透了脑筋。最后周检举他的太太，说她可能受有李弥一些赠款，以示“坦白无隐”并和李划清思想界线，后来虽然“交罪”渐归沉寂，但遇见某种情况，仍不时要旧事重提，周一直被关到 1975 年，只是比我提前十天才被“释放”。

管理所中的共党干部在“交罪”开始时，提到的“人民立场”，我多少年来还是被搞得晕头转向，老以为人民是讲大是大非的，是非分明就是“人民的立场”。其实，共干的习惯用法，所谓“人民立场”就是共产党立场，一有风吹草动，任何人在受过无数惨痛经验教训之下，自然而然都要站在“人民立场”去说话。对于任何被斗争的对象或被批判的目标，都要划清思想界限，不能存有丝毫犹豫。不这样，若被别人发现你抱“温情主义”，或在被斗者被逼得无路可走时拿你做“救命圈”，指出你对他同情，那你就有马上变成被整的危险。我们中很有一些人，因此受到无情斗争或批判的。你也不要期望：某人清楚了解你的实情，会出来做有利于你的证明。你不这么想还算“识时务”，你若指望就只能惹他给你一阵出乎你意料的攻击，甚至是毫无道理的“扣帽子”。因为这是一个不讲是非，不讲道义，不讲感情而专讲立场的一面倒的世界呀！谁不这样，谁就休想能安然地活下去！在我们这个场合更是如此。不论小组、联组或大组开会“交罪”时，今天甲成了目标，乙、丙等等，

就都群起而攻之；明天乙做了对象，甲丙等等也掉过炮头攻乙；轮到丙也当然如此。在攻击目标时，指导员还要求“声势”要同犯们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狂喊，要恶目相向，咬牙切齿地恨你不能转到“人民立场”。说到沉痛处还要声泪俱下、喊口号、吐粘谈唾沫、打嘴巴。特别是在联组或大组开会时，指导员经常往来巡视着，掌握会场的犯人是“儿皇帝”，而指导员是名符其实的“太上皇”。你一开口，就得上气不接下气像疯子一样地嚎。如果他觉得你的劲头不够，或者认为你的发言还不能使他满意时，哪怕你开始才说第一句或仅几个字，他马上就指定第二个人发言，你就得像突然关闭的扩音器一样，立即停止，还不能露出半点感到不解的神色。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成了共产党随意操纵的广播喇叭，而且是高度自动化的，一切要体会他们的神色办事。

在这一阶段中，我不曾见到有什么人来参观。假若我是个生人来到三、四所的话，忽然听到全所 42 个号子，尽是一片鬼哭狼嚎、怒斥讥骂、拍桌顿足、撕斗掴面等等异乎寻常的声音，我会发现自己来到的是一个可怕到了极点的世界，吓得抽身就跑！可是，下课铃一响，就立刻恢复正常，喝水的喝水，抽烟的抽烟，谈笑自如，若无其事。可恨我不能做现场录音，如果能把它带到海外来，那些有特殊怪癖或是爱好探秘猎奇的人，一定要抢购一空；那么，也许很可以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了。唔！我又犯了错误，又动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头了！

在全所那样轰轰烈烈的交罪运动中，伪满队比较最消沉。大家原以为：必是因为「汉奸卖国贼」这个罪名已经到顶了，没有什么可再整的了；而且他们与中共又不发生直接关系，所以中共对他们也不那么起劲。但是等到 1959 年举行第一次特赦就有溥仪在内，大家对此才另有了一种想法。因为溥仪是“三

朝皇帝”，而且在伪满更是罪魁祸首，在管理所又是最大的目标，运动一展开，首先就该向他围攻，如果整起来，那是成年累月也搞不完的。可是中共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准备要特赦他，既要为此避免发生道路上的障碍，又要避免溥仪遭受精神上的刺效；所以他们的运动才搞得和风细雨、无声无臭。这是在溥仪被特赦后的座谈中暴露思想的主要看法，就我个人来说也是具有同感的。

日本队的交罪运动，就与伪满大不相同。他们住在医务室原设的病号房。我们每一次去看病时，都听到声势极为激烈的斗争声。日本话我不懂，但由其声音气势来判断，他门是正在向某人展开攻击。够得上声色俱厉，穷追猛打。

现在，在押的日本战犯基本上都是经沈阳军区军事法庭判了刑的。他们的组长是一名年青而又刑期短，名叫鹈野晋太郎的，他在日军中是一个尉官级的干部。不久，就释放回日本了。据管理所特别向我们介绍，鹈野回到日本后还来信表示感谢，并说：他的母亲在看到他时说：“今天看到你，我真感激中国共产党对你的宽大。儿子，你永远不要忘记这种恩情！”这是暗示我们今后也应该这样。共产党做这种事是很细致的。

在日本战犯中，我还能记得名字的有：古海忠之，他是伪满国务院继岸信介（后日本首相）之后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实际掌权（职位的名称我现已记不清了）的人。据说他是日本经济学专家。他曾在全所大会上作过两次报告，记得好像是由溥仪的弟弟溥杰作翻译。其内容我现在只能模糊记得三点：第一、日本在战时特别感到钢铁的恐慌，本国只能年产几百万吨钢，而鞍山也只能生产几十万吨，如今鞍山居然恢复和扩建如此迅速，并能年产几百万吨，他对中共的努力表示高度赞扬。第二、他为大和民族的光明前途和中日两国的友谊，愿在今后做出应

有的努力。他的话，在不亢不卑之中颇有“应景”（即迁就当前情况）而发的意味。第三、在中共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他说：日本科学家对于原子可以制造武器的研究，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就已注意到了的，但是始终制不出。今天中共居然能制造成功，他表示惊异和赞叹。这种言词无非是有意大捧中共。在这次报告后不久，他就同所剩的几名日本战犯提前几个月释放了。在回国之前，中共派专人陪他往大陆很多地方参观，并发表过感想。另外，还有城野弘，他是阎锡山在山西受降日军后编为雇佣军的重要角色；他的中国语文相当好，在他们之中算是一个“中国通”。铃木启久，原是日军中将师团长，是个小个子，面孔黑黑的，老是冷冷静静的不爱说话。三宅秀也，据说是沈阳日本宪兵或警察的负责人，具体情况，我就记不清楚了。还有其他，共约四五十人，他们的批斗，虽然很激烈，但从表面看来，思想上好像都没有什么负担。他们每次到俱乐部开会或是看电影，不管里边有人没人，一进门总是一鞠躬。

共干常拿他们向我们做标榜，不是说他们对于干部如何恭敬，就是说他们如何真正认罪。记得管理所曾把一件日本战犯所交的罪案，翻译成中文宣读给我们听：这个日本人是一个特务军医。在中国内地某处，忽然一天给他送来一个身强体壮的农民模样的汉子。他于是受命把这个人做活解剖进行试验，他先给农民一支香烟吃，以示好感，然后就把他送上手术床，借口检查身体给他注射麻醉药物，并在血管里打空气，这个农民发现不对头，就挣扎搏斗。但因药性发作，这个人很快就进入半昏迷的状态中。他把这个农民大卸八块以后，并把五脏六腑都一刀一刀地分解开。过程是极其残忍而凶暴，他也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当时心理状态。他感觉对中国人民确实犯下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行，从而对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行为发出由衷的憎恨。

我听到这个译文，心情很激动。同时，我也觉得这个人所写的这个材料，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这种罪行的无限忏悔。这是人类良心的自然反应。他们今天在心头所存在的悔恨和苦痛，要不是当时的日本当权者执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又怎么能发生呢？中日两民族，同文同种，在文化上已交流了几千年，在血液和灵魂深处，都有许多共同之点，在地理形势上又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之国。如果和平共处，互相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合作，必使两大民族日臻幸福。可惜过去的历史在两国人民的心头，都造成一种极其痛苦的回忆。通过这个人的交罪原词，我从他的忏悔，也引出我的共鸣。

“交罪运动”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罪都交的差不多了，编造的心思也几乎都用尽了。共产党又拿出了新“点子”。

干部把一些“犯人画家”抽调出来，集合在一个很“保密”的房间，好几天，谁也不知他们干的什么勾当。接着就在三所腾出两间房子，把窗子门户用遮盖物封得严严的，谁也不准窥视。走廊中间对着这两间密室摆上两张桌子。然后学委召集全体犯人，围着两张桌子集合，主任委员出来号召这是交罪台，讲了一篇准备好的话。大意是：真正肯于转变立场的表现，就是要彻底交罪，谁要肯于转变立场肯于交罪，就请上这个台子向同犯们当众交待！他哑着喉咙喊：“谁敢上台交罪？”

安排好的学委姚 ×× 首先一跃上台，破声嘶叫：他在山东如何杀人如麻，连他的副官都吓得打哆嗦。他现在又想起两件罪案要交待。其一，是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他把一名地方革命干部的全家男女五口，都活埋了。这是滔天罪行，就是杀头也要交！其二，某年某月在某地搜捕了十几名革命矿工，在奉命解送到总部的途中，他嘱咐部下，就说意图暴动逃跑而全体干掉。“你看我的心肠是多么狠多么黑哪？”说着就张开大口干

嚎，极力做出像是悔罪痛哭的样子。并说：他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现在他肯于转变立场，敢于交罪，共产党不但刀下留人，还让他好好活着，这具体说明共产党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他这一套表演，在两年之前是可以骗过许多人的。现在，大家在实践中理解了：凡是在一群人中，共产党总是要留下可以作为“带头羊”的几个人做标榜，这类人也自知这是他们唯一的使用价值和求生之路，所以到时候就甘做“鸟诱子”骗人。他越做作，就越使人明白他是在干什么勾当。

安排好的几个家伙，继续如此这般演了一阵活剧之后。没人上台了，他们就指起名来。啊！我看出他们这个节目是给预定他们要整的人安排的。第一个被指名的，他不肯上台，如是就前头拖后头推，把他弄上台去，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拼命大喊说：他在离徐州几十公里的地方，发现共军和民兵曾修建一个地道。于是他在往里边灌水和呛辣椒烟后，又用炸药把地道口全部炸坏了。据估计：血债可能有几千条。他并且说：这种滔天罪行，他过去死不敢交，现在通过思想斗争，无论如何，非交不可。他交完了，主委说：“还要去学习”！然后就把他送入对面那个密封的房间里。

后来主委又指名陈旭东上台，陈不愿，如是人们一窝蜂上来，连拉带推也把他弄上台去，他在上边装腔作势地说：他跟别人大不相同，他干特务工作多少年，不是杀共产党，而是专门拉共产党叛变……。刚说到这儿，旁边站着的指导员赶紧跑去和主委耳语。这时，陈正说到：“我曾拉过……”主委破嗓子喊：“陈旭东！”，并急忙上前一把拉他下台说：“谁叫你上来的，下去！”好像陈原来还不是由他点名点上去似的。弄得陈旭东当时也茫然不解。

我终于被弄上台了。在风暴一开始时，我就做了思想准备

的。我上去就讲："我想出五条罪，都交出了，再没可交了。"于是就有人问我："你再也没罪了嘛？"我说"是的。"话声未了，粘痰唾液，纷向我身上脸上吐来。我说："我已公开挑过战，你们谁能指出我的罪行，就请检举好了！"

这时台下有人高喊"我检举！"一看是黄家驹。我当年在江苏，曾冒险为他到仪征县成立当地队伍，后来总队部名义被撤销，他当了仪征县长，竟用些三亲六故，根本不发表我的职位，我气愤之下又跑回兴化。黄有口吃的毛病，急得脸红脖子粗结结巴巴地说："我在仪征当县长时，他向我建议：如果县里财政不足，可以向人民收税，我没有同意。"学委问他："他建议，你不同意，那算什么罪呀？还有别的没有？""没有啦！"学委猛推他一把"下去！""还有谁检举？"台下没有一个人响应。

其实我何曾向黄提过这种建议？这时主委又向我说："限你半分钟交出罪行！现在是生死关头，半秒钟都是决定存亡的关键呀！"我说："你就是限我三十分钟，我也交不出。我死不了。"话声未了，就引起同犯一阵怒骂，一阵唾沫，接着还跳上几个人动手动脚，教就和他们对抗，一个一个推了下去，最后只剩一个人在桌上同我扭打。

主委把那人拉了下去，用手把桌子一拍说："我现在数三十个数，如果数到三十你还不交，你要好好考虑你的下场！"他说"一、二、三、四……"的数下去，数到二十我不动声色还四处张望寻找刚才上台和我"比武"的那几个人，有个家伙忽然口出诙谐的语气说："他是跟我们演相声呢！"大家哄地笑了。有个学委就一本正经地制止说："这是多么严肃的事，为什么搞这个？"转过头来问我："你交不交？"我说："我已被关押了八年，什么罪都向政府交清楚了，你们去问好了。"他怒目圆睁地指着我说："我是问你，你反而要我去问政府，你混蛋！"这时，

数数儿的已经数到三十了，我仍然若无其事的样子。

主委这时和另外几个学委就把我拖下台，带到那个密封的房间去。我进门一看，迎面墙上红纸黄字写上斗大的“交心房”三个字，四周墙上挂满了都是画着像“十八层地狱”那样，有的割女人乳房，有的用刺刀捅女人下体，有的成堆成行的砍头等等图形！面貌姿态是极端狰狞可怕，气氛是十分阴森恐怖，室内灯光是那么昏暗，血迹的画法，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仿佛已进入了一个鬼世界，这间“交心房”真是经过精心构思和周密设计的。

姓姚的学委把我猛力一推说：“这是我们所犯的罪，我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面对这此血淋淋的罪行，你还不跪下认罪！”我说：“我没犯过这种灭绝人性的罪，我就是不跪！”，我冲姚轻松地说：“你不是自认杀人如麻吗？你为何不跪？”他们大怒，一边拉我，一边按我下跪。我硬是不肯，遂又演出一场扭打。他们虽是个个比我年轻、比我有力。但我是豁出去了，他们仍然按不倒我。搞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已筋疲力尽，后来他们就改用了说服的软招子。但我总是那句话“谁有罪，谁就跪，我没有罪！”这当中又先后送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不但“行礼如仪”地跪下去，他还灵机一动乘机劝说起我来了。他可能出诸好意的说：“这都是我们的罪，你又何必：……”我不等他说完就插口反问他：“这上边哪一条罪是你的？”他支支吾吾地答不出所以然。我说：“你跪你的，不要管别人。”这时候学委们都借机到外边去照顾交罪台去了。下课铃响，这个场面就此中止。

吃完晚饭，我以为今天没事了。我们队的学委刘荣第又召集我们这一组到隔壁南京队的一个组去开联组会。我进屋一看，学习桌子都已搬走，围着我站了二十多个人。刘荣第开口

就问我："你交罪不交罪？"我刚说："我没……"叶佛佑（此人1966年被特赦，释放到广东淡水就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枪决。）就喊一声"上!"呼啦呼啦上来些人就捉住我的两臂，拖我到走廊上拳打脚踢。我挣开了两臂，就又演了一场"全武行"，他们的人多，虽然有些光是叫嚷不动手，我顾前顾不了后，仍然吃了一些亏。但他们始终没能把我弄屈服。闹了一阵子，就像小孩子开玩笑似的一哄而散。我只听到学委说了这么句话："看你明天交不交？"

这天晚上，我又气又累，入眠前我的思想围绕两个中心盘旋。第一，我对于向我进攻的这帮人，除了极少数外，我并不恨他们。在群相殴斗时，仍有不少人暗中和我捏手表示同情。我深知在残酷的控制和威胁下，凡是共产党矛头所指，父子都要敌对，夫妻都要反目，兄弟都要成仇，亲友都要无情；更何况都已成为笼中之鸟而又人人自危的犯人与犯人呢？这是集权统治的必然产物，我对于那个幕后的最高操纵者，更进一层认为他是人类的祸乱之源，因而对他发生了无比的憎恨！第二、我的历史情况他们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今天居心叵测地向我逼罪，这是一种最野蛮最无道理的行为，使我更增强了对抗到底的决心。

我很是疲倦，想到此，一切都归坦然。这晚反而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就听到有个人在走廊嚎啕痛哭地大喊："我确实犯了兽行大罪，我请求政府把我送到犯罪地点，依法惩办，向被害者谢罪!"大家出来一看原来是某人，这个人平时表现的是"道貌岸然"的典型。他说他当年在河南省，强奸过一个貌美的少女。这件事和他的名字就传遍该处，后来听说他被共产党扣押时，被害者曾指控他。他因为家中妻兄都一向

认为他是“正人君子”，所以为了保持“道学先生”的面孔，就坚不承认。现在，他忽然良心发现，完全坦白承认并表示忏悔。我觉得这确实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能够撕破假面孔，坦白认罪、忏悔，也完全是应该的。据说他后来曾向被害者写了悔罪书，但没有得到下文。

这件事过去，马上就继续开大会。一帮家伙又把我拉进“交心房”，一个学委指若墙上张贴的图形向我说：“段克文啊！你看这不都是我们过去所犯的血腥罪行吗？你看某人能那样承认罪行，你怎么还不认罪呢？”他的声音表情做作得真像是“悲天悯人”、“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心平气和地说：“这种超越人性的杀戮，既没指出某人在某地所犯（我本想指出那是编造，但话到舌头又改成了这种说法）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这时又过来几个人按我，我仍是照旧不跪。他们如是又拉我上交罪台，号召大家向我围攻，台下的人像疯了一样，用尽了恶毒的字眼，粘痰唾沫，喷得我脸上身上到处都是。还举起拳头喊“打！”

主委又开腔了：“大家静一下，现在还要给他一个考虑的机会，限他在五分钟内交出具体罪行。你要知道这五分钟是你的最后关头，不能无动于衷啊！”这个家伙，他又搞这套。我干脆说：“不用说五分钟，就是五年我也交不出，你们把粘痰唾液准备好，就是把我打成肉酱，我还是交不出！”这一下子还相当有效，大家都怔住了。在群众外边装作不闻不问的指导员这时过来叫我下来。一下子把他早已带来的手铐给我铐上说：“走！”把我送到四所一间准备好的空房间押起来。在走廊里来往的犯人都贼目鼠眼地向我房内窥视。他们是想从我的情况推测与他们未来命运有关的东西。

当天和次日，指导员曾两次找我谈话，问我能不能承认是

犯了“破坏运动”的错误和肯于认真交罪？我的答复是：我没有阻碍别人交罪，我只是照我的事实真相办事，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不能不坚持真理。如果编造罪行，既给自己增加思想负担，也给政府惹麻烦。我觉得那是不应该的。他们对于犯人的意见，向来是不作直接评论的。但我也看出他内心是不满的。

第三天，来了一个歪戴帽子的看守班长开了门对我说：“跟我走！”他指挥我经过俱乐部向医务室那个方向走。到了内科室对面房间门口，他进去又打开第二道门，叫我进去，里边房间很窄，除了一张小床和一个便桶，一看就知道是新放的以外，室内简直无活动的余地。在门上只有一个蒙盖粗纱布的小孔，原来这是在伪满时期所设的一间秘密禁闭室，我们到此两年来，谁也不知道。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之间。还设个坐位供轮流值班的看守之用。

交罪运动已接近尾声，想起 1954 年在长春第一劳改队时的情形，我的遭遇很与被当场处死的杨守田相似，而且这次运动的来势比那次更猛，我在一开始时又进行迎头对抗，对于情况的发展我是有了充分的估计的。但是越在重要关头，就越该坚持真理，所以我也无所畏惧，静待最后命运的来临。这当中，看守我的班长，在送饭的时候，曾经有意无意地说“不要起思想负担，不要闹情绪，只要肯于认真交罪，问题总可解决的。”我只是一句话：“我不能编罪骗关哪！”在这以前，给我送的食物比以前还好。从此以后，只吃高粱米和盐开水，还对我说：“蹲禁闭是受处分，不能跟平常生活待遇一样。”

在禁闭室的确切日期，我当时是无从计算的，因为室内只是一盏高悬的小电灯，昼夜难分。大约在班长和我闲谈的第三四天，指导员来了。我以为他是提我出号，很注意他的表情。

他把手中拿着一叠油印废讲义翻过来的旧纸，交给我说：“重写自传。”我表示既没桌子又没笔，很为难，他转身出去给我找来一支墨水笔和一个矮凳子，让我就着写。

他走后，我就研究叫我写自传的用意何在？我过去所写的两份自传，至少应该有一份跟我到管理所来。如果要杀我，为何又要我写这个呢？究竟是何道理，我始终莫明其妙。

关于写自传；既是“旧事重提”，而我又急于观其究竟，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写出交卷了。接看，我的脑子就大起活动，想起最近一连串的过程，我又气又闷，虽然不像要杀我，但对写自传又不解何故？而且室内空气闷得要死，再这样呆下去，确实难于忍受。百感交集，忽然又动起自杀的念头。这时正好我在地上发现一条锉药瓶用的约四公分长的小锉，我在便桶上不出声地磨得飞快，我准备躺在床上蒙起被盖来，偷偷割断动脉，无声无息地一死，作为我对于这种蛮横对待的抗议算了。

一名新换班的看守，给我送饭来！我就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这样关着我？”他笑着说：“你还闹啥情绪？今天就放你，看你还在生气呢！”我早已知道他们是绝对不准泄露秘密的，但又看他是真的。不多工夫，指导员就开门进来说：“你的自传远写的实在，你回去要老实些。毛主席教导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以后有错误就要改正。回去吧，不要说关在这里！”

我回到原号之后，打听日历。我才知道，我是被禁闭了十六天之久，从来不曾有人问过我是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自然也不提这件事，大家都是若无其事一样。是的，在共产党控制下，久而久之，从惨痛的感受中，谁都不敢多说一句惹麻烦的话，怕引火烧身。一举一动都要考虑是否合于毛泽东或共产党的心意。你看：这次唐山大地震，许多外国人，对于人民为何若无

其事和不说一句内心之言而不解，我要是不经过长期的经验教训，我也不懂是为了什么？

我在“交罪”运动一开始时，为什么进行那种“顶烟上”（即是迎着炮火烟雾而前进的习惯语）的挑战呢？在思想大检查的基础上，进入这一运动，我是知道它的来势之猛的。我被蛮横判为无期，在法庭无由申辩，和共产党干部谈了多少次，也都等于白费。在劳改队拼死命“争取”，不但脚镣未卸，而且被记大过。1956 年集合，本已出现“释放”的希望，但是事到如今，看来势将老死监狱了。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越想越相信没有任何人能指出我有什么罪行，我就越不能自甘这样不明不白地混下去。眼前是面临真与假、黑与白的分际，我不能再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了。所以我要公开挑战，比谁罪小。如果共产党一怒就此把我处死。正义也是在我这边。大家嘴里不说，是非是自在人心的。

其次，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他曾明白地提出“平反”的问题，并且要求各民主党派派人参加共同办理。“平反”二字的意思就是要把判错了的，经过审查核实予以纠正过来。（由此可以看出：全大陆冤狱之多，使得各民主党派和毛泽东都认为是个重要问题而提到会议桌上来了。）但这个文件发表（1957 年）到现在毫无动静。这一次是否与“平反”有关，我很难断定，但我认为：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必然要实行的。他们可能是从反面下手做文章，名之为“交罪运动”，倘然交不出罪来，再核实案情，进一步作为“平反”的根据。不久事实证明，我这个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我的错误就错在对毛泽东亲自出之于口、笔之于文的主张，认为必会“一诺千金”，一定算数的。我万万想不到这么样的一名“大人物”，在庄严会议上讲的话，竟会“反其道”而行之。

我也曾想到这次运动的风头定会很大，绝非和风细雨，很可能发生惨烈的斗争，我也可能引火烧身，但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就不考虑这一点了。所以在科长第一次召集准备会议时，我就首先提出挑战，这个行动就是根据以上思想作指导的。结果是他们又用手铐子“讲话”，把我送进了过去还不曾进过的禁闭室。

我今天要问问中共，你们凭什么罪证判我无期徒刑？是什么法律？什么公理？剥夺了 25 年大好时光，当牛做马，还要被迫口口声声认罪感恩！这是什么“革命人道主义”？我今天在纽约，敢请求在美的中共人员向北平问一下，究竟段克文犯的什么罪？为什么判决书不给？为什么劈了几根筷子，还可照常使用，就以此作为理由判罪，这在古今中外算是什么道理？我如果有一字虚假，我要向读者谢罪，我的话是算数的。

这种野蛮的、不讲理的极权制度，为了他的统治，就肆意嘲笑人权、法律、真理、正义，为了他的政权，就不惜使若干万无事的人受折磨、受凌辱，甚至被毁灭死亡！这都是政治野心家给世界人民所强加的灾难。我就是其中受害的一个。我有理由，也有权利向世界上的正直人士，为自己也为这些受难者呼吁。

把我们逼上交罪台和送进“交心房”，这是共产党最后的一招，有的人也真就被逼出一些罪行来，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共产党却是很得意的。在运动将近尾声时，学委经授意，又向大家进行两项号召：

其一：凡是过去领有的奖单、奖状、勋章或是存有的纪念照片，也都是犯罪的证物，都要交出来。据我看：这实际上是要从灵魂深处以减我们对过去的光荣感和怀念心，并从思想上割断我们与国民党的联系。他们的构思是极其周密的。人们为

了以后免掉麻烦，就把藏在天棚或是埋在床下的这类东西纷纷交了出来。同时，还得说："因为我思想割不断国民党的联系，甚至幻想变天，所以才隐藏这么多年。这么严密，这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有的在把蒋总统证婚的纪念照片交出时，还要大骂自己一顿。

其二：凡是存有珠宝金银财物的，都要自称是掠夺人民而来的，应该还之于人民以表赎罪悔罪。对此也有一些人响应。我现在不指出姓名，但举一个例子：我们中有一个人，平常表示自己清高，并且又常批评他的某位好友，"为人都好，只是过于爱财。"当前，被这种形势推动下，他的思想起了负担，弄得几天睡不着觉。最后下了狠心，把一生设法所仅存的二百几十两黄金交了出去。但是他又心疼，所以他就在"交金书"上写给他太太道："藏在某处地下的黄金，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某时埋在地下的。我干什么干什么用掉几十两，又干什么干什么用掉几十两，现共剩下 ×× 两"叫他太太起出来交给共产党。请看看，他的苦心思真是费的不少啊！谁都会明白，他在家中埋金时一定是同他太太一起干的。他以为这么一写，他太太就会按照他写的尾数，自己去起出来，交给共产党敷衍过去，共产党不会笨到如此地步。哪能不拿着他的"交金书"，到他家跟同他太太，来一个"连窝端"（即是连大带小，一下子取走的意思）一点不剩哪！

同犯们都看出他所搞的"名堂"，在这样的大风暴中，各人都要"找立场"，如是小组、联组就对他展开揭露批判。同时，又由此引起追问交罪问题，群起而攻之。这位先生还死要面子，不但对于他在黄金上所搞的"名堂"拒不承认，而且对于某些证据确凿的罪行，也矢口否认。群众当然纠缠小休，他于是在会上猛然跑向锅炉房的大烟囱，装模做样要攀登上边所附设的

梯子好像要自杀。当然，大家拖同来，又斗了一阵。

对于黄金的来源问题，据他事后自己私下讲：是他在经理某项军需时“捞来的”。我觉得这种人，是最可耻的。一个人凭两只手，用正当方法绝不会饿肚子。可是这种人的手，就专会伸向肮脏的地方，去非法掠夺国家或人民的财物。而且平时还道貌岸然，实际上是巧取豪夺，卑鄙无耻。这种人还往往认为自己聪明能干，如果他不是心理变态，就一定是天生的劣根货。他们是革命的罪人，也是人民的罪人；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内奸或敌人。他们用肮脏的手所掠夺的财物，今人被共产党给追得一干二挣，两手空空，这对于他们是一个严重的、深刻的、无情的教训。

天地间真是“有道儿就有人走”，因为这位先生攀烟囱梯子装自杀来吓唬人。如是就有另一位李某也仿其道而行之。这位先生的特点是：他批判别人尖酸刻薄，有声有色。别人批评他，他不是百般抵赖，就是装疯卖傻。这次，在群众围攻的紧急关头，先摆个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姿态，然后就像那位先生一样，抽身跑向那个大烟囱。

可能是大家对都他有了共同的认识吧！就不慌不忙地跟了出来。那个梯子本来是离地约有六尺悬在空中的，他还没有上去，就在下边大声喊叫：“不要拉我！我要上去自杀！”有个同犯很调皮的对他说：“我们绝对让您达到目的，不会拉你！”这位李先生一看没人管他，不得不纵身攀上去，一边攀登一边喊：“你们不要管我，你们闪开，我要摔死！”慢慢腾腾地攀上不到六七级停下了。他除了做怪样子，也没有什么词儿可说了，就只是“哎呀、哎呀”的，在上边装作喘不过气来。这时我们也出来了，他正在上边做“滑稽表演”呢！有个人忍不住笑着对他说：“你不要再耍死狗了，下来吧！”他抓住这句话，一边

下来一边说："下来就下来，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弄得大家哄然大笑。以后我们在某些场合，就向他打趣说："你们不要拉我呀！"他也不禁莞尔一笑。

这一场闹剧一过，学委们又出新花样，他们在大操场上，摆上两个台子，然后学委和犯人又把我前拖后推地弄上台去，有个学委问我"认罪不认罪？"我反问："叫我如何认罪法呢？""运动一开始，你就挑战破坏，这是不是现行犯罪？"我说："这个：……这倒不能不说是个错误。"这时那个在运动开始时曾发言的吕某上来说："要是真心承认错误，就要交罪！"这个说法，又触动了我的病处，我就对他说："交罪一条也没……！"话还没有说完，又一个学委就连催带劝地说："承认错误就要诚意地跪下才是，没亏吃！"他的语意我有些理解，我觉得再硬顶下去，既不好收场，于我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我说："好，我跪下。"我腿是弯了，把屁股却坐在脚跟上，但过了会就把腿分开，干脆坐在地上。

在我刚一跪下，那个负责指挥的学委把手一指说："大家到那个台子去！"如是就把那个刚才要我交罪的吕某，在学委带头下，群众张牙舞爪地把他弄上台去，众口狂呼呐喊地对他高叫"跪下！"他当然不那么情愿，如是有些人在学委带动下就跑上台去，对他拳打脚踢还加上一堆粘痰唾沫，有个家伙还把鞋子脱下左右开弓地稀里哗啦揍了他一顿嘴巴。在这样猛烈的风头下，他只好跪下了。

这时有个学委向干部作了汇报回来说："段克文有了初步承认错误的表现，但还是不够的，应该回去继续反省！"我当然了解，我的问题是收场了。

这位吕同犯膝盖还真够硬，一直这样被整了五、六天，天天都跪在那儿直直的，这当中像挤牙膏似的，又交了几条罪。

后来大家好像都有了共同的了解，风头就渐渐低下来了。人也不那么起劲了。有的人有气无力地问他：“你认罪不认罪？”

他也就嘟嘟哝哝的答：“我当然认罪啰!”

“你为什么破坏运动？”

“我过去反动意识没有改造好，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现了原形，反动本质未变嘛!”

“你还调皮不调皮了!”

“我再也不敢调皮了！这个教训我还没受够吗？”

“你说，这样斗你应该不应该？”

“这太应该啦！大家都是对我好，才给我这种‘治病救人’的帮助，我要感谢大家!”

“你不要感谢我们，你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是的，我说错了，你们说的对；我要真心诚意地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教育我，挽救我的大恩大德!”

这样又整了他三四天，人们怎么问，他就怎么答，他是坚决、彻底、干脆地采取不抵抗主义。最后只剩几个人稀稀落落地整了一两天才告结束。

通过这种情况，使我得了两个极为深刻的认识。

我和姓吕的，都是在交罪运动开始时第一次会上发言的人，因为在不同的角度上说了使共产党不乐意的话，这笔债是记在共产党的账簿上了．所以在运动快结束时，必须来个清算旧欠。在我们坐牢二十多年中，这种经验教训可说是痛彻骨髓的。要是有所例外，由于共产党的某种考虑，在暗中打你的“黑算盘”而已。例如有一个同犯在 1966 年曾发表过批评毛泽东整刘少奇是“兔死狗烹”等类的话，干部当时还表扬他：“敢于坦白思想，向政府交心”，可是到 1969 年他在农场劳动时，借

口他“擅离劳动地点，走向武装警卫，蓄意抢枪造反”这个题目，把他整得死去活来，成了残废，最后死在管理所。还有一个同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呱呱叫，干部叫他起草文件，他下笔万言；派他在大会发言，就是外来讲大课的理论专家，都备加称许。而且他 20 年来，一向是当学委，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早就释放了，但就因为他在某些场合敢于暴露自己的观点，所以一直关到最后，才同我们一起“释放”。他之所以未被那样挨整，就因为他还有“应声虫”和“传声筒”的用处。但他的老账并未兑消，而是被打了“黑算盘”。共产党的阴狠毒辣，对“战犯”，对人民，甚至对于他们自己人，无不如此。非身历其境，不能体察其滋味。“有账必讨”这一认识，对我是无比深刻的。在大陆上的所有人，也都是同样深刻的。人总是人嘛！受了教训，谁都要回味一下，动动脑筋啊！许多外国人士，到大陆访问时，对于大陆人民那种“众口一词”的表现根为惊讶，他们哪里知道：大陆人民经过许许多多沉痛教训之后，自然而然产生这样一种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藏在灵魂深处的东西，外国人也就根本不能理解。对我来说：我从此以后，不到必要时，我也很少再采取公然的对抗了。这是共产党在我身上所取得的胜利，但我更清楚了共产党的真面目，内心的反抗意识也因此而更加强烈，就此而言，这又是共产党的失败。

这个运动一共搞了将近三个月，其过程是既复杂又猛烈，实际上是天天在干，我称之为“压迫低头运动”。我所举的是一些突出的例子，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交待。总之，这是在将近两年来，通过两个文件的学习和一次思想大检查的酝酿，所采取的一种最剧烈最残酷的压迫手段。后来那名科长在对运动作总结时直言不讳地说：“改造就要脱胎换骨；而改造的过程就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在他们来看，给了我们这种精神折磨，

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越多越大越重就越好。

在运动过去之后，除了劳动或者临行突击劳动时间外，其他时间都一概用在写“交罪书”上。它的格式是要按照前文已经提到的：时间、地点、被害者姓名、所使用的手段以及伙同什么人，等等项目，一点不能马虎。

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多少年的旧事，都需要重新回忆。而且要揍条数，同时在百般逼迫之下，很多人都要编罪。因此写“交罪书”时，就要大动脑筋了。这样就出现以下几类现象：

例一、有人曾交罪行四件。第一、他在某年某月某日在甲地指挥部队和某部共军作战，由于他效忠国民党，全力指挥战斗，竟获得胜利，这是他给人民（即指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这是他罪大恶极，反动成性。第二、他在某年某月某日，在甲地指挥所部和某部共军作战，据估计曾在战场杀伤共军几百名，这是他对人民犯下的滔天血债，他是死有余辜。第三、某年某月某日，他在当“匪”（凡是遇有称呼自己时，都要以“匪”自称，不然就是“不认罪”想和共产党同列）团长时，在甲地指挥所部和共军（在那时要称为人民解放军）作战时，把重伤俘虏 × 名，嫌其不便运送，都命所部执行枪杀，这是他残暴成性，对人民又犯下惨无人道的血债。第四、某年某月某日，他在甲地当“匪”团长指挥所部和某部共军作战中，曾俘虏共军若干名，解送师部，以后情况不详，这是他所犯极其重大的滔天罪行。

上述四件罪行，其实就是某年、月、日，他当团长时，在甲地指挥所部和共军战斗中，估计在战场上曾杀伤共军若干名，并俘虏若干名，除重伤者不便运送即予当场枪杀外，余者送交师部处理一案而已。同犯们管这“名堂”叫做“化整为零”或者叫做“大卸八块”。

例二、有的人们曾交出诸如此类的罪：某年某月某日，在当某某军少将参谋长于某地举行对共军作战会议时，有某某师某某师的师长和参谋长们参加，他在会上曾穷凶恶极地提出几项作战方案，都是绞尽脑汁的阴谋诡计。虽然旋因他宿疾复发，前往某地疗养，但是他的罪行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他既指不出后果，更没交明那个方案付诸实行。同犯们管这叫做“虚晃一枪”。

例三：某某师长，在某年、月、日，于某地驻防时曾派某团往某地扫荡，捕获共军间谍一名，未曾报上级批准即行就地枪决，这一血债应该由他来负，同犯们管这个“名堂”叫做“张冠李戴”。

以上不过略举三例而已。像这类情况确是很多的。即如上文所提的那位保护李弥逃走的周凡，就一共交了一千多条罪。后来经共干一再指出，上述这类情况，必须合并的合并，落实的落实（即是“去虚存实”的意思），周就把所有罪条列出表来，一条一条检查核实，才归结为四百多条。共干还是认为不妥，足足费了半年多时间，成天思来考去，最后才落实到两百多条，交完了事。

关于周凡交的一千多条罪，他既没有受到像我那样的狂风暴雨，那许多罪条又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交出来的呢？这，我有必要补述一下小组开会的情况。我在前文已经交代过：小组既是基本单位，又是一个重要的关卡。整个运动过程，在共产党操纵下，斗争得那样轰轰烈烈如火如荼，震动得每个人都惊心动魄。小组每天都在开会，所有同犯都要按次序进行“通关式”的交罪。大家都交了，谁也不愿“交白卷”，惹得大家围攻，甚至变成被关的目标。一般说来，在小组交罪是比较马虎的，不论是否编造，凡是在口述时能起出个罪名来，只要共产党不追

究，都可以记录在案被通过。不过，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口头交待之前，切记要自己留个底子。不然的话，日子多了，你不是要忘掉，写不出交罪书；就是要重复，出笑话。而且小组记录在案，自己反倒忘其所以，那就难于自圆其说了。

据我所知，在小组交的罪，至少 99% 都是假的。如果不是照着“别人的葫芦画自己的瓢”，就是顺着科长在“交罪运动动员报告”所指的方向：“在你们过去当权的时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罪行”，如是就编造，在某年某月于某种场合说过一句如何对共产党不利的话，又于某年某月在某地无端打过黄包车夫……等等。别看这都是些小玩意儿，你要把几百条罪行编得如真如实，那还很不简单呢！我在小组还交了 103 条罪行，行走坐卧都曾极尽“挖空心思”。最后，经过屡次核实归结为 23 条。在全所，我恐怕是最少的了。

那名科长在作总结报告中曾指出：据管理所统计，三百多人，共在运动中交出罪行总计一万几千条（确数已忘）。其下还有分类：战场枪杀若干条，血腥屠杀若干条，什么若干条，什么若干条。最后的结语是：“从你们交罪的实际来看，你们还是大大有罪可交，运动不是就此结束，而应更深入发展！日本战犯回到本国还要补交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并表示：如果不把这项罪行交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心安。这才是认罪悔罪的真诚表现。这才是恢复人性的具体证明。你们过去对革命所犯的罪行，用你们的话说是罄竹难书的！这以后，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到此，可能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如此猛烈地逼交罪行，是不是为了作为将来处理我们的张本呢？据我后来所经历的事实，我只能从以下两方面作概括的解答：

第一、从 1959 年到 1966 年，共举行过六次特赦。就抚顺

“战犯”管理所来说，共约五六十人（确数已忘）被释。从罪行观点去分析，都看不出与罪行之多少、大小有关系。同时也没有因为罪多罪大，就加刑的。

第二、据我观察：首先还是如我以前所提到的。因为一体释放做政治筹码的问题暂时搁浅，变成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就使出这种手段，压迫甚于坐牢。也就是把“加速改造”，转变为“长期改造”。其次的作用是：所有罪行都是你们亲身出之于口，书之于笔的，你不能反口再不认罪了吧？这个名堂就叫做“强力压迫低头”。另外，还有这样一种好处：反正我们都已是“入笼之鸟”；不，是待罪之囚。罪行摆在那儿，必要时拿出来，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主观臆断。是否正确，还请读者去判断了。

继交罪之后，紧跟着就进入认罪阶段。他们说：交罪不等于认罪。交罪只是揭露过去，认罪才是思想转变。所以从此就提出这样两句新口号：“认罪是思想改造的动力”和“千条万条，认罪是第一条！”对此，曾进行大座谈、大讨论。千言万语总离不开如何认罪，如何靠拢人民和如何感激共产党。不论在学习中或是会场发言，张口就要说：“在 ×× 场合，我曾犯过什么什么滔天罪行！我是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千死万死，也不足以平民愤！共产党对我刀下留人，我有生之日即是报恩之年！我要和旧我一刀两断，彻底否定前半生！”这就成了我们以后老要挂在口头上的“认罪八股”。共产党管这叫做“理论联系实际”或是“结合实际”。这种调子是成年累月地唱，虽然耳朵都已听得生了茧子，但说起来硬是要咬牙切齿，劲头十足。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就以“待罪之身”自视了。共产党放个屁都成为香不可言。什么都唯恭唯谨，什么都百依百顺，连夜里说梦话，都满口认罪感恩，二十多年来，一向没听到梦呓曾有出过

毛病的。这就是海外所谓“洗脑”的功效。确实是中共的一个独到的大发明！

第十七章　依然“阶下囚”

交罪运动进入“深入发展”，实际就是运动本身的结束。这是共产党的一种高招，许多运动，特别是对于猛烈性的大运动，末尾多半都用“深入发展”这种若断若续和模棱两可的“双关语”拖下去看。如果嗣后发现“逆流”或是感到必要时，他就可用“深入发展”一词重整旗鼓。不然就无声无臭地消沉下去，谁又能管得着呢？这个方法之妙，就在于使每个人还得要继续提心吊胆。共产党在创造词汇，是有其独到之处的。我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以来，就体力活动而言，大参观以前，完全是以各种球类的体育活动为主。后来，因为“开门放”（这是我们对于“全体释放”的代用语）不可能了，就由锻炼体格的劳动步步引向生产性的劳动。通过交罪运动，共产党认为我们在交罪认罪的“思想觉悟”下不会再对长期扣押不满，如是就“打铁趁热”地把我们干脆正式投入生产劳动，恢复“阶下囚”的原来情况。共产党管这叫做“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我们那时的年龄，一般都是五十岁以上，五十以下的为数很少。体力随年龄的增长而消退，人数随着历次特赦和许多死亡而减少。但是劳动强度却一年一年在增加，伙食待遇从 1958 到 1963 年也逐次在减低。一句话：我们从阶“上”囚又返回阶下囚了。共产党管这叫“根据不同的情况，施以不同的教育”。

在开始写交罪材料（即交罪书）以后的半年中，除了经营

邻近监狱的菜园和山下的几块稻田之外，并在离管理所约五公里一个叫做“将军堡”的山沟里，从生产队要来一块约七八十亩的山沟地——作物都已长得很高的农田，作为我们正式从事农业生产的场所。我们在那里盖了一所临对时性的小房子，同时又开山修路，搭猪羊圈及修盖马棚车棚，正式搭起架子，开始大搞农业了。

十多亩稻田，分散在三块地方。对于我们当时的年龄来说，在筑埂、开沟、育秋、翻地、收割、打场这些工序，还不感到很艰苦。但是，在秧田里薅草，一蹲下去就是两三个小时，腿痛得都难以站起来，简直比受刑罚都难过。可是绝不能露难色。耙地都是用人拉，这种城边地，碎玻璃、破碗碴，甚至铁蒺藜，什么都有；一脚踩上去，就是鲜血直流的大口子。可是谁都是若无其事一样，照常把创口泡在污水和臭泥里。因为一声张，不但不符合“负伤不离火线”的精神，而且表示“不能克服困难”、“畏难怕痛”的“恶习”未改。不免在某种场台要受别人的讽刺批评，又怕给干部留下“改造太差”的印象。所以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自己知。就是当时被别人发现了，还要咬着牙说“没关系!”这种现象也可以算是“改造”的弦外之音吧！因为这几块稻田所处的地形很特殊，几天不下雨，就要每个人拿个洗脸盆盛水往田里灌。这种“人跟天斗”的行动，又叫做“抗旱”。好多次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抗旱”时，忽然下了大雨，又马上跳进水去，用洗脸盆反过方向来往外淘水，搞得浑身成了“旧汤鸡”，特别是，有一块新垦的稻田完全是粗沙子，插秧时硬得用手指一个一个地钻出洞口，才能栽进秧去，把手指磨得鲜血淋漓，都不能叫一声苦，总之：不管怎么折腾，都要把痛苦的忍受视为认罪的考验。共产党在“教育”、领导、掌握、控制和驱使人民方面，是有其一套独特艺术，并且是极

为成功的。您看，昨天江青在势时，全国人都得仰着她的鼻息批斗什么人。今天华国锋掌了权，就得马上掉过炮口轰向“四人帮”，全国八亿人民都得东风来了向西倒，西风来了向东倒，又何况几百个已在笼中关得烂熟的“战犯”呢？

管理所附近的那块约十几亩的菜园，我们 1957 年在那里劳动，完全是一种“游戏”或体育锻炼的性质，1958 年交罪运动后，就大不相同了。只把约两亩的水洼地，从高处取土填平这项工程，所付的劳力强度，比我在金钱堡劳改队有过之而无不及。翻土打畦，更得要精耕细做，如不搞得土细如绒，整整齐齐，说不定那个老技师（即是种菜的工人头头）会扳着面孔搞句怎么样难听的话，在交罪运动之前，他对我们是相当“客气”的。从那以后，他就以奴隶监管者的姿态出现了。他如果在我们劳动中发现有谁因为说话而停了一下手，他就嚎叫一声：“这不是叫你到这来‘闲拉’（即是‘闲聊天’的意思）!”谁若是有事向他请示，必须先喊“报告老技师!”他才搭腔。当了“战犯”，对什么人都得表示认罪，对什么人都得奉为“顶头上司”!

到 1958 年冬为止，我们生产的各类蔬菜，都是作为商品出售的，干部们用菜，也都要过秤付款，对于我们也是一样。从 1959 年起，这个菜园就划归北院的抚顺监狱，作为扩建厂房之用。老技师也搬到山上农园去住。在那里生产的蔬菜，我们所食用的虽然照旧过秤付款，可是对于干部就采用按人分配的方式，看样子就不像仍然在付款了。而后来，他们先拣好的分完，剩下坏的才归我们。

1958 年的农园劳动，因为我们是中途接管生产队都已种好并长得老高的庄稼，所以除了干一些前边所述的基本建设类的工程之外，就只做些中耕除草以及田间管理的工作，便进入了

秋收。这一年秋收规模虽算是最小的。但是山前山后的庄稼，都得来回爬山，用肩膀扛回到场院，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动就是一身汗。

在此应当一提的，凡是在春耕，夏锄或秋收等等大忙季节，管理所的男女干部都是一体参加劳动。女的，除了一般都能参加锄地之外，春种秋收时，多半都干些较轻的活兄。男的，几名身强体壮的如金科长、孙科员、金班长等，都是不声不响争先恐后地起带头作用。例如在锄地时，我们“战犯”中也有不少“快手”，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赶过去；再如在秋收时，他们总是拣最高处的庄稼去背。如果在路上发现我们有背得吃力的，他们就在中途拿过一些加到自己的身上。这对于我们理所当然地起了不小的“无言教育”的作用，许多人也就肯于咬紧牙关超体力地克服困难而不甘落后了，共产党虽然规定它的干部，每年都要有一定日数参加体力劳动，但我在劳改队，其他监狱或吉林公安厅或辽宁公安厅都不曾看见这种情形。这对我们这群“战犯”可能是一种“特殊施教”的方法吧！在中共远未取消军衔以前，曾看到管理所干部几乎全体同时晋级，可见它在管理监犯的系统中，是一个“红旗单位”（即是按共产党的奖励办法，插了红旗的受奖单位）了。

秋收以后，冬季贮菜，对于我们也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在抚顺这个地方，一年至少将近 6 个月要吃窖藏的蔬菜。秋末，就要开始挖一个约 40 公尺长，2.5 公尺宽和 2 公尺 20 公分深的长方形土坑，然后等待坑内凉透了，上口再搭上木梁，挡上枝条，铺上苞谷杆之类，最后再盖约 30 公分厚的土。光是这一项工程至少要二三百个劳动日。完全都用手工操作，任何东西的移动，都要付出全身的体力。下霜以后，更要昼夜不息地轮班运菜，动辄十来辆汽车，这二十多万斤白菜、萝卜，光是装

车下车，一忙就是周身大汗，可是在等车的时候又马上冻得浑身冰冷。只是两三天工夫，满院堆的到处是菜。然后，太阳出来，远要一颗一颗摊摆在地上暴晒，晚上又怕冻坏了，还得一棵一棵收起堆成堆。偏偏这个时候常是阴雨加雪，那就更糟糕，势必马上全体出动，冒着雨雪，拖的拖，抬的抬，抢运到所有走廊或俱乐部等等地方。天一发晴，又立刻照样搬出去。等到把菜晒干了，还要逐棵加以选择整理，好的准备入窖，坏的就抛向屋顶，准备晒干喂猪。天冷下窖以后，因为堆得那么高大（不这样就装不下），不能通空气，几天就发热开始腐败。这就要相当多的一批人，下窖翻堆散热并一层一层地摘除枯烂的部分。较坏的送去喂猪，稍好的，送到大厨房给我们做菜吃。除了逢年过节我们可以吃到成棵的鲜菜外，20 年来，我们在冬天都是吃这种“剥皮菜”过日子。

在以上这些操作中，在很长时期中都是不能戴手套子。因为一戴这种东西，在组会或其它场合，同犯或共干就要冷讽热诮地说你原封未动地有“娇气”，“不是认罪改造的应有态度”。谁还肯不忍受当前的一点痛苦，招惹对自己不利的是非呢？我们这两只老手本已磨得全是很厚的老茧子，这样摆弄菜棵棵，一会儿是沾满冰冷的菜水，一会儿又风吹日晒，一湿一曝，十指很快就到处裂些大口子；血水津津，痛楚难言。晚上睡觉时更是刺痛难眠，这种精神上的刺痛，不是身历其境者所能知道的。

这种贮菜法可以说是一种“恶性循环”。多藏就得堆大堆，堆大堆就要发热，就要摘除，就要……，除了人工不计外，光是蔬菜的耗损实在是不赀的，按那时 300 多人计算，每冬贮菜 10 万多斤满够用了。贮藏蔬菜的关键问题，就当时的条件来讲，是要保持窖温不能超过要求的温度，堆成小堆容易散热，

自然保鲜较久，损失自然可以大大减少。20 年来，这种建议我不知提了多少次，可是干部总是笑而不纳。就是在我们去年全体“释放”时，只有一百稍多一点人，还贮藏十多万斤菜呢！久而久之，我才明白：原来这种干法，可以每天摘下几百斤废菜养猪。钱是由我们伙食费里付出，养出又肥又香的猪来归他们吃。真是“窍门满地跑，到处有人找”啊！

忙完贮菜，接着就忙冬季采暖用煤。管理所的暖气，除了本所还要供应监外许多户（其中包括干部住房）。两者以面积论，大致相等。一冬用煤约为 1000 多吨。平均每车以 3 吨计算，至少也要 400 个车次。这些煤是先用火车从煤矿运到离管理所较近的卸煤场。然后就由我们一口气不过十分钟装上卡车运进管理所以后，再由那里准备妥当的同犯在三四分钟之内卸完。不这样就不能争取时间赶快运完。这也要昼夜不停地干，特别是在卸煤场劳动的同犯，车来了，热得够受；车走了，又冻得要死。遇着刮风下雪，那就更是苦不堪言。偌大的院子很快就卸满了，为了倒出场子好继续运输，就老弱一齐出动，挑的挑，抬的抬，在锅炉房外积成老高的大煤堆。这是一种极为繁重紧张的劳动，尤其是夜班，尽管十分疲倦劳累，谁都不曾露出半点难耐的神情，因为在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计划教育”之后，谁都懂得了对于劳动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才是合乎认罪的要求，这就是管理所比劳改队高明和厉害之点！

以上，只是就 1958 年的一些劳动情况而言。以后凡是与此相同者，我就不再叙述了。不过，从 1959 年开始，历年都有好多新的东西，那就另当别论。

1958 年的“十一节”和 1959 年的元旦与春节，文艺演出比以前更形扩大。这一年“十一节”的演出内容，主要是偏重在交罪认罪。春节五天假，真是够热闹的。犯人所做的花彩，

把所内布置得花花绿绿。演出的节目比以前也大有增加。除了吃饭以外，想休息都不能，硬着头皮去参加这种“苦笑中的狂欢”。

春节的文艺大会以歌颂“三面红旗”和强调认罪为主题。另外，和以往比较有三点不同：

其一、是由犯人主委代表全体犯人宣读致所长、干部、医护人员和厨房、理发室、锅炉房师傅们的致敬信。措词是唯恭唯谨地表示我们是如何认罪感恩。这也就等于是低头认罪的“宣誓书”。

其二、是伪满队也参加单独演出。他们有人写朗诵诗，对他过去当汉奸表示忏悔。另外，他们有个在伪满四平省当省长的（名已忘），自编自演名为“当年春节”的话剧，其内容是描写他当年如何丧心病狂地效忠日本帝国主义，祸害人民，使在春节时过着家败人亡连顿饺子都不能吃的悲惨情景，以表自己良心的谴责。解说员据说是溥仪的侄子，在广播喇叭里，随着剧情的发展，用极其激烈痛切的语调：张口“就是这一群丧心病狂、奴颜婢膝甘心事敌的汉奸，祸害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闭口“就是这一撮数典忘祖恬不知耻的，把东北的大好河山双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话的锋芒都字字刺向以溥仪为首的伪满这群汉奸。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这部“自传”中说：他本来有派这个侄子做他继承人的拟议，而溥仪对于这种严厉的斥责，好像思想上已经有所准备似地在那里全神贯注、安安静静地听着，没有一点不自然的表情。按照清朝宫廷的传统，“继承人”必须无条件的百依百顺，不许有半点“违逆”的可能，更不用说这样指着鼻子痛骂了。他（溥仪）确实是罪魁祸首，今天对此，在良心自谴之上，“甘之如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这次演出还出过一次啼笑皆非的情况，就是在一个表现除夕欢乐团聚的节目中，需要两个天真活拨的男女儿童出场。我们既全都是些男性而且又都是些老头子，这的确是个大难题。没办法，只有找两个最瘦小的干巴老头子来扮演。这两个人平日既都是病容满面，并且向来是呆板迟滞“不苟言笑”的。他们本来自知是不堪胜任的，但在“改造”中给了这样一个任务，又不能不硬着头皮去干。届时，他们的脸是刮了又刮，几乎刮了一层皮，但是胡子根藏在皮下，围看嘴仍是一圈黑乎乎的。这，只有用厚粉去盖，满脸雪白，再抹上红嘴唇和擦上两块通红的胭脂，看起来，真和很不高明的古庙塑像没有什么两样。尤其当剧情发展到他（她）们出场的时候，他们那种表现喜悦的跳法，我好像是在马戏团看过一种什么动物所特有的那种双腿并行的蹦跳，我不禁对他们那种勉为其难的精神吃了一惊！当他（她）们偎向长辈撒娇；伸出干瘪的手要糖果和“压岁钱”的时候，皮笑肉不笑裂着红嘴，露出又黄又不整齐的满口枯牙来，那种盖世无双的表演，连导演看着都皱起眉头扯过脸去摇头苦笑，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是日本队也演出一个完全日本风味的民间舞蹈节目，两个人打着伞，边舞边歌唱，我们虽然绝大多数不懂日语，但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所以大家都很感兴趣。其内容是描述两个农民被剥削的痛苦，歌声凄婉动听，日本战犯表情甚为入戏，这也引起我们对于剧情的间接理解。

春节过后，一切恢复了正常。所方不是向我们交代过：“认罪是改造的动力”吗？他们对这句话的批注是：“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认罪不是口头上说说就算了的，而是要通过具体行动来表现。是不是真心认罪，是不是诚意转变立场和改造自己，那得要经过实际考验去证明！”所以一开春，我们就先由积肥

掏大粪开始。因为肥料是“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中的重要一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为了争取本年农业大丰收，管理所号召我们：这项工作是有实际意义的。猪粪、牛马粪和人粪尿，都是最好的肥料，那怕是星星点点，都要搜集起来送到田里去。

第一步，我们先掏监狱院内的大厕所。这个是我们在白天用的。它约有 3.5 米宽，20 米长。地下的粪窖，深约 2 公尺，其长度和宽度大致和上面相等。抚顺地区在冬季，一般都是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下边约一米多深的粪尿早已冻结成一个整体了。其上也都冻成好像古洞里的石笋一样。把这些容易搞的冻块挖起来，剩下的就是连屎带尿结成的冰了。这东西既硬又疏，一镐下去，至多只能掉下拳头大小的一块，而且崩得稀碎，脸上、身上、眼里、口里，到处都是。跳进眼去，要辣得直淌眼泪，跳进嘴去，更成了苦、咸、辣、臭的大杂味，可是谁都不肯皱皱眉头或者表现不快的神色。因为若是这样，到开小组会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批评：某人在起粪窖时，劳动态度不好，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人家农民把粪看成是宝中宝，成天跟粪水打交道，从来不嫌臭。说这话的人和劳动人民，是不是吃了这种粪便还会觉得是香的呢？我想，当然不是。可是在开会的时候，为了表现“改造积极性”，必定会有人提出这个调子（不，共产党管这叫做“帮助”）。这样一来，被“帮”者，如果不“虚心接受”、不“知过必改”，那他就是“不知悔改”，就是“坚持反动立场”，因此可以说“被帮助”者百分之百都是表示“默然接受”，或者还要提出“自我批评”把自己臭骂一顿。吃一次亏取一次经验，下次当然不肯再惹麻烦。“帮人”者，既然张口批评别人，下次轮到自己头上，当然也要忍而受之，默不做声了。在这种又脏又累的场合，如果在

干部面前，稍为表现难色，不但自我要发生“经不起考验”的恐惧，而且常常会有个“积极份子”跳出来，把你的工具抢过来说：“干这么点活儿，就怕脏怕累，到旁边休息休息吧！我来干！”他抓到了“表现”的机会，你会弄得当场不下了台。这种情况，也是在交罪运动后才发生的。

起完大厕所，接着就要起监外西南角上的两个“大马葫芦”。这个名词，读者可能不解。这是由英文 Mud-hole 的译音而来的。伪满时日本人把它用日文译音；后来，中国人又把这个声音形象化，就叫做“马葫芦”，即是“渗坑”的意思。这两个“马葫芦”每个直径约 4 公尺，深约 7 公尺。战犯管理所和北院抚顺监狱所倾倒的粪便，统统由下水道集中在这里，然后经过特设的装置，把清水滤走，把粪便沉淀在这里，一般都约五公尺深。起这两个东西，很不简单。首先要搭起悬空跳板，放下去，人站在上边，用个特制的大铁勺子，舀到从上边用绳子放下去的铁筒里，再用两人像提井水似地，一节一节提上来，倒进用煤渣筑成约半亩地的贮粪场里。因为这些粪汤又稠又粘，很不容易自行散开，堆高了，还得人下去，用大耙把它堆散开。干这类活儿，不让衣服帽子、脸止手上，到处是粪，简直不可能。虽然发有手套，但都是棉制的，用了一会儿，粪水就全部渗透。特别是下到马葫芦底部的人，一个大意就要整个掉进粪浆里去，有个姓杨的同犯，他一个人就掉过两三次。上山干农活时，干部常有参加的，但是干这种活儿，从来就没有干部参加过。脏的谁都嫌脏，臭的谁都嫌臭，但是当了犯人，特别是当了“战犯”，就没有一个胆敢嫌脏嫌臭的了。

在这种粪便中，死蛔虫之多，真是惊人。每一勺子都有几条。在大陆上种菜，施肥多半以粪便为主。这当然是蛔虫繁殖的媒介。倘然炊事人员把菜洗不干净，大量的蛔虫卵就有机会

进入人体了。这是一。第二：犯人进餐时，凡是有饭菜掉在地上，都要一律拾起吃掉。如果你嫌脏，发生踌躇，那就有人拣起，不声不响地一口吃掉。那上边所沾的，当然什么都有，不论是谁吃，无疑是给蛔虫增加了繁殖的机会。我们同犯中，有不少人有从鼻孔中钻出过蛔虫的经验，其猖獗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抚顺监狱的犯人，比我们还多十倍不止，这蛔虫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

起完大厕所和大马葫芦，我们混身上下从帽子到衣服鞋袜，都要大洗一番，但是不管如何洗法，两只手和衣服上的臭味，。总是要多日不绝。尤其是洗脸和吃饭，这两只臭手，老跟嗅觉打交道，怎么也避不开。不仅如此，凡是我们的居处，不论是监号或俱乐部，也都是臭味多日不去。偏偏正好赶上有一些贵客来参观，他们虽然没有捏起鼻子，但是飞快就走开了。我们当时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还很不理解，事后一想，才明白我们是“久而不闻其臭”，在他们是难闻极了。

大马葫芦起完，这只是完成工作的一半。这时的抚顺，天气还冷。掏出的粪便，等表皮结冻约三四寸厚时，就要刨下来，装上卡车运到将军堡农园去。这种东西，表面虽然冻了，可是下面还是软的，彼此一接触，几乎全部沾上稀粪，用手往卡车上搬，两手和身上弄得比上一阶段还脏。而且在刨的时候，眼睛和嘴不时都要渗进粪渣子。

起完上一层，还要等候下一层再结冻。如果天气转暖不能上冻了，就得用土或煤渣拌成半稀不干的，装上汽车才不致漏下来。这个活儿干来就更脏。并且至少要几次才能搞完，前前后后差不多要半个多月的样子。洗了又脏，脏了又洗，行走坐卧都是臭气四溢。

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年人的手和脚，忽而干忽而湿，皮上就

裂出不少大口子，血水浸浸，终日不息。到晚上入眠后，身体有些反热了，它就更加痛楚，把人扰醒，两双手脚，简直没个安排处，放到哪儿，怎么样都是痛的。

这个阶段搞完了。接着就到山上农园起牛马粪和猪粪，这比起掏大厕所和大马葫芦来，是轻松一些。搞完这个，天气也渐渐转暖。接着就要把从管理所送来的大粪块，为了溶化和发酵，继续从上到下翻几个个儿（一般又叫“捣粪”），使它变成松软和均匀，然后才能往田里送。

这一年，山上农园，又从生产队在山后接收比原来更多的土地。新的旧的，总计约有一二百亩，这些土地基本上都是在40 度角以上的高山坡上。往那里送粪，可真不简单。开始送粪时，除了女干部外，男干部几乎是全体参加了。他们对我们虽说：“各尽其力，不要勉强”，但是由体力最强的金科长、孙科负、金班长一带头，装得满满的，跑得飞快，我们相形之下谁又好意思装得太少走得过慢呢？我们那时就已都是五十开外的老骨头，挑的挑，抬的抬，一二里路的陡坡，每爬上一步，都要使出周身的气力。在开始爬坡时，还可以支持，到了山腰时，就有的虚脱，有的发疝气，甚至有的晕倒了。所里的医务人员，在这时候总是要带急救箱来，经过临时处理，一般总是重打精神，鼓起勇气再干，“坚持不下火线！”你看，干部们那样在挑战式的你追我赶，干得那么热火朝天，我们这些在被考验中的“战犯”，又怎么好“临阵脱逃”呢？

这时的抚顺，一般气温只是不到摄氏十度。上坡走几步就是满身大汗，棉衣都穿不住。可是把粪送到地点，转身走下坡路时，就被山风吹得浑身冰冷。我的体质对此最为敏感。每年春季送粪和秋季打庄稼，无论如何都躲不过两次感冒，而且接着要气喘咳嗽一个多月，真是痛苦至极。这已经成了我的“时

令症”，我现在仍是每季必发，成了我难忘的纪念。每次病发，我不禁就想起当时的苦楚。可是那时，我绝不敢声张或请病假，总是硬着头皮挺过去。在一 1973 和 1974 年春天，我患的比以前特重，只是每次请了一天病假，就受到多次尖锐的批评：“也不过只是头疼脑热，就借故请假，逃避劳动，你看谁像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有这种娇气，也不觉得可耻！”所幸 1975 年我们都被全体“释放”了，不然的话，这顿批评又不知要怎样挨呢？

送完粪，管理所又召集了一次“生产动员大会”。说这是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我们管理所的全体“战犯”也要“力争上游”，大搞农业。由学委主委代表全体“战犯”提出书面保证。要生产苞谷若干万斤、稻谷若干万斤、蔬菜若干万斤、杂粮若干万斤，错、羊几百条，并把所有地头地边和沟岸都种上南瓜，预计生产十万斤喂猪。这个计划和保证，在当时确是不小的，可惜事隔久远，详细数字我已记不清了。

这个大会日本队也出席参加了，他们也提出保证。除了到农园的河边荒地上开垦稻田约三数亩，按日本经验直播稻种外，还要在监内养 400 只鸡，生产鸡蛋 1 万个。为此我们在监内还特地给日本队建了一个不算小的鸡舍。日本队开的稻田虽然成功了，但因第一年是土壤不熟野草又多，所以秋后的收成不很高。养鸡对于他们也是一种新尝试，他们能够认真照书本学习，就是夜间也要起来几次去照顾鸡的情况。因此雏鸡的成长率，倒是不错的。他们还从管理所请来的专门人员处，学到阉鸡育肥的技术。把公鸡从腋下第 × 条肋骨处开了个口子，把肾脏取出来，它就不再啼鸣，雄冠也开始萎缩，并很快长肥，变成几乎跟母鸡一样的食用鸡了。日本人学这个很高兴。据说，他们将来回国后，还准备把这门技术推广呢！后来又听说：把一

种药剂注射到鸡冠上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但我们没有看到他们采用这种办法，其成效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养的是以“来亨”鸡种为主，这种雏鸡都是用孵卵器孵出的，秋后天冷，必须设置电热保暖器（即像假母鸡作用的一种特制器具）以供钻进去取暖。但是管理所不买，他们就只好用火炉来代替，雏鸡只有两寸来高，热气往上升；离远了小鸡根本利用不上，靠近了，往往有烫死的，我常看到日本犯人哭丧着面孔，拿着死雏鸡，表示自己照顾不周。据说：每死一只小鸡，他们都要作一次检讨呢！

干部在报告中说：“我们自己养鸡，每天能下 400 个蛋，你们每人每天都可以吃一个啰！”蛋是产了不少。但是我们一个也没吃到，日本战犯是否吃过，我不得而知。干部过几天就自己分几个，这倒是我亲眼见到的。

这个大会开得很有声势，表示的决心十分坚决。这一天还为我们改善生活吃包子。可是到了秋后，除了稻谷、地瓜（又名红薯）、苞谷、花生还比较不错以外，南瓜几乎一个没收，养了 30 来只羊，被狼咬死了一半，丢下的羊肉，反而便宜我们打牙祭，剩下十几只活羊，后来就都卖了，猪也远没达到理想。最高养到三十头，但是瘦猪就有二十多头，真正养肥的只有两三头。这时的生活比以前差多了，大家都馋得很，每次休息时，就有不少人围着猪圈互相研究，哪个猪可以有肉多少斤。言外之意就是想吃那个猪的肉。心想要能分一头那该多好。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一共只吃过两三回自己养的猪，那种肉确实是又肥又香，与众不同。干部们分到猪肉，更是同声称赞。

关于深翻土地，近年来是在全大陆雷厉风行的。凡是毛泽东的号召，管理所无不坚决照办。只因我们所种的都是山坡地，挖不到几寸就是沙石，所以只是象征性的搞了一下。虽然如此，

但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应当把所闻、所见、所想就便在此谈一下。

不知是哪一个人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说是中国土地所以增产太小，就是由于表土里所含有益于农作物的细菌，都被沿用几千年的旧犁浅耕法吸收枯竭了。如果能把深土翻到上面来，那就一定能大量增产。问题既是在中国式的“旧犁”上，据说苏联的铁制双轮双划犁，能比中国犁深耕两寸多，如是毛泽东见猎心喜，就一声令下在全大陆一体制造、推广、使用。1956年我们由长春被解往沈阳时，沿途所见运犁列车络绎不绝。那时大陆每年所产钢铁还很有限，光是用在这上面的，其比重当然是可观的。嗣经农民的实践证明，不但用加倍的畜力远有些拉不动，而且根本不合乎中国耕作方式的使用。更重要的是：不但不能增产，而且很明显地减产了。所以农民干脆把它送进农具房，作为古董专供展览之用。这也和大炼钢一样，成了大失败。也许毛泽东认为这种犁所翻的土地还不够深吧？他是向来不认输的，如是就又号召全大陆大张旗鼓地进行深翻地。在整个冬天和春初，除了其它必须使用的人力外，所余的农业劳动力几乎全使用在深翻地上，三九隆冬，仍然到处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你追我赶，互相挑战竞赛。像挖壕沟似地一节一节向前翻。一翻都是二尺以上，有的翻到七八尺以上。地方报纸，每到一定时期都要汇报成绩一次，说是本省、本市、本县，从某月某日到某月某日，总共深翻土地若干万亩。为了给这种深翻地的效果做证。人民日报载称，在某地种的地瓜，在地下结得像地瓜楼似的，亩产达几十万斤。特别是水稻，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今天报载某某地亩产水稻几千斤，过几天又报导某某地亩产几万斤。再过不多日子，又报称某某地亩产水稻几十万斤（好像是四十万斤，我也记不清了）。更妙的是这个产量还

经过当地党委过秤验收证明无误的。这证明毛泽东思想真正是“威力无比”的。我当时曾为此算了个细账，不用说几十万斤，就是十万斤稻谷撒在一亩地的面积上，至少将近 12 公分厚。我真纳闷这种稻谷是怎么长的呢？难道它都长成像一亩地那么大的一层厚达一公尺的硬盖吗？难道它也不需要空气和阳光吗？可是党委硬是证明无误，那还有谁敢不信呢？并且中共中央在年终总结时还发表生产公报，说本年的钢铁生产是大跃进，而粮食产量更是翻了倍，这既不是误差，又不是造假，而是中共全体上下严肃认真核实的结果。昭告全大陆和全世界，这是多么庄严的事情，当然是千真万确的！谁晓得第二年全国大饥荒实在逼人太甚，无情的事实，无论如何也盖不住了。

毛泽东在一个什么会上才无可奈何地承认：钢产量的数字是把 ×× 万吨“土钢”（即毛泽东大力提倡“大炼钢铁”的产品）也包括进去了；农业去年是减产了，那是统计部门在数字计算上犯的错误（原话已记不清，只引其大意）。他说得那么轻松自然，好像他都没有一点儿责任似的。这个“英明伟大的领袖”这几年也的确略忙碌的了。他就像小孩子那样任性，一忽儿搞大炼钢铁，一忽儿大搞双轮双划犁，一忽儿大搞人民公社，一忽儿大搞深翻地。为了硬要证明“毛主席指示的无比正确性”，竟然不惜一手遮天的编造出一套神话式的数字，欺骗人民。结果，步步紧迫地造成世所罕见的大灾荒，他还顺手牵出统计人员做代罪羔羊！唉呀！我的天！要不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挽救了局面，那种惨状真不知要“伊于胡底”！后来，这“三自一包”反而成了“滔天大罪”之一，把刘少奇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对于惹出如此大祸的毛泽东，还是到处献唱“东方红”，或者含泪高呼“毛主席万岁！”甚至还有人说，“因为你（毛泽东）改变了这个世界！”这种怪现象，我的确莫明其胡

涂！也许我的脑子洗了 25 年还不到程度，那就只好再等二十五年再看了。

凡是实行深翻的土地，都完全是平时产量很多的平地，实践证明，表土是最肥的，结果把肥土翻下去，而把瘠土翻到上面来，造成“人工破坏土壤”，花费无法计算的有用劳动力，并把最好的土地造成最次的土地，非得两三年，不能恢复原状。人民公社从精神上给农民以消极情绪，深翻又从土质上横加减产的因素，“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并不是田旱涝等等条件促成的，把“自然”二字改为“人为”，那是最恰当不过的！关于这个严重灾害问题，大陆以内没人敢谈，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海外也没听到什么人研究它的成因。我就不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在秋后，从山上扛苞谷时，我和一个平常很爱说笑的同犯走在一起。我俩在闲谈中扯到“三面红旗”，他顺口念出这样一首歌词：

三面红旗，三面红旗，
都是毛泽东亲自扯起；
首先是土法炼钢，
搞得一败涂地！
其次是双轮双划犁，
也是一样泄气！
尤其成了笑话的，
是大张旗鼓深翻土地！
他老人家硬不认错，
统统推罪于统计。
若是别人弄得如此糟糕，

一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什么真理，什么正义？
完全都是儿戏！

这首词的第二句，原来是“伟大旗手是毛主席”，我现在给改了一下，其它都是照旧。因为我对这首歌词，当时既感到他很大胆，又觉得词意很有意思，所以至今不忘。更令我不忘的，我俩还有以下这一些对话。

我听了他这么首歌，我看看前后都没有别人，我就吃惊地问他：“你这个家伙，奸大的胆子，你也不怕我汇报？居然唱反诗，你也不怕我汇报？”

他一点也不慌张说：“你这个家伙，我……知……道，把你那一套赶快收起来，不要演相声，吓唬人。如果你真的汇报的话，我就反咬一口，说是你向我说的，反正没有第三者证明，我看你有什么办法？你是不是想找‘沾包’啊？嘿！嘿！”

我说：“亲爱的同犯，你写反诗，还要抓我当俘虏，真是胆大包天！‘没有第三者？’你要再向第二个人讲，那不就是‘第三者’了吗？”

“亲爱的同犯”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不要拿我当傻瓜，你想想，如果你汇报了，政府（同犯们把管理所和共产党，一般都称作“政府”）可能还一时搞不清，不过只能光记上一笔账，倘然我再向第二个人去讲，他一汇报，政府就肯定我无疑，遇到机会就该整得我要死了！”说到这里，对面来了一帮人，我们就把话头引到“今年收成好歹”上去了。

是的，我们通过十几年的经验教训，私下说这类话，既要找对象，又不可在两个人以上的面前讲，更不可事后向其他人讲。

这个人已经死了，但因他和他家属关系很好，我就不便在此提出他的名字。

现在言归正传。送完粪，稻田秧苗已经下种多日，山上的农园很快就要开始春耕春播。因为我们之中，没有会扶犁的，所以这门工作专由一个农民出身的看守班长负责。我们在农园种的有：大豆、高粱、小米、苞谷、小豆、马铃薯、地瓜、花生、蕃茄、黄瓜、豆角、萝卜、白菜、胡萝卜、芹菜、菠菜、辣椒、茄子等。以上这些东西，以苞谷为大宗。它有一部份是为了喂猪喂鸡等，大部份是为了换大米，供干部们分用。高粱是为了喂马和用高粱秆作为搭黄瓜、豆角和蕃茄架之用。小米（北方叫谷子）的主要用途是取草喂马。花生，我们在新年和春节时可以每人分到半斤左右（多半不是太饱满的），所有其余的那些，都是按户按人分配给干部用的。在 1957 年我们在监外种菜时，那时不是采用分配办法，干部们是到那里零买，用一斤也认真过秤付款。1959 年以后，就改为分配制了，是不是还付款，那就不得而知。关于菜蔬有时我们也分一些，不过都是干部拣好的分完，轮到我们也都是次等货色了。

我们种这些东西，除了高粱、小米、菠菜、芹菜等等，都是条播外，其它一概是“点”播。即是一个人在前头刨埯（即挖坑），第二个就按埯施肥，第三个人点种兼培土。全部春播虽然很紧张，但并不像其它工作那样劳累。唯独按块施肥，有谈一下的必要。前边已经交代过，粪是已经送到田里了。但那只是按照单位面积的需要，差不多等距地放些小堆堆。到施肥时再用土篮子到那里装许多，然后按埯施一些。我们在起初是用破塘瓷碗舀粪，一碗正好施一埯，既不脏，施量又准确。可是科长发现问题了。他过来接过去，用手抓粪往埯里施，大家都怔住了。心想：这种人粪尿，现在还有的很湿很粘，臭是不

必说，而它事实上已经成为荟集细菌的大本营，能用破碗舀又何必用手呢？科长带头示范以后，发表了一套理论：“万一你们将来有回到人民行列的那一天，如果施肥还得用碗来舀，农民一定要说：你们这群国民党人员没有真正改造好，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对于他这种说法，我当时很是不能理解，我觉得农民也不是不知道香臭，或者是为脏而脏的。能用不堪使用的破碗舀它，为何一定要用手呢？后来，有个特赦释放的“战犯”，落户在人民公社从事农业劳动，他“争”着专门搞大粪。社员们一致赞扬说：“共产党确实有办法，把国民党的高官，都能改造到这种程度！”我才有所领悟！原来是这么回事。

耕种完了，很快就进行插秧。这门劳动在前边已谈过，故不再述。与此同时，就开始进行锄地了。锄地对于我们来说，最初倒不怎么劳累的。在锄第一、第二两遍时，庄稼还长得不高，有时清风徐来还感到山野空气清新的舒畅滋味。虽然当头的太阳，透过暗色衣服，肌肤感到刺痛，但是习以为常，也就不像开始时那么难忍了。等到锄第三遍时，庄稼已经长得过人，进到地里又闷又热，浑身是汗，头晕脑胀！多数都是穿着短裤打着赤背干活，高粱和苞谷叶子上的毛刺，刺得身上一条条红道子。特别是这个地方到处是“刺刺（此处读‘拉’）秧子”，这种野生植物，长了许多长蔓，那上边全是毒刺，只要碰上就肿起红条子，刺痛几天不消。

在锄完第一遍地后，管理所又运到农多红砖园许，发动我们在原来那所小房后头的高山处坡上，平了一块地方，和小房成直角地又盖了五间房子。这个工程在当时的我们来说，并不算小，因为一砖一瓦都须用肩膀运上山坡去，而且所用大量的水，还得到半里之遥的小河边去汲取。木匠由杨丽天和邓君麟传授，有几个人很快也可以充数了。黄鹤把他从劳改队学来的

那点瓦匠扶术，零零碎碎地也教会了一些人。大家全体动手，很快就完成了。

开春以来，除了星期日和例假外，我们几乎全是劳动。学习又摆在次要的地位，有时只是“浮皮撩草”地学习座谈“人民日报”社论等等而已。因为大家心目中认为这种劳动乃是一种认罪的考验，同时也看到“释放”一时不可能，既可在劳动上求表现，又可免得成天伤脑筋搞思想斗争，所以每天都在紧张中。

我们每次上山劳动，基本上都是整队徒步来去。特别老弱的犯人只能就管理所的卡车取送东西的方便搭乘一下，所以每个人都要准备跑二十华里的路。这是一条一半以上是沿着山间溪道左右盘旋的崎岖便道，要过几次河，河里摆的踏脚石又是单行的，没过河以前要站在那里等一个一个过完了，然后又要快步追赶继续前进的队伍。特别是收工同来的路上，这样搞几次，非但呼呼气喘，而且弄得精疲力竭。尤其是下雨天，浑身淋水两脚泥，为了避雨，不是高速行进就是跑。这对于劳累了一整天的我们，简直是一种灾难。在山上劳动要出汗，跑路也要出汗，被雨一淋常常患感冒。因此，每次上山劳动，大家都要带一件棉袄，下雨时把它在身上一披，雨小可以根本不湿身，雨大就是湿透了，不致使冷雨直接和身体接触；并且，在山上吃完中饭把它往地上一铺，又可以躺在上边休息一下，享受一天最难得的幸福。所以同犯从经验中流传这样一句话“上山三宗宝，毛巾、食具、大棉袄。”因为成天满头大汗，不用毛巾揩的话，淌进眼睛去，会淹得眼睛睁不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用的碗筷，每次上山劳动都得用个裁破衣服所做的小布袋带了去，不然，在那里吃饭，就得用手抓，所以少不了。

战犯管理所院内，就总体计算，一共有七所房子。这些房

子之间都由安有玻璃窗的走廊相通。这是日本人的设计，大概是为了有人进出时，避免被人窥视的缘故。七八月间，管理所忽然派我们到浑河沿岸去搜罗大批鹅卵石，要把所与所、走廊与走廊之间有便门相通处，用它修成外部甬道。这项工程浩繁，先得把 1 米到 2 米宽的基土，垫得中间高，两边稍低些，然后用砖砌上边儿，再把土打实，才按照鹅卵石的形状颜色拼砌成各种花样，有的是龙飞凤舞，有的山水花卉，有的是各式图案，有的是喜庆字样（如“囍”字之类）。用各色各形的石头来“描龙画凤”，这群“战犯”的使用价值，确实很不低啊！整个工程总共计长近 1000 公尺，有的地段两旁还植了矮树墙。另外，还在适当处所修了两个喷水池，其中一个是日本战犯在大批释放前，为了招待从日本来此参观的家属而修建的，我们在四周又修上辐射形的一圈石子路，还摆起水泥制的休息凳，在喷射的水柱上又安上乒乓球，随水上下滚动。另外全是我们新修的，在水池正中，安了一个约有一丈高变压电厂不堪使用的电瓷塔，中间通上有节制的水管，水就像断线珍珠般从顶上一层一层流到水池里。因此我们就管它叫做“珍珠塔”。此外，在澡堂窗外一块空地上日本战犯曾修建一个养鱼池，环以假山石，各种各色的金鱼游来游去。满院花草，全监油漆一新，装扮得倒相当美观。它和这些铁栅监房，褴褛衣着，特别是我们抑郁悲酸的精神状貌，是完全不相称的。

我们在这一年的劳动，确实是够紧张的。为什么共产党还要调动如此重大的人力物力搞这个？我们当时也确实茫然不解。如果说：这是意在调剂我们的枯燥生活，我们成天困坐愁城，又哪里会生观花赏水的闲情逸致？而且共产党正在继续不断，步步加紧地给我们的精神和肉体施加惨重的折磨，怎能会动此正相矛盾的“美意”呢？我们虽然理解了共产党的一举一动，

都有它自己的用意和动机，但是究竟为什么？我们一时也确实无从估得透。

接着，不管我们在监所或是上山，都常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参观。特别是值班看守一指示我们要把号里内务、走廊、俱乐部、监里各处和院外道路车场都要认真整理或打扫时，不是有“高级首长”就是有外国贵宾来参观了。据我们间接得知：北平文艺协会负责人老舍就曾率家小特别来此参观，并和溥仪拍了许多照片。还有一次我们正在学习时，忽然来了一群参观的，在最前头的人约有五十来岁，身着军便服，还加着披风，满面红光，很是趾高气扬。从边跟着一群军、政模样的人，他们服装的精美华贵，我在大陆上，这是见到的唯一一次。他们刚从窗外过去，同犯中有个叫贺秋龟的就指走在前头的人说：“他是杨勇大将。”贺在被捕前，和杨曾有过接触，所以一见即知。杨还特意到监号和溥仪交谈一番。总之凡是到此参观的，总把注意力故在溥仪身上。就是不交谈，也要在他的窗前、门口、放慢脚步，多往里望几眼。管理所的干部也低声耳语地告诉他们：在哪个铺位的就是溥仪。

等到这一年冬初，宣布“特赦”溥仪等人时，到管理所的人就更多了。北平还派来新闻纪录影片摄制的人马，把监内一些像样子的角落都一个不漏地摄入镜头，我们前后一连串才得到启示，觉得把管理所搞得如此漂亮，原来都是为举行特赦做布置，让大陆内外知道，共产党是如此优待“战犯”的。当然，这只是我们的领会，是否符合实际，我想读者们，也可“思而有得”吧！

秋收之前，有个科长召集我们到大厨房前面一个空场上集合，场中一张桌上放着一个尚未装配的小型电动机。科长向我们介绍：这是伪满队的几个“战犯”初步试制尚未完成的 1.7

瓦特小型电动机。这种东西，社会上现在非常需要。“你们经过交罪运动，觉悟都有很大的提高，对于这种需要，一定完全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管理所可以为你们筹划一笔费金，先建立一个小型工厂，试制一下看看。如果一年能制 2000 多台，这贡献也是不小的。大家愿意不？”大家理所当然地高高举手。又问：“有决心吗？”“有！”

共产党的饭绝不是那么容易吃的，我们在农业和其它方面的劳动，本已是很繁忙很劳累，但他们要把我们这 300 多架老骨头，做到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发挥最高的使用价值，所以又打主意，给我们背上工业生产的大包袱。

那个科长在发动了这个运动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叫我们把大厨房隔壁的水泵房的一些原有笨重设备搬出来，进行车床、刨床、钻床等机器的安装。在此同时，又把一、二所辟为作业室。在一所的靠边门的一个号子里安上了剪机，把矽钢片（即硅钢片）按电动机功能大小的尺寸剪成大长条，再由大冲床冲成圆块，再送小冲床在上面冲上小孔，然后一片片把小孔对正重叠到一定尺寸，压紧固定后，就从这道贯通的小孔下线成为“定子”，最后加上“转子”和装上外壳，就成了电动机。这种外壳都是生铁铸造的，第一年都是由外厂定做的。

厂房的建设和机器的安装，都是最费体力的劳动，当然都是由我们包办。只是由北院（抚顺监狱）请来一名钳工师傅和一名车工师傅做技术指导而已。关于下线技术和电机功能试验等项，另由大石桥请来一个师傅指导。在大陆上，“师傅”即是熟练工人的称谓。

由于管理所早已有了充分准备，机器、设备、器材都已按时涌到，在发动我们大打“人民战争”（即全体出动）之下，基础工程很快就完成了。管理所对于我们这群“战犯”的估计，

确实是够得上准确的。像是对于这种我们过去毫不熟悉的工程和技术，前前后后总共不到两个月，就几乎都能操作，开始试着生产了。工人师傅也说："我们过去，都要学徒三年，你们五六十天就成功了！"这些人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如果过去也能这样肯用，革命事业一定是战必胜、攻必成的。

我们开始，只生产 1.7 瓦特的电动机，以后就进为 2.8 和 4.5。分上下午两班劳动，最高量每月可达四五百台。据估计：2.8 电动机至少可卖四五百元一台。只此一项，每月即可生产 20 万元的财富，我们都是无偿劳动，利润当然是很可观的了。其销路南至两广，北达新疆、内蒙古；都是由共产党中央主管部门按用户的申报而统筹配销的。

除此以外，我们还把矽钢片做电动机所剪下的边边角角，再上剪板机切成小条条，用来做自偶式小型变压器，这种变压器，虽然笨重而又不美观，但因它在 220 和 110 伏特上可以交相使用，所以当时在社会上是很需急需的，它卖七八十元一个，还供不应求。上、下午两班劳动（一般学习也改为上、下午两班），一天可生产 30 台左右。我在这个工厂里，是干卷线工。我这一班是和胡毓英在一起，我卷出的线圈，由他用白布带子加上绝缘纸包紧。另一班是孟昭楹和另一名同犯一起。

胡敏英是云南人，很有"儒雅"之风，他是 1946（或者是 47）年当副师长时在河北省清风店被俘的。那时他还是相当年轻英俊，30 年来的囚禁生活，已被折磨成鸡皮鹤发双目失明的糟老头。到 1975 年被"释放"时，被人搀扶着都已迈不了步了。他和杨文琼是我们这些人里被拘押最久的两个人。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忽然得了下肢瘫痪的病症，后来转为痴呆。既不知饥饱，又语言不清，成天往裤子里排泄，他本是爱清洁的漂亮人物，到此时搞得臭气熏天，狼狈不堪，简直不成

个人样子。在全体被“释放”的前一年，就是那样肮肮脏脏地死在看守所。听说他临死时还模糊不清地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后来，我们又改做小型电流互感器和穿心式电流互感器。前者共计制造 3000 多台，每台卖四五十元，后者共制 1500 百台，每台可卖 60 元。

从大石桥请来的师傅，还比较内行。但是不久就又调回去了。接替的师傅本是在变电所工作过的外工，对于电动机和变压器等等制造的技术是门外汉。他只是拿来个样品，就叫我们分解开，照样子做。这真伤透了脑筋。例如穿心式互感器的四个线圈要一条线到头还得联在一起，他既不给安装卷制机具，又不能指出操作技术。反正叫你做你就得做。有个同犯说：“师傅与犯人的关系，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只有绝对服从，毫无道理可讲！”对于我们来说，确是如此！倘然对师傅的话，稍露一点不遂意，不但要受到干部的严厉批评，而且要交给小组进行斗争批判。最后还要在师傅面前必恭必敬地双脚靠拢，规规矩矩立正站着进行检讨和听候训示。是的，当了阶下囚的战犯，见着任何人都得低头认罪，老老实实。我们走在路上，常有小孩子指看鼻子骂我们，并且用砖瓦石块打我们，我们都得“和颜悦色”地甘而受之。

师傅既然交下这种线圈，是要穿在构成正四方形的四个铁芯上边，不用说制造，我过去连看都没有看过。它用的是什么样的机具？这四个相连而又个别分开的线圈又是怎样卷成的？逼得我不能不大动和大伤脑筋了。坐卧不安地想了几天，还真的有了门道，如是自己设计了一套机具，又自己做成一套卷线模子，一经试制，果然成功！师傅也拿着向外人讲：“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个“我们”二字，究竟指的是师傅们，还是指的犯人们？那就不得而知了。

电动机制造除了机器加工以外，重要环节是在下线。师傅不懂又要犯人做，这个难题可也真不小，怎么办呢？下线组组长许权这就逼得团团转了。所幸管理所发现了这个问题，给我们买了一些关于制造电动机的书。许权从头开始研究，所有关于下线操作、如何绝缘、浇漆、干燥、装配、接线、试验等问题，都从自学自作中得到解决。电动机就大批生产了。不但如此，嗣后外边分送来许多坏了的电动机，师傅找不出毛病所在，只要许权一着手，立刻就找出毛病在啥地方，马上给修理好，运转如常。师傅也不得不说："许权将来有那么一天，满可以当个很像样的技术员！"

从电动机制造情况来说，共产党只是购置机器设备和原料，然后就伸手向我们这群"战犯"要电动机了。终身劳累为赎罪，榨尽脑汁为立功。也就是体力不花钱，脑力是他的！我们就是在"加速改造"，"努力争取"的幻觉下，无休止地苦干了这么多年。

这个许权，他既是学习组长，又是下线组组长，其改造表现确实够得上"不错"了，可是他刑满多年还是不放。当年到达"战犯"管理所时，还是一个很潇洒的人物，要说能说，要写能写，要干还是肯卖力。他本有疝气的病症，但在重劳动上，向来都是"顶烟上"，疝气下来，就用手顶上去，不叫一声苦。到 1975 年 3 月随着全体被"释放"时，已经变得满面皱纹了。他当年在湖南曾当过酆悌的参谋长，因此都说他一定是"长沙大火"的主谋，他又张口结舌说不出所以，为此他也伤透了脑筋。他在牢中，家庭生活很艰难。后来，她老婆（不，共产党随着毛泽东喊江青，叫"爱人"）听说他在管理所做了生产组长，以为他一定有工资可拿，如是就三番两次来信催他向家里寄钱。为此，他还受过多次的批评："你为什么要啊'烧

包’（既好像包袱里有好东西起火烧了似地，要赶快亮出的意思），告诉家里这个？”弄得他哭笑不得。

秋收，在一年的农业劳动中，是最忙最累的季节。这一年和次年种地最多，200 多亩的庄稼，把它割倒，虽然还不算太繁重，但是由于我们许多人都是生手，在割地时，不是有些人砍破了腿，就是割破了手，鲜血淋漓，还要“坚持不下火线”。特别是往回扛庄稼，在我坐牢 25 年中，可算是最为劳累的工作。山高、坡陡、路远、不是荒径，就是羊肠小道，凡是有登山经验的人，遇着这种情况就知道下山比上山还艰难，我们在上山的过程中，体力本已消耗殆尽，下山时又加上百十斤的重载，我在那时期是中上体力，走不了多远，两腿就开始打战，倘然一个脚步不稳，溜下去就有生命危险。特别是扛小米，苞谷秆和高粱秆，先要把它们搭成“人”型，捆紧，然后把它们立起来，低下身子用脑袋钻进交叉处，使尽全身力气硬挺起来才能开步走。这种扛法，既是头重脚轻，而且前面只露出很窄的一条视线。偏偏这条视线又常被秆上的叶子挡得模糊不清（这种叶子还常常刺眼睛），任何人都是晕头转向。并且不定向的山风，有时从后边吹来，就像有人推你一下，一个控制不住，就要栽下崖去。有时又从正面吹来，那个正冲前方的“人”字口，被风吹得一转，人也就变成陀螺柱了，说不定转出什么结果来。这种山径，有的地方被水冲成低洼一线，有的地方又被树枝封锁，真是步步艰难，步步障碍，步步有意外，步步有危险。汗流浃背，头昏眼花。身上的重载本已压得难挨，而许多突如其来的困扰，更使得精神陷入极度的紧张。但为了表示认罪，为了怕自己落后，总是坚持再坚持、克服再克服地干下去，咬紧牙关，到达目的地时，全身已筋疲力尽了！这样干了一天，等到晚上收工回管理所的时候，两条腿真是软弱无力，不能抬

得动了。可是又不能不走。

因为我们所扛的东西把视线常给挡住，分不清路径，所以有的人就迷失方向走上相反的路。等到发现自己走错了路，已经走离现场几十里，快到抚顺市郊区的戈布街了。他很怕被弄成“私自逃狱”的罪名，遭受重惩，赶紧央求老百姓指点道路，两步变成一步地气喘呼呼地跑回来！要不是他先向干部报告，谁也不知他是走掉了呢？

在此，读者可能发生这样一个疑问：“难道你们在监外劳动，就没有干部监视你们吗？”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答复是：“基本上是的。”我在此所以用“基本上”三个字，就是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军管”时期最严厉阶段外，在劳动时就只有一两名干部（一般是看守班长）主管带班。在出工收工时清点人数和分配劳动任务而已。在春耕、夏锄和秋收的大忙季节，虽有一些干部参加，但是一到现场，他们就忙他们自己的工作，根本不管我们。带班的班长是不参加现场劳动的，不是找个地方坐下聊聊天，就是索性打起瞌睡来。这时的山上农园，大致是一个圆形。按直径算，约有三里多路，按圆周算也有十来里路。不是庄稼就是树木；而且是山区地带，要走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跑得无影无踪，不到清点人数，几小时之内不会被发觉的。在此，不明大陆情形的读者可能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跑，让他们拘押了 25 年呢？”我在此要爽快地告诉关心我们的读者：“我们是绝对不能跑的！如果真地跑开，便是自己走上了死路一条！”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下三点，就是我这种说法的根据：第一、我们穿的既是“与众不同”的黑衣服，而且又是这么残破，到任何地方，都会被人发觉我们“来历可疑”，马上遭到拘捕。第二、就假如这一关被你蒙骗过去了。但是你逃跑之后，总得

找个安身的地方。不论你是投亲还是靠友，他们在多年遭受惨痛经验的警觉下，为了自身的安全，客气点儿就是秘密报请主管机关，把你“捉将去”。如果他们要表现自己的“立场”或“积极性”，就索性在你一露头时就立刻把你捉起来送官法办。就是至亲好友，也万万不能保险的！据我所知，因为一个农民曾藏匿一个“要犯”，被共产党发现后，抓去被枪决，而那个“要犯”直到 1975 年我们被全体“释放”时，依然还活看。像这样的教训，一般人民当然比我知道的更多更深，他们绝对不敢再冒昧包庇你的。第三、任何人不能不吃饭就可活下去。在大陆上，你如果没有官发的粮票；过不了几天，你若不肯再返回管理所自首，就得干脆下狠心自甘饿死。这种粮票，你没有户籍就根本领不到，而且它又分为“地方通用”和“全国通用”两种；前者只能在县、市、或省的范围内使用（即是买粮或者在饭馆吃东西），后者必须申明必要的充分理由，才能按照往返的期限发给你（可能是用普通票顶换，详情还不知道）。我的天！你是一个逃犯，到那里取得这种粮票？更何况，住店要证明，身边又没钱。你要逃跑，那不是自寻死路吗？作为“战犯”的我们，凭着多年积累的常识，谁都能有这点儿认识。如果没有取得“政府的保票”（即“释放证”），就是再艰苦，谁也不能走开，也不敢走开。管理所当然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所以他们是“高枕无忧”的。偌大的管理所，连工人师傅在一起，共有六七十个干部，除了办公室前门那名卫兵有武器外，不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放心程度，一直到最后全体“释放”，在管理所整整 20 年的过程，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其实，整个大陆，又何尝不是如此？

山上农园忙完了，就赶紧抢收几块地的水稻和秋菜。这一年，我们的劳动是极其繁重的；而其强度，比起劳改队来，却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仅要搞农业，并且还要搞工业。成天两头忙，真是疲惫不堪！我所以把这一章称自己为“阶下囚”，这就是主要的标志。可是，这只算开始，更多的劳动，还在后头呢！

以上所述，只是就我们辽宁队，以及北平队、南京队、武汉队四个队为主。这四个队，此时实际上已经混为一体了。日本队的劳动情况，也曾大致说明。只剩下伪满队，尚付阙如，现在补述一下。

关于伙食待遇，伪满队由于溥仪的关系而显出特殊；在劳动方面，管理所也是从溥仪身上出发作考虑的基础的。伪满队虽然也有些老头子，如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已经老得口腔肌肉失灵，成天老把舌头吐来吐去，齐知政老得两目几乎全然失明，这两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此外如八十来岁的吉兴，后来还能争取参加厨房做补助劳动，七十多岁的王之佑也还能参加豆腐房的工作。其他人，一般年龄都和我不相上下，参加重些的劳动，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共产党对于承认自己是人间“大废物”的溥仪，可能不愿让他去参加较重的劳动，但又不肯显出特殊的痕迹，所以伪满队都是安排些可有可无的清闲劳动。

从 1957 年春开始，我们就到管理所后门外的菜园去劳动，但见不到伪满队，后来在进出后门的时候，才发现伪满队这一群人包括溥仪在内，原来是跑到锅炉房后边那个大煤渣堆拣煤核。那里是一个一般人不常到的僻静之所，要不是我们到菜园来去都要从那里经过，我们还不容易发现的。锅炉房烧的煤，虽然有些没有燃烧完的煤核，但把它拣出来再烧，发热量当然远不及好煤那么高了。一般说来，只能烧饭用。据说管理所是出于节约的理由，所以派一些犯人去拣煤核。因为那个地方四

面都不透风，烈日当空，他们都穿短裤打赤膊在那里干。据说：他们 20 来个人拣了一夏，也不过拣出五六卡车的体积（指煤渣）。溥仪很瘦，背也显得有些驼，细细的两只腿，他很爱打赤膊，把衣服往肩膀上一搭，晒得黑黑的，破帽子一戴，真是个典型的肺痨第三期的病夫，若不是有历史事实为证，他在大街上走过，谁也看不出他周身哪点儿会有当过“三朝皇帝”的征象。他又是个近视眼，有一次在大厕所里，不知怎地把眼镜掉在厕所里了，那是当年德国蔡斯公司专给他配的，他很是着急。但是怎么捞也捞不着，后来管理所给他配了一付。

我们第一次看见溥仪劳动，是 1957 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早晨，他同另外一个人，抬着他们号子里的马桶，向他们门外的小“马葫芦”里倒。看样子，他虽然没有像古时勾践为夫差尝粪说成是甜的，但他也没有嫌脏怕臭的表现，并且很踏实地用水把里里外外冲刷得很干净。

他才到管理所进出监号时，非等着有人给他开门，他还不迈步呢！正好管理所派他当年的“御前侍从”做他的学习组长，对他提出“帮助”，大意是：“今天不是你当皇帝的时峡，还摆那个臭架子。你现在是汉奸卖国贼，应当老老实实遵守监规，别人不但自己给自己服务，而且还一体负担各种应尽的一份勤务，你为什么还要别人给你开门？”他还算是很“识相”，从此以后就不再等别人给他开门了。但除了逼不得已时，他还是尽量避免进出。一定要自己开门时，他用手帕先把“门把手”包起来再开。他的理由是：那个东西老是有人抓来抓去，怕别人的毒菌传染了他。当然，他又受到一阵无情的批评。这“毛病”也乖乖地很快改掉了。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仓惶逃走，把他的皇后（后来死在吉林）和从北平带到长春的一些可称为

国宝的古物抛弃了。只用几只长袜筒子装了一些珍宝，缠在腰里，并带着溥杰和一名妃子，登上日本飞机打算逃往日本。途中曾在吉林的通化停了一下，再上飞机时，把这个妃子也丢掉了（后来她仍回到长春）。飞机飞了一阵子又停下来，溥仪等一下飞机，就被苏联军队逮浦。原来，苏军当局命令日本关东军必须交出溥仪，日军遵守命令，这架飞机就中途改航，按照苏军的指定，降落在沈阳了。

不是 1956 年，就是 1957 年，共产党出于政治的理由，把溥仪的那名妃子千查万访地找到了。并接到管理所和溥仪相见，不能不说是溥仪一生中的又一奇遇。

溥仪的这个妃子，原来曾由日本人在全伪满各学校的女生中进行遴选，从旅顺、大连到黑龙江，选来选去，最后在长春某校选定一名女生，据说最是娇美动人，因为她家是开豆腐房的，一般人就称她为“豆腐西施”。

当中共把她找到送来与溥仪会晤，据中共的一名采访记者说：她长得“很甜”。共产党破例为他们布置了一处“新房”，秘密地使他们再一次“合巹”。但是三天后，妃子返回长春，通过法律手续，和溥仪正式离婚了。

从 1959 年开始，溥仪就同罗振邦等三四名伪满战犯转到医务室，作中医、针灸和护理等见习。据说：他很得医生和干部们的赞许。曾拜日本特务头子做干老子，后来在平、津一带横行无忌的川岛芳子（汉名金璧辉，日本投降后被枪决）的蒙古前夫甘诸尔扎布，专门在养金鱼。川岛芳子的胞兄宪钩（满族名字）和溥仪的弟弟溥杰等，做修整俱乐部后门外草坪的工作，另外还有几个人养马，培育蘑菇和做豆腐。

豆腐这种食品，所有中国人几乎都很爱吃的（现在全此界各地都已有人喜爱它），我从小就对它有偏爱，够得上“百吃不

厌”，现在虽已年老，一餐吃上两三块，也是平常的事，过去，则更不用说了。我的家乡（东北）所产的黄豆更是驰名中外，做出来的豆腐又嫩又香，我一闻着就垂涎欲滴。记得当年我从长春监狱解到劳改队的时候，看到为犯人所设的“小卖店”有豆腐出卖，立刻尽囊中所有，买了四块，狼吞虎咽地一下子吃得精光。后来被解到管理所以后，头一两次还感不到什么两样，再继续吃下去，既感到它不香又不嫩，甚至好像是种份状东西压在一起的，吃起来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快之感，这时我还以为可能是技术不高明的关系。可是在去山上农园的路上，看到一般人所买的豆腐，从颜色质量来看，还不如我们吃的，我很是不解。等到管理所自己做豆腐，我才知道：东北所产的大豆，都尽量供应出口，而且整个大陆都闹食用油脂的饥荒，做豆腐一概都用榨过油的豆饼（以前用做饲料或肥料）来加工，所以很不好吃。东北是产黄豆的著名之区，人民连一块真料的豆腐都吃不到。一直到我 1975 年 3 月 19 日被“释放”，20 年来的情况都是如此。至于关内和南方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1959 年夏天，不知由什么地方，传出溥仪向共产党献出珍宝的秘闻，后来证明属实，前面提过：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在沈阳被逮浦后，就被苏军解往苏联，那时他和苏军在长春所逮捕的伪满其他高级人员押在一个地方。当然，溥仪和溥杰是单有一个小范围。这时，他们对于随身所携带的那些珍宝，就动起盘算来了，左思量右考虑，总怕不安全，万一露了马脚，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一定会被搜走；那么，不论当时或未来，都将有些不测的问题要发生。而且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批财产，他们认为这与他们当时的生命和以后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不知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都是在如何隐藏这批宝物上转念头。嗣后，不知溥杰从什么地方发现一只

箱子，两人再三研究，就决定给箱子安个夹底，把珍宝藏在里边。也许是受体积容量的限制，装不了那许多吧？他们就把这些珍宝排队，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把最精最好和他们最爱的装进夹底（据说是四十几件），其它一些他们还是怕苏军发现，就由溥杰上房一股脑儿丢进烟囱里了。

当 1950 年，苏联把他们解归中共路经满洲里踏上国土时，他自己认为是被当作第一号汉奸卖国贼而被处死的末日终于临头了。

所以他那时还有意让随侍在他身边的一个堂侄，作为他的继承人（后来未实行）。在一有老百姓的地方，他总是低头掩面，很怕被人发现，致被激愤的人群一哄而上，即或不是把他当场打死，也要振臂高呼把他即速“镇压”（这在大陆是“处死”的意思）。他虽是如此恐惧和悲观，但他对于那只“百宝箱”，仍然死守不放。1950 年因韩战吃紧，他一度由抚顺再转哈尔滨，而后又返抚顺，七八年来，他对百宝箱一直秘而不宣。

这件事情，他的那个年轻的堂侄当然是了解的。他的这个侄子的思想，不久被“打通”，就由试探而转为正式的劝导把这些东西献出去。可是他还是舍不得，又经过一番周折，溥仪只肯把乾隆遗传下来的一块田黄石图章献出来。共产党马上给以表扬和鼓励。与此同时，他的侄子，就把全盘底细向管理所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他并表示：如果溥仪再要顽固不放，他就出面正式揭发，可是那个“脾气不好”的所长，经过研究和再请示之后的表示是：“思想的进步有快有慢，不是一下子就可打通的。你也不要性急，要以与人为善的态度，慢慢地帮助他。这个主动权还是应该给溥仪，等他思想搞通了。自动献出来，那对于他的改造才是更有好处的……”（根据干部报告，我所回忆起的大意）。回过头来，那个侄子又如此这般地进行和风细雨的

帮助，溥仪终于把“百宝箱”打开，全部献出了。

从接那名妃子相会，到这个“百宝箱”的处理，可见共产党对溥仪真是费尽了苦心。溥仪本已是“笼中鸟”，而他那只箱子的全部情况，又都落入共产党的掌握中，反正跑不掉、飞不了，问题只是如何处理。

毛泽东在某一场合和溥仪的叔父（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载涛见面时曾说：“溥仪改造得很好，你可以去看看他嘛！”载涛马上就欢喜若狂地到抚顺会见溥仪，并把这种情况传达，把这种情况和“第一次特赦”就有溥仪这一事实结合起来看，溥仪的“特赦”早已是“通天内定”的了。所以这批珍宝的如何处理，共产党也是“极具匠心”的。这一年末，溥仪被“特赦”，共产党还把一只在溥仪看来，是极有“纪念”价值的怀表发还给他。这只表是当年冯玉祥“逼宫”时，溥仪逃往日本公使馆路过东交民巷在一家“洋行”买的。如今这只表，就有了双重的“纪念”价值了。对于过去来说，它是纪念“落难”，对于今后来说，它又“纪念”共产党，毛泽东给他的“新生”，一物代表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共产党办事，真是多么细致、周到、恰当而又触及你的灵魂啊！你看看：溥仪为了纪念这次“新生”，马上就写出对共产党、毛泽东“感恩戴德”为主题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在国内外吸引了不少的读者，起了不小的作用，可见共产党的用心，又是多么合乎“经济学”的原则！

溥仪被“特赦”不久，管理所曾把许多用锦缎做得极其精致的小盒子，送交学委会保管。从那里面各种安放东西的孔型来看，我的常识告诉我：在“特赦”溥仪时（或者前后），把他所献出的这些珍宝，还做过现场实物展览呢！而后把那些盒子丢开，当然实物在展览之后，全部上缴北平喽！

1959 年，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那种阶下囚的劳动模式，基本上是定型了。因为我们的年龄是一年一年老迈，体力也一年一年衰退，病的死的也一年一年增多。再加上总共六次的“特赦”，剩下能劳动的人，也一年一年在减少。但是，我们的劳动强度和项目，却是一年一年在增加！

第二部分

第十八章　第一次“特赦”

1959 年秋收之前，管理所有计划地布置一个“学习汇报会”，发言的人都是早经指定并都要按所写的稿子来宣读。

我们初到管理所时，在大会发言的人多半都是由“举手争取”而被临时公开指定的。后来，管理所发现这种发言常常不合他们的要求和方向，如是就改为事先布置，非公开指定某某犯先行起稿计并经管理所核准，然后在大会上“照本宣科”，如果发言者临时附加说明，干部就要以“提醒”的方式使他立刻转入“轨道”。但是到开大会时——特别是当有外人参加时，他们还要告诉：“大家都要举手争取发言”。所以“开会如仪”进行到犯人发言时，“呼”地一下子全体举手。那时，他们就指定准备好的人，走向台下的“麦克风”，高声朗诵起来。这对于我们说来，也有一个好处。因为不论开什么会，向例都不是公开预先宣布的。若是像先前那样临时召集，被指到头上的人，常有临事仓促“不知所云”或是“思想抵触”根本不想发言的。像现在这么搞，在管理所既可保证“定向航进”，上述这类犯人又可免得忐忑不安，所以是“各得其所”。

这次大会上，被指定发言的有：日本战犯古海忠之、伪满战犯溥仪。这次大会，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发言者不是在台下，而是在台上。干部也都坐在我们的后头，好像是旁听的样子。我结合当时和后来的发展情况，觉得这次大会

完全是为溥仪的“特赦”所作的“前奏”；让他亮亮“改造成就”，免得“战犯”们对于“特赦”他，发生什么不“正确”的想法。换言之：就是给溥仪的特赦“开路”。其他发言人只是“配角”。

溥仪发言的第一句是：“前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发言”，（他发言稿就是这样写的，古海忠之也是与此类同）。溥仪发言比较从容，讲起来也不像是照稿念的，虽然有时把稿本放下，临时附加一些说明，但干部没有干涉他。

他是从“三岁登极”开始。他说：他的爸爸见着他都得跪地叩头（事实上总是回避见面），所以他自幼就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思想基础。后来，虽然逊位了，但是根据和中华民国所签定的“协议”，他在紫禁城之内，仍可以用“大清历”——“宣统年号”，仍然可以“称孤道寡”，仍然可以举行例行“庆典”。那时候的“御膳房”还有 200 多个“御厨”为他做“御宴”。对此，他虽然自承是“人间的大废物”，但他的顽固性却因之更加深更加固了。

关于“张勋复辟”，虽然在超越紫禁城的范围，当了几天过眼烟云的“皇帝”，但他对于恢复“祖业”的念头，却是勃然兴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用一语双关的口气说：在北京城居然出现紫禁城和中南海的中华民国两个政府，只有在当时中国才有这种怪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可怪，究竟是应该赶他出紫禁城，还是取消中华民国政府，他都含糊其词。

溥仪对于冯玉祥把他赶出紫禁城一事，只是在话里话外显出一种不平之气。当然，他如果说得太明显了，他是知道在此时此地那意味着什么？

后来，他逃到天津日租界，他没有一天不在做“恢复祖业”的“美梦”。这中间，他虽然受过政客小丑的骗，但他仍然是

执迷不悟，一意伺机而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就歇斯地里地妄想取法“晋朝重耳”的故事，跃跃欲试了。所以从他的发言里，也听得出他是主动地去干那种汉奸卖国贼的勾当。他只是跟日本特务机关发生一些接触，什么条件和未来的具体内容都不曾谈及，就夤夜之间，上了日本所特备的“贼船”，闯过当时国军所设的海河卡哨，到海口上了日本兵舰偷渡到大连，不久就到长春当了大汉奸伪满傀儡皇帝。

然而他把这次出走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的临时动机：第一，他说他当时曾接到一些恫吓信和爆炸物，甚至他常去消遣的一家洋饭店的茶房，都向他摆出极其恐怖性的诡密姿态，当然，这一切都是日本特务所设的诡计，所以他被逼不得不上“梁山”；第二，他说郑孝胥一心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搬出来，自己好当汉奸头子，所以他在百般劝诱之下上了当，因而他到大连以后恨死了郑；第三，因为西太后等坟墓被盗，他向国民政府呼吁也无从制止；所以他就以此做为报复。这是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卖祖国当汉奸，仅能找到的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借口，他仍无法否认他一心想要再作“大清皇帝”乃是他的主要思想。

根据当年曾参与接运溥仪从天津出走的日本战犯在战犯管理所揭露的材料，溥仪那夜在天津所上的日本快艇，在底舱曾预先装满了炸药。如果中途遭到拦截或者出了什么意外，护送的日军就要引爆，全船毁灭，以免被人发觉秘密。这也可见日寇当时积虑的一般了。

溥仪到长春后，在“国号”和“祭天”的问题上，又进一步尝到苦头。在溥仪的妄想中，国号最好是用“大清”或者“后清”，可是日本有他自己的打算，坚决加以拒绝，溥仪虽然

不能如愿，但已完全处身日本魔掌之内，怕搞僵了，下场颇堪忧虑；所以也就半推半就地只好搞个伪满洲国了。在溥仪的想法，“皇帝”是“天”之“子”，若不祭“天”，就不能算做真“皇帝”，同时也意味着他已不是在继承清朝的传统，所以他很坚持。这在日本帝国主义看来，是“无关宏旨”的，也就不再争执。但是长春没有天坛，溥仪就临时搞个什么地方，又从老一辈的哪个妃子，搞来一套清朝皇帝的礼服，就“沐猴而冠”地演了一场滑稽戏，就算他“即天子位”了。

溥仪从这里开始；口气与以前有所不同。他“即位”后第一个“诏书”，就是在强调“日满亲善”的饰词下，奴颜婢膝地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的主宰地位。从此日寇把他置于日本关东军的监管之下，并把这个“诏书”编入课本，叫人人都能背诵，而且在某些正式场合，一开始就宣读一遍。谁要是对日寇稍有不驯，那就是违背“诏书”，那就是“大逆不道”。日寇在东北所进行的任何无法无天的罪行，都可以假此理由加以任何凌辱或屠戮！这个大汉奸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和灾祸，真是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蔽其辜！所以他被苏联解给中共路过满洲里时，怕被中国人民发现一窝蜂上来把他砸成肉酱，吓得浑身发抖而不敢抬头露面，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从这个“诏书”认识到他的利用价值，如是通令全东北，不论大小机关，必须在重要厅堂设个“御座”，并在高处供起他的“御照”来。如果有任何警报发生，当时首脑的第一任务，必须诚惶诚恐地高捧这张“御照”先护送到安全地方，然后才能处理其它事项。如果“御照”发生问题，那是要罪加一等的。日寇在我东北要假溥仪之名横行，所以在表面上尽力要把他“神圣化”。可是在“皇宫”之内却把他看得严严的。甚至派了个日本人，在“办公室”门上给安个“××

挂”（两字笔者已经忘记）的日本名称；住在“宫中”中当溥仪的“太上皇”；如果溥仪不照他的意思行事，他会当面训斥一番。据说：他还揍过溥仪的嘴巴，其威风之大，看管之严，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溥仪要想对外接触，如果不经他“批准”那比登天还难。所以溥仪在发言报告时一提到他，就恨得咬牙切齿，顿时就闹起情绪来。尤其对于“×× 挂”这个职名，他也不知那是什么意思，而这个日本家伙是谁派来的，是怎么进驻“皇宫”的，他都完全不知其所以。

溥仪自作孽，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并明目张胆向中国内地进行疯狂侵略之际，他又颁发“诏书”，对日寇大祝其“捷”，大助其“威”！妄想就此机会随日寇进关，好再钻进北平紫禁城，登上三大殿，重温“中国皇帝”的旧梦。至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在他脑子里当然是没有任何考虑的。可是这种进一步甘做傀儡儿皇帝的痴心妄想，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让他达到，而且日本关东军对他看得更紧了，如是他心生一计。

他以为日本军人都是崇拜日本天皇的，如果他能和日本皇室拉上关系，日本关东军就一定会另眼相看了。而日本为了在世界上造成不是并吞中国东北，而是把伪满洲国以“兄弟”盟邦相待，所以在溥仪访日时，日皇裕仁亲自出马，以“国礼”相待。溥仪不但拜裕仁的母亲做干娘，并且“奉迎”日本天照大神神位，在长春南湖建庙“供奉”。他以为把狗肉向羊身上一贴，他就成了日本金銮殿上所长出的“狗尿苔”（一种最不像样子的蘑菇），日本关东军，就会对他优礼相加了。正如他自己在发言中所说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如他所想的那么天真”。他回到伪满不久，他的“皇宫”中某个房间的门上，就挂起前文所提到的“×× 挂”的牌子来。

当年若不是溥仪甘投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日本在我东北的政治措施，就绝不会那样随心所欲。如果它不能很快在东北扎下根，它也绝不敢再肆无忌惮地发动“七七”事变。由此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横加的灾难，用共产党的话说：溥仪的罪行实在是滔天的，并且他不是被迫或者受骗，而是在“恢复祖业”，再骑在中国人民头上过“皇帝”瘾的图谋下，不惜出卖国家民族，摇着尾巴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儿皇帝，在人类历史上像这样的大卖国贼，真是不多见的！想想在日帝铁蹄践踏下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相想在日本军队刺刀下牺牲的千百万中国同胞，溥仪被送上断头台，是一千个应该，一万个应该的！他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人间大废物”，而是事敌卖国的大祸首和罪魁。可是这一点，在他的发言中只用极其抽象的“罪大恶极”一笔带过，他的悔恨之心；还是一点不深入的。

我们听来，好像他是为他过去在“诉苦”。他发言的第一句，我觉得就有问题。他既不用“伪满战犯溥仪发言”，也不用“战犯溥仪发言”，而偏偏要用“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发言”，这不是他对于“战犯”二字的理解不俗，或是出于一时的疏忽。而是意味着他不承认是战犯，又意味他仍然要摆“皇帝”的架子。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来说，真正够上战犯资格的，溥仪倒是第一个。他连这两个字都不肯给自己戴上，他灵魂深处的东西，就可想而知了！可是毛泽东早在接见溥织叔叔载涛时，就肯定了：溥仪的改造是很有成绩的。

1959 年 10 月 1 日，是共产党在大陆成立政权第十周年“纪念日”，除了各机关门前和交通要衢，大搭彩牌楼外，所有路面上的建筑物也都粉刷一新。管理所的干部也向我们动员：这是十周年的“大庆”，管理所也要大大庆祝一番。除了以前曾经提到的，全所油漆一新和铺设甬路之外，我们又从各个角落

进行突击打扫，和准备各种“庆祝”节目，不过这一年的“十一”却发生了一件新鲜而不平常的事。

回想起来，大概就在九月末尾的一天早晨，管理所忽然叫我们到俱乐部集合，说是有重要的新闻，要我们往意收听，并作好笔记，准备进行座谈。我们当时从干部们的神情上和气氛上，虽然觉得一定是重要消息，但究竟是什么消息，都无从猜测。等“东方红”的曲调奏过，第一条消息就是：毛泽东向“人大常务委员会”建议，要对在押的国民党、伪满和蒙疆的战犯举行特赦。他的全文大意是：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通过共产党的改造政策，不少战犯都“确已改恶从善”，所以他建议应该举行特赦。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大消息，大家立刻就活跃起来。每个人的心灵都立刻飞越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下边的其他消息，谁又有心去听呢？

在进行座谈时，大家的心情都无法平静下来，那种高兴的程度，只有抗战胜利的喜讯，才能与此相比拟。毛泽东既说：不少战犯都确已“改恶从善”，那么这次释放当然也几乎人人有份了。我当时的感想是：1956 年，若不是右振闹事，我们怎会坐三年多冤枉牢！这回可真正有希望了！

今天，右派闹事的风波，既然平息了，毛泽东按“既定方针”来个大释放，是可能的。虽然 1956 年 1 月在参观中见到街上横扯的大标语（热烈欢迎和平解放台湾）时所产生的那种“拿我们做政治筹码”的看法，仍然清晰地存在着，但谁能在发现有可能要离开永远是苦度光阴的监牢而不欢天喜地呢？

我在前文所以提出“既定方针”这个字眼，不是我的主观臆断，而是根据 1958 年夏天，曾由北平德胜门外监狱（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都集中在这里，后来，秦城监狱修好，他们才被转解到那里）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十来名犯人说：

张治中和一些“民主人士”，曾到监狱访过他们，张并以负责的口气向他们转达：“毛主席说：你们都改造得很好，不久就要全部释放。你们放心好了，这是一定的。”今天，果然又是毛泽东向“人大常委会”提了这个建议，至少也不会与“全部释放”太离谱。如果要说我有“主观”成分的话，那倒是我在“既定方针”之下所加的“可能”二字。

不久，由朱德主持的“人大常委会”就通过决议：全体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对在押的国民党、蒙疆政府和伪满“战犯”，实行特赦。共产党的人民日报，又简录了毛泽东的建议内容，以“改恶从善，前途光明”为题发表社论。空气搞得这么高，架势拉得这么大。“特赦”的规模一定不小。大家一心盼望 10 月 1 日这一天，会要举行“特典”，大家的心情也非常紧张。就在 9 月 30 日这天下午，我在院中散步时，隔着电网听到北院抚顺监狱的犯人也在议论。大概就在这天晚上（确切日期已记不清），广播中又收听到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名义颁布的命令。内容大致是：一、对在押的国民党、前蒙疆自治政府和伪满的战犯，凡押满十年以上确已“改恶从善”者实行特赦释放。二、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

从这个“命令”来看，大家就动起研究来了。除了很少的人，一般都已被扣押了十年以上。包括我在内虽然还不到十年，但认为“善门”一开，不到两年也就该轮到头上了。这又慌哈？但对于“改恶从善”这四个字眼却费了很大脑筋。它既无标准，又无范围。共产党的话，向来就是笼统其词，难以捉摸，可是这与我们当前命运攸关，总想把这个“丈二的和尚”摸出个头脑来，无论散步也好，休息也好，只要有人一提到此事，就会有些人凑拢来，你一言，我一语。其中最有力和最使人开心的说法，就是毛泽东既对张治中说：“他们都改造得很好。”而在

这次“建议”中又说：“不少战犯确已改恶从善。”当然就是绝大多数都会释放。而且日本战犯除了判利的都已全部释放，只剩下很少一部分。绝不会对“外”敌宽，而对“内”敌严吧？所以大家都转为乐观，就不愿再瞎猜了。

不过，刘少奇的命令既然是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看样子势必在过了“十一节”后才能举行“特赦”。所以大家都乐滋滋地过起“十一节”来。当然，“十一节”一过，大家都集中精神在观察举行“赦典”的苗头上。甚至有些人偷偷地在整理行李，但除了接连有几批参观的以外，一直老不见有什么动静，有些人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焦急起来。从管理所的修缮来看，至少在半年之前，就做了准备；而且通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把形式程序都紧接着办好了，为什么迟迟不举行？从而大家就以为：必是因为“特赦”人数太多，事先的筹措（包括审核）和事后的安排（包括就业），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好的。

大约在十月中旬，管理所曾组织我们在抚顺和沈阳两地进行过一次规模不大的参观。我们是把这看成为特赦的前奏，自然很是高兴。在抚顺曾参观“阶级教育馆”和大伙房水库（这时早已建成）等，在沈阳参观的，除了农业展览馆和工业展览馆等，以前都曾述及，不再重复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曾花了足足半天时间参观了一个叫做“建国十周年辽宁省劳改犯人产品展览会”。因为时日已久，它的全名我虽不敢保证没有出入，但即使有错也只是几个字的排列问题。

这个展览会，在我们的历次参观中，规模确是最大的一个。它是一个临时性的“棚式”密集建筑，占地至少在 20 亩以上。又大又宽的展览棚，一个挨一个。就其大分类来讲，每一个棚就大致是一个“部”。棚与棚之间，都是平行而又紧相接连的。我们当时都曾记有笔记。早在 60 年代，“战犯”管理

所就以“代为保管”的借口，连同日记之类都全部搜走，所以究竟分多少部，和什么名称，都已无从查考了。现在只能就回忆所及，概述一下：譬如我可以给它叫个“钢铁制品部”的话，那就从各类大小机床、锅炉、铁道零件、钻探机具、各种精密机械，到家用剪刀、菜刀以及农用锹、镐等等都有，而且还有不少称为“尖端产品”，为我们做了现场表演。在电器产品方面，我记得有各类发电机、电动机、电子仪表、变压器、电线以及各种电工器材。最使我注意的，我们所制造的电动机和变压器，也在那里陈列出来。在农产品部门，瓜、果、蔬菜、各类粮食、鸡鸭鱼猪牛羊及其制品，种类繁多，数不胜数。我们跑了一下午，还没参观到三分之二，电铃一响，就有人用扬声筒在喊：“现在已到闭馆时间，请赶紧结束参观”。这时我正通过家具部来到棉丝制品部，听到“逐客令”，只好循着路线加快步伐走向出口。

这个展览举行之目的，我想不外：第一、夸耀共产党建国十年来的成就。这个展览会的本身，就是全大陆工、农、矿业的缩影，也是无偿奴工血汗劳动的成品。凡是各地各部门所能生产的，它无一不有，这些产品，大多用“新生”这个厂名或牌号做标志。这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很多“内行”的人，都喜欢购买“新生”制品，因为制造这种产品的人，在刑罚的重压下，谁也不敢疏忽大意，所以在质量上，比较都是头等的。沈阳工业展览馆的许多产品，也都是劳改犯人制造的。由此可见它在辽宁省工、农、矿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这个展览的目的之二，不外是显示与国民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罪犯劳改的成绩。从这一角度来看，展览会规模之大，展品数量和种类之多，确实已足够说明这一点。不过，我在此用了“与国民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罪犯”这些字眼，读者可能会

费解。需要说明一下。据我从 1951 年到 1956 年，在公安局拘留所、劳改队和监狱接触到的事实，与国民党毫无一点关系的罪犯（如强奸、杀人或抢劫、盗窃等犯），绝对占不到全部的 15%。过去的党、团、政、军、警、宪、特，这当然是与国民党直接有关系，至于乡、镇、保甲长和地主等，我把他们列为间接关系一类去。从 1956 年到 1959 年我被转解到“战犯”管理所，与这种情况脱离接触，但只三年时间，就是发生变化，我想也不会太大吧！共产党既把上述两类统称为“反革命犯”，所以我认为那时所有的大陆犯人，绝大多数都是与国民党有某种关系。

从沈阳回抚顺，我在车上对于这个展览会。根据印象曾做了一个约略的估计。每一部分以 500 种产品来计算，全益展会至少也在 5000 种（不是件）左右。而每一种产品在一年中的总产值，从最保守的方面去估计，至少平均也在 25 万元以上。例如红砖一项，在这个展览会中只是种类之一，但笔者过去所在的一个劳教队，一年就要生产 10 亿块，总值合计 4000 万元。就一个省来说，生产红砖的劳改队，至少也在 10 个以上，其总值合计起来就更多得惊人了。所以我平均以 25 万元来估计，那是最低了。

就用这个保守的估计来推算，只是辽宁一省，由无偿劳动所生产的总值已在 12 亿 5 千万元！再从这个数字扣除 40% 的原料、生产设备和其它消耗等开支，上缴的纯利润，也要有 7 亿 5 千万元。一个辽宁省是如此，全大陆相当省级的单位共有 29 个，合计起来每年就是 217 亿 5 千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投资是 766 亿 4 千万元，而参照当时已进入到第二个计划，其预定的投资总额不曾发表，笔者大胆地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投资给翻上一番，则为 1532 亿 8 千万元。那么再把全

大陆犯人每年生产总纯利用五来乘（即是五年的总值），那就是1087 亿 5 千万元。也就是说：它净占第二个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 70.9%。这该是多么地惊人！世界上竟出现以罪犯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这该是世界上的奇迹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原来是建在劳改犯人的无偿劳动上，难怪犯人劳动大军继续在扩大，劳动强度也在继续提高，唉呀！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国家！

我在前边已经谈过：1956 年以前，全大陆的犯人生产纯利既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的 39.8%，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忽然升到 70.9%，是不是笔者胡搞一气呢？关于这，我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和“自我核实”，认为这个估计，虽然一时无法取得现实材料（包括数据）为凭，但我的估计自以为是合理的。现在，如果我把前后两种估计方法重新调整一下，我想读者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以前的估计（占第一个五年计划百分之39.8%），是以每个犯人每年生产纯利 2 千元，并以全大陆 300万犯人总乘积所得出数字比较的。如今，我把辽宁犯人产品展览会从品种所作的估计，也换成和上次估计相同的方法，那么不但每个犯人每年生产的平均纯利，到 1959 年至少应该提高到5 千元，而且犯人的总数也应该是 450 万了。把这个积数 225亿元，再用五（年数）去乘，乃是 1125 亿元。这就要占第二个五年计划总投费比数的 73.7%，可见两者是极其相近的。

在此还须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 1956 年之前，特别是劳改犯人，那是与众大不相同。共产党为了取得重大成果，他们的生产，除了特殊种类之外，一般是以消耗体力最大的手工劳动为主。到了 1959 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需要，机械化程度一般说来就提高到为主的地位。根据笔者从事 25 年劳改的亲身体验：手工操作与机器操作

的生产比率至少是 1：4，有的到 1：100 以上；而非熟练工与熟练工的生产比率，一般又是 1：6。以此类推，我把前后两时期的生产纯益的提高，用货币表为 1：2.5（即五千元），是极其保守的了。

第二、我把前一时期的劳改犯人总数，估计为 300 万人，我想任何稍明大陆情况的人，是只有认为保守，绝不会怀有任何疑问的。那么到这个时期，为什么又“忽然”提高半倍而成了 450 万人，难道与国民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罪犯，不但被押者没有减少，反而又从地下钻出 150 万吗？关于这一点，我也确曾给自己设问过。但是先就辽宁犯人产品展览会来说，每种产品以三个人来生产的话，全省至少也要有 15 万以上的犯人。在此我还应该附带说明一下。仍拿红砖来说，在展览会中，也不过只放几块。可是在一个省区来说，制砖的犯人至少也要 2 万人左右。当然，有些品种要少的多，但平均以 30 人来估计，那总是少到不可再少了。那么全大陆以 29 个单位来总计，450 万元这个数字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也是保守的。

有的读者，可能又发生另一个问题。像宁夏、新疆、青海等边远地区，一个省区只有几百万人口，那会有 20 万犯人呢？我的答复是：据我所知，在现在的大陆，愈是边远的地方，就愈是犯人成群的地方。愈是刑期长的内地要犯，就愈可能送到这些地方去劳改。因为这些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工、农、矿和交通要开发。那些地方走几天连一个人都很难见得着，犯人被送到那里，要想逃跑不但要准备饿死，而且还要准备喂野兽。唯一的希望就只有死心塌地地去拼命“争取”。而且陷入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的惨状，又很不易透露出去，共产党就更放心。广东、江苏的许多犯人都被送到黑龙江，上海的学生和某些女人都被送到宁夏、新疆，这不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嘛！苏俄把

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妙着”中共当然更会懂得！我们虽然是处在与世半隔绝的“战犯”管理所，但是社会上许多事情，特别是关于犯人的事情，社会人士都不知道，可是我们有的会知道得有根有据。但这也是有关“机密”，我就不便详述了。总之，这些地方的犯人，至少不会比辽宁少。其次，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北院的抚顺监狱只是一网（电网）之隔。那里的情况，我是亲目所见。就以规模来说，1956 年到 1959 年，至少扩大到三倍以上。真是够得上月月在充实，年年在扩建。到 1974 年，我们因事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在 200 平方公尺的面积内，光是砖头就堆得有一丈五尺多高，而且各种车辆还正在往里运输不停。这可见：大陆上的监狱事业是潜力无穷，正在“方兴未艾”！1956 年秋我们才到“战犯”管理所时，那里的范围虽然不及现在（指我离开大陆时）的三分之一，但是还没有发生人满之患。然而到 1957 年，那里虽然又新建了一所三层楼的大监房，仍然无法容得下。结果，把“战犯”管理所的一所和二所，借了去住。随着这个监狱的不断扩大，犯人也跟着增多了三倍不止。按理，在共产党建国的初期，应该是逮捕与国民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份子是最高潮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杀的、自然死亡的和刑满释放的以外，拿“战犯”管理所的情况类推，也应该只有少数剩下了。那么，这样多的罪犯，又是那里来的呢？关于这个，我不必再多费笔墨。只请大家想一想：大陆上的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就只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人死于非命，被投进监狱的，就可想而知了。不用说别的，就只“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一个名词，就要给狱犯开辟多大的来源？我这里给 300 万加上 50%，这是我无办法找到确实数字根据，只好凭我亲身目睹作此最低的估计数字。如果有人硬要发生疑

问，倘然你无由去大陆的话，那么就请您委托到大陆参观访问的先生们亲身到那里的监狱、劳改队考察一下吧！那些新罪犯，除了一小部份是强奸、杀人、抢劫、盗窃、贪污之类的以外，绝大部份都是由于过去或现在的言行，触犯了“当今”的痒处或痛处，而犯了“滔天大罪”，既无法律明文可凭，又不通过什么审理过程，就被推进监狱的。那里是一个只有“毛泽東的权”，“当权派的权”，而没有“人权”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成百万成千万人犯罪，而没什么人犯法（因为根本无“法”）的地方。而有些先生们，对几百万人所遭的“横祸”，熟视而无睹，明知而不问，这在今天的世界，不是咄咄怪事吗？我衷心希望到大陆参观访问的人士，能够留意及此。不过我也要在此提一个忠告，如果要认真进行调查的话，一天以考察两个单位计算，至少也要准备忙上 20 年（如果共产党批准的话）。我看，能做几个重点调查，也就蛮够了。

想起这个犯人产品展览，再回忆我的劳改历程，并参照已经建国 60 年的苏俄，我所得到的个人观感是：“建设社会主义”离开罪犯或罪犯式的奴隶劳动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愈是“建设社会主义”，犯罪就愈是有增无减。难道“社会主义”与罪犯，是一种恶性循环吗？

“特赦”的雷声是在九月末就开始响了，可是经过 10 月一个整月和 11 月的上、中旬仍然不见雨下来。这期间，除了上述情况和一帮接一帮的参观者以外，约在 11 月中旬，由所里的负责人召开过一次类似的向全体犯人征询感想的会。这个负责人除了照例讲那一套“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对于战犯的改造极为有利，并希望大家在百尺杆头更进一步”之类的笼统话之外，并就毛泽东的建议，征求大家发表对于自己的估计和想法。这虽然不用事先起草照本念，也许因为这是每个人都在

希望，但又不好说出口来，所以举手者很不踊跃。如是就改由指定发言。有的人含糊其词，不知所云；有的人就大背“改造八股”，说他自认为还没改造好，不够“改恶从善”的标准。这时主持人就指定溥仪发言。他好像感到很突然，站起来很勉强而又踌躇地说：“我觉得我的罪最大，不敢想能得到特赦。”语声未了，那名主持人就跟着反问一句：“你罪大吗？”溥仪把眼睛一直：“嗯，是的！”这个会到此就结束了。会散了后，我就想：“为什么那些人发言，他没一点反应，而专问溥仪呢？”我当时不得其解。

到 11 月末，监里监外开始进行彻底大扫除。内务要求做到整整齐齐，墙壁、门窗、走廊，更要擦洗得一尘不染。大家心照不宣地互相默示：“那个好时候要到了！”

在 12 月 1 日，忽然出现一批我们乍见之下难以了解其“何所事”的人马，共约十几个人，穿着干部便服，两个一伙，三个一串，由干部领着，到处转来转去，举凡监号、理发室、俱乐部、澡堂、工厂、大操场、厨房，总之，监内各个角落，他们都进行了耐心而细致辞的观察和研究。究竟是想干什么，我们一点也猜不出。又看到一些工人在俱乐部和某些其它地方装设临时的电线，我们就更莫明其妙。

第二天，这批人马又来了，与昨天不同的是，有的拿着照相机，有的又带着各式的摄影机。同时又搬进许多水银灯，有些三个五个一排，有此又是单个的。这，我们明白了！他们是从北平到此来拍摄特赦现场纪录片的。

从这天开始，我们就遵令一律换上“大礼服”（新衣服），有几个人在某一场合，忽然灯光一闪，卡嚓一下就给拍了一张，但只是有数的几个人。这一天，他们是集中拍摄工厂、厨房、理发室、医务室等有关我们的劳动和生活实况。同时，我们还

特别为此集合在大操场表演了一段课间操。12 月 3 日这一天，他们全部人马就集中拍摄溥仪的“起居录”了。举凡他穿衣、吃饭、缝补衣服、学习阅读以及在医务室各种见习劳动等等，多少个镜头，从各种角度和各种姿势，拍了又拍，摄了又摄，一直到认为满意为止。那天夜里，我们都已熄灯就寝快到半夜了，溥仪的那个监号，水银灯还照得胜过白昼，在拍摄不息呢？

从这天下午起，俱乐部就禁止我们入内。这个，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布置会场。

12 月 4 日，吃完早饭就让我们在大操场集台。所里负责人向大家讲话，他面露笑容地问：“今天的这件事，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吧？”大家极高兴地同声回答他说：“知道!”“那好，我向你们宣布几件事：第一、今天的队伍，稍稍变动一下。我喊到谁，谁就依次站到前边来。”如是就喊：“唐曦、叶杰强、孟昭楹、赵金鹏、周振东、杜聚政、白玉昆、贺敏（这八名是国民党“战犯”)，“溥仪、郭文林（伪满战犯，蒙古族）”，等到这十个人依照所喊名次在前边站好了，他又继续讲：“其他的人，还是按原小组的次序不动。”说到这，有的犯人点点头，大概他是已有所悟了。他接着说：“刚才所喊到名字的十个人，从一进门的右边起，按照所喊的名次，坐在最前排的两张凳子上（每凳三个人）。其余的人，接着他们，每凳仍按四个人，顺序坐下去。第二，大家入场坐定之后，首长来了，要全体起立，等首长就座，大家再坐下。第三，首长训话完了，大家要热烈鼓掌。第四，发特赦通知书时，喊到谁的名字，谁就答应“到!”然后走到台前距离三步站定，行一鞠躬，上前接受通知书，然后再退回三步，一鞠躬后，不要回到原座位，走到仍从原来的右方，面向讲台按单行依次站立。第五，大会结束后，首长退席时，大家起立，并热烈鼓掌，然后再依次退出会场。领到特赦通知

书的人，仍留俱乐部。大家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啦！”声音气势比刚才差多了。

一进俱乐部，首先发现的，所有的水银灯都全部打开了。另外也不知那来的那么多记者式的人物，照相机、摄影机一直响个不停。讲台上新幔高垂，确实下了一番布置功夫。台上横额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两旁悬着一条标语式的对联，左联是“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右联是“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字体虽然写得十分不高明，但每个字都有二尺见方。讲台后边放有三排椅子，共约三十多个座位。台下的左右两方，成“八”字形分别设有观礼席和记者席，共约五六十席，早已坐满了。

等到首长们鱼贯入座后，我发现那位自称“脾气不好”自从向我们讲过“你们再要改造不好我就要发脾气了”以后，就三年来一面不见的那名所长，今天也居然在前排边位上出现了。虽然因为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面部又一点表情都没有，我也看不出他的脾气是否有所改变。但我也肯定了第一排所坐的都是与特赦会有关的主要头目。由管理所金科长担任司仪。宣布“特赦大会开始”后，首先由一名穿着漂亮的毛呢干部服的50来岁的人，照着已经写好了的稿本讲话。他的大意照例先由一些现象，证明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开始，接着就转入：在如此这般的大好形势下，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改造罪犯乃是改造世界的一部”的伟大的马列主义指引下，和……下，全国战争罪犯的改造都有进步，而且有些人确已“改恶从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是……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建议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是非常必要和非常及时的。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表明无产阶级专政是异常巩固的等等。这种

定了型的“中共八股”，在前后六次特赦中，已经叫人听得腻而且厌了。

第二个讲话的是一个穿军服的，一看就知道他是辽宁公安厅的人员。其内容与上一个讲话的人相仿，就不再重提了。

等到辽宁省高等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发“特赦”通知书时，全大会达到了最高潮，所喊的名次，正是前边所提的那十个人。摄影的，更加忙碌地去拍取各种特写镜头。等到喊出溥仪这个名字时，从他起立到接受特赦通知书和最后归入行列站立，所有摄影机器都对着，完全拍入镜头。等到那十个名字宣布完了，金科长就宣布：“大会到此结束”了。

等到首长们鱼贯走出会场，他又宣布：“大家回去稍稍休息一下，就进行座谈。”

就在走出会场时，大家都像若有所失，沉思不语。有的人回到号里，一头栽到床上，唉声叹气。有的人跑到院中，低首徘徊，心事重重。组长和学委们这时倒很活跃。当然，这是他们搜集汇报材料的重要时刻。

大会过了不到半小时，溥仪等又回到号里取行李。这意味着他们监犯生活的终结，所有的摄影者，又集中到现场大拍一番。

座谈开始，学习组长一看没人争取发言，只有自己勉强带头。但从他声音的凄戚和语无伦次听来，除了表露他内心的失望外，也显出他的言不由衷。他认为唐太宗的囚犯，比起共产党真正特赦释放“战犯”，那没啥了不起，他又望风扑影地说，过去国民党对于共产党是“错杀三千，不放一人”，今天，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是“一个不杀（镇压反革命中杀了至少三百万人，他一时忘掉了），而且确实改恶从善的又特赦释放”，这是亘古未有的宽大！就他自己来说，他确实还没有改进得像溥仪等等

那么好，所以他自分是不应该得此特赦的。……但他并不悲观，只要肯于转变立场，认真争取，他迟早总是要回到人民行列的！等等，等等。

学习组长打过“前阵”，还是没人跟着“出马”。眼看“冷场”了，生活组长只好慢腾腾地起来“救难”。他没开言先就眼泪汪汪的了（这是为的什么？他自己当然知道）。唏嘘了一阵才开腔。他首先表示，他对不起共产党。因为他一贯不相信改造政策，所以他一向都没重视自己的改造。1956 年集合后，当时曾发生一些非分的想法，那都是不肯正视自己。当时的抱怨，都被今天的现实所粉碎了。人家溥仪等十个人，“确实改恶从善”了，所以今天就都回到“人民的行列”。如果他早能切实认真改造，这回也许会是第十一个人。他又说：他在会上看到几年不见的孙所长很觉惭愧。那时孙所长就说：“你们要是再改造不好，我就要发脾气了！”他这几年真是白过了，他决心不再叫所长失望（这时有的人都要笑出声来了）。如果真有第二次特赦的话，他相信会使孙所长满意。他明明是在抱怨，可是他在暗讽之中，又极力装出“煞有介事”。

他发完言，也许大家的情绪渐归平静了些，心中也想出了一些路道，包括我在内，就都举手争取了。学习组长首先指定了我，这，我明白，他是要我跟着他的路子跑，可是我向来是要说自己的话的。我的发言大意是：刘少奇的命令，既然规定了“关押已满十年”这一条，我是自己没份了的。不过，当时还以为再过两年我就可以列入“大有希望”之列，所以自己安慰自己不必着急。现在一看，照每年释放十个计算，全管理所一共三百多犯人，那至少还得三十年才能放完。我已年过五十，究竟哪一年能轮到自己头上？而且是否能活那么久，都不得知。我现在虽不着急，但也只好等着将来碰运气，得过且过，当一

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特赦座谈会连开好几天。通过报纸和广播，知道全大陆共特赦杜聿明、宋希廉、溥仪等 33 名。据我们所知，全大陆在当时，共有北平、抚顺、西安、重庆、山东和内蒙六个拘押“战犯”的地方。总计约一千名左右，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苗头来看，这种筹划至少在半年以上就开始了。而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之后，还迟迟到两个来月才举行。中共和毛泽东费了这么大的劲，才只释放了 3% 上下，这不仅对大家是一种重大打击，同时，对共产党自己所喊“加速改造”的说词也是一大破产。因为发言的苗头已呈明显的不满，一些在发言措词或暴露思想方面持观望踌躇的人，也渐渐解除了顾虑，要“开怀畅谈”了。当时各式各样的论调很多，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现在只举出一些类型作代表吧！

伪满队有个人说：在他看，这回特赦就是专为放溥仪，那个蒙古人不过是做陪衬，溥仪那么大的罪，共产党所以赦他，就因为他的“名头”在国内国外有宣传的价值。而他本人不具备这种价值，所以他算完了！只有老死监狱！

在原南京队有一位同犯说：他从苏州监狱，就和在上海被俘的国军将领徐继泰关在一起。后来徐被解到海州（东海县），经共产党交群众“大卸八块”处死时，把心肝都给掏出来。所以他一向不相信共产党会真宽大。他想起这件事来就害怕。特别是南京“上调”，他就老吓得深夜里作恶梦。今天，共产党虽然开了“善门”，但在所有被关押的战犯中，在伪满以溥仪“数头号”，在国民党以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最重要，若说他们都已改造好了，为什么能这么巧？他怀疑这是出于毛泽东某种需要的结果。他过去地位不高，所以想到未来很悲观。不过，就抚顺战犯管理所被特赦的八名“国民党战犯”来看，唐曦只

是一个少校谍报人员，叶杰强不过是个团长，孟昭楹也仅是一个普通外交人员，赵金鹏是个上校参谋、杜聚政是个上校、周振东是个中校、贺敏是铁路局总务处长，只有白玉昆才只是个少将副师长，虽然他相比差不多，但轮到他作陪衬，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也有的人又在“改恶从善”上咬字眼。他认为“改恶从善”既无标准，而“确实”二字更是漫无边际，特赦通知书上虽说“经过审核”，但“容核”什么都语焉不详。他怀疑：共产党要特赦哪个人，哪个人就“确已改恶从善”！他在过去劳改过程中，看到有被加刑的，在判决书上都曾指出是又犯了什么罪。这才叫人知所悔改，心服口服。今天，特赦的评语竟是这样的含糊其词，真叫人糊里胡涂，无所适从。

也有的人趁机表示：他认为共产党跟现在的我们，都是处在改造与被改造的同样关系，当然是无亲无厚、不偏不倚的。而且共产党一向是“大公无私”的，所以他相信共产党的评语是正确的。他如果真的改造好了，他也一定会得到特赦。他今天所以未获释放，只有怨自己，而绝不怨共产党。他并表示：他决心努力要把自己脱胎换骨，争取在下一次得到特赦。绝不辜负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希望。上两位同犯就是后来在我们小组里发言的。当时就有人对后者的发言、作出皱眉的表情。大概他是怀疑这位发言同犯别有用心乘机表现假积极吧！是的，在我们那时，这种人也是确实有的。至于他是否如此，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也有这样一位同犯。他说自从在广播中听到毛泽东向人大常委会提建议的那个时候起，他就一直盼望得难以睡觉，行走坐卧都在想念跟家人团聚。他最喜欢他的小女儿，分别时她才五岁，既伶俐又聪明，一见着他就亲得离不开，说着说着掏出

最近寄来的相片，对着落起泪来。尤其说到：她女儿最近来信说："爸爸！共产党、毛主席这次把你们特赦，我们全家都千言万语说不尽地感激，我们全家都在日夜盼望您回来，我妈妈虽然去年和您离婚了，那是不得已。她现在正在等您回来复婚呢！我奶奶更是乐的不得了，把中秋节做的二斤腊肉，也准备好了，等着您回来吃呢！爸爸起程前，千万来封电报，我们全家到车站接您去！"说到这，他简直泣不成声了。我听来也不禁心酸。

有个四川同犯，暴露思想简单明了，开门见山。他首先背诵了两句毛语录："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他认为：现实情况给他的直接感受是"首恶必赦，胁从不放"！如果他说得不对，请大家帮助。可是大家，你看看我，我望望他，谁也无言以对。

有一位同犯，平常比较沉默寡言，这回他也打开了"话匣子"。他不但慢声细语又好像心平气和；而且旁敲侧击，十分面面俱到。他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当然谁都知道是罄竹难书的。中国在近代所以搞得如此贫穷落后，就外来因素而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当然是最主要的。远者不淡，只从九一八到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 14 年间，它不仅霸占了整个东北四省，而且穷凶极恶地要鲸吞整个中国，铁蹄所至，庐舍为墟。它不但奴杀我东北三千万父老，还在内地血腥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可是对于这些惨无人道的刽子手，除了极少数判了刑之外，一下子就都全部释放了。而且这个释放地点就正是在它们对中国同胞犯下滔天罪行——平顶山惨案（详后）——的抚顺。也正是在这个抚顺，三百多过去共同抗日的国民党"战犯"中却只释放了八个人。他不知日本战犯为什么会改造得那么好。他也恨自己为什么改造得这么不争气。

若说日本战犯不遥拜日本天皇改造好了，那么我们也"否

定了前半生”。若说共产党对民族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有所偏爱或者别有用意，那是不可想象的诬蔑，但是两者同为战犯，为什为改造的结果是两样的，他也极难找出确切的答案！最后，他很希望能对“改恶从善”指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来，他相信他能用事实表明决不会再落后于日本战犯，也不会落后于溥仪和杜聿明等人。

他的话虽然讲得很委婉，但都指到共产党的痛处。就“改恶从善”的标准而言，在我们整个被关押期间，谁也摸不着它的边，共产党也始终说不出其所以。总之：凡是释放了的，就都是“改恶从善”了的；凡是继续被关押的，那就理所当然的是尚未“改恶从善”的。在当时，草情虽然激愤，但在足够的经验教训之下，人们的发言还不能不为“后果”顾虑。怕逞一时之快，留无穷之患。

在上述各类发言苗头出现之后，金科长马上召开大会讲话。他的主要大意是：在如此大好的形势下，在通过十年改造，“战犯”都有一定程度进步的情形下，毛泽东建议，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这是史无前例的。可是举行特赦之后，有些人竟然发生一些奇奇怪怪、极不正常又不应有的“谬论”（在此他把上述的各类思想，用批判的口气简单列举一番），这充分表明：凡是产生这种想法的人根本就没有“改恶从善”，跟人民的思想感情毫无共同之处。人民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都是坚信不疑的，人民对于毛泽东的所谓“英明决策”都是坚决拥护坚决照办的。他说：你们一遇到“风吹草动”不如己意时，就要“唱反调”。他接着就举满战犯为例：当年由苏俄解回大陆时，只要能不被杀头，就要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保住了头的今天，赦了溥仪没有赦到他，他就说这说那，什么词儿都出来了。

这些语意，都是不露尖的刀子，我想读者一想就明白它的恐惧性，更何况当时作为其锋所指的我们？

他接着就举出以下一个例子，用以证明溥仪确实是“改恶从善”了。他说：有一次，一名前清“遗老”（笔者推测：也许是载涛）到抚顺来看溥仪。管理所人员把他带见之后，就破例地退出现场，让他们进行无拘束的谈话。那名“遗老”一看眼前没有外人了，马上双膝跪地，痛哭流泪地说：“圣上幸此，受了屈尊，‘臣’不胜……”，溥仪当即给以申斥并在那名“遗老”走后，马上向政府作了汇报。这显然就是“确实改恶从善”的一种具体表现等等。最后，他认为大家所暴露的思想是极其不健康而且又非常不利于改造的，让大家回去继续进行深入地座谈、进行认真地检查批判。

在共产党统治的世界，人们在长期和反复的残酷磨难和惨痛教训中，锻炼出一种能硬着心肠对自己狠狠批判的本领。据笔者个人的经验，只要对立思想一暴露，共产党就要给记上一笔账，它到某种场合或某种程度就会向你清算（清算的办法，一般总是“借福发挥”，翻箱倒柜把你“全部家当”已露头或未露头的全部的对立思想搞得精光，整得死去活来还不止）。当时常不问，甚或还要即时“表扬”一番。至于“批判”，共产党名之为“消毒”，其实，也不过是共产党阻塞“逆流”的一种手段。同时对于同犯也是下了一付“麻醉剂”，以为“批判”过了，就归无事而迷迷蒙蒙自安下来。但是，那笔帐既不能消失，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爆炸。

管理所既然把“警报球”挂出来了，各组马上“进行深入座谈批判”。这回就不是互相观望弄得组长非带头不可，而是面临关乎未来命运的关头，大家就一体举手争取了。特别是那些发过“谬论”的人，更是唯恐“落后”。而这些发过“谬论”

的人又都成为重点，不但要自我批判，而且在“批判不够”之下，别人还要“义不容辞”地进行“大力帮助”呢！这种材料，我现在还能记得许多，但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几个类型，说明问题，我想就可概见其它了。

例如平素沉默寡言而这次也打开了“话匣子”的同犯就说：他过去还以为自己“改造”差不多了。通过这个关乎自己命运的关头，反动尾巴就全露出来了。因为没赦到自己头上，他思想搞不通，就用日本战犯释放的太多而衬托国民党“战犯”释放的太少，暗指人民政府处理不公。这证明他确实还没改造好。他说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还应当进行长期地而且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后，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再出任何怨言。科长的讲话，这是向他伸出及时的援救之手。那真是“治痛救人，与人为善”，他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最后，他认为他以前的发言，是“以怨报德”又一次犯罪。他诚心诚意以“待罪之身”接受处分!……。

前次的座谈，本都是“怪话连篇”的，但是事到如今，大家同处在“警报球”的危险信号压力之下，如是一改人人愤懑，而为人人自危，就是自己既也免不了要检讨，而对别人也绝不能再袖手旁观。上一个发言，还没有完，只是停了一下“摆”，就有人起来进行帮助了。他说他听到那位发言，他也看到自己的反动面貌是如何的丑恶。但是为了大众的共同改造，他不能不指出：那位的发言，好似“水上的油”，极尽轻飘飘之能事，“避重就轻”，一点儿不结合实际。他用手一指那个发言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哪是露出反动的尾巴，你是张开血口，伸出毒牙，咬向共产党、毛主席!”（这就是说：那个发言者罪该万死）他又进一步“帮助”：他不是“用日本战犯释放的太多而衬托国民党战犯释放的太少，暗指人民政府处理不公”，而

是血口喷人，诬蔑共产党对民族的不共戴天之敌无边宽大，而对曾经两次合作的国内政争之人无边严酷。他说他是挖空心思进行“恶毒”的攻击。到此，他话锋一转又搬出“改造八股”说：“我们都是千刀万剐也不足以平民愤的家伙，该杀不杀，留下我们的狗命让我们劳动改造，给我们以重新做人的机会。今天，毛主席建议对确实改劣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他注视一下正在现场监听的指导员，然后用手一指那个发言人，回手又拍一下自己的胸部说：“就因为没有赦到你和我，我们就怨天恨地，满口胡说！这就证明我们确实没有改造好，怎么能和溥仪相比？冲我这样表现，就把我改造到老死监狱，我也决无怨言。这一点，你（指那位发言者）也要好好考虑!”这时指导员的表情，显然较为满意了些。

在大家轮流对那位同犯进行了“大力帮助”之后，那位同犯又再一次对同犯们的帮助表示态度（我们一般称之为“表态”）。他的表情装得很沉痛而严肃。他首先表示：他通过大家的热心帮助，真是“如梦方醒”。因为他平素在学习上不用心，所以对待事情的立场、观点、方法还都是“老一套”，用反动的立场、观点，怎么能正确理解如此这般史无前例的新事物呢？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确实，就因为没有赦到他自己，他就红了眼，对“恩典”进行肆无忌惮地反扑，杜聿明等他不知道，据他亲眼所见，溥仪确实是“改恶从善”了。金科长举出他能向政府汇报“遗老”下跪的事，就是最有力的例证。他自己不是改制得差不多了，而不比任何人都改造得太差。他真心诚意地感谢大家给他的帮助，这是对他在危险当头敲了“警钟”，他从今以后，只有“规规矩矩”，绝不再“乱说乱动”。最后，他又具体表示两点：其一，将来就是别人都释放了，剩他一个人，也绝不会再出怨言；其二，这是他在大家帮

助之下，一点极其感性的认识，他以后要继续深入学习、深入认识，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那位说“首恶必赦，胁从不放”的同犯，一开口就首先痛骂自己“确实是反动透顶，又一次现行犯罪”！他说他的用意非常恶毒。他所以颠倒黑白，恣意诬蔑，就是蓄意催促共产党，再有特赦时，能够多赦一些。特别是像他这类“校级战犯”也能多赦一些，他就有可能也混出监狱去．他说这是反动意识的作祟，“图穷匕见”就“妄逞一快”！他接着说：共产党是大公无私、实事求是的。溥仪和杜聿明等当然都“确实改恶从善”了，所以才特赦了他们。就因为他们碰巧都凑在一块，所以他肆意曲解，说成是“首恶必赦”。这种说法就是说“罪恶大，地位高反而占便宜”，真是反动到了极点！除了溥仪、杜淮明等人之外，还有二十多人，虽然反动地位较低，但就其本单位来看，当然也都是“首恶”之流。根本没有“胁从”可言。至于诬蔑政府对于溥仪好像是“曲意培养，内定特赦”那更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因为溥仪确有“改恶从善”的表现，政府加以鼓励，加以培养，那是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他是百分之百举起双手赞同的！现在既然是“善门大开”，谁要能好好向溥仪学习，政府当然对谁也是那样。对他来说：因为有了这样严重的现行犯罪，完全是以“待罪之身”悔罪改过，既不敢希冀也不应该那样对待。只有老老实实，从事于“脱胎换骨”的改造。就是把他关押到死，他也是心安理得。

有一位同犯，他一开头就说：“共产党、毛主席对于我们在押的战犯，实实在在太宽大了！”据他所知，不但在上海战役被俘的徐大麻子（即徐继泰）被解到东海把心肝都给挖出来，就以东北一地来说：军统东北区区长楚大光，已退职几年的沈阳督察处处长荆换文，在北平已向共产党自首登记的崔志光，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秘书华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以及沈阳、长春两个督察处的所有被捕的大小人员，除了一名总务科长陈牧，因为他老子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关系，押了几天就放回北平以外，都全部处死了！1956 年共产党把我们这群该杀未杀的“战犯”集中起来，给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期能“加速改造”早做新人，反而有人以为“与和平解放台湾”有关，那真是“以怨报德”，天大的诬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天下无敌的。要我们这些家伙，有个“屁用”！正如金所长指出伪满战犯那样，当年，只要不杀头，都求之不得；今天，举行特赦了，又都得寸进尺，说这道那起来。他说他是被判处 15 年，那真是无比的宽大！就是关押终身，也绝无怨言！

从管理所挂出“警报黑球”以来，所有同犯的发言，都从失望、惶惑、不满，一变而为自咒、认错和甘愿长期关押了。我虽然只举少数的例子，读者也可以理解发言者的精神遭受和内心隐痛。

这次给同犯们的震动是极其重大的，同犯们的思想反映也是极其剧烈的。上述那种会上的公开发言，因为受了许多顾虑的限制，就不如会外“谈心”来得那么直截了当或者朴实无隐。

有位伪满战犯，在院中散步时，谈到溥仪的被特赦，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说：毛泽东在“沁园春”这阕词里不是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嘛？今天，他踌躇满志地登上形同“九五”之尊的“伟大人民领袖”的高位，把“三朝皇帝”溥仪特赦了，就是要显露一下“我毛泽东的今朝”，不然，怎么叫“诗以言志”呢？

以上是那位同犯的原意，我虽然不敢说他完全对，但我也

认为他的看法有道理。我所以认为有道理，根据是：一、前后举行过六次特赦，唯独这一次是由毛泽东建议（其他五次是由周恩来以国务总理名义提出建议）的，而这次就有溥仪；二、伪满队从 1957 年保持“吃小灶”一直到溥仪特赦，那不言而喻是专为他提供特殊的“照顾”；三、溥仪的“献宝”本是由他的堂侄先发动的，而管理所千方百计要把主动权由溥仪去承担，这显然是有“定向培育”的性质；四、毛泽东早就扬言“溥仪改造得很好”，那当然也是“意有所属”；五、很费心而且很特殊地送溥仪等三个到医务室见习，在溥仪特赦前一天，特别为此拍了纪录片后，其他两人就跟着“退休”了；这就明显不过地，专是为溥仪“做成绩”了；六、特意安排他在大会上作报告，不容讳言这是在犯人中间给溥仪的特赦制造思想和舆论的准备。总之，溥仪的特赦，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早就内定了的。

另一位原武汉队的同犯，对于这次特赦，也有他自己的四条论断：第一、如果还有 1951 年集中时那种“开门放”的可能，就绝不会搞这个拿几个“大头子”作标榜拿几个“小喽啰”作“陪嫁”的特赦，看来，最近几年不必再抱幻想（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看对了）；第二、溥仪也好，杜聿明也好，王耀武、宋希濂等也好，都无非是拿他们摆进“宣传橱窗”，给台湾看，好像是毛泽东已经改弦更张“与人为善”，进而引起人们的错觉，达到软化斗志，分散敌意的作用；第三、这些人的未来，充其量不过在某种场合当当“政治花瓶”，跑跑“政治龙套”，吹吹“政治喇叭”，有了用场就登台当“应声虫”，没有用场就送进后台去打瞌睡；第四、什么“改恶从善”不“改恶从善”，不过是变（戏）法的“金、木、水、火、土”（在中国社会，街头变戏法的艺人，在使用手法时，用这个词作掩护），那才见

鬼！

通过这次深入而激烈的批判，科长又召集一次大会，对于大家的“胡涂思想”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澄清和扭转，表示赞扬。眼看就要来到 1960 年元旦，就把话归引入到排演文娱节目上去。对这次特赦，要大大歌颂一番。

在此有一点应当附带补述一下。毛泽东的建议，人大常委会在决议和刘少奇的命令中，都曾提到对于一般监狱的罪犯，也举行特赦。不过据我所知，为数很少；而且是只此一次。

因为刘少奇的特赦令有“关押已满十年”这么一条，我觉得在被关押还不到九年的我，对于这次特赦本身关系不大，所以我在历次座谈上，为了规避暴露思想惹下“后遗症”，所以很少发言。但我绝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今天为了完整地说明问题，我要在此综述一下。

对于特赦溥仪，我是很有意见的。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也是有亲近之感的。但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我心头也确实留下不能泯灭的印象。他做为这个传统的末代皇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不仅不计较“旧账”，而还给以“逊位之君”的礼遇，这不能不算革命历史上少见的宽容，可是，溥仪在北平紫禁城里，却没有一天停止过复辟的活动，张勋复辟就是显著的例子。“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家遭到蛮横侵略之际，他竟然甘心事敌为虎作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的灾难。他确实是罪大恶极。用共产党的话说：他确实是“不杀是不足以平民愤”的。对于这样死有余辜的天字第一号的卖国贼及战犯，共产党竟千方百计地导演他做出“表现”，毛泽东又“一往情深”地蓄意赦免他，我在总结同犯们各种意见的基础上，所得到的论断是：什么民意？什么法律？什么“改造”？都要看是否合乎他们自己的政治需要。如

果合乎他们的需要，怎么搞都对；不合乎就什么都犯罪！这个“他们”就是共产党！也应该说是毛泽东！

特赦虽然必有溥仪，但特赦却不是为溥仪而举行，它是另有其政治的特殊用意的。在共产党控制大陆之初，因为他们在人才数量和业务能力，还不足以应付局面，他们对旧有的各机关工作人员采取“包下来”（即照旧按原职任用的意思）的政策。甚至有的机关在旧有人员都已跑空之下，他们还派专人到各地去招揽，并信誓旦旦保证他们的安全。等到局面撑起来和工作展开之后，他们在秘密准备接替人力的同时，就暗中进行调查并筹措一网打尽的密谋了。在国共战争谁胜谁败尚未定局之前，共产党为了软化瓦解国军的斗志，为了制造国民党人的内部意见分歧和某种错觉，为了煽惑舆论的同情，以及为了在国民党内发展内奸，他们对于所俘的国军人员，曾经采用过“释俘”政策。共产党这一着，也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导致国军形势在大陆上节节失利之后，他们就转而在如何免使“死灰复燃”上作打算了。

在韩战紧张之际，共产党的准备都一切就绪了，“镇反（镇压反革命）”命令一下，所有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各种人员以及乡镇保甲长，甚至国民党的叛徒（共产党称之为“起义的”），或者已向共产党登记自首接受管制的，以及缴械后经共产党给证“遣送返乡就业”的，都在 1951 年 4 月前后，一下子按图索骥逮捕“归案”。据我最小的估计，在全大陆范围内，至少就有 300 万个人头在共产党的屠刀下落地；而没有理由被送上阎王殿的就转送劳改队，从事长期无偿奴役劳动的至少也相当于此数。他们管这叫做“连根拔”。

这当中，也有为数不多的国民党高层党政人员暂时被保留下来。因为他们过去经历长，社会关系又复杂，用他们写材料；

既可发掘“漏网之鱼”，又可了解国民党过去的许多机密和人事关系，这对于共产党都是舍此莫由取得的。另外，又可以把这些人对台湾做诱饵，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有利用价值。暂时保留一天，不是不杀，问题是要看情形而定。据周养浩自己所讲：他在某一次碰巧的机会里，就曾亲眼看到在他的档案中已经列为死刑的条子，当然不仅他是如此。反正都已成为“笼中鸟”，共产党高兴在什么时候动刀，那自然是随心所欲的。

囚禁在山东的国军被俘人员，除了徐继泰等人被残酷处死者外，如前文所述“上调”南京的那一批，本也是在阎王殿上登记在案的（留在山东的，当然是在后续之列）。只因毛泽东改变了策谋，才幸免于难。

因为上述两批人员，就当时的情况看好像是列为“镇反”之外，所以我不得不在此把内中情况再次介绍一番。实际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镇反，只是处理上有所不同而已。

前文也已交待过，毛泽东在韩战中受了前所未有的教训。除了把他的兄子毛岸英送到韩战战场，打算显显风头捞点像蓄意扶植江青那样的政治本钱，结果是“不便”宣扬和无声无嗅的丧生之外；以“战无不胜”自诩的中共军队，不但成师成万地被缴械投降，而且全体宁愿刺字反共去台湾，绝不再返大陆为毛泽东“服务”。在这种无情打击下，他那被胜利给冲昏了的头脑，才冷静下来，感到国民政府的屹立台湾乃是他梦寐难安和最难解决的大问题！至于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究竟采的什么决策，以常情度之，总不外武力解决或是政治解决两个途径而已。对于毛泽东产生迷信的人们，特别对大陆共产党政权，捧得神乎其神的人们，认为“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经“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培育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至少有 300 来万，一向是“战无

不胜，攻无不克”的。对于中国版图的整体来说，不过是区区一个拳头的台湾，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他的“心头病”的解除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是，凡是看过大陆电影纪录片的人们，都会看到在历次游行中，那个一丈见方的大字所组成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那幅大标语吧！无情的时间与事实证明，那幅大标语扛了 27 年，一直使毛泽东干着急没办法，他就始终没敢下这个“令”！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每次见到那幅大标语时，虽然也不懂，但是就我所看到的一切迹象立论，他一直到死，的确没动过这个“动武”的念头。在一九六几年，我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得知“所向无敌”的“人民解放军”，也曾在金门遭到全军覆没这件事（在大陆上很少人知道此事），我觉得他所以不曾动过这个念头，就是：他怕攻打台湾不下，再遭一次“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被消灭，可不能再像当日金门那样容易“瞒天过海”。必然弄得人人皆知，纸老虎被戳穿，威风扫地，整个大陆立刻就要天翻地覆，那可不是好玩的。读者，在此可能认为我这是主观臆断。那么，我在此引证一下赫鲁晓夫的看法吧！

中共和苏俄的“万古常青的永恒友谊”，一旦搞得反目成仇之后，赫鲁晓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是个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可是为什么不解放台湾和收复香港和澳门呢？”他又引用俄国寓言讥骂毛泽东说：“癞蛤蟆对敌人鼓气以显自己的壮大，结果只有胀破肚子完事。”（我是引其大意，原词已记不清）中共报刊为此大骂赫鲁晓夫。由此也可以连带看出：如果毛泽东要收复港澳，他就势必得对台湾动武。如果对台湾动武能成功，港澳当然“吹口气”就可收复。关键问题是在台湾。到今天为止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那么攻击，毛泽东虽然气得

浑身发抖，但他忍着这口气，也没敢对台湾动武，这就不是笔者“信口雌黄”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这句话，有不少人是知道的。二十几年的时间，准备应当是够充分了。但他所以没打，当然就在“无把握”这三个字上。话不说到这儿，很多人是不明白的。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是神化了的，中共的“人民解欣军”也被这些人捧到天上去了。而大陆的土地人口又那么多。在此，可能有人给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究竟为什么会感到对台湾动武没有把握呢？关于这一点，确实有许多人莫明其糊涂，甚至要找许多理由去作似是而非的解释。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标语年年要扛出来，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寝食难忘的。那么既然动武不可以，当然就只有走政治途径了。常识告诉我们，凡是战争两方的谈判，必定列入“释俘”这一条款。可是台湾始终拒绝接触，用中共的话说，毛泽东只好被迫搞单方释俘做“敲门砖”了。在战争中搞“释俘”这一着，乃是毛泽东的一大“天才的发明”，前边已经提过，他搞这一套是捞到许多便宜的。如果在大陆继续屠杀下去，就要惹得台湾军民更加愤怒，更加团结，更加警惕，更加不共戴天，所以他又回到“释俘”的老路。但这与前不同的，就在从前的那套设想之外，又加上向台湾暗送虚情假意的“秋波”以示“冰释前嫌、言归于好”的作用。只要国民党肯搭手“上套”，内部意志就要开始涣散，外交关系也将日趋孤立。到那时候，反正台湾就那么大，人口就那么多，落在毛泽东的掌心，他不但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找任何一种借口，再来第二个“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一网打尽、连根拔了！西藏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国民党当然更要“稳、准、狠!”些。我这个“阿 Q”要不是被“改造”了 25

年，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点我也是不能认识的。

1951 年的大集中，本来就是“竹筒倒豆子”（全部释放），就因为匈牙利事变和接着“右派闹事”，弄得毛泽东这个意图遭到阻碍。这是他心头的一大隐痛，动武不敢尝试，政治攻势成了唯一的手段。虽然台湾的态度仍是坚决不理，但这“敲门砖”还是不能不用的。等到 1959 年，匈牙利事变和“右派闹事”的风暴都成了过去。毛泽东就又迫不及待地转换另一种形式，来搞特赦了。

凡是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特赦应该是判刑的罪犯为对象。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未判刑，按共产党的说法、只能是“教育释放”。而且从第二次特赦开始，判了刑的只能减刑，而未判刑的才能特赦释放，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要知道：毛泽东就是法律，只要合乎他的需要，他要怎么搞就怎么搞。话说回来，就因为台湾强硬到底，他如果要一下子把这些筹码全放出去，以后便没有题目可作了。所以搞出这么一套，既要未经判刑和“关押已满十年”，只要“确实改恶从善”。这一套莫明其妙的名堂，像一点一滴地“挤牙膏”，走一步探一步。以后的事实，完全符合这一点。就是这一原因，我们又被继续关押了十六年。一直等到毛泽东自己也知道快要见马克思了，为了实现政治途径解决台湾问题的梦想，他才趁他活着，把我们全体释放。

第十九章　三年大灾荒

在 1960 年秋收后，我正在电机厂，给变压器卷线圈，向管理事务的班长请领面粉打浆糊，用来粘绝缘纸。这个平常总不爱讲话而又极为谨慎小心的班长，忽然露出为难的表情，去了几小时也不回头。我卷了线圈不封绝缘纸就不能下机子，犯人既不能停下手不干活儿，又不能再去找他，我只好找点别的闲活儿来应手。这一天，如石沉大海，不见班长露面。这是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使我既焦急又纳闷。第二天上班后，这位班长只给我拿来一小包我向来不曾见过的一种黑色粉状的东西，交给我说："你就用这个打浆糊吧！"那种东西，我也叫不出名堂，但又不能再问，只好硬着头皮找水去打。按照往常的施水量打出之后，像一种黑豆腐渣，根本不粘。用这种东西粘绝缘纸，完全不合工艺规程和质量要求。如果在使用上造成安全事故，我是要"罪加一等"的；甚至来一个"蓄意破坏"，那就更不堪设想了。事逼无奈，我不能不硬着头皮去找他。还没等开口，他就若有所思又好像有难言之隐地先向我说："你就先用一下试试看嘛。"我情急了，我说："绝缘纸粘不住漏电，这个责任我如何负得了？"我同时又提醒他："这顶多用不了二两面，就可以用一个来月，到厨房取一点就行了。"对于任何问题，干部向来只是作"指示"，绝不作解释。他还是坚持"试试看"，我不能再说，只好回来照样干。结果，卷出三十多个线圈，没

一个粘得上。对这个问题，我是又头痛又不解，甚至觉得他是故意给我为难。这一天，他又是不露面。

过了一天，他拿来一大捆从苞谷棒上剥下的叶子（俗名哄“苞谷窝子”），交代我说：“把这泡在温水里，然后用手一个一个细致地揉搓过，在水里涮净扔掉。最后用水中的沉淀物打浆糊，会比上次用的东西好些。”我如法而做，虽然比上次拿来那种不知名的东西好些，但是还不合要求。这时我已经看出这是他另外又找出的办法，面粉是决定不能再用了。但为了那么一点点面粉，班长为什么那么“讳莫如深”？为什么心情又那么紧张和不安呢？我当时确实觉得奇怪。

接着管理所就发动犯人们到乡下采曲妈菜（一种稍有苦味，并且很多农田都有的野菜）和到山林里去拾几种他们所指定的树叶子。前者说是为治疗某种疾病，后者说是供作猪饲料。但因季节已过，曲妈菜已经绝迹，拾得的树叶子也很有限。

与此同时，我们用豆饼做豆腐所剩下的豆腐渣，本来都是用来喂猪的，这时干部忽然都亲自挑到监外去。我当时想，他们一定是挑回家去喂自己养的猪，就没工夫动心思去研究它了。

我们到管理所以来，面食方面，主要是吃面包。烤炉和用具等都是在关押日本战犯时备置的，我们到此，就延用下来。在我们才到时，面包都是用市面上不易买到的精粉做的。在1957 年大参观之后，“竹筒倒豆子”式的释放不可能了，就改为“八一通粉”（即 81% 的混合面粉）。这时，忽然开始掺上白的苞谷粉，没有几天，又完全用黄苞谷粉了。接着又很快用黄色变成酸黑的了。我们这群老头子，跟着也变成“霜打的黄瓜”。在那样强度的劳动下，成天软绵绵的，体力很快陷入难以支持的状态。不久，我们得知毛泽东在一次集会上提出：去年钢铁产量和粮食产量那种大跃进的增产数字是统计人员搞错

了，并更正为该年度实际减产的说法。我们才恍然大悟：毛泽东那套异想天开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搞出来的大灾荒，在无法掩盖下正式开始爆发了。

我这里所以用“正式开始”这个字眼，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就是 1960 年的农产再不算好，但总要收获一些，如果 1958 年中共新宣布的增产也是真的话，1959 年库中稍有存粮也不会在 1960 年秋收之际就搞得严重到这程度。记得，我们在 1957 年春参观沈阳大青高级社时，他们粮仓中所储的存粮，都是满满的。这表明 1958 年实行“人民公社”的当年，由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粮食大为减产，1959 年就无存粮可言了，这当然毫无疑问。换句话说：毛泽东为了硬要给“三面红旗”撑腰，就编造假数字，打肿脸充胖子，骗取人民对他的迷信。若不是无情的事实逼得他到 1960 年再也掩盖不住了，当然还是得撑就撑的。处在被统治地位的八亿人民，被蒙在鼓里，猝不及防地遭此骇人听闻的人为大灾难，在人类文明进步到今天的程度，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竟敢干出如此的勾当，那除了他自己，还有什么能够放在他的心上。难道说：这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吗？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道德吗？绝不！这对人民是天大的犯罪！而且以后，他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一步紧似一步地迫使人们为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竟使整个大陆处于接连不断的祸乱状态，这在政治史上更是前所未有的反动！特别是，明知自己造成了恶果，反而推在奉命而为又不敢出来否认的统计人员身上；这种事情都能干得出来，那还算是什么“伟大领袖”！凡是有是非感的人，凡是头脑中有“人民”二字地位的人都不能不认为那是市侩不如的行为！大陆八亿人民是我的骨肉同胞，我今天回想起长春大饥荒和这项大灾难，我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制造

死亡的毛泽东，作此真实的揭发和控诉，是非自在人心，想读者也会作论断的。

这个战犯管理所，在关押日本战犯时期，主食就不定量。我们被解到此处，既因为要用我们作“和平解放台湾”的筹码，又因为有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战犯和部分日本战犯在继续扣押，所以“不定量”这一措施就延续下来（全大陆的其他管理所都是定量的）。这时面包吃了不到几天，色泽进一步加黑，味道是既苦且涩，谁也猜不出是什么原料做的。同时，管理所又号召小组进行自报公议，然后交由所方核定进行节约运动。我管这个叫做“减食定量”。

这个运动很激烈并且很闹了一阵子。这种面包都是先经厨房切成约一公分半厚的片片送来，习以为常，大家都养成每餐吃若干片的无形定量。譬如我，每餐向来是吃四片，但由于今昔质量差别，现在吃四片已感到不足，却因为要节约，就不能不硬着头皮自请改为三片了。其他的人，也都是如此。这样向上一报，指导员召开大组会，竟然指为这是玩弄“真冒报假节约”的欺骗伎俩，必须重行评定。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把原来所吃的片数，故意增加后，反过来又作为节约，实际上是原量未减。并说有的组长也互相包庇搞鬼，这回必须先由他们带头做起。大家虽然心中不服，但是情势所逼，谁又敢出头申辩呢？在小组开会时，组长首先作自我检讨，他承认“冒报”这一点合乎他的实际思想，他虽然不曾那么干，但他内心是起过那念头的。这表明他是“阳奉阴违”。为了改过自新，为了表示真诚响应节约号召，愿把自己的主食按常量减少一半，即是按每餐吃五片，现在改为两片半。最后，他还别有用心地说：据他所知，有的人确实是“冒报”了，希望这些人要好好考虑和改正，这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花招，谁都懂得的，所以当场就有人要求

他明确指出，可是他又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不过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他既然咬着牙减半带了头，这对大家的压力是极为重大的。据我自己的感受，平日吃四片，现在的养分已经大不如前，吃五片都不顶事，若再按原量减半，营养量顶多相当过去的五分之二，而且菜是既少又劣，连个油眼儿都难见到。我们的这付有机体全要依赖这几片黑面包来维持其生存了。这样突如其来的减法，有人表示：就他的每天劳动情况来说，至多只能减去三分之一，不然的话，事实上就无法应付。他的话没等说完，组长就"拍"地把桌子一拍："岂有此理！我不也在劳动？我能减一半，您为什么不能？"他一肚皮的难过，立刻乘机爆发了。他接着用煽惑的口吻说："大家看看，他的意思是说，不照他的办，他就要拒绝劳动了，他这是用'耍死狗'的流氓手段，要和节约运动公开对抗。老实告诉你，你这是痴心妄想，办不到！大家说，应当怎么办？"大家对于这种情况，谁都感到是大难临头，心情的沉重，那是不言而喻的。指导员又亲临现场，形势所逼，就都异口同声的喊："斗争！"气氛一紧张，他知趣地站了起来，面向指导员说："我干运输，那个活儿很重，多少天来（他的意思是指改吃黑面包以来）就体力不济。我减食三分之一，确实是最大量了：……"，组长马上把话抢过去："他要赖不成，现在又改软招子了。真无耻，大家说：是不是？"大家齐喊："是！无耻！"指导员好像没有这回事似的，一点表情也没有。有个家伙用愤怒的声音指向这位同犯说："你这个家伙，平日吃饭就老是"死撑"，现在还想那么干，是不是？不要脸！""呸！"一口粘痰，吐在那人的脸上。那人还不服，组长就叫他立正站在屋中央，老老实实静听同犯们的批判。如是你一言我一语，"鬼嚎"般地恣意进行讥骂，粘痰口沫都向他吐了

去。

各号子也都是如此，1958 年大“交罪”的发疯情况又再出现。指导员（我们当时称之为“科员”）开腔了，大家马上静下来。他的讲话大意是：自从毛泽东号召节食以来；全大陆都是一千个照办一万个执行。共产党为了照顾我们这群年老的战犯，才苦心孤诣地放在最后来施行。可是有人还死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用这个理由，用那个说词，绞尽脑汁想把自己放在例外，没有一点儿“人民的思想感情”。凡是肯于真心改造自己的人，对此没有不表愤慨，不坚决反对的。最后，他认为：有些人对此一不良现象，还是抱温情包庇的态度，发言还是冷冷清清不够热烈。这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不应该对这样的运动小手小脚，观望不前！

对于监外的任何情况，管理所干部向来是不作任何透露的。这次他无意中提及全大陆至少已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实行节粮，我们才得知整个粮荒的严重性。但经他这番话的煽动，大家立刻向那个倒霉的同犯展开攻势。大家照例打了个“通关”以后，组长叫他表白。他在如此的压力下，首先承认自己确实还是觉悟不够，不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现经科员的耐心教育和同犯们的热情帮助，他知道自己错了。他要向组长学习，坚决请求减食一半，并保证把劳动搞好，以示悔过自新。他总算识相，就机下台，过关了。

我们组里有个体弱多病的小个子老头，他平日只吃一片多一点儿，他说：他的食量在全所里恐怕也是最低的。至于应减多少，他自己没主见，请大家评定，他都衷心接受。大家对此都觉为难。这样的黑面包，如果每餐半片，确实成问题，所以都不开腔。已经冷场了，组长刚要搭腔，指导员就说：“我看你反正消化不强，少吃点儿，更容易消化。这对于你是有益的。

要知道，每人每天能节约一两粮，全国六亿人口（当时的人口数字），每天就节粮六千万斤。那么，至少可以使七八百万人活一天。这意义多么重大，我看你每餐就吃大半片吧！”那个小老头眼泪汪汪地表示接受。他是我们组里评审最省事的一个人。

有个大块头是泥瓦工，他有力气又能吃。遇春节他能吃100 来个饺子；一条面包切 12 片，他至少要吃 10 片，要是减为 5 片，在别人是饱餐一顿，在他却成了大问题。这个同犯，性情还很暴躁，如果不合意，他还要发脾气。他的“自报”，只能减掉四分之一，这当然通不过。大家吼了一气，他还是无动于衷，如是有人向他吐痰，又有的人把袖子一挽，表示要向他武斗。他不但反吐别人，而且把眼一瞪，架子一拉，准备接受挑战，要“打擂台”了。他是我们里边有名的“猛将”，这一下子把众人都吓住了。如是又转为“鬼哭狼嚎”拼命伸直喉咙的大批判。搞了两个来小时，他还是坚持他的主张。弄得小组都下不了台，指导员也跑进跑出好几趟，一声不响。

中间休息，作完课间操后，指导员就先到屋里等着。组会恢复，他首先开腔作指示。大意是：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作不同的具体处理。××（那位同犯的名字，恕我不便披露）他体力强、食量大，这就不能按照一般对待。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暂先挂起来等着大家考虑考虑再决定。大家当然是“唯命是从”。我深深领会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大应用价值，就在于“当权派”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对有益于自己时，找出随心所欲的理论根据，谁要不同意，谁就要被扣上“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徒”的帽子，他明明是看 ××“难继”，另打可以下台的主意，所以他先在此伏上一笔。果不然，在运动搞了一星期，大家都搞过了，科员在临结尾的会上作了如下的指示：根据 ×× 体质的特

殊情况，他认为，每餐可以减为六片面包。还问大家同意不？作为阶下囚的我们，干部的任何指示，都得“奉为圣旨”，谁敢说半个“不”字呢？而且谁都明白他是蓄意把这件棘手的事放在运动结尾时收场，谁又那么不识相呢？

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和饥饿进行搏斗”的运动。既要在“自报”时作自我搏斗，又要在“公议”时和别人搏斗。尤其这种饥饿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随着情绪的紧张和抵触，斗争很快就进入激烈的高潮。如果和 1958 年交罪运动相比，除了未设有“交罪台”和“交心房”之类的名堂而外，其他方面都显不出什么两样，只是时间稍短而已（共约一个星期）。

运动一结束，生活组长就马上按，小组统计数字领来，然后照每人所定的片数发给。一句话，我们开始吃定量了。才开始的几天，我们还可以应付。接着，我们体内积存的养分逐渐消耗光了，而面包的质量也一天不如一天。不用说劳动，就是走路都感到两腿发软，眼前发黑。在工厂劳动中切掉手指的；在干有关农业劳动中晕倒的，都相继出现了。大概到第二个月时，就有一些人的腿和脸出现浮肿。开始时人数少，医务室还把这些人集合起来，特准吃点儿营养餐。不几天人数急速增加，也就各回各号，听其自然了。我不但得了浮肿，而且还患了夜盲症。腿上脸上一按一个坑。眼睛一往暗处看，只是一大片圆圆的白光，什么也看不见，尤其精神的萎靡和郁闷，更使思想负担十分沉重。不论行走坐卧，总是想东西吃，这个滋味就更难熬。真要变成只要能吃顿饱饭，死了也情愿似的。此后不久，肝炎病也相继发生，据我约略估计，大致占总人数十分之一的样子。因为我们设有医务室，医护人员又很负责，因此病而致死者虽然很少，但是完全根治者，除患有并发症者，却未见其人。在香港自杀的张铁石，他是第一批患者，而且曾经一度严

重。通过长期休养治疗，虽然大见回头，但是永未根绝。肝炎这种病在大陆很普遍，死亡率也不低。我不仅过去不曾听说这个病名，就是到香港以后，也不曾见过有谁患有此症。我很怀疑这种病是与这场大灾荒大饥饿有关系。

1961 年 5、6 月间，干部忽然叫我们在俱乐部集合。金科长在第一次特赦后约半年就不见了，随后由一个姓刘的军法人员正式接任所长。主持这次开会的是另外一位王科长，他的语调很低沉，他的态度显出内心的激动。他的讲话很简短，其大意是：自从毛泽东号召节粮以来，管理所从干部起是认真执行了的。共产党政府一向是按照“革命人道主义”办事的。对于我们实行减食定量，不过是一种“教育措施”的过程。因为大家基本上还能响应毛泽东的指示，所以我们的主食，即日取消定量。

他最后用沉重的口气说：“你们即日恢复原状，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们干部，仍然吃定量的‘代食’，革命人道主义嘛！”说到这，他的目光，他的语声，他的表情，表现得极力抑制情感的激动，几乎要潸然泪下。这不是做作或表演，而是内心的真情流露。人是感情的动物，处于当时境况的我们，在如此强烈感应下，都忍不住热泪满面。

这对于我们是一种完全出乎意外的变化。我们对于当时的情况是感动的。而我们对于事情的突变，也是极其惊异的。

他们和我们虽都是在毛泽东一意孤行胡搞下的受难者，但我们是被关押的犯人，而他们是看管我们的干部。在粮荒如此严重，而每个人的命运都处于很难设想的情况下，他们竟能抑住感情，忍着饥饿，用自己的口去宣布他们“治下”的犯人，解除定量，吃饱肚子，我们的感情反应，自然是极其强烈的。

我们的减食定量，既是经过那样一种激烈的逼迫而实行的，

为什么不到三个月，又忽然恢复旧观了呢？任何人都不能不对此感到惊异吧？对于这样一个十分奇突的问题，身处其境的我们，自然要动脑筋去思考一番。

最初，我也认为正如那名科长所说的，是出于“革命人道主义”的观点。可是头脑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这种看法大成问题。此时的全大陆，据说只有各国的使节和专家们不吃定量。若说今天对于已经置于监狱这项暴力压迫工具之下看管的“战犯”，竟然也和那些以国宾优待的外国人员等量齐观地施起“仁政”来，我想任何能够异想天开的狂想家，也不敢唱这样的怪论吧！而且，这在严重关头又是一个唯一的破例行动，要不是毛泽东亲自训令，谁肯不要脑袋，对“战犯”敢惹此大祸呢？我在此要附带说明一点：由此可以看出，凡是对于我们有较重要的措施，都要通过毛泽东才能决定。

话得说回来，当年长春饿死 16 万人，他都没讲过“人道”，要不是他对台湾在处心积虑地转念头，他不会对于“锁在保险柜里的群宝”（在他心目中的我们，此时是这样看待的）忽然反常地讲起“慈悲”来了。我对这个论断，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反复的印证，才肯定了的。如果有人认为我是“血口喷人”，那就请他从毛泽东一生的所言所行去找答案吧。倘然能有一条成立，那我就是丧尽天良！

毛泽东自己说过：“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与恨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极端。毛泽东对于国民党人的恨，特别是对于现在台湾的国民党人的恨，谁都知道那是有缘有故和有根有据的。而现在他忽然把关在铁笼子里的国民党人当“宝贝”讲起“爱”来，那么他的缘故，他的根据又是什么呢？说刘这，三岁儿童都会明白，就用不着我多费笔墨了。

对于科长在讲话中所用“代食”一词，我初听之下似懂而不甚解。后来才明白：那是一种食物代替品。它的成份是随地而异。其材料不外榆树叶、柳树叶、野菜、草根、糠皮、豆饼、地瓜藤和以上所提打浆糊用的苞谷叶等等，掺和少量的苞谷（据说每月只配给 20 斤左右）之类的东西所做的食物而已。我们在实行定量前后所吃的面包，也就是这个东西做成的。不过据我观察，干部们倒没见得有患浮肿的。我们管理所，专有两名同犯，用食品加工后的剩料，放在一个特备器皿里制做一种叫做“人造肉”的东西，完全供干部用。我想可能与此有关吧！

开春以后，我们到山上农园劳动时，沿途所见，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是有气无力面现菜色的。到处在议论着：如何在荒山上开点地，想办法种点东西度荒，连管理所的干部和师傅们，也常听到围绕这个中心在盘算着。抚顺市周围都是山，因为土壤瘠薄，除了很少植有林木。都是光秃秃的，从来没人耕种过。大致从五月开始，就有许多老少男女，带着锹镐等工具，上山刨地了。凡是有土的地方，就按其地形，横三竖四地成了一块块的农田。我们站在农园四下一望，全部荒山都像一种道袍下的乱补丁一样。就连我们农园旁的树林里，那怕是仅仅几平方公尺的地方，也都尽量利用起来。诸如上述地方，秋收究竟能有多少，当然很难断定。可是这总不失之为给肚子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所以就不能不硬下心，从现在的口粮中挤出一份作种子来 W 险了。这当中，使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们在耕作中刨几下停一停那种和饥饿搏斗的样子。

我们到卸煤场附近一块稻田去劳动，总要经过一座粮库。它是抚顺许多粮库中的一个主要粮库，设有铁路便道，运粮列车一向络绎不绝的。不但几十座大粮仓都一向装得满满的，而且还有若干座正在兴建中。它并附有很大一座机械化的粮食加

工厂，光是工人就有几百。等到粮荒表面化后再经过那里时，工程中止了；残体被风吹雨淋得不成样子，加工厂也停顿了，十分之八九的粮仓的门都敞着成空了。但是也有两项新设施，那就是不但站上武装警卫，而且在电网之上还挂起警告不准行人接近的牌子。由此，既反映了粮荒的严重性，也显示出社会的危险性。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理解的。次年，我们再去沈阳参观时，凡是在两地及沿途所看到的粮仓，都一概空空如也，许多也已残破不堪，根本没有人过问了。请大家想一想，在那样一个社会制度下，被毛泽东一意孤行地给搞得“国家”粮库都空到如此程度，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大家可能还记得吧！东北是一个土地肥沃而人口较少的地区，过去的粮仓一向是大批出口的。现在这地方都已如比了，内地更可想见。关于内地的各处情况，我想海外同胞比我当时所知者，不知要多多少倍。人民饥苦之严重，社会秩序之紊乱，真是可怕极了。光是铁路沿线，到处是饥民成堆，旅客取出食物，刚一露头就被人夺去一口吞下。特别是山东和江南，情形就更为惨烈（笔者当时没有机会目睹，只能概括地就所知者在此附上这么一笔）。要不是刘少奇唱出“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几个字，缓和了群众对于“人民公社”的反抗情绪，转移了忍饥闹事为生产自救的思想，从而起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虽然人民手无寸铁，但在无路可走、忍无可忍之下，要不天下大乱才怪。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刘少奇是救了毛泽东的“驾”。可是，就因为这个为毛泽东所搞出的大“纰漏”，被刘少奇给弥补了，使人们觉得刘比毛要正经些、有办法些，这就使一向“天下老子第一”的毛泽东醋劲大发，种下了刘少奇日后“身败名裂”的祸根。

东北习尚，在秋收之时从来不见有设专人看庄稼的。换句

话说：就是很少遇见有偷庄稼的。共产党统治大陆后，人民慑于严刑峻法，当然更加不敢乱动其手。可是，从这年秋季开始，每一块菜地都搭起一个“看青”楼子，不分昼夜，都有专人轮流守望。接着所有庄田，在一定距离和视野之下都相继搭起。就是我们的农园，在山前山后也采取同样的措施，由干部们轮流看守，而且有时还要鸣枪“示警”。就是这样，他们在锄最后一遍地或是上山打柴时，发现我们的包谷或树上的果子等等，都不翼而飞了，并且在草丛里常发现成堆的这类东西。可想而知，那是有人先积存在那里，等到方便时或者想用时再去拾取，免得被人发觉。与我们农园相邻是抚顺市园林局所经营的一处实验果园，占有整个一处山谷，面积不小。四周全是密植约 1 丈 5 尺宽木刺锋利的洋槐，并且从齐身处锯开一半，再把上梢按倒交互做成栅栏，外边又在树荫下拉上细铁线以示有爆炸物或其它危险。而沿栅栏之内，约隔 200 公尺即设一岗楼，并有持枪人守卫。此等防范，可谓既周且严了。因为从栅栏到果树区有一个几十公尺宽的空间地带，经管理所洽妥，我们到那里打柴时一看，外缘树上的果子，大部分都已丢光，草丛中还随处可拾，那当然也是窃者所散失的。以上这些情况，表明过去的良风美俗，被这种人为的饥饿给冲击得荡然无存了。那是一个一切都操在毛泽东手里的世界，在如此严重的灾情下，亲友不相赒，家人难为济，此风之开，又是孰令为之？直到我们在 1975 年被释放时，情形还是如此。刚入秋，还没等庄稼成熟，山上所有的自留地都已经收得精光了。这一方面显示饥不及待，另一方面当然也是由于互防窃盗。到秋收正式开始时，拣庄稼的人不知比收庄稼的人要多上多少倍。管理所的干部要求我们要作到“颗粒还家”，在边收边运之后，还派我们逐物拾得干干净净，不使有一粒粮遗留下来。在这之前是不准其他外人进

地的。就是这样，在我们去后，还是有些人，带着饥饿，急切和愤激的眼光，在地里寻来觅去，那怕只找到一个片荚，一颗谷穗，都像拾到一块瑰宝那样高兴。在多少天之后，实在找不到什么东西了，才逐渐不见了。

我们收苞谷的办法，是砍倒之后归成小堆，然后有人逐堆采摘米棒，随后还再检查一遍，采收工作就告完成了。因为杆棵需要等几天再运，所以老百姓到上边去找寻剩下的米棒子也是合乎道理的，可是管理所不许。一群妇女争辩，一个姓贾的干部向一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发威说："那么大的一个丫头，还不讲理，硬抢庄稼，你也不害臊？"把这些妇女激怒了，就你一言我一语，反唇相讥起来，那一名女学生更不客气，指着他说："你倒好大架子，竟叫起我奴婢来了。我们被你们整得快饿死了，你们收完了，不但不准我们拣，还要这样骂人，你这是什么道理？"别人也随声附和，这个干部就恼羞成怒，指那名姑娘说："你说是我们把你们整得快饿死了，你是煽惑韦众，反对毛主席，进行反革命！"他就要拉那个姑娘，如是大家都和他吵闹起来，弄得他无法下台，半晌无语，最后只好走开了事。这种情况，充分表明人民内心的怨怼之一般。

特别是在收获地瓜和花生时，我们不但要一行一行地刨，而且还得把全土深掘一遍，搜得干干净净，就是半截藤也不能切下。这时，地边早已站满了带着篮子口袋和锹镐的男女老少，我们一离开，他们就马上大翻特翻，一连几天不绝。他们本已够饿的了，还得上气不接下气地拼命向地下找食物，把整个土地都翻掘得这一个堆，那一条沟；第二年春耕，还得重整土地。这种饥民求生的情景，今天写到此处，心情仍然是难以平静。

以上，只是我的亲目所见，就全大陆而言，当然九牛一毛。只从这一鳞半爪的材料，也可见灾情之严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自是无处可买，工业产品也当然要随之闹起缺荒，而且其质量之糟糕，更是不堪言状。就以钢笔为例，用不了几天，不是断裂，就是丝扣脱落而不堪使用。我接连买了几支，还是所谓名牌笔，都用不久就相继报废了。特别是与农产原料有关的产品或是粮食以外其它农产物，更是奇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共产党，为了掩盖“三面红旗”所造成的恶果，硬把这种灾荒，说成是由于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从而给它起个名字叫作“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仿佛这连续“三年”就不是神化了的毛泽东所能应付的，这“特大”就不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所可克服的，而这“自然”就非毛泽东所造成的。“敢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居然认起输来，退居第二线，多年一声不响，这不能不说是天大的奇闻。世间真是“能人之上看能人”，到刘少奇开了“三自一包”的药方，蠢蠢欲动的人心平静了，社会秩序安稳了，灾荒渡过了。生产恢复了。不然的话，若不“陈胜、吴广”遍地起，天下大乱才怪。可是刘少奇也真不识相，胆敢在老毛面前“露一手”，那还能不自取其祸！

毛泽东有两首诗，就可以证明他把刘少奇恨到何等程度！这诗就是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关于这两首诗，世人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过去在大陆，每到“七一”（毛泽东自注是 1958 年“读六月卅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吸血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该年 7 月 1 日写的。）为了称颂毛泽东关心“民瘼”，还要有些纪念活动呢！但其中的许多语句，我既觉得跟一些人的解释有些难合，又觉得跟消灭血吸虫很少关联，所以一直难求其解。后来，到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被斗，我印证了前前后后，也经浮想联翩，才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首是说：祖国有这么多的绿水青山都被弄成白费了（枉字意思），可恨我这位华佗连刘少奇这条“小虫”子也奈何不了。叫他（指刘而不是自己）给弄得千村都成荒野，万户都无人烟，只有鬼在唱歌（他是说，“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所带来的大减产大衰退是刘搞的）真是可恨极了。你还要在庐山会谈把我的国家主席宝座夺掉，弄得我成天没事干，只好坐在那儿不动，随着地球划夜自转八万华里（四万公里），要不然就得在夜间伸着脖子观赏漫天望不到头的银河系！牛郎我要问问你（瘟神指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场合就正式反映刘为瘟神），咱俩过去的患难与共（他俩从小在一起干革命）的情谊，怎么能不随着东流一去不复返（就是“绝交”）了呢！这一首诗的主要重点是对刘的愤恨。

第二首是顺着“沁园春”那种“秦皇、汉武……还看今朝”

的老调，自我吹擂一番，并表示刘少奇下了狠心。他的话是说：有朝一日我一展长才（春风），被你（刘）搞成为人拉矢及鬼唱歌的荒野就会变成到处万千杨柳的美丽山河，大陆六亿人民都像尧舜那样揖让温良供我使唤（即听他使唤，就称为尧舜）。以下四句的意思，前两句是逞他的本事，在共产党（红雨）内他要怎么翻江倒海，就怎么翻江倒海（证诸后来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这话就成了伏笔）。“青山”是为了对“红雨”，就是说，任何崎岖山路，只要毛泽东动动念头，就都成为他任意独来独往的坦途（这是说，他的本事不小），像五岭那样的山区都会变成可耕的良田，三河（珠江、长江、黄河）流域都会曳引机轰鸣（这是给“人民公社”、“大跃进”申辩）。到那时，我看你（指刘）这瘟神还往何处跑？我要用照天大火把你烧死（这就注定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我还不能肯定搞清楚。记得，使毛泽东最感恼恨的庐山会议，好像是 1958 年 8 月开的，那么这首诗毛泽东自注是在同年 7 月 1 日写成的，这又怎么解释呢？可是我又知道：毛泽东的诗文绝大多数都在事后很长时期才发表，这当然有他自己的用意。因此我也怀疑，他为了不让人察觉他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写的，怕泄露了他的用心，惹出麻烦，所以就倒填日子，藉血吸虫以“言志”。如果我对这两首诗的解释合乎实际，那么这个推想自然可以成立。若然，更可见毛泽东的诡谲和阴狠了！这个“伟大领袖”竟是“伟大”到这样的程度！

第二十章　苏共中共反目

自从中共统治大陆以后，什么“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要向苏联一面倒”、“苏联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我们要向老大哥学习”、“苏联的援助是忘我的无私的”、“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时候任何人也破坏不了”、“山再高，水再深，也隔不开中苏万古常青的永恒友谊”、“中国和苏联是兄弟国家”、“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是兄弟情谊”等等。凡是中文里最美好的字眼，都精心选来用在“歌颂”和“祝愿”中共苏共的关系上。中共张口闭口都高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红了半边天，全世界一片红，已为日不远了。”谁若是对苏俄说一句错话，就要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罪过。记得，龙云到苏俄参观之后曾说过一句什么“错话”（原话已记不清），就被打成“右派”，自我检讨批判多少次都不行，一直到死后才摘掉帽子。那时谁能设想中共苏共会有反目的一天呢？

记得不是 1960 年就是 1961 年冬，在举行特赦后的座谈上，有个姓刘的学委，向组长们传达管理所的指示时，以个人口气，透露出苏俄派在大陆的所有专家都全体撤退了。等到组长们把这种情况传到我们时，大家不禁愕然！甚至有人怀疑组长是把原话听错了。而不见报纸或广播报导其事，更有人怀疑是那个同犯有意造谣惑众，好反映情况的人，也就有事可做了。等到

那个学委在他的大组会上再一次以个人口气宣布这个消息时，大家虽然觉得“其来有自”，是管理所暗示的，但对中共苏共的关系还是莫明其妙。人们认为：如果不是两者之间出于某种默契，就或许是中共自动请求的。两者之间的甜言蜜语过去讲得那样亲亲热热，哪能会出什么岔子呢？所以也不敢置一词。

后来，我们在出监劳动或是去沈阳参观时，沿途见有许多正在新建的工厂，施工架子还都原封未动地摆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淋已停工许久了，我们还以为是由于大灾荒的缘故。这些工厂，一直到 1975 年，还有少数放在那里成为废墟。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一直到古巴问题发生，我们仍是闷在鼓里。赫鲁晓夫公然要向古巴运飞弹，我们遵照管理所的指示进行座谈，大家还本着龙云的前车之鉴，不敢对“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苏联”说句“不恰当”的话。相反的都“应景”地说：“赫鲁晓夫确实够得上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政治领袖，不顾一切能把飞弹堂堂正正地运送到美帝国主义的床边支持古巴，也确实够得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真了不起！”等等。总之，是一片“颂扬不迭”。接着报纸又报导了一套消息，说是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不惜武力对付，苏俄运送飞弹的船只乖乖地接受美国海军检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到古巴游说，把所有飞弹全部运回了。管理所对此又喊我们进行座谈。这下子可把我们难住了。明明看透赫鲁晓夫讹诈不成反而出了丑，可是想到“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时候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那套说词，谁又敢说出心中话，去揭“社会主义阵营”的丑，甘冒破坏中苏永恒友谊的大不讳呢？但是又不能闭口无言。死逼无奈，有个同犯眉头一皱，就想出话来说：他首先要检讨自己，他原来本是用因袭的反动观点看问题，以为赫鲁晓夫在面临武力阻吓之

下低头了。现在想来，觉得赫鲁晓夫确实是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不计个人毁誉，毅然决然采取妥协途径，避免了一场人类有遭遇毁灭危险的原子战争，这种以人类生存为念的伟大胸怀，确实是伟大无产阶级伟大政治家的伟大作风，赫鲁晓夫实在太伟大了，伟大！伟大！真的伟大极了！

在这样一个世界，人们的第一考虑，都要提防惹祸并绞尽脑计去说迎合共产党的话。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对这样一件事情说话，每个人的心与口，都处在极其痛苦的矛盾斗争之中。大家忽然从这位同犯得到伟大启发，如是就众口一词地“歌颂”起赫鲁晓夫的无比伟大，尴尬的心情，才得以轻松下来。

这一关刚过，随着管理所发来的“人民日报”无情斥责赫鲁晓夫的文章，要我们立即进行学习座谈。原来，自从赫鲁晓夫下令撤退专家以来，因为人们的思想无认识无准备，不好马上调转炮头进行攻击，憋了一肚子暗气，现在找到机会爆发了。

该文中的用语，既锋利又露骨，说他是假装气势向美帝进行讹诈，碰了肯尼迪总统的钉子，又无可奈何地屈辱低头，他本身便是耍流氓手段，对古巴更是无耻的叛卖等等，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破口大骂一通。这，基本上是与大家原来的直觉想法一致，要说有不同，只是用语极尖苛，攻击更猛烈而已（我们在这之前，是不敢也不能用那样语言的），这真使我们啼笑皆非。我们既然“看风使舵”地硬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去，这个嘴一时是很不好反的（处在大陆的人们，这种情况，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少痛苦的回忆），怎么办呢？只好还是先从自我检讨入手。把自己说成是对赫鲁晓夫犯了“个人崇拜”，今天通过文件的学习，才发觉自己的理论学习不成样子，而政治嗅觉

更是低得可怜，然后，再把赫鲁晓夫臭骂一顿。最要紧的，还必须郑重其事地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导的中共，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把“歌颂”赫鲁晓夫的那套词，改头换面一下，来“颂扬”中共了。在大陆上的人们，手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口也是被共产党使唤的。而且是特级遥控和特级自动化。特别是正式关在监狱的我们。请读者诸君想一想，就“加勒比海危机”（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往古巴运飞弹这件事的称谓）这一件事，我们的嘴就得跟着反过来，掉过头还得自圆其说，监外情形当然可想而知。

到这个时候，从连篇累牍批判痛斥赫鲁晓夫的文章中，我们知道了：几百大项支持合同完全撕毁，石油供应断绝和向中共逼债等，从而才明白了，中共苏共已经真的反目了。在那样一块地方，不论什么事情，你是否应该知道，或者在什么时候知道，都是得费共产党的神来决定的。从这个时候起，苏俄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变成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了，以前由苏联所设计或修建的项目也不是最先进而变成最糟糕的了。当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也就由社会主义的党而一下子变为集权主义兼修正主义的党了。

苏共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之下，忍无可忍，就发表“公开信”进行辩驳，并指责中共忘恩负义。这一来，中共成立项目小组，专门进行反唇相讥。接着“评苏共公开信”就“二评”、“三评”一直到“九评”，用中共的惯用语，就“狗咬狗”咬得翻天没完，在全世界共产党内掀起轩然大波！从而不但演成了珍宝岛兵戎相见，并且随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苏系共产党和毛系共产党两种水火不兼容的组织。

假马列主义、真马列主义、真正马列主义等等，就像北平王麻子、杭州张小泉那些刀剪店一样，你说你是真的，我说我

是真正的，而对方都是假的，中共苏共双方这种不疲倦无休止的互相攻讦互相痛骂的闹剧，一直到如今还在热火朝天。这些情况，凡是留心时事的人士，当然都知，用不着我多费笔墨了。

这中间却有一个极其微妙又极难以理解的插曲，我应在此随便提一下。大家还记得吧，自从斯大林和南斯拉夫的铁托，由于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搞翻了之后，中共就对铁托指名道姓地并凡是咬住不放地，张口一个“铁托匪帮”，闭口一个“铁托叛徒集团”，一直骂个不停，把南斯拉夫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来赫鲁晓夫上台，为了要拉拢南斯拉夫“重新回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到南斯拉夫访问回到莫斯科，在某种场合中说过“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么一句话。如是“九评”之中就设专题，罗列无数材料，用以证明南斯拉夫是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叛徒，投向美帝怀抱（因为美国当年曾对南斯拉夫有所支持），蜕化变质走向资本主义的反动道路，攻击得体无完肤，藉以指控赫鲁晓夫和铁托是沆瀣一气，都是一对屎蜣螂，混身都是臭不可闻的。也许是凑巧吧？赫鲁晓夫一下台，中共又马上和南斯拉夫搞得火热，称为友邦了。读者诸君请看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毛泽东的矛盾论运用得这么神奇奥妙，灵活万变，他们衡量问题究竟以什么做标准？他们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我说句冒失话：除了毛泽东之外，任何人是摸不准的。

从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到现在，苏共中共互相谩骂攻击的文章和谈话，可以用用百用千来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都被他们翻箱倒柜地找遍了，去寻找词句为他们各自的一方服务。关于这些材料，凡经中共所发表的，在关押中我是无一漏掉地学过了。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词，弄得头昏脑胀，我始终搞不清“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

闹了这么多年，又搞得兵戎相见、两阵对峙以及在国际共产党之间搞成两个系统的对抗，为什么所有各方都对这个原因讳莫如深，只字不谈呢？也许我的“旧法观点”大“根深蒂固”了，打官司也要指出对方理亏的所在，才好令人评出谁是谁非嘛？可是，世间竟有这样奇怪的事，尽管势不两立，但是对这个只要把真象揭露就可使对方一败涂地的问题，苏共竟然有“容人之雅”，而中共也“顾左右而言他”，各国共产党也不好意思过问，大家转弯抹角，就是不说正题，弄得世人到现在还是糊里胡涂，莫明真相。这当中，竟然还有不少人像那时被关押的我们一样，也鹦鹉学舌式的扯直了喉咙跟着瞎骂一气，今天想来，真是可悲又可怜！

事情一直到事隔 19 年的 1974 年前后，在一部中共海军故事影片（片名已忘，其内容是由苏俄供给制造舰艇的关键性钢材是劣货，因而由一个工人自己想办法冶炼了出来），从两个角色对话的夹缝里，以愤懑的口气透露出大意是这样一句话：“他们竟要求我们和他们成立混合舰队，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唔，多年的大闷葫芦，好像用这样一个方式揭开了盖子！最近在威特克所写的“江青自传”中，除此之外又加上一个“将在中国设立一座长程广播站”，乍听之下，也颇像有些可能。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中共骂苏共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说苏共把东欧那些共产党国家视为附庸，通过“经互会”进行整个控制和无情的剥削。那么，如果当时把事实真相昭告天下，铁证如山，苏修叛徒集团，不就更加无可抵赖了吗？对于这样一件堂堂正正捉住贼赃的事，为什么偏要走“小道”，通过影片对话和江青的口来拐弯抹角地透露呢？谁都明白：演员的对话当然没有政治责任，是真是假，谁也无权过问。江青在当时也没有实际的政治职位，事后说出来，充其量

也只能看作是得之于传闻，当然不发生“官方文告”的效力，谁也不能据以为凭。同时中共苏共那时正在搞得火热，两下既是海誓山盟的兄弟国家，又是“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兄弟党。毛泽东第一次去苏联参加俄共大会时，跟赫鲁晓夫亲然得来搞同性恋似的搂着抱着嘻皮笑脸地走路（有当时发表的照片为证），要好得只差没穿一条裤子，就是有“联合舰队”（照江青的说法，毛泽东已经同意，当然更不成问题）和“长程广播站”的提议，两方又不是敌国提“哀的美敦书”，当然可以慢慢商量。赫鲁晓夫再鲁莽，也不会发神经病似的忽然在大陆正闹饥荒之际，就“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搞绝情断义的分裂，甘冒大不讳与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共产党国际团结的罪魁祸首吧！若说一定就是因为这个，我敢说：它言之不成理，对任何神智还健全的人，是没有说服力的。至于为什么在事隔多年之后，用演员对话和江青之口来搞这个，其用心何在？当然只有毛泽东知道了。

原因当然绝对是有，可是两方为何绝对不揭盖子，也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同犯几乎一致认为是由双方争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所引起的，可是只在私下议论，或是在“思想汇报”中反映过；因为干系重大，怕引火烧身，很少敢在讨论中作公开的暴露。请想想：赫鲁晓夫、毛泽东和两个党都对骂一气而对此不提只字；管理所在某些场合又警告说：“有些人竟说是由于争夺领导权，这不是造谣诬蔑吗？”我们被关在牢里的战犯，谁又敢不“三缄其口”呢？

关于争领导权的看法，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在中共虽然受害不浅，尤其在大饥荒中发生，更等于被赫鲁晓夫按着喉咙想一下子拍死。但对苏联也极其不利，因为它不但失去一个推销次货的大市场，

而且也丧失一个取得优良必需品（例如：中共输送给苏联的供应品，大米都是拣选的，水果都是挑上等之中最好的）的基地。若不是必不可免，绝对不肯下这么大的狠心，干出这种损人又害己的事。并且两下在这时期，既未发生疆土之争，也未发生其它龃龉，而“联合舰队”之说既然站不住脚，那么要说不是因为“争领导权”，到现在谁也没能找出其它原因。

其二，“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所造成的局面，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乃是空前的分裂和从未有的明火执仗的组织对抗。对于这样有深远而又严重影响的行动，双方都不敢在当时揭破其原因所在，毫无疑问，必然都有难言之隐。因为“争领导权”这个名词，用中共的话说，就是在共产的世界内“争霸”！那很明显，是把中苏两党之外的一切共产党当喽啰或当平剧中的“龙套”看，如果声张开来，可能引起其它各国共产的鼓噪，群起而攻。势成骑虎之下，两方如果硬着头皮互相攻讦，那就充其量等于相互摔狗屎，结果都弄得浑身臭不可闻。不然，就得各自辩解装好人，那也等于“泥菩萨洗脸，越擦越脏”！赫、毛这两个人物是一对很有本事的大雄略家，这种必然的情况他们是会充分作了估计的。此事绝不可向外人告，双方只好忍住苦头先打打“肚皮官司”，等待机会一到，另抓题目来较量。正在赫鲁晓夫在古巴问题上出了丑的时候，毛泽东就乘机拿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雄”姿态，大张旗鼓向之进行咬住不放的攻击，势不两立，一心要把赫鲁晓夫打垮。对方也以列宁的教导：“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和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引大意，原词手头无数据）”进行诡辩。刀来枪往，一直到如今还在旗鼓相当的对垒着。这是一种避谈“争领导权”实际是为“争领导权”而拼命，这论断是顺理成章的。

其三，从双方嗣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也有力地反证了这一

点。我们看看，就在“撕毁合同、撤退专家”表现为“争领导权”的“图穷匕见”之后，既然形成了公开对垒，当然谁都要尽全力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阵容，所以，双方不但对现有各国共产党政权，能控制就进一步控制，能拉拢就百般拉拢之外，又索兴尽一切手段在各国发展苏系毛系两种共产党组织的对抗。这也充分表明在“争霸”问题上，已经进入“一不做、二不休”的阶段。反过来说：如果不是早就在“争霸”上动了心思，“无产阶级天下一家”的传统，就不会如此轻易而毫无顾忌地打破了。

在他们这种“争霸”斗法的过程中，有两个可悲的“驯服工具”，我要在此略谈一下。

第一个是印尼总统苏加诺。从印尼的地理位置来看，毛泽东如果能把它控制在手，对东南亚就形成了囊括之势，中南半岛自然也随之唯其马首是瞻了。这对排除苏共势力和扩大与巩固“争霸”地盘，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从印尼独立以来，苏加诺的声望和地位是居于压倒的优势。这个自承是受过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洗礼的印尼元首，对中国一向有好感。中共政权成立以后，就一直对他进行拉拢。在万隆会议上把他一捧，苏加诺开始晕了。人们可能还会有印象吧，中共接待外国政要所搞的那套热烈夸张的架势，第一个对象就是从欢迎苏加诺开始的。不用说那套人所共知的人海列队和载歌载舞，已够他陶醉的了。为他在颐和园特设的游园会，事先经过充分研究准备，到处搞的都是苏加诺所最喜爱的印尼玩意儿，诱得他喜极忘形地和女孩子们跳起印尼土风舞来。“匠心”运用得这般到家，苏加诺哪能不感觉中共对印尼的要好表示，确实是真诚的。再加上什么“求大同、存小异”和什么“坚决支持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反帝反殖民斗争”

等动听的口号，喊得那么响亮，苏加诺把中共视为可靠的盟友，生怕靠得不够紧。苏加诺已成了“驯服的工具”，毛泽东就唆使他的分号（印尼共党）经理（艾地），抓住机会在高唱“拥护伟大领袖苏加诺大哥”的口号下进行全力的迅速发展。艾地也的确不负所望，不数年间，印尼共产党员就猛增到 300 多万人，顿时成为左右政局的野火燎原之势！这个印尼总统把印尼共党看作是依赖的左右手，就兴高采烈地大张旗鼓掀起一个反对马来西亚运动，要显示“伟大彻袖”的威力。事情闹得如火如荼，毛泽东一看，“万事俱备”“东风已起”，艾地及时应召到北平亲身接受“机宜”（毛和艾握手言欢的照片，当时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后，回到印尼就借口印尼军人反对“马来西亚运动”马上发动“夺权政变”，中共报纸立即为之摇旗呐喊。毛泽东的“囊括”计划实施了！可是，事情并没有按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印尼竟出了一个当机立断、敢做敢为的苏哈托。结果是：作为毛共分号的印尼共产党自艾地起全部被消灭，数百万华侨也因其中曾出了些左派分子而遭了“池鱼之殃”。此事发生的关键，是苏加诺甘作“驯服工具”所引起。他落得政治生命告终的可悲下场，我想他事后想来，应该觉悟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吧？

毛泽东对于这件事，的确是费了苦心经营的。如果成功，请想想：亚太地区，今天又将成何形势？毛泽东从“争夺领导权”进而为“建立领导权”又将成何局面？

第二个是高棉元首西哈努克。

印尼的结局，使毛泽东的“囊括”计划完全失败，他就不能不在中南半岛大动脑筋。

话要在此再扫上一段。对于“撕毁合约、撤退专家”这事的本身来说，在苏共是“下毒手”，在中共是受害者。按理，其

它共产党政权是应该对苏共生反感，对中共表同情的，可是情形并不如此。除了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和苏俄搞翻，转而同中共结成又是“万古长青的永恒友谊”外，东队各国和苏共唱一个调子，这不足为奇。但是邻近中共的外蒙北韩和北越也和中共离心，向苏共靠近，这确实是令人大可深思的现象。若非他们也察觉到“撕毁合约、撤退专家”是由于毛泽东要和苏共“争霸”所逼出来的，那就不可能再有其它解释了。这意味着：依这些小国来想：苏俄那么强那么大，把你（毛共）刚扶植成形，你就野心勃勃想夺他“为首”的宝座；我们离你这么近又这么小，你要得势将来我们还会有好的受吗？所以他们都心照不宣地倾向苏共这是很自然的。

远在西半球的古巴也表现了这一点。卡斯特罗在古巴成立政权后，毛泽东极力想在那里插一手，也确实给了些“慷慨”的支持。就是为赞扬卡斯特罗政权所拍摄的彩色电影，我们就不知看了多少部。可是在“争霸”斗争表面化后，卡斯特罗也显得对毛共“敬鬼神而远之”，卡斯特罗到苏俄访问了多少次，却不理北平，这使毛泽东大为“龙心不悦”，于是也采用赫鲁晓夫的手段，把供应古巴的大米立刻大大削减，想把卡斯特罗的脖子一下子捏住，卡斯特罗发怒了。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了长篇露骨演说大意是说：“古巴是产糖为主而不产米的国家，在中国一斤糖可以换五斤米，几年来古巴只是以一斤糖换一斤中国大米。现在就因为在某些方面，中共对古巴不满，就把供应我们的大米，忽然借口‘他们自己也需要’就大为削减，作为报复。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我们是一个小国，又不敢想搞什么‘世界中心’……”谁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凡是中共报纸要把对他们有攻击性的言论全文刊登出来，他们都是准备要大肆反驳的。而且他们在登载这篇演说全文时，也正是附注了这一点。可是

事过多日，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什么反驳，而是在新闻栏内发现中共是“慷慨到底地答应接受古巴要求供应全部大米（记得好像是每年二十万吨）”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读者会从“就因为某些方面中共对古巴发生不满”和“我们是一个小国，又不敢想搞什么世界中心”等语文中找出答案的。一句话，古巴和北越等国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毛泽东不愿把它吵嚷开来，就“打牙往肚咽，忍痛装心中”地满足古巴的要求了。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缘故，越共中共的关系，本来是很好，就因为上述的缘故，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就也对中共“敬鬼神而远之”。虽然在越战中，尽管毛泽东也搞了一些“扶助”，并高唱什么“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越南的可靠后方……”等调子，但越共仍以依赖苏共为主。凡是发表什么文告，总是把苏共列在中共的前头。在紧靠的南邻竟发生这种向“苏修”靠拢的“携贰”现象，毛泽东是要对付的。中共苏共一旦爆发正式战争，“苏修”要在越南取得活动权，那还得了！

西哈努克这个公子哥儿，在毛泽东的心中，他是一块什么材料？又有何种价值和用途？这个荣华富贵享腻了的公子哥儿，在寻欢取乐式的到北平几次访问中，都出乎他意外地受到像对待苏加诺那样热闹而“真诚”的欢迎，使得他心花怒放得“乐不思蜀”大写其“可爱的中国”之歌（西会作曲，这首歌后来在凡是有西出席的场合，都要为他演唱），并派他的儿女到北平留学（来去周恩来都设宴款待），在高棉也搞起什么“王家社会主义青年团”来。他变成了“中共迷”，虽然自恨“可惜自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可是亲中共、学中共，这总是他操之在己的自决权哪！”确实，搞这套在他是一种很富刺激性的新玩意儿，他又怎么能不“心向往之”？

就在他“安得逸儿”的自我陶醉中，在北平受过训的乔森

潘就潜回高棉，扯起共产党旗号，开展游击战搞“革命”了。也就是毛泽东把对待苏加诺的那套阴阳两面的手法，照搬不误地施用在这架“工具”上面来。

公子哥儿总是公子哥儿，接受中共这一套虽然好玩，但总不如带看漂亮的老婆到巴黎欣赏轻歌曼舞更有意思哪！这时候，他的副手朗诺对乔森潘这个大隐患采取行动，西哈努克对此竟在巴黎大表“痛心”，毛泽东在高棉正式亮出招牌，在高棉成立中共的“跨国公司”的机会到了。西哈努克在毛泽东的眼里虽是一只哈巴狗，只要给点儿好东西吃，哈巴狗总尔摇尾乞怜驯承主命的特性。这一点有妙不可言的价值，毛泽东是会充分利用的。赶紧把他弄到北平，投其所好地豢养起来，今日摆大宴，明日供歌舞，一行一动是专车专机，每来每往都是周恩来亲迎亲送，住的地方是为之特建的“元首府”。“人民日报”破例地提供第一版头条位置供他发表“文告”在高棉所享不到的尊荣，在其它地方所见不到的场面，使这位“哈巴狗”欢天喜地和俯首贴耳，百依百顺，死心塌地地供毛泽东得心应手地完成了以下三个要求：

第一、在越共背后通过西哈努克，让乔森潘放手建立“中共分号”式的政权，用以牵制亲苏远毛的越共。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运用是够得上“极尽鬼斧神工之妙”的。如果他只是光秃秃地唆使乔森潘明张旗鼓地去搞，那不但对于高棉暴露了“革命输出”的真面目和违背自己所倡“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调子，弄得“打草惊蛇”招致众恶，而且更重要的会使越共察觉其“玄机”，更促进“携贰”之心，对于支持“跨国公司”的物质运送，也会受到心照不宣的阻碍。所以在北平让西哈努克成立有名无实的傀儡政府，授乔以副首相兼国防大臣和总司令的名义，在高棉“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权

独揽地去搞，那真是名正言顺无往不利的。果然如众所周知的：越共、老（挝）共都打通了，朗诺政府也推倒了，乔森潘这个“分号”正式“开张”了，越共的背后的“监视哨”也建立了。

第二、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亚、非、拉许多被毛泽东划为“第三世界”的国家，有些就干脆和中共政权宣布断交。这一点，毛泽东当然明白，这是对他起了戒心，于他很不利。善于“通权达变”的毛泽东，对于这类问题通常不是从正面求辩解，多是采用迂回办法造成错觉来默化和麻痹对方的警觉。西哈努克本身既是贵族，而他所代表的社会制度又是与中共相反的。毛泽東如是就拿他做样品、摆橱窗，对外进行扩大宣传，以示“中共跟亲王都可合作无间”，那么你们还怕什么？从后来与一些国家相继复交来看，在这一点，西哈努克这个“驯服工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

第三、是“命”西哈努克携带全家老小几次三番作全大陆的访问，那种降重、热闹和动员规模之大，在中共招待外国政要史土，确实是够得上“空前”的。大城市那种全市结彩、锣鼓喧天，多少里沿途列队歌舞，大宴会大演出相继不绝，一举一动都由地方最高“首长”亲自陪随，一出一进都由车警护卫，还跟着望不到头的小轿车等等就不用说了，就是中小城市或少数民族聚居区，都要做到尽量动员和极尽夸张之能事。

每一次“出巡”并派出纪录新闻摄影队摄制成套彩色纪录片，在全大陆各个角落放映，用收扩大宣传之效。从影片中，我还想起：西哈努克在“巡行”新疆时，赶上那里正落着没膝以上的漫天大雪，穿着特为新制薄薄舞装的女孩们，列队伫立在凛冽寒风中冷得直发抖，脸都冻成了紫色。在西哈努克经过的一霎那，那种还得强颜欢舞的情景，我心中真有无法说得明的感触！读者在此，也可能要问：这是为什么？那就是毛泽东

自己已经察觉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把人心搞得终日惶惶，每个人都寝食不安地等待难测之事的突然发生。毛泽东为了冲淡和转移这种含有危险性的空气，又搬出这架"驯服工具"作了更充分的利用啊！

西哈努克绝不是白痴，而是一个有些政治权术经验的国王。他之所以心甘情愿被毛泽东"物尽其利"的使用，除了被在中共区所享的"尊荣"迷醉之外，当然最主要的，也是为他自己的妄念使然。以他的言论行动可以了解，他错觉地以为中共待他既然几乎等于"穿一条裤子"那样亲亲热热，而他又百依百顺地摇尾乞怜，这个"后台"是可靠的。那么作为"中共分号"的老板乔森潘，又是他以高棉"元首"名义委派在高棉"闯天下"的，将来总不至于对他"另眼相看"，最低限度名义上的"元首"是保得住的。也就是溥仪当年取媚日皇以"羁"关东军的迷梦，他又重做了。所以朗诺释放他的儿子们和母亲以促其回头，他就借机表示他靠拢中共支持乔森潘和朗诺干到底。那时候，他的未来结局，我们是已经看明了。果然，乔森潘登上统治高棉的宝座，把他请回去，往王宫里一放，正如溥仪当年一模一样。最近，他也许看出苗头不对吧，借口想要到法国去，乔森潘当然明白他想搞什么名堂。只不软不硬地说一句"那不是爱国者的行为"，他就不用想再离开高棉"王宫"了。但不知他的王宫是否也出现了当年在溥仪皇宫里出现的那种什么"××挂"？

他既不知自己在毛泽东的眼里是块什么料，也不曾看看：世界上有什么人和中共搞拉拢，想好处，结果都是"与虎谋皮"（这种人，过去是"屡见不鲜"，现在仍是"所在多有"呢！）。但这个"一物三用"的"驯服工具"，比起苏加诺来，他确实没有辜负毛泽东所望，不是失败，而是相当成功的。

由于中共苏共的“争霸”，因此顺便谈到毛泽东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南半岛“战略部署”的两个可悲的“驯工具”。

中共苏共大反目也罢，争领导权也罢，“争霸”也罢，这种情况，骤视之好像很奇突，但细思一点也不足以为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正如共产党自己所吹嘘的那样：第一次大战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次大战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当年，只有苏共是夺得政权的党，它不但有夺权的战斗经验和严密的人事组织，并且还有充足的政治与经济的实力。所有其它各国的党，不是处在地下就是处于在野的地位，不依仗它就不行，捧斯大林为“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我所知的中共用语），那是“有物质基础”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苏共的周围，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次大战后所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党，在苏共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物质的、组织的各种相应方式的支持下，在各自的国家取得了政权。他们是从苏共从属的地位，而变为争取的自主的地位。总的说来，或大或小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朝廷”。谁也不愿做别人的“儿皇帝”，所以时机一到，一个不对头，就要反目、出分裂。试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与苏共，不就是早就因两个“政权”的龃龉而搞成分裂的吗？所不同的，他们是由于“控制”和“反控制”，而中共苏共则是由于“争霸”而已。总之若是没有各自“朝廷”的出现，这个分裂是不会也无由发生的。既然出分裂，就要搞集团，搞集团不免再出分裂；那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成为空话，政权间的相互倾轧也必然成为无休止的斗争。这种矛盾律的恶性发展，是随看共产党的存在而贯彻始终，随着共产党的发展而循环扩大的。而且对内斗争更甚于对外，这也是它的政权性质给先天

决定了的。我所说的“对内”是指各个共产党相互间以及各党的内部斗争而言。举其要者而言，请看斯大林对于党内人士的残酷大屠杀，毛泽东对内的一系列无情斗争，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等，是人所共知的。这是为什么？是对内争“领导权”的问题。各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都把美国喊做“头号的帝国主义敌人”，可是苏共政权成立 60 来年，从未对“美帝国主义”真正交过锋，可是南斯拉夫共党政权一成立，苏、南就反了目，阿尔巴尼亚也只是不到十年功夫就和苏共成了仇。特别是中共和苏共那种指天发誓的“万古长青的永恒友谊”，也只是十数年，就由亲热的顶点降到冰冷的极端。不但珍宝岛兵戎相见，而且现在还百万大军列阵相峙，对骂喧天。这是为什么？这是相互争“领导权”的问题。

我在被关押 25 年的强迫改造中，曾学到毛泽东教给认识事物的法则“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我从他们的行为得到认识，又用这种认识去考证他们的行为，经过多次的反复，才得出这一个肯定的认识，那就是：在各自的对内来说，是“争权”；在相互关系来说，是“争霸”，不是你想“霸”我，就是我要“霸”你，总之是“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毛泽东教会了人们的。不能因为他们自己避讳提这个问题又忌恨别人谈这个问题，就不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俗语说的好：“纸里包不住火”，真相总是要暴露的，愚民政策总是不能长久的。强迫改造了 25 年，我也不应该白学一回呀！

由此可以推知，这样斗争下去，至少必然导致以下两种结果：一、从时代的观点来说，它们是从革命的进步性，已开始

向封建的腐朽性蜕变了。也就是说：以建立“王朝”，建立“罗马帝国”为内容，而什么什么主义只是幌子了。二、从他们的斗争手段来看，他们是纵横捭阖，渗透颠覆，无所不用其极（如：在各国收买、拉拢，建立自己的派系，苏共向中共派特务，中共向苏共建小组），这就使各自党内的清洗斗争必将步步加紧，而党与党的猜忌倾轧势将永无已时。

第二十一章　第二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后，因为溥仪走了，伪满队和我们之间的那道屏风，马上撤除，厨房的师傅，除了只留一个作为监厨，全部由伪满战犯接替，伪满队的伙食也降为跟我们吃一样的了。溥仪的弟弟溥杰同另一个伪满战犯，也到锅炉房抬煤去作劳动。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和溥仪到医务室劳动一样，做做成绩，下次特赦可能就有他，果然，猜中了。

第二次特赦，是在 1960 年 11 月 28 日，分别在北平、重庆、西安、山东和抚顺举行的。就抚顺来说，大会的情况基本上和第一次一样。伪满队有溥杰和王子衡，金名世，甘诸尔扎布等四名。在抚顺的国民党战犯，有高广荣、欧阳午、陈庆试、张普霖、阳丽天、冯国典、庞铮等七人。

这次使我们最受震动的，就是刘少奇在颁布特赦令中，有这么一条特别的规定，原文大致是这样的：凡是无期徒刑或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战犯，服刑已满五年并“确实”有改恶从善之表现者，死刑可以特赦减刑为十五年至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可以特赦减为十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从这条规定可以明白两个问题：第一，凡是被判过无期徒刑或“死缓”的人，至少必得蹲满十年到十五年才有出监的希望；第二，凡是被判过刑的人，不论“改造”得如何有“成绩”，也只能适合“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而不会被认为“已经确实改恶从善”，也就是只

有服刑，而无特赦释放的可能。至于那些判 15 年、20 年的根本未提，当然不在话下了。共产党的那套“宽大”和“加速改造”等等好听的话，一下子都揭底了。

在管理所的现有“战犯”中，除了伪满战犯都是未曾判过刑者之外，我们国民党“战犯”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已经判过刑的。人总有往好处想的倾向，在刘少奇这个命令公布之际，虽然都受了震动，但还认为：共产党的假面具，他们自己未必撕得一丝不留，如果能减刑为 10 年或 15 年，也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出监的。

在举行特赦那天，仍然是由辽宁省高等法院代表北平最高法院发给特赦通知书。等把“特赦释放”的发完了，就轮到减刑的了。记得第一个是方舟，他是电机厂下线组副组长，学习不坏，劳动更有突出的成绩。我们的下线，百分之百都是手工操作，不但多次比赛，他的质量和数量都是第一，而且其他电机工厂的工人还来我们厂向他见习。就是干部也承认：“方舟的质量和数量，在社会上也是第一把手啊！”他的表现既然如此突出，当然无疑是十年了（他是无期徒刑）。那个代表宣读他的通知书时，会场真是个个“洗耳恭听”。等到姓名、年龄、籍贯……到“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都念过了，下边竟是“特赦减刑为 20 年”！这时，大家的心真的像绷断的弓弦那样一跳。事情还不止此，下边还有类似批注的一句话呢：斗改判的刑期由送达通知书之日起算”！我的天！

第二个人是陈震东，他本是河南人，自幼在山西从军，由于受到阎锡山的宠爱，后来当了阎的“亲训师”师长。据说太原被共军攻破时，不少将校都群集在一预设爆炸物的地洞中（好像是煤井）喝完了酒，电钮一按，都一起壮烈殉难了，他当时没有在场，后来被捕判了无期徒刑。这一次，他也改判为

“刑期由送达通知书之日起”的 20 年。

总之，这次减刑的，都是“如此这般”的一概 20 年，无一不同。

会后，照例要进行座谈，“特赦释放”的依然那么少，而且大家都认为释放溥杰乃是溥仪的预定继续，所以对之冷冷清清，而对“减刑”问题，却成了“热门”，大家的心情都有说不尽的激愤，所以都纷纷争取发言。

有一位同犯说：才到管理所时，所长说他为我们昼夜不安并且一分一秒地都盼望出监的心情，而感到难过。可是，政府把我们过去由一分一秒所积累的十来年的光阴，都一下子给抹去不算了，他认为政府所讲的话，是很不易兑现的。

管理所的刘所长和许多科员们都不断到各号考察情况，他们的表情，外表上是故持镇静，实际是紧张的。

有位同犯也说：政府张口闭口总说希望我们“加速改造”，面对今天的事实，使他不能不说：“是加慢改造”。他过去已经坐了 10 年牢，然照现在所改判的刑期，如果把这算进去，还算够得上“加速”二字，可是要从“送达通知书之日起算”，那不是有意“加慢”吗？而且他现在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是否能再活 20 年，那也很成问题。若是死在监狱，对“政府”究竟是感恩还是抱怨？这个话，他真也不能知道怎么说才好？照他现在看：好像“政府”的考虑是：“活着出监的人，越少越好”！

有位同犯说：他虽未判过刑，但照现实情况来看，很意味着：“战犯”管理所至少还得 20 年才能关门。到那时，他就是能出去，也已活不了几年，真是越想越悲观。

有位同犯说：减刑为 20 年，再加上已服刑的 10 年，实际是 30 年，这种改判是“明减暗加”！

投机份子，真是到处都有。当刘所长在窗外往号里考察情

况时，有位同犯急忙争取发言。大意是：共产党遵照“伟大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对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和特赦减刑。可是有些人对于这种天大的恩典，竟然血口喷人地诬蔑什么“明减暗加”等等，这如果不是灭绝了人性，也是改造很有问题。要知道：“我们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天字第一号加三级的战犯啊！”这种恩典要是轮到他的名下，就是死在监狱，他也是“死可瞑目”、刻骨难忘！

他的这种发言，是想搞什么，当然大家都懂。但在这种场合，谁又能和他冲突呢？他既然不提名地指向那位刚才提到“明减暗加”的人，那位同犯就气得红涨了脸，他一着急还有点口吃，刚起来要唔唔，所长就进来说：“座谈发言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也不用着急，先坐下！”如是转过话头问大家：“听你们的发言，是不是对减刑，思想还搞不通啊？”还是那位说“明减暗加”的同犯先回答说：“把过去所服的刑期都不算了，实，实，实在有点那个……”还没等别人开口，所长又说了：“这在你们，那是很自然的。好，你们还是继续谈吧！”他把两个人的话打断后就走了。

我的发言，主要有三点：一、我在第一次特赦时说过：每年以特赦 10 人计算，全所 300 多人，至少要 30 年才能放完。从今年的情形看，这个趋势很有肯定的可能。那么未判刑的固然年年有希望（假定每年都举行特赦的话），可是谁也不能肯定自己能不能再等 29 年。从这一点立论，我看倒不如改判 20 年的希望还较固定些。二、从各国的法律来看，无期徒刑的罪犯，很少坐牢一辈子的。现在既然没规定有期徒刑可以再减刑，那么这改判 20 年实际上还是等于“无期徒刑”差不多，因为它不能再减刑了。我觉得政府这条规定，实质上是等于左手给你点东西，右手又拿回去了。说到这，那个投机份子马上插了

一句："你是说政府耍花招？"我立刻发问他一句："我只是摆事实，什么地方不对，你可以指出！"他把眼睛翻了几翻，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继续讲我的。三、我不但是无期徒刑，而且在劳改队"记大过一次"到现在还没有取消。如此看来，我这"加料"的无期犯，连改判 20 年，都恐怕难轮到我的头上。

这个座谈，一连开了两三天，除了极少数无耻的投机分子外，就连平日表现积极的份子也对此搞不通。实际说来，并不是"搞不通"，而是对这种"沽名钓誉"、"明减暗加"的花招，表示无可奈何的谴责。作为当权的政党，对于关在他们牢里的罪犯，要杀嘛，就干干脆脆地杀；要赦嘛，就大大方方地赦。今天，在"特赦"上都玩弄如此见不得人的卑鄙手段，其它就可想而知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发通知书那个人，在念到"刑期自送达通知书之日起算"的时节，声音忽然转为低沉和紊乱，可见他心深处的反应也是如何的不正常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

按常理讲：未判刑犯与已判刑犯，是有罪名和刑罚已否确定之分的。那么，依当时具体情况而言，特赦应该是对后者，前者只适合于"教育释放"。他们为什么要把两者颠倒对待而又不是同样以"特赦释放"处理呢？还是那句话：他们就是故意用这种不伦不类的"设限"，慢慢"挤牙膏"，用以试探台湾国民党的反应，已经达到心劳力绌的程度。

犯人的不满情绪实在太高昂了，使得到任不久的刘所长也不好立即采取批评或制止。座谈过了几天，他才召开大会讲话。除了那套必有的"形势八股"而外，对于同犯们的不满，尽量避免正面的批评。只是在列举几种发言类型之后，提出个新鲜的"一步走和两步走"的问题。"一步走"是指"特赦释放"，"两步走"是说改判之后可以还经再改判或者"特赦释

放”。他并且说：“进步有先有后嘛！未判刑的未必一定走在前头，已判刑的也未必走在后头。问题是在个人争取，只要‘确实改恶从善’，说不定这次改判的，下次就会得到‘特赦释放’了。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这一点大家不要再疑虑！”他停了一下，还重复了一句：“说不定这次改判的，下次就会得到‘特赦释放’，问题是在个人争取。……大家的前途都是光明的……”

所长的讲话，内容比较具体，凡是对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有认识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内容绝不是他以所长的职位敢决定的，显然是经过汇报上级并经过指示而发的。它使同犯们明白了两点：一、已判刑的同犯，非经过两道大关，已无出监希望；就是改判了的，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通过第二关；二、虽然共产党的诺言，向来不算数，但有作为代言的刘所长为证，明年再有特赦，也可能有那个被当作“样子”摆一摆，但是绝不会多。并且以后怎样？当然很成问题。以上这种看法，虽然当时都不能说出口，据我所知，绝大多数都有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确是如此。

从 1961 到 1966 年，又断续地举行四次特赦（连前共六次），只有 1961 年举行的第三次特赦，把第二次特赦中改判为 20 年的那个陈震东，真的做为“样子”“两步走”了；此外，就再也不见第二个了。请看看，共产党的说话和办事，究竟是怎样的！

更奇怪的事情还有呢！1960 年的改判是 20 年，1961 年改判就成为 19 年了。他们是把 1960 年当基准，再过多少年，就从 20 年里暗扣多少年。到 1966 年毕行第六次特赦，改判就成为 14 年了。1960 年以前，也蹲的是共产党监狱，可是他不算。1960 年似后，他却照扣不误了。刘少奇的命令，本是规定从 10 年起码，可是他不多不少，也不分等次，一律加一倍，咬住二

十年不放。算盘打得这么精，这简直是把“特赦”当生意做啊！

共产党对于这个“两步走”除了只用陈震东给“第二步”摆了一下“样子”，嗣后就无言取消之外，对于“第一步”他们也是极其心疼不肯让谁走的，我在此举发个例子说明一下。

我是“加料”无期徒刑，当然不在话下。据我回忆，一直到 1966 年第六次特赦，还有以下几个人根本未改判。

周建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曾在四川当过补训处处长，后来当过战地视察第 × 组组长。共产党占领大陆后，他就带着他左右转香港闲居。因为同乡（醴陵）和历史渊源，他听说和他最要好的程潜，在背叛国民党后当了共产党的湖南主席，这位仁兄就只身去长沙找程潜“投效”了。他以为他们过去关系那么好，哪能不对他有所安置呢？据说程潜是为了给他谋个资历基础，就保送他到“军政大学”先学习一下再说，其实是送他到那里“过筛子”。在学习中，发现他把那位杭州警校毕业又现任国大代表的太太留在香港，而且他（她）俩又是从台湾到香港的，问题越搞越复杂，说他一定是国民党派他去干特务的，他被斗所受的苦头，当然是一言难尽了。后来，他就被不明不白地判成了“死缓”！按共产党的规定，判这种刑的人若是到两年还没有“后效可观”的话，是要执行枪决的。这个大压力堆在头上，就是受多大的气，也不敢吭一声。而且他体格又瘦弱，劳动又不敢不拼命，他所受的苦头，就可想而知了。

幸亏 1951 年大集合，他由武汉转到抚顺，这个“死缓”也就不声不响地“缓”了下来。

后来在学习中，他那个老问题又被提出来。他既然找不出证据，又怎么说也难对头，如是就调动一个姓陈名达并且是出了名的“打手组长”，到他号里进行“大力帮助”。这个陈达组长又和他同是醴陵人，可能是要显示“划清界限”和“表现积

极”吧，对他就揍得更起劲。打得他遍体鳞伤满面鲜血，他忍气吞声，怎么也难以说得明白。

他平常的表现是规规矩矩，在“遵守监规”上是作得不错的，以他的体力条件来说，劳动也确实做到“尽力而为”。可是经过六次特赦，他的“死缓”仍是原封未动。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身体已经羸弱不堪，又在此时受到一场“劫数难逃”的无情斗争，共产党开天恩所设的“两步走”，他一步也没走，得感冒不到一天，就抱恨终天地死了！

周在当时，给人的印象是朴实温静，我俩很谈得来。有一次在下棋中问他：“你这个‘死缓’如果‘缓’不过来，要是被枪决，我不是也少了一个棋手了嘛？”他也很幽默地答了我一句：“关于这嘛？我倒已有思想准备了！”这话很有意思，我就问：“你准备了什么？”他颜色一变：“那就是：‘看啊！请世之不忠其党者戒！’”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戒”他是咬起牙来说的，给我的印象，真是强烈而又深刻！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我并不是领有正式党证的国民党党员），不知有多少人都应该深自反省检讨一下，也应该有所警惕！我现在写到这里，特别想起在许多方面都跟他极其相似的一个人，所以我要在此插上下一段。

张毅夫（在坐牢时叫张严佛）也是醴陵人，并和程潜、陈明仁交好。程潜在长沙宣布背叛，据他自己讲，他确实出了不少力。那时的军权是掌握在陈明仁手里，所以程潜要举事就非先打通陈明仁不可；但陈对程的叛逆行动很不以为然，所以就借机回到醴陵躲起来了。这个家伙于是马上去醴陵游说，因为他这个从南昌跟邓文仪起家，做到军统局仅次于戴笠的角色，都看国民党大势已去而疯狂搞背叛了，这本身就对陈起了感染力。据他自己说，他和陈明仁的私交又那么要好，百说千说，

陈明仁才动摇，由他陪着回到长沙。他自己以为他是建立了为共产党开了“南半天”的功劳，就乐滋滋地等待“论功行赏”和准备“高官得作”了。而且程潜所以敢明目张胆搞叛变，也是因为有他这个军统要员入伙做保镖的缘故，所以他觉得只要有程陈两个人在，他的“功臣”之位就保定了。可是，共产党进入湖南之后，连同和他搞鬼的任建冰以及他所保荐的陈达，都逮捕归案了！他和我常“聊天”。不但对共产党悻悻然怨恨满腔，而且对陈明仁所说“学生哪能背叛校长”之词也还大不为然呢！后来在 1963 年前后，因为他关联到成都一个什么案子，就解到北平去了。1975 年全体释放后，听说他在不久之前，死在秦城监狱。我不免想起周建陶所说“看啊！请世之不忠其党者戒”！

在国民党的老一辈，很多熟悉谢膺白这个人。他曾在中央军校八期当过总队长，后来又作过江西省政府秘书长。他也是被判无期徒刑（也可能是“死缓”，已记不清了）。这位广东老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乐天派，总是笑咪咪的，很少看到他有不愉快的时候。在我们当中，他虽是最老的之一，但是身体特别健康，耳聪目明，牙齿未脱一个，也从来未到过医务室，连检查体格的人，都说他：“至少可以活到一百岁”。他在学习中，从来没听说“发过怪论”，70 多岁的年纪，劳动还受过表扬。应该说是合乎“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了，可是一直到第六次特赦，仍然是“原封未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小组批评的第二天，就被一些面色惊慌的人抬往医务室，没过两天他就没走“第一步”先走“第二步”，被送出战犯管理所，转往火葬场了。

吴汝诚是四川人，小学教员出身，共产党进入四川以前，他在中统局重庆办事处工作，也被判无期徒刑。他体力很强，

并担任木工组组长。他的“改造”也是有表现的，他是没走“第一步”而先走“第二步”得以活着出监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他是在 1975 年 3 月“全体释放”时，随着“全体”而释放的。另外的一个，就是笔者我段克文了。若不是有这么一个“全体释放”，说不定到 1980 年全部被改判的都满期（20 年）后，我被改判，就要另起 20 年了，倘然那时我们还能活着的话。

在八年中，仅举行六批特赦，以战犯管理所而言，释放的总数不出五十人。他们所以这样若断又续，释放不肯多，减刑还怕宽，（这完全说明了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已经费尽了心机。对于他们这种“口蜜腹剑”的行为，我固然愤慨不置，但我确也看透了：在他的心机用尽之日，必然要出现 1951 年大集合那种未曾实现的情况！——开门放！所以有些同犯和我私谈，不满“挤牙青”和表示悲观时，我就“十拿九稳”地告诉他们：“同犯，不要悲观，‘牙膏是必然要啊挤’的，但要挺得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好事在后头呢！”等到 1975 年 3 月 19 日。连“改造表现”都不问就全体释放后，他们纷纷乐开怀地向我握手说：“唉呀，老段！这么些年，你始终肯定，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关于第二次特赦中的欧阳午，我在前文“恍然大悟”一章里，也曾提到过，但语焉未详，现在，应该补充一下。1948 年 10 月，以曾泽生为军长的第 60 军，在长春被共产党煽惑叛变时，他是 60 军的第 52 师副师长，该军所辖其它两个师，原来都是龙云系统的云南部队，唯独该师是由中央拨归建制的。就当时的防务区划来说，60 军的其它两个师，是处于 52 师和新 7 军（也是中央军）之间。曾泽生当然明白这种背腹受敌的形势，对于他的叛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就以“开会”为由，把 52 师师长李嵩骗到军部扣押后，欧阳午就“举足轻重”

了。当时第一集团军（辖新 7 军和 60 军两个军）发觉曾泽生的叛迹之后，曾命令欧阳午对 60 军进行监视并直接接受该总司令部的指挥。如果欧阳午照办，不但可以制止曾泽生叛变，而第一集团军（包括新 7 军）也不致被迫“放下武器”，从而整个战局也不致发生那样急剧的变化，可是，欧阳午却硬是带 52 师随曾泽生叛变了。

他把队伍带离长春不久，他就被送到“军政大学”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思想了。在那里给扣上“假起义蓄意叛变”的帽子，狠批恶斗，整得死去活来，接着就把他关进神鬼都发现不了的单身牢房达 7 年之久。若不是毛泽东黔驴技穷之中又对台湾搞统战阴谋，在 1956 年初，把他同我们一起被集中（见前），他准定是被折磨至死而送往火葬场，那是无疑的。

欧阳午的体格很瘦小，在战犯管理所，他是张口认罪，闭口感恩，向来不提“起义”二字（这意味着向共产党“倒算”），很怕再犯错误。劳动更是绝对拼命，每次出工站队，他总是提前早到，抢站第一名，在现场，他总是一声不响、聚精会神地干活儿。我曾和他同组两年多，每天收工回来，他都累得精疲力竭，他满脸满身都弄得污秽不堪。我们常常喊他“小鬼儿”，他却以此自鸣得意呢。因为他确实够得上“全力争取”，共产党总算“开天恩”，把他在 1960 年特赦了。也因为他抑郁难申和劳累过度，他到家就得了瘫痪，以后，就不知下文了。

在大陆，奉为“圣旨”的毛语录，曾有这么一句“最高指示”：“党的政策历来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一个“镇压反革命”就至少杀了 300 多万人，他们的帽子，当然是“首恶”，这一点共产党确实是做到言行一致了。而许许多多根本没犯任何罪行的人，不是也开刀问斩，就是毫无道理地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那就不是“胁”不“胁”、“从”

不“从”的问题，而是说话算不算数的问题了。至于“立功者受奖”，除了是“统战”的骗术，我在 25 年中从来就不曾看过一个例子。像欧阳午这样遂行了曾泽生“起义”，进而演成东北、华北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巨变的家伙，结果还是那种下场，毛语录都等于放屁，他们还厚着脸皮说：“共产党说话向来是算数的!”说来真怪，世间偏有一些人硬是迷信他们那一套呢。唉。他们是没吃过共产党的苦头啊!

请读者不要以为欧阳午的例子是个别的，也不是共产党所说的：“抓住一点当全面”，而是有一大堆活生生的事实做活生生的证据啊！这，容待我在后头再交代吧。

第二十二章　两件“怪”事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曾发生两件出乎人们意外的怪事，而共产党的处理也更出乎我们意外的“怪”，因为这两个“怪”很足说明一个问题，所以我要在此谈一下。

（一）

1960 年夏，有个科长在一次集会上的讲话中，曾无头无尾地提到这么一段话：“人家那么年轻，是为大家的健康服务，自己这么大年纪，怎么还发生那种想法，真奇怪！我今天不指名，希望他要好好反省，及早检讨，及早回头……”这话既无具体内容，又没透露任何人事关系，听他的口气好像很严重，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谁都莫明其妙。

不久，有一天在俱乐部看电影，还没开始放映，有一个女护士忽然表情很不愉快地走了，有位同犯忽然起来要跟出去，经在旁同犯的强力制止而罢，嗣后大家打听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那位同犯老把眼睛盯住那个护士不放，被人家发现，就生气走开了，那位同犯就是姚步烈。

在这以前，不知他已打过多少次报告，要求和那位护士结婚。这件事，管理所当然没有向那名护士透露过。在俱乐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这个护士也就不见了。据“马路消息”，她是到锦州和一位医大毕业的医生结婚去了。但他再见不到那个护

士，就发疯起来。今天给管理所打报告，要准许他在管理所结婚，明天给医务室写信，请求和她会面，若不然就在笔记日记大写“情诗”或“恋爱文”，简直闹得翻了天。

事情已经搞得尽人皆知，小组就发挥组织性地对他展开大力帮助。问他那个护士叫什么名字等等，他都一概说不出。问他为什么要发生这种念头？他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后来在同犯穷追之下，他说在打针时，那位护士摸他的胳膊，那就是爱他，所以他非要求在监狱结婚不可！

在大陆上的医护人员，服务精神的确是不错的。就以战犯管理所而言，不管是刮大风、下大雨，或是雪深没胫的严冬之夜，只要发现有人发生病情，他（她）们总是立时从监外赶来，不眠不息地进行耐心细致的营救，从来不曾有过半点倦怠。就是平常，他（她）们也没有过粗言暴语，而总是勤勤恳恳地尽量避免发生使我们有受刺激的感受。真真实实为患者服务，殷殷切切“治病救人”，他们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我们到管理所时，他们都是青年英俊，她们都是小姑娘或少妇。等我们出管理所时，他们和她们都是儿女成行，成为中年以上的父母了。他（她）们人生最宝贵的青春都为服务于我们的健康而逝去！我没看到他（她）们晋过级，我也没看到他（她）们因为家务的繁重（下班后要做饭洗衣和照顾儿女等）而疏忽本职，我更没看到他（她）们由于待遇的微薄而不耐烦工作。我记得：有位同犯得了那么一种病，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蹲在地下采取很低的姿势给他打针，可是那位刘护士已经怀有八九个月身孕，一点不犹豫地双腿很低地蹲在地下，愉快而耐心地费了很长的时间注射完，又和颜悦色地把他扶回躺在床上，盖好被子才走开。这是货真价实的忘我救人的崇高表现，是感人的，难忘的！这种高贵品德，是不能与那种一意孤行、不惜把百万千万人的

生命拿来为自己权位服务的野心家、当权派同日而语的。

我们对于医护人员都有此种不同程度的感受，护理人员给患者打针，摸摸胳膊细心寻找恰当的脉管，这正是她要为患者作更好服务的表现，凡是身历其境的人都应该对她发生敬意与感激之心。可是这个思想肮脏的同犯，看她年轻貌美就动了邪念，所以很激起大家的不满，都对他不齿并群起而攻之。可是他又无动于衷地坚持己见，说理不成，就继之以武斗。就是把他打得鼻口出血，他都站在那儿，不理不睬若无其事地一口咬定“非结婚不可”！甚至整个学干时间，都在为他开会，一连闹了多少天，他仍然如故。小组监视他不准打报告写诗文，也不知他趁什么机会，竟写了些小条子，不是向反映情况箱里投，就是向值勤班长递。我们以为他是得了精神病，可是他不管是学习、劳动或是其它方面，都完完全全正常。说话既不“走板”，办事也无变态，但是每在学习发言时，他拐弯抹角，总要提及那个问题，当然又是一场武力制止。

这件事已经闹了两年多，实在太不象话。同犯除了限制他在任何场合发言，或阻止他再写诗文或条子以外，对他也实在无可奈何了。一天，我看到他的铺位连行李都空了，我探询其故，同犯们都毫无表情地说：“科员通知他，卷起行李走了，谁知到哪儿去了？”从此，一年多毫无消息。对于这种情况，大家都是“心中有数”的。因为人们对他所设想的结局，作为犯人来说是一种“不祥之兆”，并且又怕谈起来会惹麻烦！所以谁都不谈他。说句痛快话：在共产党监狱，竟敢在工作人员身上，发生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我们所见到的事实，他要不遭枪决示众才怪。毛泽东不是有那么一条语录吗：“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予以制裁！”他确实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条

明文法，下场当然是“死路一条”。

到 1963 年春，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把他又解回管理所，关在三所一个单号里，窗子都密封，门也加上重锁，任何人也不准往里窥视或者交谈。不久，就举行第四次特赦（该年四月）依我在劳改队的经验，我肯定：他是被送往别处确定案情后，又押回管理所，准备在特赦大会上，执行“就地处死”的！

在举行特赦大会那天，全体“战犯”都到俱乐部后，果然有好几个干部把他押进俱乐部，放在最后一排一个独立的凳子上，在后边看着他。这不是长春劳动队杨守田（见前）事件的重演吗？论他的“现行犯罪”，比杨是严重得多的多呀！等到释放和改判的通知书都发完了，“首长讲话”一开始，我心想：只要一提及“姚步烈”三个字，他的恶运就算注定了，可是连公安厅首长讲话也没提到他，我又以为：台上横额仍写的是“特赦大会”，必是要等首长退席之后，再换横额另开会的吧？首长们退席之后，司仪人竟高呼：“大会到此结束！”干部们把姚先押回，我们才相继回号子进行座谈。

我是首先争取发言的，找认为：就我经验主义的看法，不论就姚的“现行犯罪”或是被押回来后的禁闭情况来看，他都是要被“就地处死”无疑的。不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作为被关押的罪犯，如果那样嚣张地直接向管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女性——肆意污辱，要说不被制裁，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那个女护士乃是为患者进行服务，他竟以如此卑劣和疯狂的行为来对待，也是任人所不齿的。尤其那个女护士是已经订过婚的少女，他的悖谬行径如果“以讹传讹”的话，她在社会的尊严、亲友的关系、婚后的感情，以及她个人的前途等，又将造成怎样不幸的后果？只此一端，他的道德犯罪，也是极其严重和不可原谅的！在我被关押的过程中，我看到的事例都是比他

轻的多，而都处了死。而他今天，居然“安然无恙”，也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尤其是：那么多合乎“确实改恶从善”者释放老是如此之少，而减刑改判者，又设限如此之严，而对现行犯罪者，又如此宽大无边，不予处死，这是怎么回事，我也确实困惑不解。

其他同犯的观感，少数与我大同小异，多数都以强调共产党的宽大为重点，那都是怕惹麻烦的“应景”之言，我是完全理解的。

特赦大会过后，姚所蹲的禁闭号，门就不再上锁了，有时又放他出来到院中散散步，渐渐就也将房门大开并准许他和人们说话了，过了一个多月就放他回正规号，照常参加学习劳动，和一般同犯合为一体了。

他一年多来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了，许多同犯都在交谈中试探他的口气，可是他一发觉，就示意“不谈这个”，所以始终是个谜。但我认为他不是被解到辽宁省公安厅，就是被解到北平去受审，被判死刑也是很可能的，但因共产党中央不批准，所以又解回管理所“以观后效”了。

他一切恢复正常以后，情形并未好转。只要同犯一疏忽“照顾”，他还照常打报告或写信。只要听到他那个号子动武的声音，不用问，就是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不管怎么揍他，他仍是“若无其事”地我行我素。不论他的思想实际如何，但他的表现也确实是无耻极了！胡闹极了！在我的一生中，确实还没有见过这么耍流氓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是“依然故我”，受到多少次的武斗，当然可想而知。

大约是 1970 年冬，他在劳动中，忽然发觉腹痛如绞，医务室就急忙把他送市立医院诊治。初以为是盲肠炎，手术都准备妥当了，但检验报告，说他不是盲肠炎，住了两天，又回到管

理所。接看医务室主任又接连几次把他送到设备最完善的抚顺煤矿医院去检查，按惯例医护人员是绝不向犯人患者透露病情的。这时，他已经不那么痛了，但还不准他劳动，并破例地批准给他一个月的病号饭。如是，大家都觉得他的病已不是一般的了，接着医务室主任又陪他到沈阳著名的医科大学去详细检查了两三次。据他回来说：不但经过许多医生会诊，而且上了几次他也叫不出名的仪器，进行极其详细的检查。当然，他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病，这时他一点也不感到痛了。如是就不吭不响地又去出工参加劳动，被医生发觉，马上就把他从现场立刻调回到号子休养。他对医护人员犯有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是罪行），而医护人员也还是“若无其事”地照旧尽心竭力地照顾他。又过了不久，他的腹痛又发作了，送到医务室病号，他的腹部溃烂出一个洞，一切秽物都由那里流出，弄得同室病犯都嫌臭得要死，可是女护士仍是无微不至地护理他，并小心翼翼地给他打针（大概是止痛针）。这种感人的“治病救人”的伟大精神，我到现在也是感同身受的。到医务室病号不到三个月，姚步烈这个家伙就带着满脑的肮脏和满身的臭气死去了。据我想，他可能患的是肠癌。

（二）

不是 1961 年就是 1962 年末，共产党曾派来一个小组住在管理所，要我们曾在国民党“中统”或“军统”工作过的人员写下隶属过的机构全部系统材料。曾经给张学良主持过特务工作，后来又成为“军统”要员的陈旭东，也是其中的一个。不但那个小组的人员常找他谈话，据他说共产党还另外派来一个年老干部住在管理所，专门和他谈过两天话，向他了解西安事变之前的内幕情况。从管理所人员对之必恭必敬和在大灾荒尚

未解除之际竟特备罐头营养餐来看，那个老干部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陈的态度又是优礼相待，并有些“赞扬”的表示，陈也觉得很高兴，他认为他的前途是出现光明了。

在对赫鲁晓夫展开如火如荼的大批判之后，他忽然迎着风一跟唱起“反调”来。他张口说：“赫鲁晓夫是真正马列主义者”，闭口说：“赫鲁晓夫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等，和毛泽东唱起正相水火的调子。不管会里会外，越唱越凶。不用说是在监狱，就是在整个大陆，除非谁安心不想要脑袋，谁也不敢这么干的。所以在整个管理所，从干部到同犯都起了很大的震动。不论是在院中散步或是劳动等其它场合，值勤人员都在暗中注意他，他已经成了“危险份子”，谁又敢和他相近惹“沾包”呢？

小组会上“帮助”他，他不但不服，而且还说：他的思想早已“入党”了，他作为真正信仰马列主义的人，在真是真非之前，是不能东倒西歪的，他们那个小组为他开的会多得无法计算。他越说越起劲，越来越坚持，许多人气得要向他动武，管理所对此又三令五申地严厉制止，所以大家也都在“徒呼奈何”中，对于此等“特殊照顾”，也确实“大惑不解”！

“人民日报”有一次报导一条消息，说陈旭东（当然是另一同姓名者）接任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他说：那是国务院已经先行给他安排的职务，他不久就要到北平就职了。事有凑巧，我们有一次吃鱼，他也说：那天正是他的生日，乃是政府专为他安排的，他就真像“有恃无恐”更加肆无忌惮了。

在每次会上，主管科员总是参加不误，并且细心静听不置一词。后来闹得实在不可开交，只是在一次思想检查中对他展开大字报式的批评，可是他仍是我行我素无动于衷。我和他本是旧相识，在管理所的初期也很谈得来。有人在他唱出“怪”

论前，曾看到他把共产党北平高级党校校长杨（又好像姓张，已记不清了）献珍的一篇短文让我抄过，在我们组会上曾对我提出警告，说那篇文字乃是可以两面解释的“毒草”，陈给我抄是有用意的。因此我就以该文为主体对他提出揭发与批判。他也和颜悦色而又洋洋自得地讽刺我说：“若不揭批我，那怎么能算进步？没关系!”他对所有的批判文章，照旧是相应不理。在七八年里，主管科员和科长，曾和他无数次地单独谈话，他是软的不吃硬的不受，一口咬定，他是对的。

1964 年春，我们到北平参观，他的妹妹到秦城（我们住在秦城监狱）去看他时，得知他在共产党监狱竟敢和毛泽东唱对台戏，真如晴天霹雳，吓得惊慌万状，痛哭流涕地和他谈了两天，他还说他妹妹多管闲事。可能是她又把此事转告给他的老婆和儿子，他（她）们隔不多久，就来了封长信进行痛切的“帮助”，他还是照旧无动于衷，而说要坚持真理的。

在两次特赦大会上，首长在“照稿子宣读”的讲话中，都曾提到他的情况，并给以严厉的警告。特别是第二次，口气之激烈，我们听来都觉得可怕，可是他却毫不在乎。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公然明目张胆地为苏修叛徒集团张目，这是在人民的监狱，肆无忌惮的坚持反革命!……”等等，足见此事已经搞到共产党中央，它的严重，可想而知。可是这个陈旭东的会外表示是：“这是政造教育的机关嘛！批评那是理所当然的，不批评怎么叫‘教育’呢？”在那次严厉警告的大会后，科长马上找他到学委办公室进行半公开的谈话。这可能是认为他在如此大会的重大压力之下，可能做出“就范”或者“低头”的表示，所以才采用这种方式，对大家可以起些“教育作用”吧！可是他的态度还是照旧的坚决，弄得那个科长下不了台，气得满脸通红而去。他呢，还满肚子不高兴，去厕所小便时，还自言自

语地说：“思想若一压就倒，那还叫什么思想？”我和另外一位姓黄的同犯，看他实在很危险，很有意找机会私下“帮助”，他发觉了就老躲着走，看来，谁也对他无可奈何了！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陈旭东被调入上述那个“打手组长”陈达的号子。不几天就哄通哄通对他“开火”了，那个号子都是些身强力壮的莽汉，在陈达“喊号”下，一个不对头，就劈头盖脑一顿打，然后就按他跪在地下讲话。他起初是进行反抗的，但这是一种有计划的预定步骤，他越反抗就越“一窝蜂”地向他进攻。他的体力不强，也可能他觉得火候已到，他就不再抵抗，而表示交代。陈达“命令”他，主要地要交待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在大批判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修判徒集团当中，要大唱反调？第二、其目的何在？问题虽然提得这么简单，但是交代起来，却要面面俱到，字字落实，而且枝枝节节，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抠得详详细细。当时都作好记录，并汇报在案。每天开会，都迫使他跪在地上讲话，一连搞了一两个星期才结束，这个苦难，他确是够受的了。

我和他不是一个小组，斜对门隔窗相望，只偶而看到他们号子的一些片段的动态，具体情况不得其详。嗣后综合他们号里同犯的透露，他的交代大致如下：第一，他一听到骂国民党是如何罪恶滔天，他就不服。若没有国民党，中国就不会有今天。国民党对国家和人民之功是不朽的，不容歪曲；第二，他的年龄已入老年，反正也活不了几年，与其受辱而生，不如殉节以死，其心已决，所以一切都不在乎；第三，他认为中共与苏共，当日好得如胶似漆，一旦又恶如寇仇。这是反复无常，他同情赫鲁晓夫。以上三点内容当然很丰富，我只是撮其大意而已。他在小组交代完了，还一五一十写了自供状，然后经过陈达核对无误，才交给了管理所。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那天我因为患了感冒请假休息，总觉得他们那个号子好像有事；我起来一看，主管科员正在他的窗外走廊里向里面注视着，虽然面现笑容，但一看就知是故意做作的。我就假装到三所图书室去，经过他们门前一看，陈旭东正在收拾行李，他望了我一眼，仍是不慌不忙在收拾他的。我心想："情形不妙啊！"但也不好停留张望。我到三所一看，吕科长正在值班室那里掌握情况呢！接着主管科员（姓谢）就来向他汇报。讲完以后，吕又喊他回头低语了一阵，谢会意地点点头。我一心想要看明情况，在图书室里无法坐下去。在我放慢脚步回头的时候，谢就故意含笑地问陈："你收拾好了吧？别忘掉东西。"陈答："收拾好了！"他的表情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失常的样子，我却很紧张。谢说："那就拿着走吧！"他们直去俱乐部。据我估计，不是检查行李文件（笔记之类）就是"上绑"。什么时候从那里走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回到号里很是忐忑不安，从他事情发生的经过，想到文化大革命和近来的交代，特别是今天科员提他的表情，我肯定了他的严重性。那天正是我们主管科员（姓崔）值班，我猛然想出一个问题，去请示他。他正在低头出神，我说的什么，他都显然没心听。我不知趣地又说了一遍，他很不耐烦地说："等有工夫再谈吧！"当然我明白：他和我是想的同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陈旭东今天"走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以来，过不了几天，就见到监外举行公审宣判大会，押解犯人沿街游行示众（人民叫它为"敲山镇虎"或者"杀鸡吓猴子"）的举动。轰轰的汽车多少辆，每辆车上都由武装兵押着上了"五花大绑"并插上"招子"的犯人。在汽车行列的前头和末尾，还放上一辆特备许多强音广播大喇叭，高音女声嘶破喉咙地拼命喊着口号和某些犯人的罪名等。相去几里

都能听得到，使你毛骨悚然！就在陈被解走的第二天，又听到监外传来这种声音，而且越来越近，紧靠着战犯管理所过去。虽然我没听到“陈旭东”这三个字，但只就时机而言，我也认为他是“完了”！

他走后，在私下也都纷纷议论：他是“在劫难逃的”。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位同犯可能是出于“探探别人口气”的用意，他在发言中，转弯抹角地提到陈旭东时说：“也不知他的下文是怎样的了？”我们刘组长马上接过来说：“怎样的？那还用说，‘镇压’（那是处死）了呗！”如是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在陈走之前约两个星期，管理所就召集一个他曾经参加的小组，撰写一个文件，其中关于陈的历史罪恶和现行罪恶，都经过一番整理，作有系统的罗列，呈给政府，作为处死的准备。要不是陈已经走了，他是绝对不敢透露的。所以他肯定陈是已经被“镇压”了。他的这段具体经过，使大家的原有看法，就更加确定了。从此以后，也就很少有人再提他。

1975 年 3 月 19 日，全大陆在各地关押的“战犯”，除了袁晓轩一个人仍关在北平秦城监狱之外，全部释放后，马上都集合在北平，住在前门饭店。一天晚上，在走廊里忽然有人很高兴地在背后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完全出乎意外，他原来是陈旭东！喜得我俩跳起来！他当年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自己也“不摸底”。把他解到北平秦城监狱，送到密封的单人禁闭号押起来，既不准通信，也不准接触任何人，一直到这次释放前几天，忽然提他出去量衣服尺码，他还不解其故，到举行释放大会，他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对于他的问题，依据前前后后的情况来判断，我认为：在离开管理所之前的阶段，是准备把他处死的。但是毛泽东没批准，所以才把他解到北平，用密封禁闭号关起来，他的下落既

不明，谁又能知道毛泽东的打算是什么？

特赦我们所以要慢慢“挤牙膏”，减刑又舍不得让我们在20年内能出去，其用意不外是在台湾问题上动脑筋。那么对于犯了严重监规纪律的人，他又大破其格地绝对不杀，这当然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然，他们也绝不会史无前例地对“事之不能忍者忍之”！共产党的一切，都是为他们的“江山”（不是“人民的江山”）服务的，为了他们的“江山”，他们可以干出别人所不能干也不敢想的事，用出别人所不能用也不肯用的手段。谁若为他们的甜言蜜语（例如对苏俄与“民主”党派）或者戏剧艺术的手法所迷惑，下场必定是可悲的！时机一到，要不遭毒手才怪！

第二十三章　关于写材料

从我们被押那天起，一直到脱离共产党的控制那天止，写材料始终是我们重要的“利用价值”之一。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控制下，不管在监或是出监，只要人还没死，就得无条件地和百依百顺地给共产党写他所需要的材料。在起初，他们还讲些什么“立功争取”或者“也是靠拢政府的表现”之类的空话，后来他们就把这当作“是否肯于跟共产党走”的标准来对待了。写的合乎要求，乃是理之当然。如果不能认真或者马马虎虎，还要记上一笔黑账，等于自己“告”自己。所以有不少人，一直到死或者大释放，还在成天写材料，问题还越搞越不清，越弄越复杂，因为共产党的刑罚，根本没有什么法律条文作依据，而是凭他的政治要求，要怎么来就怎么来。写不好是不得了，而写好了又了不得。在写材料这个问题上，同犯们所受的精神痛苦，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老实讲，我在这上面所受的苦难是比较少的一个。因为我的社会关系不复杂，写的材料又少，“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虽然也受过批评，但又有什么法子呢？

写材料，总的来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俭举材料。在我们被关押的 25 年当中，可以说：天天都号召我们写，特别是在我被捕初期，他们急需寻找端倪，档案的基础又没建立，所以他们曾用“戴罪立功，争取宽大”等类的话，给在押人以诱

饵，让人们尽全力“争取”。据我在全部历程里所知，没有一个人是由于写这种材料而得到宽减的。在管理所有个姓李的，由于他的检举曾破获了一个打入并埋藏在共产党内很久（二年多）的组织，连管理所都要把它编为话剧，以后做“示范”。排了多少天，都已经过预演，就是因为怕“此功成立，不得不奖”，所以在将要演出之际临时取消了。

写这种材料是犯人的一种经常性的“任务”。并不只是战犯管理所如此。共产党除了过不到几年就作为一种运动进行号召外，并告诉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起来就写，在管理所专备有这种纸张，不管用多少，他们都是很不吝啬地供给无缺。我们在管理所，历年都要写一份“学习改造年终总结”，管理所还要求把“写了若干份检举材料”写上去。当然这是一种“麻醉剂”。他们的用意是要人们自我造成“立功有案”的错觉中，更多的检举过去的“自己人”。

写检举材料，要交代明白以下各要点：一、姓名（包括别名等）、年龄、籍贯；二、面貌特征；三、身材特征及高度；以上两点是为印证本人；四、被检举人的出身履历及阶级成分；五、他的主要及最后的工作职位和曾否参加党派组织？以上两点是提供被检举人的历史情况；六、被检举人都曾犯过什么罪行（反对共产党或是一般刑事犯罪）？每次都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同那些人？七、这个被检举人的最后住址及其以后的可能去向；八、还有哪些人曾和他来往密切？以上八点，当然不是那么呆板的，而是知多少就写多少。每个材料规定写两份。据我推测：可能是把一份送交共产党中央主管部门供做编审统计之用，另一份留在省级备查吧！

我是写材料最少的，但在 25 年中，至少也写了 30 份以上，就以这个最少数类推，全大陆有三、五百万犯人，总计起来至

少也在一亿份以上了。这当中有不少是重复了的，但这种重复正可补上彼此的不足，俟共产党中央经过整理编审，就可汇成一套完整的东西。落上阁王殿上的生死簿，你又逃不出大陆，早晚总要拿办归案的。在大陆上，奴隶劳动的犯人大军，所以有增无减，这种检举材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多增加一个犯人，不但增加一个长期的无偿劳动奴隶，而且又减少了一个共产党的“眼中钉”。所以他们是千方百计地推动“写材料”。相反地这些写材料的人，也给自己更套上了相应的绞索，只有愈套愈紧，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共产党是会放松的，这也只是“武大郎服毒”，吃了是死，不吃也是死。而不是什么别的。

第二类是写系统材料。所谓“系统也者”，就是按照某些人过去各个历程阶段的所属机构，作有组织有系统的叙述。也就是说：共产党要从各个个别的部分拼合出国民党某些总体机关的全都内容，裨能作全面的了解。不论党、团、军、政、警、宪、特，只要他们认为可以达到他们这种要求的人，都曾写过这种材料。

因为我曾在吉林省政府当过参议兼驻长春代表，他们就曾叫我写过关于吉林省政府的系统材料。但我只能按照所拟的组织系统表，填上能知道的主管人员外，在分条说明中，我既无从指出他们的人事背景和经历，更指不出他们的具体工作内容。至于其他各县市，我除了只能把我当过八天县长的伊通县的组织系统概况，粗略地列出一张表之外，主任秘书的名字我是填出了，但是他的历史情况，我也只能知道他曾在公营企业机构当过秘书，至于几个科长的名字，我还有两个搞不清楚。所以我把这份材料交给主管科员时，他只是“嗨”了一声，再就是点点头让我走开完事。这是我决定了的历史情况他们不满意，也只好听他去吧！所幸我在材料的末尾附了这么一句话；“关于

吉林省政府的问题，在押的尚传道（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和黄炳寰（该省警务处处长）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全面更明确些”，我总算做到尽我所知了。

大约在 1962 年冬，共产党曾派来一个小组，住在管理所组织我们过去在“军统”、“中统”两部门干过工作的写系统材料。一天，管理所负责人，召集我们在这两个部门职位比较重要的人开了一个会，向我交代的大意是：我们都曾在那个部门担任过重要的工作，现在“改造”这么多年了，都有一定的进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可以回到人民的行列。政府组织我们能把过去所属的组织系统作个全盘的交代，这既是改造的表现，又给自己免去“后遗症”，对于未来是非常有好处等等。这种挑引我们错觉的空话，使得我们的耳膜都听得起了茧子。我们是在押的监犯，还不是叫怎么做就得怎么做？写系统材料的要求，也如前文所提的那样。开始时，是集合在一个空号里写。那个小组的成员每天要来几次，一方面是考查我们的进度，一方面也是在调查我们的态度。当天写的当天拿走，大概是去核对或研究吧，过几天又给送回来，准备装订成册，一起再交出。

我对于这份“差事”，真是苦恼万分。别人写了上百页，我还不能动笔。他们问我缘故，我说：“想了这些天，简直还不知怎么写才好！”他说：“知多少就写多少，那还有什么难的，实事求是嘛！写吧！”既然是“知多少就写多少”和“实事求是”，我的思想开朗了。我的顶头上司是戴笠，我的下属是陆中强和李艾三。这个系统表是再好划没有。然后就把他们的各方面，就我所知者，老老实实地逐一说明，一共写了还不到八页就“交首卷”了。这对于我真是有同大病方愈，顿时很觉舒畅。

第三天晚上，他们的小组成员提我到管理所的一间屋子，在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 40 多岁我从未见过的小瘦子，他的左

右各是一名他们小组的成员。一看就明白中间坐的那人是这个小组的头头。他假装和气地让我坐在他对面一张设好的椅子上。他先从“改造”情况问到我写的系统材料是否写完了？我知道这是主题。我如实地答以“前天已经写完交出了”。他的颜色有了变化，很冷酷地问我：“你的系统就是戴笠这一个头和陆、李两条腿吗？”他的口气和用语虽然是尖酸刻薄加讽刺，我还是沉住了气，据实地答复他：“我当年是被戴笠直接任用的，他不过利用我过去在苏北的历史，派我带陆、李两个组到那里布置盟军登陆，攻击日本侵略军。还没到达目的地，日本投降，我们中途也就解散，各奔前程了。这是事实，我没有加以任何掩饰。”他马上又问：“那么你是没罪的了？”他正触及我的心头的痛处，我很严肃地和他摆事实讲道理地展开辩驳，并指出：我被捕已经十几年了。判我无期徒刑，始终也没宣布我犯了什么罪？我等待了这多年，打多少次报告，都无下文，今天见着了负责人，我不能不据实以告。我过去曾说过多次：“押我越久，你们就越调查得清楚，那我就越有本钱不认罪……”我们谈了一个来钟头，他老想压制我，压不住，他就说我不老实。我又问他：“我不明白这‘老实’二字是何所指？共产党不是讲‘实事求是’吗？我说的是老实话，如果你指出我什么地方不符事实，我就自己请罪：……！”他尴尬不堪。坐在他右边的那个人就插嘴对那个人说：“我看问题今天不能谈得完，是不是改日再继续好些？”那个头头乘机下台说：“那好吧。你先回去，有机会再谈。”

我认为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问题揭开盖子，将来不知要糊里胡涂拖到哪年为止，所以事后我确实做了充分准备，一心等待他再找我。等了四五天，班长通知我到三所特辟的一间谈话室，进门一看，只有他一个人。他先向我交待要谈的题目，老

是避免我把话引向那个老问题上去。一天谈不完。第二天还继续谈。谈完了，他就叫我按照他所指出要点去写材料。从此以后，那个头头就再也不见了，时常换人，谈了一些问题，其中最着重的是关于我和张学思的问题。反复谈了多次，也写了一些材料。这，我才明白，我是由写“系统材料”而转为写“零碎材料”了。

在反复谈张学思的问题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对日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看到国民政府可能释放张学良，感到十分惊慌，因为张学良的旧部，很有一些军政人员在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些骨干力量；同时，又因为“西安事变”给共产党造成了“绝处逢生”的机会，共产党内对张学良抱好感的大有人在。另一方面，共产党又蓄意向国民党进行斗争。如果国民政府释放并任用张学良的话，这对共产党的阴谋和内部分化都会发生极其危险的后果。于是由张学思出面，大发传单向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他的长兄。同时周恩来又在政协聚餐会上，声泪俱下地大放厥词请求释放大家的爱国好友张汉卿将军，当时在座诸“公”无为之动容。

国民政府可能正在准备释放张学良，但这么一来，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一、张学良这样被释放，不但只是感激共产党，而且可能认为有共产党做后台，还要发生某些不正确的想法；二、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下释放张学良，那就等于制造对国民党有大弊对共产党有大利的舆论。谁又肯干这样的傻事情。也就是这么一来，要释放也不能释放了。共产党的占得“机先”，阴谋得逞了。表面上是大仁大义，实际上是又狠又辣，真厉害！连张学思都不懂共产党之请求释放张学良正是为促成不释放张学良。到一九五八年他又在北平政协会议傻里傻气地吵嚷此事，可是就从那次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在公开场合露面了。

在写“系统材料”上，有些历史过程复杂的人，确实写得很够系统，洋洋大观，有的写了两三年才交卷。公开的、秘密的、组织的、人事的，总之，凡是国民党过去在大陆所有的特工内容，都被翻出来了。因为每种材料都要写两份，又拖得这么久，派来的那个小组，约住半年，就撤退了。未写完的材料，以后都是由管理所代收代转的。

第三类是写指定材料。我把它又分为个案材料、项目材料和名单材料三种。

所谓个案材料，就是被指定专写某事或某人的材料。这种材料的来源，还很不简单，根据 20 多年的经验表明，大致是这样的：在全大陆，不论大小，只要是个独立部门，就都设有一个特务机构。一般的名称是叫“保卫科”。据我所亲见，我们去农园劳动所经过一个采石场，共有 100 左右名工人，还在一个孤立小房设个保卫科，四周用板条围起来，挂上一个“非请莫入”的牌子。至于我们历次所参观过的单位，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保卫科就是公开的基层特务组织。他们不是成天翻阅各成员的档案（他们叫材料袋——在大陆上每个人都有，走到哪儿就在暗地跟到哪儿），就是成天贼目鼠眼地调查各成员的言行。不问可知，那个“保卫科”当然是归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从这种事实来看，每个人都在特务监视之下，那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特务统治”呢！只要他们认为什么人有问题，马上就汇报上级，并很快层转共产党中央的特务机构。如果不是“社会保卫部”，就是归“社会保卫部”直接控制的公安部第三处（在大陆上凡是公安部门不论设有第三处或是第三科，只要是“第三”就都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公开特务组织）。

倘然什么人的问题是属于现行，那多半交地方机关处理，若是历史性的问题，中央特务机构有一个很庞大而又分工极细

的调查研究和档案保管部门，按照姓名、年龄、籍贯、性别以及历史阶段，立即可以找出那个人在各个阶段的同事或关系人，指示原机构去到某些地方找某些人进行调查了解。

我们集合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期间，他们是不和我们见面的。他们只是写出提纲来，限日期写好，交由管理所代转给他们。如果他们在审阅材料后，认为还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他们就再如此这般地写出另一提纲，一直到他们满意为止。管理所单为此设有材料投交箱，常是每天都有几十份，在全大陆范围内，都要到此了解嘛！我们在出监劳动时，常看到他们都是三人一群两人一伙的来，向来没有发现有单人独往的，由此可知：他们的上级不放心，至少要派两个人同行彼此进行监视呀！要知道他们常是一跑几千里，这种特务费的开支该是如何的可观了。

我在一九五八年曾在检举运动中写过这样一份材料：“顾××（当时名不详），自称福建人。年约四十岁，家住北平东南园某号。在生意中经同学介绍和他相识，只知他在北平伪组织时期曾当过北平伪警察局经济科科长，其他不详。”总共不过100 字。到 1970 年，我忽然接到这样一个提纲：一、“你当年在北平所认识的家住东南园的顾 ×（这个字我现在忆不起了）清，据你推测，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从这一条就可知：他现在还没被捕；我本不曾写过他的名字，他们若不是通过总机关从统计中得知，当然不会从别的方面，把这个名字补起。这表明那个总机关的工作是极其周密细致，其作用又是很有效的。至于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当年本是点头之交，我当然不能凭推断去胡猜。二、“介绍你们相识的那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当时住在什么地方？”从这条看来，他们是想去找我那位同学去了解那个姓顾的。我只知他是当时广东督军龙济光的最小的儿子，

当时住在宣武门外旧宅，后来听说已经卖给了共产党，以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名字叫龙启乾。我的回答也仅此而已；他们自然又要设法去找龙了。三、“你还知道有谁认识他？”不知为不知，我据实以答。从这个提纲可以具体了解：不管写得如何简单，他们总要不惜多大开销和经过多少曲折找到线索，只要把你拿捕“归案”，一判就是几十年的奴隶劳动劳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多大本钱也会有巨利可图的。

在 1964 年，我曾接到一个提纲，问我以下的问题：一、周石民和你是什么关系？你是否任用过他？二、他都有哪些罪行？三、是什么时候由你资助回乡的？我接到这个提纲一看，根本想不起这个人，所问的问题，我也一点摸不着边际。我只好在材料纸上写：“我根本不识此人”，而交了白卷。第二天，原提纲并附一张最近的照片给顶回来了。我一看照片，确实好像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事情摆在面前，我不能不开动脑筋了。

想来想去才想出，他原来是在长春一个警察派出所当一名警士，那时才十八九岁。因为和我的勤务兵是同学，常到我家去看他，所以也跟我见过几面；当时我都不记得他的名字，更不说事隔十几年了。事有凑巧，我在 1975 年释放后到北平，在公共汽车上又遇到那勤务兵的另一同学，谈及此事。那个周石民只因当过几个月警士，就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了 10 年徒刑。在共产党统治下，就连他们的“自己人”，今天是“亲密的战友”，明天都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何况他在旧社会还当了几个月的小小警察！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军管时期，管理所就在医务室的范围内空出五个房间，上边挂上“第一室……第五室”的红字牌子，呼之为“临时法庭”。从那时起，凡是来调查案情的特务，就不再是先写提纲交由管理所安排处理，而是由特务人员直接

"坐堂"亲自审讯了。我们要是被提审了，在门外先大声喊"报告"，里边发出准许的命令后，进去先要面对特务规规矩矩行鞠躬礼（他们向例是连头都不点一下的），然后静听他们的吩咐。高兴就指定你一个坐位，不高兴就叫你立正站在那儿。

大约是 1970 年夏，有两个人提我审讯。他们一般都是先叫你谈谈个人的经历，然后，在这些经历中，找出他们要了解的问题来。我照做了以后，他们就专问我：在长春时我常到哪个医院去？我在那时期不曾患过病，也没进过哪家医院，当然据实以答。他俩一听，顿时面现怒色说："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不老实！你不是常去济民医院吗？"啊，原来是我帮忙找房子的那个吴济民诊所。吴济民的一位族人是我的朋友，离他们不远的街口有间房子，因于他族弟托我，我就介绍他在那裹开个家庭式的诊所．我有时出街就到那兄坐坐，完全无其它关系，我就照实以告。他们又问我和李占元是什么关系。这个李占元我根本摸不着头脑，无以为答，他们就大发雷霆说我硬装糊涂；并指出李就在吴家，我还是不明白。那个坐在正位的家伙把桌子一啪："你说！他们家都有什么人？"我说："吴济民和他太太住在楼上，只有一个据说是他内弟，大约不到 20 岁，在楼下看门……"。我还没说完，另外那家伙就插嘴问："你说他姓什么？""我不知道。"那个特务忽然一下子立起，好像拉开架势要来揍我。我说："我到那里去都没和他说过话，我怎么能知道他姓啥！"在正位的那个特务把眼一瞪，用手恶狠狠指我说："你还装糊涂，他就是李占元！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据实说，他都有哪些罪恶？他是不是当过医官？……"据我的印象，向来就不见他离开诊所，是否有什么其他活动，我当然无从得知；而且他只够当学徒的资格，怎么可能当医官。这都是些没有影子的话，我只能就我所知者以告。

就为这个人，他们足足问了我四天，我实在不耐烦，我不能不表示："我不能胡说八道陷害人，再问也是这个！"这才让我写材料而去。在大陆上哪怕是个年轻学徒，不知哪阵风刮到头上，都要受到无端的迫害。我虽不知他的后果，但我以经验断定，最轻也是徒刑 10 年。这个制度要不推翻打碎，谁也不要想能够苟安。这种实例多得很，我不过只举其一而已。这说明不是"八亿人民站起来了"，而是八亿人民当了奴隶，毛泽东当了奴隶主！

关于项目材料，这里边更是大有文章。事情的进行是：共产党特务总机关，把在押的国民党人员，经过调查分析，把一些他们认为合于"利用"的人，用"给以争取立功机会"等类鬼话，按照过去的职位，分别指定个人或集体，去写历次战役经过、党政活动或特工行动等专题材料。然后他们把这些个别的材料经过归纳、整理、分析，又编写各种各类的整套村料。这样，他们一方面对于过去的某些情况，从而得到全面具体的了解，研究出对付台湾的办法；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这些整理出来的材料，按照他们的要求，捏造一个假名字，用"揭露"的口气，再把许多内容改头换面并穿插一起，印行成书，发售肆间，对国民党进行反宣传。这不仅是"一箭双雕"，而且也在蒙蔽世人之下，收到一些颠倒黑白的欺骗之效。这一着，是很阴毒的。记得我在香港滞留期间，在友人处曾发现用"陈少校"这个假名所写的五本合成一套的叫做什么"金陵 ×× 记"的东西。我翻阅一下，发现它乃是中共百分之百地把上述一些材料加以篡改而成的。例如其中"黑 × 记"一书，主要就是把康泽所写的"文史资料"和周养浩、沈醉、徐远举等在重庆所写的专案材料，按照破坏国民党的意图，经过大拆大卸、添枝加叶和颠倒黑白而成的宣传品。专为煽惑海外人士对国民党不满。

但因为这种东西，大陆上还有不少活见证可以识破，特别是怕被那些原始笔者发现共产党这种卑鄙无耻见不得人的伎俩，所以才用捏造的“陈少校”充“作者”，运到香港出版。它和“七十年代”等，都是专为煽惑海外人士的东西，大陆一步都进不去。他们自己的出版物都不敢让在他们统治下的人去看，其用心之叵测，可想而知。可是有些人，不知不觉甘心受欺骗，其痴其愚真是可悲！

第三类是名单材料。在某些不同的阶段，共产党都按照他们不同的需要，开出名单张挂出来，要我们拣其所知者去写。这种材料，与上述各种比较起来，有以下特点：一、凡是单上有名的，部是在台湾活着而且有一定地位的人；二、尽可能指出他在大陆或海外还有什么亲人？而这些亲人都可能在什么地方？三、要尽所知地指出他在大陆或海外还有那些感情密切的亲友？四、他都有哪些特殊的爱好（如打牌等等）？倘然谁怕名字和本人不符的话，他们还能提出相当近期的照片来，让你来印证。这些照片，从各方面看都不是从什么印刷品上翻印的，一般都很像是原照的。我亲眼见着几张，还是穿着正式陆、海军服装呢！

从这种写法来看，一般人都认为：共产党在台湾可能还有些特务在暗地活动，不然他们哪里能得到那些照片呢？他们对特务有一条最重要的规定是——只准潜伏，不准暴露。所以他们要调查出这些人的爱好，遇到适当机会，就投其所好地相机接近，既可以刺探各种机密，又可在他认为时机成熟时图谋不轨。他们还认为国民党人重感情、讲情面、念故旧、信亲眷。所以他们用尽心机去找他们的亲人或亲友，准备用“跑单帮”的办法，挖国民党的墙脚。

艾毓英当年做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他的儿子被

共产党拉上了，就在他家里设立了共产党支部。他爸爸做了保护伞，还始终不知道。一直到艾被捕，才发现他儿子已当上了北平清华大学共产党总支部的宣传部部长，可是不再认他作爸爸了。这种例子很多。共产党在“少爷”路线上，是拣过许多大便宜的，所以在这上面他们是不遗余力地去搞。据我所知，这些被利用的“少爷”，在其“利用价值”消逝之后，其结果也都是不妙的。就如艾毓英那个当宣传部长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由于他的历史出身，而被斗得死去活来，终而不知下文。在历次运动中，这种人被斗得自杀的，也是大有人在。出卖了老子还要遭共产党的殃，走这条路也真是报应！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等，也都扯到家庭问题，其他就可想而知了。在他用着你或是要向你打主意时，什么甜言蜜语，他们都会说得出；到了用不着你或者主意打过了时，那你就会变成“乌龟王八蛋”，骂得你狗血淋头！这是共产党的“客观存在”，已不知有多少人吃过这种苦头，可是还有人执迷不悟，真是咄咄怪事。

1960 年代初期，在大陆上盛传台湾已成立战地政务局等机构，准备对大陆进行反攻，共产党很惊慌地首次公布出名单来，要我们写材料，第一批只是十几个人，不久，又公布了第二批约三四十人。接着，又用中文打字机打成几页相连的名单，共约 300 来人，每号送一份传阅照写。这三者之间，有些人是重复的。这也可见他们匆迫惊慌之一斑了。除了前述四个物点之外，如果是军人的话，他们还特别要求要写出该人喜欢使用哪种战术和具什么个性？这是什么用意，任何人都会明白。

对于写这种材料，谁都知道它是要干什么？所以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一问三不知”。有个同犯，连一个都没写，他的理由是：“除了蒋以外，我一个都不认识！”还有另外一件事

更足反映一般人的心情。就在传来反攻大陆的消息和写这种材料当中，共产党出于讥讽和丑化国民党的理由，不知从什么地方剪辑拼凑一部无声黑白旧影片，而且把光线故意搞得那样不调和，他们用心的阴毒，那是不必说的。记得在演到中国的伟大领袖蒋总统扶着蒋夫人下飞机，和检阅军队分列式两个镜头时，有些同犯的热泪就不禁夺眶而出了。共产党对于台湾的消息一向是封锁得纹风不透的，我们在监牢中忽然一睹领袖容颜，内心的钦敬之感，绝不是共产党“丑化”的设计所能减低的。就在散场时众人挪挤在门道中，忽然有人情不自禁地说：“好容易见到一次，心里真是热辣辣的！”这句代表众人心声的话，不知是哪个败类反映了，但是找不出是谁说的。接着在两次的集会上，科长都无法指出名字而恶狠狠地批评说：“你们改造了这多年，在影片上见到蒋某人，心里还觉得‘热辣辣的’……这也就是你们应当继续关押的根据！”

是的，我们在共产党的监牢里，牢地都已快坐塌了。可是牢门再紧也掩不住人们的是非功过之心，国民政府在大陆是处于外患频仍、群雄割据的时代，要没有蒋总统，中国不会统一，抗战不会胜利。“辣辣的”感受，乃是是非心、正义感的表现，写名单材料也就是向这种是非心、正义感挑战，遭到无言的抗拒，那是理所当然的。

从 1974 年起，又忽然出现写名单材料的高潮。我虽然还用“名单”这个名词，实际上是油印成册的。一连发了许多本，每号发一本，每本只有四五百人。起初还按姓名笔划排列起来，后来也许是赶不及，就张三李四有一个算一个了。好几千名字谁有心去细看，如是就在学习时间，各号专派一个人去一个一个地念，听到有熟悉的就记下来，然后再查对是否其人。如果在姓名上有疑问的话，他们还会把那人的照片和简历拿给你看。

我们组有个同犯，看到他胞弟的名字，但不敢断定是否其人。管写这种材料的干部不但照册念出他弟弟的出身、学历、经历、个性和当年在长江和某种检查人员发生重大纠纷等事，并把不久前的相片拿给他看，果然是他弟弟一点不错。到 1974 年底，又印出一本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全部名单。连前至少也在四五千人以上。当然，这些名单是共产党特务机构认为这些在 25 年前，都曾和我们有过某些联系才列出的。此外，在台湾的其他党、政、军、警、宪、特，以及地方各基层组织的人事，他们也无不有案可稽了。也就是从士兵、警察，一直到各个高层组织，他们都“了如指掌”。不过只是与我们无关，没有列出名单而已。

写这种名单材料的要求，并不是像“准备反攻”时那样要指出“喜欢使用那种战术……”等，而只是像写一般检举材料那样就够了。这是因为“在某些不同的阶段，共产党都按照他们不同的要求”办事啊！共产党从他们控制大陆那天起，没有一刻不在对台湾动脑筋，他们对于“异己份子”、“不稳份子”和反对过他们的人，是恨之入骨的。不消灭干净，他们是梦寐难安的。在写这种材料的当时，我们虽然不认为像先前那样，是为应付“反攻大陆”筹划对策，但究竟为什么？一直到全体释放，我们才明白：原来他们是最后利用我们的“使用价值”，趁我们释放之前，把台湾的全部公教人员都留个“案底”，妄想有朝一日“拿办归案”呀！

第二十四章　“回门”

嫁女归宁，通俗的说法是“回门”。1964 年，抚顺战犯管理所曾把历次所释的某些同犯召回管理所，汇报释放后的情况，因而我把这名之曰“回门”。意思就是把管理所当作战犯的娘家看待。据闻当时除了抚顺以外，还在天津一家豪华旅馆召集华北以溥仪为主的一批人（但溥仪托故未到，而以他弟弟溥杰代表出席）。另外，大概在四川还召集过西南地区的一批人。因为我对这两批情况不详，现在所写的，只是以抚顺为主。

好几年来，我们吃的主食，基本上都是玉米面包，大米和白面只是偶尔才见面。吃的菜，夏天也只是白水煮，很少看到点儿荤腥。特别是冬季，上一餐是开水萝卜、白菜，下一餐是白菜、萝卜开水。而且这种萝卜、白菜还都是很差的，吃起来真是“其味无穷”。夜里常梦见大厨房来了猪肉，醒来自己又觉得那么难堪。我们年龄日益见老，努动日益繁重，而精神折磨又日益加剧，这首先是毛泽东对于处理我们的方式改变为慢慢“挤牙膏”所带来的结果，“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还是其次。

这几年来，除了以前所述的劳动项目仍然照旧外，我们在农园的两个半石化的大沙坡，硬是一镐一镐、一层一层地修成节节梯田。写来，不过四十几个字。要知道这种已经石化了的沙质地，一镐下去所刨动的土，只能是以“两”来计算的。不但要把高处切成整整齐齐平均至少在四尺以上的斜面，还要填

出宽约一丈五十，长约四百米的十几层梯田来。不用说我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就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是谈何容易！在梯田上还要每隔十米，挖一个两米直径及其等深的大坑，要从山下抬来肥沃的客土填进去，植上果树，再从山下挑河水灌溉成活，五十多岁当“战犯”，这种苦楚，不是身临其境者，怎能知其滋味？不特此也，我们还把农园山上原已修成直角的两栋房子，在其各个对面，削平山坡和垫出台基，用石头垒成六、七尺高的层层保坎，三间（原有的）对三间，七间（原有的）对八间地造上砖瓦屋，成了四合院，四周又筑上约八尺高的围墙，院外又植上参天的高杨。另外，在离此不到五十米的对面山头上，为干部修了十来间住宅以外，还在左右两个山腰，凿了一个七米多宽、三米多深又三十米长，和同样宽、深二十米长的两个大地槽，以备将来盖防空洞用。这是在风化石上一镐一镐刨成的，而工程量又这样大，其艰苦就更可想而知了。这些基本建设搞成之后，远望之，绿树丛中的层层红色建筑，既整齐又显眼。有的干部说：它很像避暑山庄，又有的说：它在某些方面又好似拉萨的布达拉宫。不管避暑山庄也罢，布达拉宫也罢，它都是我们这些老奴隶用滴滴血汗堆起来的，尤其想到那时候我们肚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我们每次上山，都不禁望之而生余悸！

到 1964 年夏，我们的伙食显然比以前有了改善。基本上都改为米面，而且可以天天见肉了。每星期至少要吃一顿包子。据说：伙食费是每人每月 18 元。就大陆来说，这已是中上的伙食了。虽然不及 1956 年集合后那么好，但也差不了太多。所以我们用经验主义看问题的人，都以为 1956 年的苗头又出现了。后来的事实表明，此举与“回门”及对于 1965 年的筹划都是极其重要的部分。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于从这里释放出去的人，都提出一个实际上很有约束力的要求，那就是：以后要经常和该所保持联系，遇有什么问题，所方也愿从旁尽力帮助解决。据我所知，一些释放了的人，不但实时要向管理所写出“感恩信”和汇报就业情况，遇有问题还要及时“请求指示”。管理所每隔一定时期还要派专人到各地视察一番。每个人的常地直属机构是指挥所，并由管理所遥控。作为一个释放了的“战犯”，事实上只是一具既被直接掌握又被牵线调度的木偶而已。他既没有自己的意志，也别想身由自己。头上脚下、眼前身后、四面八方都受监视控制，成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从他们的汇报，十足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被释放了的人来到管理所时，不是把 1957 年后的那套蓝色单干部服（多数都当作接见家人或参观等用的“大礼服”而保存下来）穿上，以示穿戴嫁粧“回门”讨娘家的欢心，就是穿上一看就知是特别新制的衣服，以表示他们现在生活的充裕。可见他们对于“回门”，事前在思想上都是经过一番认真准备的。

唯独前文提过的黄鹤，衣服很不像个样子。虽然还没打过补丁，但是黑布上的污渍已经成了白云朵朵，又旧又脏显然这还是他唯一的一套服装。他到抚顺那天就去各号和我们见了面。谈到他现在的情况，他说他“过的很好”。因为他会全套泥瓦工，在农村很受欢迎。除了一般农活儿之外，还要为一些社员修补房子或者翻修火炕。所以他一年能有一百一二十元的收入，在社员中还算是不错的。但他的问题是：劳动强度大，胃口又能吃。布票不够用，分得的粮食也不够吃，所以儿子儿媳都搬出去过日子，老婆也成天意见连篇，这是他唯一的苦恼。从他面容的消瘦（他原是一个大块头），皮肤晒得黑黑的，两手厚茧

子加上他的那身衣服，他的话是符合实情的。能是因为人未到齐，没有经过统一安排。他的话还是未经过“加工”而“照本实发”的。像他那样的壮汉，终年辛勤劳动，所得也不过百元左右，其他社员不想而知。在大陆上，按物价比值同抗战前对照是五比一。劳动强度比过去不知高了多少倍，而所得比过去要低三分之二。而成天还得张口说：“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闭口要高呼“毛主席万岁”。黄鹤的现在，也就是我们的未来。大家听了，震动之大真是“不言可喻”！

黄鹤走了之后，就不见再有人来。过了两天黄带着很不自然的面容又到我们的号里。没说了几句话，他就引到公社的“待遇”问题上去。他改口了，他说：他的自留地一年就可生产两三百元，加上他同爱人在农余时间编筐编篓搞副业，一年又可收入三百多元。所以他每年准可收入六七百元，生活确实是富裕的。因为他前次把这个漏掉了，所以特此来说明一下。说完，马上走开，不但不再到号里来，而且偶然遇到也不再说话了。

自留地、搞副业每年能生产五六百元，简直和“亩产十万斤水稻”同是天下奇闻，他的这种表现，使我们很生疑，他是受到某种压力而发。如果不是“回门”人到齐了，在预备会中提出应该多说令人鼓舞、少说令人泄气的发言原则；就是管理所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对他提出，警告性的批评。

过了约一个星期，在正式举行汇报会时，黄鹤忽然换了一套崭新的漂亮衣服。他居然也显得容光焕发起来。事后打听，原来是管理所看他给别人的观感太“泄气”，特意给他买上一套新衣。就黄的具体情况来看，如果两年之后再有回管理所那一天，不但不能把它当嫁衣再穿回来，保不定管理所还得再给他买套新的。一年总共只能赚百八元钱，嘴都供不过来，劳动

强度那样大，又费衣服，哪有钱买布啊？汇报会一连开了几天，黄鹤始终未发言，我想并不是他不曾准备，而是不便给他机会发言，那是肯定的。

经过一番研究、设计和起稿，全体大会举行了。先由各自地方的单人来作报告。

李寓春是在第三次特赦释放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公社劳动的。他的报告，首先把共产党毛泽东的伟大恩情歌颂一番。在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他在特赦释放后，被安排在他的故乡的一个公社从事农业劳动，并和他的老伴在一起。他到公社之际，他的亲友都来看他。他的一个族侄，在人散之时低语告诉他："老叔！您不要太天真了！"他当天就把这情况向党支书（即支部书记的简称）作了汇报。这既表明他和旧的关系划清了界限，又说明他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究竟他的侄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其动机当然谁也摸不清。他不汇报，如果日后出了问题，那可就要大祸临头了。在大陆上除了只能给共产党毛泽东当学舌鹦鹉以外，就是夫妻、父子也不敢说真话的。最近在报上看到驾米格 19 起义的范园焱义士说：他多少年来都不敢把起义的念头告诉他的太太，那是千真万确的。这种灵魂深处的痛苦，不是当事者是无法理解的。李寓春在作汇报时，心中也是痛苦的，但他不能不汇报也不敢不汇报。他今天虽还当成光彩的事来宣扬，但他只字没有提及他侄子的下文，可见他内心深处是沉痛的。

其次谈到他的劳动，他当之无愧地认为：他把在管理所所受劳动教育的成果，不折不扣地带到他所面临的劳动中去。够得上越是坚苦越向前。例如：他们队的粪坑是既深且大的。里边储了满满的稀屎。在起粪时，他看别人有些踌躇，自己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一桶一桶地往上提。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冲天

干劲呢？第一、因为他是共产党毛泽东改造教育的国民党战犯，在困难当头，应该做出相应的表现；第二、那比起在管理所起厕所和掏大马葫芦，基本上都差不多，因此是训练有素又有思想准备；第三、管理所的干部都能在施肥中用手抓大粪，这对他是终身难忘的教育；第四、大粪对农业是宝中宝，他有机会作点贡献，觉得是分所应尽。因而他表现很出色，支书等干部都表扬他；这个国民党的“大老官”经过共产党的改造，确实是表现不坏，不负所望！经过这番“导演式”的鼓励，历年起大粪的劳动，他是“包下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谈到两种情况：第一、他在每次掏完粪之后的许多天，不但吃饭都觉得臭的，而且睡觉还觉得是在和稀粪打滚。可是他绝没有因此气馁，相反的，这是他洗刷历史身份（他最后是吉林师管区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副司令）一种心安理得的必由之路；第二、因为他混身都弄得臭不可闻，他的老伴（爱人）都不敢和他接近，成天嘟嘟囔囔，唠叨不休，他把这说成是：他老伴思想落后，老扯他的后腿。而他没有说：他的老伴是“不识时务”！他老伴，还想养只猪杀了能解解馋。他也狠狠批评了她，不该“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留恋腐朽的旧生活”，所以他很不满意。

此外，他又着重感激党支部对他的信任和关怀。每年秋后，大队把所收的庄稼都运到场院，为了防盗防火防奸，照例要派几个人守夜看场。那是一个极为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不是贫下中农出身并经过考验而认为极可靠的人，是分配不到这种工作的。就是他在该公社落户的那年秋末，党支部竟把这一任务交由李寓春一个人去担当，这是他梦想不到的事。哈尔滨地区到冬季，一般温度都是在摄氏零下三十度。李从晚收工以后就接班，一直到次日出工，不管是寒风飕飕或冷雪飘飘，他都片刻

也不敢停地围着场院转来转去。尤其到后半夜，更因腹饥分外寒，冻得手脚都失掉知觉，他只得用跑步来使身体生暖。他知道：不论出了什么问题，对于他这样历史情况的人，将要发生多么可怕的后果。所以他绝不敢钻进草堆里暖和一下啊！这是党支部对他的“信任”。他确实也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经得起考验，始终没出事。所以他也有难忘的表扬。说到这，他几乎是感激欲泣了。

关于党支部对他的信任，他就举以上为例。党支部为了使他能“跟上形势”，照顾他的学习，曾特别给他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不管如何忙，那怕是半夜，他都要秉烛一字不漏地通读一遍，并要做出札记，写出心得，到一定时候，他还要向党支部作一份汇报。遇有重要文章或消息，他还要自动自觉地召集左邻右舍，为大家读报。他说，他过去在管理所学习没有用心，真是悔恨已极。希望我们在如此优良条件下，要以他为前车之鉴。现在他身处农村而学习还没有落后于形势，这都是党支部对他关怀备至的结果。他对此确确实实感到无限温暖。

唔！我忘了李寓春还说了两点，应该在此补充一下。其一，除了先到党支部报到和办理户口等手续外，还曾挨门挨户到各家跪地请罪。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他身为军人，未放一枪而逃往内地，使家乡父老在日寇铁蹄下渡过 14 年的苦难生活，都是与他分不开的。而日本投降之后，他又在吉林当上了师管区司令，把无数的故乡子弟送去当“炮灰”，那更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其二，在他落户不久，党支部还为他特别召开一个“改造报告会”（也就是“认罪会”），他首先把过去所述及的那套“认罪八股”，如数家珍地照搬一番，然后强调他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他的思想、立场转变的过程，而归结到：他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恩情永不能忘，并

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指导等等。据说这两个行动，都很得到党支部和社员群众的赞扬。

就是这样认罪服法，用手捂着脱肛（他患此症有年）艰苦劳动、粪坑里打滚、寒夜里看场，并且受到多次赞扬的李寓春，在文化大革命时他又“二进宫”（即重行归案法办）了。

这消息是这样透露的：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哈尔滨公安部门，曾多次派人到管理所向过去与他有关的同犯，取证他的历史情况。如果是党支部或是“保卫人员”去调查，那还不能证明他又被捕。但公安局不同。人不到公安局，它是不能过问的。据我确知：特赦不到几年还有被处死的（详后），多少刑满的照样可以不经宣布而无限延期；判了刑期的也毫无道理地被拉出枪毙（见前），共产党的判决，共产党可以毫无约束地出尔反尔，有人说：那里是一个特殊的制度，好像“人权”二字的定义，不能等量齐观，这种“党霸（即共产党成了恶霸）观”都已征服了学者的良心，大陆八亿人民身陷时无天日的苦难深渊，那不是活该吗？但我不用信“党魁专政”会万古长青，任何强人都终将在人民意志的怒潮面前给摧毁得粉身碎骨！毛泽东自己也早承认：“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可是，他就不看看他自己，跟人民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曾传坦是广西合浦（原属广东）人。曾任某军参谋长等职，也是特赦释放后回到原籍参加劳动的。他的汇报，除了满篇都是管理所干部过去讲话中的用语，以示他把过去“教育”牢记在心，并着重地描述他在劳动上如何艰苦奋斗及虚心谨慎地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与接受教育外，特别强调在管理所学习的重要。他说：他蒙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宽大，回到“人民行列”之后，处处感到过去学习的不够。人民一张口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相形之下，过去不用

心学习的尾巴就暴露无遗了。管理所设备那么好，书报那么多，又有干部帮助指导，机会是难得的，时间是充分的；他十分郑重其事地反复叮咛我们：“你们应当分秒必争，千万莫辜负大好时光；像我，后悔就来不及了！”他的全篇报告，我觉得很像都是有意“现身说法”为我们而准备的。他不但能说，而且做的也相当真。不论早饭前或是晚饭后，我们都常在图书室看到他看书（他们是住在监外，由大厨房备饭）。他见人就：“哎呀！你们真太幸福了！吃的这么好，又有这么多书！我真羡慕死了。我回来真是一秒也不敢耽误啊！那怕多学一句话，也是好的！”有次遇见我，他也是这么说。我说：“那你就留下别走了！”他一怔：“只要政府批准，我真情愿留下！”这当然是废话。他一回也没到号子里去过。可能是因为黄鹤到号子里出了问题，谁都有所警惕吧？

李衍涛是辽宁海城人。曾在某专区当过保安副司令。他是刑满释放的。他的汇报，主要是检讨两件反动行为。其一、为了他儿子结婚，他老伴曾养了一口猪，杀了招待亲友。喜事办完批评会就为他举行了。“毛主席号召节约，不准大吃大喝”，一般结婚，都是新娘子漫步走上门来；亲友不准送礼，新人也只准以糖果几碟、纸烟几包，待客成礼，他却要杀猪宴客，不但是铺张浪费，而且是有意用物质搞拉拢。共产党只准在“公”的方面向它亲，而不准私人馈赠生感情。他犯了大忌，理所当罚！受到狠狠批评。他在谈到此处，表情十分沉痛地向我们说：“同犯们哪，请你们看看，我怎么对得起‘娘家人’（指管理所）！改造了这么多年，怎么还干出这种和社会主义道路毫无共同之处的事！人家贫下中农，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是一千个照办一万个实行，我呢，还是照老样子办事，这不是幻想地主资本家复辟又是什么？……同犯们：我确实没有改造

好。我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你们回到人民行列那一天，千万要以我为戒呀！”说到此，他的眼泪竟然会流下来。

就是这位李衍涛，他在和理发师谈话中，又犯了一个更大的反动罪行。在大陆上，1965 年之前，城镇或乡村常有单人理发师，挟着工具包，鸣着钢制的响器，沿户招揽顾主（后来因为常出“毛病”，大概是经过取缔就不见了）。有一次，李就和理发师从当前的生活问题，不知不觉地就扯起个人的苦况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话到支部的耳里，问题就严重了。接着又扯出那个理发师，据说还是个积极的反革命分子，而且那个人已不再见，这个“包”就更“粘”大了！什么“思想落后”，什么“警惕不够”，什么“反动本质未变”，什么“对社会主义仍抱抵触情绪”，什么“不是政治嗅觉不够，而是反动事物合乎自己的胃口”等大帽子给自己扣了一大堆，检讨再检讨，总算得到一个“警告，以观后效”的结论。他这个问题，还给我搞出个麻烦，春节文娱大会，专对此编了个活报剧。因为我在平剧“法门寺”演过贾桂，他们就派我去演那个理发师。纪律所限，又不准不干，真是难过得很。

康建东，辽宁铁岭人，是特赦释放的。他在这 14 个“回门人”中是唯一在汇报上提到每月工资的人。他说：他被特赦之后，被分配到他的原籍铁岭附近的一个以生产蔬菜为主的大队劳动。他到那里向党支部报了到，又到居民组登了记和办了户口，油、粮票等一系列手续，请了几天假，也把他的老伴接到一起住。他就业不久，在劳动中，就听到有的社员在闲谈：一听说来了一位康老头儿，还是一位国民党的大老官。可不知他认罪怎么样？”他很识相，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他马上接过来说：“我就姓康啊！我过去对人民确实犯了滔天大罪。真是罪该万死，蒙共产党毛主席该杀不杀，给以宽大改造，还让我回

到人民行列……我今后一定在社员们监督、教育之下，诚诚恳恳地继续改造”。说着说着他就在野地当众做起认罪表演！若说这是他自甘情愿，我看未必。可是，逼人的形势给摆到眼前，他要不做，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谈到他的工资问题，他说：蔬菜生产的收入，一般都比普通农作要高些。在起初时，他每月的工分所得总数只在 50 元上下。由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他终年到月不曾迟到过一分钟。就是别人都收工了，他必须把一切都搞得妥妥实实才能走开。越是艰苦越抢前，每逢好处每退后。按照他们的规矩，剔下的蔬菜，有可食用者，则无价给社员分用，但他连一棵也不敢拿。就是一条黄瓜一棵葱，他都按市价购买。在劳动休息时间，头头们有时摘些蕃茄给大家解渴，可是他几年中一个都不曾吃过。因为他能勤勤恳恳地工作，谨谨慎慎地守分，后来他所分得的工资，竟能达到每月七八十元。所以他也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储蓄。是的，在大陆上，一个人每个月的收支情况，是谁都知道的。如果你有点结余不送到银行，居民组等单位就会对你进行帮助：“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上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进行革命斗争，把余钱送到银行储蓄起来，又可生点利息，不是一举两得吗？”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储蓄的话，那就对上述说法成了“消极对抗”了，尤其曾有“反革命”历史的人，更要赶忙不迭。但是，一遇风吹草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只准“存”不准“提”了。

对于康的报告，我个人认为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谓“基本上”，就是对于他分得工资之多，我有保留。我从来没听说从管理所出去的“战犯”，有过这么多的工资。就是在管理所算做第一流的车工或翻沙工，也不过只有四十来块钱一个月。在大陆上，农与工是相差很大的，康能分得那么多，我有疑问。

是不是他别有用心地要这么说，我就不敢肯定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头上，特别是被释放的“战犯”，检查、斗争他都是首当其冲。当这种风吹到他们的公社时，武装工作队（大概就是所谓“支农”的“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召开大会，首先让他当众检查。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历史罪行，另一个是现行问题。前者，他是按照过去的交代如实地重复一遍；后者基本上与上述“汇报”内容相似，还检查不出其它不法问题。那个军方头头很是恼火。问他：“你就只是这个吗？啊！现行问题一个也没有？”他回答说：“我一时还想不出什么来，请社员们帮我想想看吧！”于是那个头头面现愠怒而像很有把握地口向全体扫视一遍说：“请大家帮他想一想，他在此几年中都犯过哪些罪行？”群众中没一人应声，那个头头的脸发红了。如是就以煽惑的口气，厉色鼓动群众说：“大家要站稳阶级立场，现在是无产阶级天下，不是国民党当权的时代，大家不要有顾忌。他有罪行只管检举请举手！”全场硬是无一人举手，那个头头的脸由红转白了。等了好大一会儿，仍是原封不动。那头头虽然看出不是他心中所想，但他还不肯罢休，就色厉内荏地喊：“有我们给撑腰，不要怕。不管大小，是问题就要检举！”全场仍旧是鸦雀无声，毫无反应，这时，那几个军代表开始耳语一阵子，宣布：“大家回去想一想，下次再开！散会！”“下次”当然是无限期推延下去了。

从以上这段经过，至少可以反映三个问题：一、戴上“历史反革命”这顶帽子，随时随地都是首先被“整”的对象；二、作为被释放了的“战犯”，成天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情之紧张，精神之痛苦，比在监狱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在监狱，每个人都处在“事已至此，听其自然”的心理状态，反而无惊无恐）；三、一般人民群众是有真是真非的，尽管处在被控制被

威逼的无权地位，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他们对邪恶是不屈服的。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有朝一日暴发成洪流，任何反人民的势力，都必定葬身在人民的汪洋之中！

其他从个别地方来的单人，还有：正诸尔札布（伪满战犯，蒙古人，就业在海拉尔）和关梦龄（见前，就业在抚顺市公园）二人。关梦龄在各种场合，说不了几句话就时常把他的左衣袖捋起来，原来是显示他已经戴上了手表。可是任何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只很不像样子的旧货色。就现价估计，大概不出五块美元。可是在被特赦的所有“战犯”来说，只有他还能买上那样一只手表，也确实是难得而突出的了。因为他们俩的汇报都是一般化，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另外，有八个人是集体参加的。据他们说，都是在营口某大国营农场劳动。其中有：

一、唐曦（见前）是第一批特救的。在特赦后不久，曾拾我们来过两次公开信，表示他欢欣鼓舞和鼓励我们努力改造的热情（有些同犯被释后都有此表示）。他是被分配到辽宁大石桥某工厂工作的。在就业之前，他曾请求批准先到湖南原籍看望他的父亲。他在我们当中是最年轻的一个，又是和杜聿明、溥仪同在第一批特赦的。有一个女共青团员，可能把他当成“名登金榜”的“翰林”，就热情洋溢地主动请求组织批准和他结了婚。他的来信，真是够得上意气风发，激励有加。以后就不来信了，也不知是怎么又转到营口农场的。

二、叶杰强（见前）也是第一批特赦的。当时被指定回他的原籍——广东梅县——就业。但他行抵韶关，就接家人来电，说是他的旧敌对他的回乡很有“意见”，他就赶紧向管理所汇报情况，并请求指示。据管理所嗣后向我们透露，也是在东北又给他安排工作了。

三、高广荣可能是河北人。白玉昆是山西人，曾在阎锡山部队里当过副师长。以上两人，分别是第一、二批特赦的。

四、刘荣第（见前）、李仲章（见前）、张达权和江声煌四人都是刑满释放的

唐曦是他们的组长，由他代表作汇报。他不曾提及他们那样八个人为什么会那样不寻常地就业在那样一个地方，他只是说：他们的组织上对他们的照顾始无微不至的。因为他们的来路是相同的，为了他们的方便，所以特别给安排了一个独立的居所，并让他们自行起伙。他们又共同出钱买了一架收音机，每天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辽宁省的广播，对于他们的学习很有帮助。他们在那里的主要工作是育苗。不但介绍一些数字和成绩，而且又自诩一番他们的劳动是很出色的。因此，他们很得领导上的表扬。并且还时常去探望照顾他们，问寒问暖。江声煌虽然老而且弱，但能在劳动之余，还在附近栽植一些花草，领导上也曾为他对美化环境作了贡献，予以口头表扬。对此，他所以在汇报里特别提到，可见他们是引以为荣的。此外，他们有的人参加养鸭子。据他说：从饲养、宰杀到冰冻大批出口，都一概是机械化的。

就在这次汇报的次年冬季，医务室空着的病号房，忽然搬进了令人感到奇怪的一伙人。说是新来的犯人？可是在我们不露面时，他们有时又好像是有意避免被人看见似地出来活动活动。一发现有人来了，他们就躲了回去。日子久了，囚犯们发现这伙人原来就是营口的那个小组！他们每人的心情都很颓丧，见到我们很觉“不好意思”。跟上次来管理所的表现，完全大不一样。后来，也许是管理所为了解决我们的疑窦，对此事专举行一个报告会，仍由唐曦作报告。他说：过去所说的国营农场，原来是一个劳改大队，他们所以单独在另一个地方集中居住，

也只是与一般犯人在形式上稍有不同，实际上是一样的。他们所以集体地又回到管理所，乃是由于劳改队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也就是把他们给“休”回管理所了，至于他们是为什么集中在一起？又为什么被“休”回来？他没有（也不便）作明确的说明，只是笼统其词地说：由于他本身条件不够当组长，使得大家收到不良后果，这责任应由他来负。可以说他的报告乃是以自我检讨为主题的。

但是从他以下一些陈述中，却透露一些情况。一、他和那位共青团员结婚不久，就和他离婚了。这表示她发现他原来不过是一个“等外公民”，觉得不光彩，所以“不久”又离了婚。他因而闹情绪发牢骚，老是心里放不下。从而才由工厂被送到劳改队，终而又退回管理所的。二、刘荣第的家庭曾在长春开宾宴楼，那在当地算是有名的餐馆，他刑满释放后，因为分产的老问题，曾和他的继母在法院打官司。这被认为“仍然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受到了批评。刘又认为这是家庭私事，思想老是“搞不通”。当然这就是他被集中又被“休”的主要原因了。李仲章对于他当年被周恩来派到东北策动国军王家善部叛变，未授功反而判罪。思想的结一直未解决，刑满释放后，仍然发牢骚。被集中和“休”回，那是理所当然的。江声煌是黄埔军校三期生，他认为他一直是忠实地给李济琛当马前卒，李叛卖国民党当了“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却判了罪，一直不服。在管理所时，就老想去找李济琛；被释后当然也老是“念念有词”。他与以上的人落得同一结果，那是事所必然的。张达权是因为在买东西时和店员因故口角，而又被“回炉”重炼的。叶杰强、高广荣、白玉昆，都是特赦的。唐未透露他们的问题，但肯定是不会无因的。

以上八个人后来被移到山上农园去住，他们虽然照常劳动，

但伙食都是由我们项下分过去的，这说明他们仍是处于无偿状态。一直过了半年多，一些人随着第六批（1966 年）特赦释放了的几个人，另行安排了工作，但是刘荣第、李仲章仍然留守“避暑山庄”辛辛勤勤地义务劳动到 1973 年，才再一次“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女共青团员嫁了被特赦的战犯，会有不光彩之惑，此表明被释放战犯的处境该是何等卑辱！离了婚发牢骚还得“回炉”改造，这表明他们的处境又是何等可怕！闹家庭问题，同别人口角，都得“二进宫”，谈谈旧案情流露不认罪，那当然更是“反动透顶”，罪有应得。可是他前一次的汇报中，还得把劳改队说成国营农场，把变相犯人待遇说成关怀备至，他们的心灵深处的悲痛，俱是何等的“其味无穷”啊！

在我的叙述里，以前曾有一些地方写到“下跪请罪”的事。对此，任何正常人都会发生一种难忍的屈辱之惑；我想读者们更不会例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而在共产党看来，却完全与此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无比威力和“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威力的反映。另外也意味着他们奴化训练的成功，暗怀着一种洋洋得意和“无产阶级江山”（实在说来是“毛党江山”）异常巩固之感！仿佛就是标志着：凡是天下反集权、反奴役、争自由、争民主的“异己分子”都被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的了！他们对此极为重视，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导演”。本文所述的李寓春、康建东已是说明这一点。更可恶的例子，请看下边。

石玉湘是湘西人，原是地方武力的一个头头，后来在国军当过师长。他在第四次特赦后回到湘西，被安排在一家文具店工作。到家没几天，地方领导干部就邀他到一家剧院去观看演出。他当然“受宠若惊”唯命是从。他高高兴兴到那里一看，

正是在演丑化国民党的话剧。最后一出是演一个恶霸横行乡里的故事，他还莫明其妙。等到他看到那个丑化了不像样子的主角台词说明是“石玉湘”，他明白了邀他观剧的用意，当然他也懂得应该怎么作。

当演出快要结束时，他快步走上舞台，向观众“直溜溜”地跪下，涕泗横流（究竟是出于“认罪骗”还是惨痛，就请读者去想而知吧！）地高喊说：“父老们哪！剧中的大恶霸石玉湘就是我本人啊，剧中所演的故事，只是我很少的一部分，我还有……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我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向父老请罪!……诚意接受父老监督、指导，继续改造……”在此可能发生疑问：石已回到湘西，我怎么会能知道这种经过呢？这，我要交代一下：石玉湘回到家乡后，把这当作“光辉榜样”，这是在给我们的公开信中的一部分。所遗憾的是我现在只能简录很小一段而已。

在这次汇报会上，他们每人都特别强调：他们有些都已取得“公民权”，有的并极其“光荣”的参加过选民投票。从这一角度，他们真好像已经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到处受歧视，一有风吹草动，就首先被“整”，动不动还得下跪认罪，要一定说是“公民”，也只能说是“公民”之中的等外品，也就是上文所指的“等外公民”。

第二十五章　炼石英坩埚

自从我们集中到战犯管理所以来，除了原有各所监房的外形没有多大改变（内部还有不少新建工程）以外，监内各种建筑物，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搬来移去，历年不断。反正我们这骨头，木工、瓦工、电工什么都有，只要一声令下，他们的心中所想就可不付任何代价地成为事实。他们要冬季吃青菜，我们马上就给盖暖房，他们灵机一动，要想培育人工蘑菇，我们就把暖房拆除，立刻重建培育室。说这种蘑菇品种不好、味道不美，不如养海狸鼠和兔子（三年灾害末期），既可吃嫩肉，又可取毛皮。我们就赶紧把房子拆掉，就地掘坑修水池（养海狸鼠）和盖兔子房。光是猪圈就不知搬了多少次，马棚、牛栏、仓库、鸡舍，更是拆来搬去。烂砖头到处堆不下，只有挖坑取土后，把它们填入地下埋起来。那么大的监院，几乎都已无坑可挖，这虽足以反证我们历年的艰辛，但在管理所却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反正劳动无酬，又百依百顺，只要在生活或经齐上合乎他们的设想，他们就要我们照干不误。

约在 1962 年夏，正在工厂、农园和以上这些杂七杂八都忙得不可开交的时际、，管理所又要抽出大批人力，开办石英坩埚工厂。据主持这项工作的干部说：这种坩埚是冶炼某种稀有金属所必需的。从苏俄进口 20 到 30 公分高，直径 10 到 15 公分的一套（三个）要人民币 2 千多元。而且他们还不愿卖，蓄意

要卡中共的脖子。自己生产一套的成本，顶多不过 20 元，就是卖 1 千元，利润也极为可观（这在共产党叫做“利润挂帅”），说干就干。

生产设备，主要是一个大型变流器，由自己的工厂做出，再由北院抚顺监狱拉上鼓风管，基本设施就告成了。这种东西的制造过程是：把一个炭精棒插入盛在圆桶的石英细粉里，通上电流，炭精棒发生高热，等到把周围一层的石英粉熔化成半液体时，取出来，拔出炭精棒，装入模型里，鼓气吹胀、成型，冷却后，按规格要求锯去吹风口那部分，再把毛刺口磨齐，就完成了。设备和工艺都如此简单，这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昼夜两班生产，干得热火朝天。那位主管干部，也在集会上频频提到：“像这样的工厂，我们要尽可能多办几个”，言下不胜得意。

这里边有两道工序，曾陷我们同犯于深重的苦难。

第一个是锯割炭精棒。由有关部门调配来的炭棒都是直径约 10 公分以上，长约 60 多公分的大家伙。必须由木工用锯割成约一公分半见方和长约 20 到 30 公分的规格，才能合用。这种东西很脆，一不小心弄断了，这对犯人就意味着又给自己添一份过失。可是它又不能免掉不断的思想上的负担，真是苦不堪言，而且消耗量又很大，锯不出来，就要停工。如是就得小心翼翼上气不接下气使出周身全力去干。再加精神的紧张，虽在摄氏表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冬，用不了几分钟就要累得全身大汗。有时我们就寝之后，还隐约听到他们在哈呀哈地锯得正起劲呢！

干这个活儿，锯下来的黑色灰尘到处飞扬。它和汗水一结合，要把身上糊一层黑泥巴，鼻孔唇边就弄得更加乌黑，肺腔里究竟装了多少，反正没人量过，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第二个是磨石英粉。其过程是：从山上拣来不含杂质，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英块。用清水洗净泥土，因为避免其他物质添杂进去，所以不许用木制或金属器具，只许用石头砸石头砍打成约一公分半大小的碎块。这工作极不简单，这种石英石头，大的有三、四十公斤以上，小的也有二三公斤上下，要高高举起猛力相击，砸成上述那样的碎块，真是谈何容易？不用说一砸就是几百几千斤，就是砸上几十斤，也要累得精疲力竭、大汗淋漓、头昏眼花。而且石状不一，力量和方向一不对头，飞跳起来，常打伤人。当了共产党的罪犯，反正什么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了。不用说皮破血流，就是腿断筋折，也不能顾虑自己的痛楚或危险哪！

砸成小碎块，然后把一小撮放在一块有平面的砧石上，再用双手拿一块石头用尽全身力气，连压带碾地硬是把它磨成细粉。最后还得经过最细的饰子，把筛成了面粉状的细粉送去做坩埚。剩下的还得送回重磨！石英的硬度很高，要把那么大的块头磨成细粉，我的天！那要付出多少血汗！

在起初干部只提出把石英石磨细的要求，对于这种陌生而奇特的工作谁都不知从何下手。如是我和另外四个人由电机厂抽调出来，担任试验的工作。以上这套程序也就是包括以我为主想出来的。由于我在合乎质量的要求下，数量又比较突出些，所以后来还派我做过多次的操作示范。是的，因为我常在某些工艺上，能找到一些秘诀或者想出一些改进办法，同犯们也就呼我为“段窍门”，有的人开玩笑，就颠倒过来，呼我“窍门段（与“断”谐音）”。

我们在试验中找出了“门道”，管理所就派出些“老弱残兵”，一共二、三十人，集中在不到 40 平方米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正式开始研磨了。这些人，不是走路都勉强的老头子

（如段慎修、秦绍观等），就是弱不禁风的常病号。体力最强的，也有高血压或是老肺病。在一般情况是下，这些人的劳动只应当作“休养”活动，可有可无的。现在，为了以“抗苏修”，发大财，“给他们改恶从善找机会，让他们在劳动竞赛中，做出成绩”，把他们全部“废物利用”了。这意味着：可以“争取特赦”，这些人也确实发挥了自觉能动性，豁出一切拼命争取。

那个屋子就那么大，除了原来的大石头是在屋外作初步破碎外。其余各工作如：砸碎、磨细和过箩都是在屋内进行。弄得飞砂走石外加白雾沉沉，几乎对面不见人；击坏眼睛和穿破皮肉的，当然不在话下。最讨厌的还是那种石英飞尘，小小的六角结晶体，既是那么锋利坚硬，而它的化学成分又是于肺很有害的二氧化硅。满口满口吸到肺里去，它的后果，该是多么可怕！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活着出监，也就是当然的了。

干这种活儿，为了把上身重量通过两臂都贯注到两手上去，限于屋内面积，大家都是肩靠肩面对面地跪在地下干。但为了一心火热地在劳动竞赛中，表现出“改恶从善”，跪上几个小时，谁也没有喊痛的。到收工喊“停”，有的人两腿都失掉知觉起不来了！等走到屋外一看，每个都成了严冬雪夜的行路人；头上身上都落满了“雪”，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则上了一层白“霜”。

那是一场争取“改恶从善”的竞赛大战。他们在这种幻觉下，那怕把生命一下子送掉，这赌注也是要下的。一般说来，15 分钟也磨不到一市两。你追我赶，谁肯落后？就是半秒钟，谁也不肯耽误。现场情况真是俗得上“哈气成云，挥汗成雨”。但我要加个脚注：这个汗他们是没工夫挥的，充其量只能把头抖一下。抖剩下的，就让它冲和脸上的石英粉钻进眼睛、口腔或者沿着脖子随它自由自在地淌下去！这样干一天，快手也只

不过磨成四五公斤。等而下之，少的只有两公斤左右。相形之下，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了一盆“奥林匹克”烈火。虽然未必能夺“冠军”，但总不肯自甘落后。尤其是，在收到某人几斤几两，都要唱名而报，那每一个字音都跟“改恶从善”、“恢复自由”连在一起，比“拉拉队”还有效。这场老残竞赛就被赶得“屁滚尿流”，拼命以赴了。

段慎修是湖南人，据说曾是青年党的高层人物。他年龄很大，又患气喘。他被判的刑期，我记不清了，但至少是无期徒刑。受着减刑幻想的驱使，他干得特别艰苦，也特别令人感触。在最初，他曾是跪下起不来，后来他把棉衣往膝下一垫，一跪就是一个通班。虽然规定“中休”十分钟，他也从来不停。好几次他把小便都就地解在裤子里，也不肯耽误一分钟！

在那样的现实情况下，对于他的气喘病当然更加不利。气上不来，他咬紧牙关就“吭呀吭”地一气不停！从开始到停产一共八九个月，他就是这样一秒钟也未停地坚持到底。为了争取“改恶从善”、他也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他是出监了——怀着一片热望被送往火葬场。

政府的德意，既是为“改恶从善”找机会，在这样一场争取决斗中，成绩显得落后的，其内心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任建冰患高血压，是落后者之一。他出于自己的动机，就乘机盗窃别人的成品，放入自己的一块。成绩忽然大大提高，被别人察觉，他虽然矢口否认，但内心更加不安。他越想越难过，在学习时间，他看到一个干部从走廊走过，他跑出去跪在地下痛哭流涕地说：“科员！我向您报告！我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虚报成绩，我偷了别人的石英粉！竟然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十几年改造的成绩，毁于一旦！我现在向全体同犯检讨！请求政府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他嚎啕痛哭不已！嗣

后，他又在小组会上检讨说："我是在武汉就受政府优待了的人（他和张毅夫同是活动程潜、陈明仁叛变投共的家伙），以为在政府号召下做出点成绩，我就可以出监了。看见别人都赶在自己的前头，我就'黔驴技穷'，想出这种人所不齿的手段？……这是我自己在同犯中制造孤立……实在是自趋绝路！"从此，他就陷入沉闷抑郁，不久，就得脑溢血一命呜呼了。

这虽是这个贱胚子咎由自取，但如果不是为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所逼，恐怕未必如此之速地落得这样下场。

我每次看到这群"老弱残兵"的劳动情况，心里真有说不尽的感触。我曾开动脑筋，设计了一套自动化的机械，把破碎、研磨、过箩，都可流水完成。并画出草图，主要动力是自己工厂制造的电动机两具，其它也所费无几。几次三番向政府投建议，结果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反映。口口声声"革命人道主义"的共产党，难道只为了节省十几套坩埚钱，就对这些老骨头丝毫无动于衷吗。

冶炼炉昼夜不停，生产了八九个月，光是锯下的废品，不多天就堆成一大堆，用卡车不断地送往垃圾场。成品贴上精致的标签，像宝贝一样地送往办公楼地下室严密封存起来，以备外运。到第二年春夏之交，出人意料地忽然停产了。"老弱残兵"虽有"得免于难"之感，但究竟为什么自动把这棵"摇钱树"砍掉，谁也莫明其妙。事隔几年，有一次连下几天大雨，办公楼地下室全部被淹。派我们到那里掏水，霍然发现那些宝贝——坩埚！原封未动地摆在那里！从此，犯人们私人交谈时，常会打趣地说："像这样的工厂，我们尽可能地多办几个。"

第二十六章　北京参观

随着伙食的提高，管理所干部在讲话中又采用了一个新词句：“希望您们在不远的将来，都能由强迫的改造走向自觉的改造”，并且还用暗示的口吻解释说：“你们要知道‘自觉的改造’是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又露出有被全体释放的苗头了。可是 1964 年 12 月举行第五批特赦，依然是人数无几（全大陆只有五十几人）。虽然如此，伙食也仍然维持原状。根据经验，我们还是觉得很有希望的。这个调子他们还是继续再唱。

1965 年元旦过了不久，管理所在一次集会上宣布：要组织我们去北京（在大陆上北平叫北京）参观。并且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组织罪犯到那里参观，不但是史无前例，而且具有重大意义。要我们好好认识并进行座谈。当然，在座谈中照例是鹦鹉学舌式地来一套“共产党伟大，毛泽东英明”等等陈词滥调，然后转到如何保证严守参观纪律上去。那也无非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抢前不落后，随时作笔记到处不忘罪”等等，这都成了“例行公事”了。

但是有个同犯，也提出一个新鲜而大胆的问题，那就是：既然都能远到北平去参观，为什么不能参观一下战犯管理所自己所设立的展览馆呢？那不是同样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吗？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是在 1962 年（确期已记不清），管理

所就把整个一所空出来，进行一种很特殊的装潢修缮。地下筑槽设上暗藏的暖气设备，地面全用由锦州买来的大理石铺得华华丽丽。然后把所有窗子全行封闭，就由特请的精细木工和装潢工，由一位常住的工程人员指导把门关起，进行内部修缮。严行保密，究竟在搞什么，我们也确实闷得慌！不久，又来了六七个女孩子，在那里出出进进，口里还念念有词，在她们估计不能被我们看见的场合，有时还比比划划好似在做表演练习。于是自作聪明的同犯，就得意洋洋私语起：“一所是改建最新式的剧场，不久我们就可观赏精彩节目了”，讲得津津有味。过了几个月，大概内部工程已经完毕了，于是就见一队一队的人们，成天不断地依次从那里进出。由于我们觉察到这与剧协开演收场的情形完全不同，原来的想法开始动摇了。

那时，监内到处都种有花草，特别出奇的是辣椒。线椒、狗椒、灯笼椒、朝天椒、佛手椒、槟榔椒、柿子椒，红的、白的、黄的、紫的、奇形怪状、五颜六色，当花草种了满院，确实引人注意。那些来客中有人出于好奇心，就向我们问这问那。他们的领队就当场批评他：“事前不是早已交代过：参观展览馆，不准和犯人讲话吗?……”这，我们才知道：那原来是个展览馆啊！但是，展的什么，还是不知道。管理所若无其事似的一字不透露，谁又敢问呢？可是问题就在于：既是展览馆，而又常组织我们到别处去参观，为什么反而不让参观“自己的”呢？又为什么不准到此参观的人和我讲话呢？这的确是个难解之谜，所以这次有人利用座谈的机会提出来！当然，照常没有下文。

第二年，展览馆的所有模型橱框和一切布置内容，都很精心细致地打成包件，连同所有有关人员一齐跟着，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半年多才运回来。又开了一段时期就关闭了。从

我所发现以前到此参观的队伍中，有些是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人员，可知沈阳各机关，当是有组织地到此参观过了。当然不是运到沈阳，而运到北京去展览那是很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有一次派我们从卡车上往展览馆搬东西，我们才得乘机窥视了一下。所有设施虽已不是那么整齐了。虽然只有几处天灯开着，展出景物都有些阴暗不清，但一望见图片、模型，还有穿清朝官服的，那不言而喻，则是以溥仪的罪行和改造表现为主题了。还有，部分是日军服装模式的，当然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及其战犯改造为题材的。我们当时不敢露出有意要看这些。只是扫视一下，就实在够上触目惊心的了。高处满墙壁都挂的大型金字的关于“坚决镇压反动派”的恶狠狠的毛泽东语录。绝大部分的展览内容都是诬蔑、攻击和丑化国民党的。一瞬间我只模糊地看到以下三个橱柜：一个橱柜里的模型，正如 1958 年交罪运动时所设的“交心房”那样，极尽诬蔑之能事所绘制的，有如古庙壁画“十八层地狱”那种血光迸溅，令人可怖的各式各样残酷屠杀的情景。它把国民党都塑造成为“吃人的野兽”，用以煽惑人们同国民党发生不共戴天的仇恨。另一个我没有看得十分清楚，我的印象，好像是模拟南京雨花台刑场的情形。关于这，共产诬蔑说，在雨花台一处，就杀共产党人十几万之多（他们曾捏造出一个具体数字，但已记不起确数了）。那么，除了对日抗战曾迁都武汉及重庆外，国民政府在南京一共不过 14 年，按此推算，平均每天至少要杀 30 人以上。我在南京前后曾有两年上下，并且常去雨花台游玩。也知道那里有个刑场，但他们这种说法，不用说见到，连听也没听过。在国家的首都成天平均要拉出去三十人枪决，姑不论罪名如何，也是骇人听闻的事，如真有其事，当时竟不被人所知，也不为世人托病，天地间绝无是理。若就当时国共斗争的实际

情况而言，总共处决过几十几百，我不认为不可能。丢开远的说近的，他们所以编造如此令人咋舌的勾当，无非要在不明当时情况的后一辈人中间，制造仇恨国民党的情绪，以转移他们对于当前环境的不满。同时，把这联系和比拟到我们这些“战犯”，个个都是“猪嘴撩牙的吃人野兽”，好叫这些参观的人都成为猎人似的，将来遇有机会就对我们开枪射击。是的，上文所举的李寓春、石玉湘以及还有一些未曾提到名字的人，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另一套模型是一群着“战犯”服装的人跪地请罪，那不用问是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比威力下”，我们这些“吃人野兽”般的“战犯”都被改造得两个膝盖成了“橡皮轮胎”，那怕是硬石子儿或水泥地，都能服服贴贴跪地请罪，用以显示他们的“改造成绩”和挑起人们的轻蔑之心。他们对此，不仅要到处导演，还要通过展览散布到四面八方，做到无处不知，无人不晓。我不知海外人士对此生何感想，就我个人来说：这只能暴露共产党的残酷本质和嘲笑人类文明无所不用其极的野蛮行径！

这样内容的展览馆，虽然近在咫尺，他们当然是不能也不敢向我们开放的。一直到 1975 年我们全都离开管理所，始终未得一见庐山真面目。这位同犯所提出新鲜而大胆的要求，也确实刺到管理的痛处，当然未能实现。对我们来说，也实在是一大憾事！

对于管理所为什么要把我们分成紧相连接的两批参观，我们当时很是不解。这不是既费事又费时吗？等我们到了北京，才明白是由于住所的限制。

临行之前，管理所曾向我们提示说：“你们这次到毛主席身边去参观，有人感触很强烈，还想给毛主席写封感谢信，你

们赞成不？”当然群声“赞成！”如是推出一位学委起了草，并在俱乐部宣读一遍，内容不外是“感恩认罪”的改造八股型的“王母娘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但是，你只管念，听不听在我。然而有一点不能马虎，那就是举手通过。謄清之后，有位科员再一次召集大家到俱乐部，郑重其事地嘱咐我们工工整整地每个人签上名，由他们去完成下一步的“光荣任务”。这种东西，即或不必称之为“强奸众意”，称它是“诱逼而为”，总是符合实际的。说真的，我只想顺顺利利地到北京看看实际，回到抚顺静等“自觉改造”的来临；机械地举举手，签签名。你们舒服一下，我们“安逸”一下；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应景之举，背心之言。通权达变，适增所愦啊！

我们第一批是二月下旬出发的。坐了一夜的火车，天才亮就到了天津，望见北京已是“日上三竿”了。城墙已拆，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东南角楼，大概是作为“古迹”存留了下来。它是我当年在汇文学校读书时，课余常常登临的游赏之处，远处望见格外觉得亲切。可是火车走近一看，它已残塌不堪，遍体鳞伤，面目全非了。既然作为名胜古迹保留下来，共产党为什么不把它修葺一下？我还以为是没有照顾及此呢。往地面一看，残破的枕木、零散的铁轨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没人管，路基的石子和抛弃的废物，混杂在一起，好像这条铁路已经废弃多年不用了。到了角楼下边，火车并不是顺着旧城墙外往西去前门车站（已改为工人俱乐部），而是转入城内，然后沿城墙旧址西行到了座落到哈德门内东边新建的北京车站了。这里倒很清洁而且有秩序。

火车停下，当地就有人上来和干部打招呼。一望而知：那是专来照顾我们的。下了火车，上了停在出口外的大巴士。可能是为了等人，并未马上开走。这时，我四下一望，原来整个

车站，除了把汇文学校生物教室和运动场全部占用外，并把汇文中学东面的空地以及空地北面的民宅都辟为站外广场了。

用 1956 年参观的经验来判断，这次不是住旅馆也不是住招待所。所以巴士开了之后，直奔东长安街。我知道那里有北京饭店，但我认为不可能住那里。后来车子转向德胜门。我一想：那边没听说有什么大旅馆，而杜聿明等曾住在德胜门外监狱，我就肯定是去那里了。可是车出德胜门一直不停地向北郊行进，什么去处？就无从捉摸了。走了一个多钟头，经过沙河镇，快到南口了，车子又沿燕山脚下转向东行，再过小汤山，发现紧靠荒凉的燕山脚下有一所孤立的灰色大院落，原来这就是新建不久的秦城监狱！也就是中共的“天牢”！

墙有一丈五尺来高，外灰内红，上边拉着构型万难攀越的电网。隔不远不但有重兵看守的碉堡，而且接有探照灯，夜间照得如同白昼。院落之大，东西约一华里长，南北约半华里宽。院中除了监内办公室和仓库等为平房外，另外有四所 U 形的三层建筑，那就是关押犯人的牢房。所有这些建筑都是灰色的，相互各成一单位，其间有墙相隔。院内又设有地堡，内设武装监视哨。牢房都是平顶的，上设有抽屉式的许多大格子，格子之上还有天桥。据说，每到放风时，就命犯人从特设的小门进到格子里一个人活动活动、或者晒晒太阳。天桥上的哨兵，不时来回巡查，真够得上是层层设防，步步监视，好不森严，好不恐怖。

监外靠近处，只有一处锅炉房。员工宿合是在离约半里路的东方。此外，北倚光秃秃的连绵无际的荒山，东、西、南三面也只是不见人家的果园。足见这个地点的选择是特别费过心思的。

我们是住在最靠东头的一所监牢内。大概是为了保密和通

行的方便，我们是从东面的一个便门进去的。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楼梯所经过的从下到上一整个部分。进去一看真是吓死人，到处都是很粗（直径一寸以上）的铁栅栏，简直跟兽槛一样。上边的门闩，也有娃娃腿那么粗，到处都是大锁，一般的都在四斤以上。我是被分配住在第三楼的一个监号，共住五个人，那个门至少也有七公分厚，上边只有一个内向以备窥伺的不到一公分的喇叭镜。室内打地铺。天花板有一丈多高。高处只有一个口向外开不到一尺半宽的小窗户。门旁墙根靠水泥地处，有一不到半尺见方外高内低、折成直角的小洞口，既可通风又可送饭，但无法外望。到处叮当响，又阴森，又可怖。比起抚顺，每人都有憎此乐彼之感。号内没有便所等等设备，据说因为这还是轻刑号！我们多次听见：院内地堡里的监视哨兵厉声发出警告，大概是与我们邻近而又不相通那些监号里的人，有些什么动作使他们不满意吧。

厕所是公开的，小便池臭不可闻，大便池水道不通，溢得满屋满地。浴室在楼下，有盆浴，据说是专为病号用的，一般人只能洗淋浴。那也是保密性的，一个小格子，还不到一公尺见方。而且时间很短，至多五分钟就得赶快走开。在有参观节目时，早晚餐都是在“天牢”开。主食都是订制的面包、馒头之类，副食由干部和一名炊事员预备。有时候也吃饭，并弄个一菜一汤。基本上比在抚顺好些。参观嘛，参观两天要休息一天，除了理发洗澡外，还要举行小组讨论或者写笔记。

在秦城略事休息，我们就开始参观了。其次序共有以下单位：

北京焦化厂

该厂位于东环南路（即环城东路的南段）。据干部交代，这

是一个守密的地方，经过特许，我们才得参观的。果然，门口设有双岗，看样子，至少有一排武装驻此警卫，出入都须经过盘查讯问。一进门，最醒目的是一所三层办公大楼，外面全部贴的白瓷砖，耀眼明光，很远即可看见。与炼焦的一些深色设备相对照，它就更显得不调和而突出。这所楼是所费不赀的，许多同犯在座谈“参观感想”时表示：“毛主席不是说：‘勤俭办企业’吗？焦化厂的办公室不知为什么要修那么漂亮？”干部后来推托说：“那是苏联专家搞的。”

办公室虽然那么漂亮，但是向我们作介绍的是在一个草棚式很不象样的临时性房屋中进行的。大意是：这里炼焦所产的煤气，主要是供应各国使馆之用，因为产量不大，居民只能供应很小一部分。如此看来，它可能是专为向各国使馆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也可以使用煤气”而设立的。它的副产品，主要是卫生球，苯还在试制中，仅此而已。

厂房也不大，现在留有印象的，只是配料车间的翻车机。它是把各种煤料原车送入这个机架之后，按动电钮一转，就把煤倒下再换入其它车辆。这在我们看来，当然是见所未见，照例鼓掌！其它各工序，我们既外行又陌生，向导逐步讲解，我们也只是走马看花而已。

归来的路上，我在车上想：那么点儿大的工厂，产品又那么少，为什么要驻兵如此保密？莫非是怕供应使馆突生中断吗？

国棉二厂（国营棉纺织第二厂的简称）

该厂位于朝阳门外。这一带已经成为工业区，比较大型的工厂多设在这里。该厂规模不小，粗略估计占地至少近百亩。一位不到 30 岁的女职员向我们作介绍。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是：过去的北平只是一个消费城市，工厂只有一个财政部印刷厂和

一个面粉厂比较还像个样子，纺织工业除了只有几家小型的手工作坊，大型的根本没有。现在（指当时）已办了三个大型的纺织厂，该厂是其中之一。职工的平均工资每月约 60 元左右，最高是每月 110 多元（八级工），最低的学徒工每月也有 30 元上下。就是厂长的工资也不太多，有位副厂长每月只 80 元。纺织机械大部是大陆产，很少也有购自日本的。职工大多数女性，至于职工数目以及产品产量、福利设施等项，就记不清楚了。

就我的水平来看，这个工厂是相当现代化的，车间通风通光以及安全设备，都够一定的水平。因为机器老是哗啦哗啦响，讲解员的声音很难听得清；而且我们的队伍断断续续拖得很长，一般都是处于小跑步状态，连走马看花都够不上。好在，我过去曾参观过纺织，而且从画报之类的书刊上常有接触，只看看规模作个大致的领会，基本上也就够了。

在大陆上，纺织机械制造厂是有了一些的。我从机器上所安的厂牌来看，有郑州、济南，也有上海制造的。

在纺纱车间和织布车间，工人们为了适应机器的要求，老是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特别是织布车间，为了从劳动竞赛中争取评上“先进工作者”（以前叫“劳模”等），有的工人要照顾 20 台甚至 30 台以上的机器，精神和体力的负担就更大；下班时节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记得，我在中共报刊上读到指控日本纺织业资本家说：“他们为了更残酷地剥削工人，竟让女工穿上轮式冰鞋，在纺织军间奔来忙去，那是拿人赶机器，不人道到了极点”（大意）。与现实对照，我倒有些茫然起来。一个人要照顾二、三十台织布机，她会比日本工资多吗？“两条腿跑路”难道比“溜冰”鞋会舒服些吗？在日本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惨无人道，在大陆又是谁剥削工人，谁惨无人道呢？对于工人来说，日本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当权派是不是同样的呢？剥削

的定义，究竟应该怎么解释呢？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是越搞越胡涂。马克思的“资本论”真是不易叫人学得通啊！

这个厂正在搞无梭织布机，据说这是世界的先进技术，他们是在试制阶段。我们曾特意到那里看了一下。规模不大，已能运转；但织出的布还不能保证不跳线，这是一大关，过不去是不算成功的。

我们来去之际，在该厂门口看到不断的卡车在向外运输布疋，这表明该厂的产量是相当大的。

参观该厂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一、生产管理是有条不紊的；二、卫生、安全和福利设施也是够水平的；三、一般的棉纺织机械，在大陆上是可以自给的；据说，还有部分援外。

我们是在该厂工人食堂用的中饭，虽然没有厂方人员出面，但由菜肴比较丰盛来看，当然是由他们招待的。用膳的工人们老用惊奇的眼光，老捉摸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我们虽然知道她们是“猜不透我们是干什么的”，但我们总是有些发窘。

饭后稍事休息，干部就领我们到食堂外的一个比较僻静之处。经所长介绍一位约 55 岁以上的老女工向我们讲话了。这，我们“条件反射”地发生了警觉。她的名字我在不多几年之前才行忘记。她是“劳模”之一，以前在共报上也曾知道她。她没有拿着草稿，却讲得很合乎“要求”。足见她是个演讲的“老手”，并且事前又作了充分的准备。她的讲话，确实够得上有声有色。我在写到此处前，曾认真地加以回忆。不用说录其大部，那怕只录出三分之一，我想对于人们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她能在“天子”脚下取得一席之地，当然是“有两下子”。可惜，我现在只能记得一鳞半爪，实是一大遗憾。

开始时，心平气和，就跟谈家常一样。她说：她是苏北人，因为家贫，父亲饥寒病故，她就跟着母亲到上海求生活。不久，

母亲也因贫病交加，又无钱买药而死去。这就是说：她从上一辈就道道地地是无产阶级出身。那年她只有十一、二岁，被逼无路只有拜工头到纱厂当童工。到此，她的声音就转入好似难以自禁的凄惨。她让我们想一想：童工又能赚几个钱？除了被工头横行克扣，到自己名下，不用说吃不饱穿不暖，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钱找啊！没办法，只好找几个同病相怜的小姊妹，弄条破毯子，找个避风的地方挤在一起过夜，说到这，她就真好像吞声欲泣了。

后来她听说东北大石桥成立了纺纱厂，出高工资招收熟练技术工，她于是又怀着一片梦想跑到那里去。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儿还有工人的好结果？又回到了上海。这当中，她罗列了成堆成串的苦难遭遇之后，把话锋一转，厉声怒目，咬牙切齿地指着我们破口痛骂起来了。她说她一生所遭的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帝、封、官"的总代表国民党给她的。要不是我们维护那个吃人不见血的社会制度，她又那能遭受终身难忘的痛苦，她就是剥我们的皮，抽我们的筋，也不能解她的心头之恨，一口气说了一阵，又停了一下，面容渐渐转向喜悦。她说：因为中国出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才打倒了我们这群国民党，包括她在一起的苦难人才翻了身，她要永远"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把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让"反动派"再得翻身，她表了一气"态"，话锋一转，她说她刚才所讲的话，是发乎一生的切身感受，实在难以不言。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她们无产阶级的胸怀是伟大的。共产党执行毛主席的改造政策，希望把我们这些"坏人"改造成"好人"，她们是一百个拥护，一千个赞同的……最后，她还祝愿我们："能够早日改恶从善，重做新人"哩！

我在前边所以说她"讲得很合乎'要求'"，就是她好像是

在做演员，每一句话都是照剧本背台词，合乎角色的“要求”。在大陆上，共产党导演出这类角色，可以说到处都是，尤其对于我们，这个戏更是要演。

她讲完之后，金所长就问我们：“你们对于这位老工人师傅的教育，有什么感受没有？”这是要搞什么？大家是心中有数的。眼看要“冷场”了，忽然钻出一个家伙举手了。他的发言大意是：他刚才听到老工人师傅的控诉教育，他的心情万分激动。他认为那位工人所说的遭遇都是确实的，也都是包括他在内所加在她身上的。他确实罪该万死……，为了表现他能认罪，说着说着就跪在地下了。接着又说：蒙她“既往不究”，那是“与人为善”的天大恩德！他并宣誓，他一定接受她的教育，坚决走“改恶从善”之路，争取重做新人，不做到这一点，“死不瞑目”等等。他是一个小组长，在这眼看冷场的情况下，不能不出来“救驾”。他既能“善体”上意来个“援场”，又借机表现了自己，当然“义不容辞”，一举两得。就是在他跪下之后，其他的人都像“看热闹”似的动也没动，这使他的“进步表现”就更加突出了。对此，他可能还有“洋洋自得”之感呢！

他一个人表演完了，势不得就此结束。金所长又征求：“还有谁想发言？”还是冷场。金所长又重复地问，这时有一个叫作龚新民的湖南人举手了。这个人，既是土腔很重又是“大舌头”，平常说话常叫人听不清，可是今天，他却从容不迫，而且语音在基本上能使人听得懂。他的发言，简短而含蓄，大意是：老工人师傅的控诉，他好像在什么地方都已听见过多次，当然不能不会是真的。这次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对于他是再一次的深刻教育，他要用感激的心情，认真地加以思考，俾能对于他今后的改造，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最后，他对她这次费了这么多宝贵时间和满腔热情的教育，表示衷心的感谢。到

此，他规规矩矩地向她一鞠躬。

也许我们的思想出了偏差，对于金所长的表情，看来不那么愉快。他好像预感到：再继续下去不会有什么意思，就不再征求发言，而只是对大家说："谢谢老工人师傅的教育！"他带头鼓掌，大家鼓掌。"今天的参观，到此结束，大家准备上车，回去！"

清华大学

共产党的人民政府成立后，对于大陆上原有各大学的校、院、科、系曾有大规模的调整。相同者按地区布局和实际需要，进行了认真的裁并。这既可以集中设备，又可有计划地造就人材。现在的北京清华大学，就是经过上述调整后，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工科大学。是我们参观的节目之一。

我们到达后，是由该校一位负责人（不向我们表明讲话人的姓名身分，已成定例），在会议室向我们作介绍的。他一开口就说："提起清华大学，你们都不会是陌生的，你们之中可能有人还在此读过书吧？"（有人举手并应声说：他是在这儿毕业的）他继续说："关于这个学校的历史，谁都知道这是美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培养它的买办或代理人，正如毛主席在'友谊，还是侵略？'这篇经典著作中所指出的：把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这对中国是一种更加阴狠的侵略，绝不是什么"友谊"。而你们却把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当成朋友，从而在不同程度上，都怀有这样那样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这种思想如不彻底肃清，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祸害……"等等。他是借题发挥，首先进行重点批判。正如在全大陆一样，只要一提到美国，就必须把过去的好感翻过来，用尽一切词句，挖空心思不问青红皂白，

进行劈头盖脑的批判，使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在共产党看来，这是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社会制度、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把对方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就意味着自己的统治有被推翻的危险。不管过程如何曲折，手段如何多变，但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总目的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机会教育”，当然更要照行不误。25 年中，对于“美帝”的批判，不但是舌敝唇焦，就连用个英文字母，也必须遭到“幻想美帝”的无情批判啊！他们的逻辑是：“美国用英语，你用英文字母当然就是幻想美帝呀！”可是，现在大陆所行的国语拼音，还不是用的那套字母吗？可是，我们写东西时，在一、二、三、四或甲、乙、丙、丁等类标号用尽时，用上 A、B、C、D，那就会出天大的问题了！

接着话头转入了学校的现况。关于教职员工及学生的数目，共有若干科系和专业等等，我当时都曾作了笔记。可恨这类东西，释放时片纸只字都被没收，我现在只能遗憾地付诸阙如了。这也是我在写此“自述”时的一大苦恼。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只能约略地记得，清华的教职员工大概有两三千人，学生约有一万多人。当然，这个数字还是有出入的。

我们的参观，也是走马看花的。那时他们正在上课，在各处操场上体操课的学生，至少有 15 班之多，每班都有教员在指导，看样子，操练认真，秩序也还不错。从建筑物的颜色和新旧程度来看，可以分辨出，新的建筑比旧的要多些。在原校址东边，新建了一所教学楼，至少有十来层，其形式好像是莫斯科大学的翻版，也就是中央主楼有点像纽约帝国大厦，下边伸出四条腿，外形已经建成，正在装修内部。我们只是远远望一下就走开了。我们曾参观一个关于电子的研究室，这是我们参观的重点，换句话说：这也可能就是他们的精华所在。应届

毕业班正由教员领导在作实习。向导人员对于一排排的电路装置讲得津津有味，他说：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经过教研人员的努力，对于科技尖端的电子计算机，在既无数据又无图纸的困难情况下，已研制成功，并且要当场表演给我们看。说着说着，经过在前头的人问答了几句什么，一按电钮，不到一分钟，机器上就吐出宽约一尺多，长约十来尺的两条横幅，上边由数字组成约一尺见方的大字。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对于电子科学我们虽然一窍不通，但我们很理解这是在干什么，立刻一片鼓掌。然后，操作人员说：这是他们所研制的仿真电子计算机运算的结果，又是一片鼓掌。我们再往前走，忽然看到一架像是旧式大型照相机倒安起的东西，在映象玻璃上出现我们（包括我在内）在走动，大家都怔住了。为什么这架照相机在镜头看不见而又相反的方向会搞出这"玩意儿"呢？解说员大概看出了我们的问题，忙说："这是他们最近研制成功的电视现场摄影机"，又指向他面前一架大形镜箱说："摄影机在这儿！"唔！"电视"？这名词我们只是在报刊上接触过，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工科最高学府，居然也能搞出这样尖端的东西，确实了不起！又是一阵鼓掌！

我们还参观了实习工厂，规模不大，里边安装的都是各类简易机床。我所以敢用"简易"二字乃是根据我后来当了车工的理解。车床虽都不大，但是很新。一些学生正在练习拆卸和擦油。据向导说：这是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学习要结合实习，不像国民党时代，光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关于这一点，我倒觉得不符。当年我常去北平大学工学院，多次看见我的中学老同学，在机器厂抡大锤、开车床；在纺织厂（实习工厂）纺纱、织布。"孩子总是自己的好"，共产党在这方面，确实表现

得突出。

我们仍是在那个会议室用的中饭，吃的是全面（即是不筛除麸皮的面粉）做的包子，这是用卡车从外面现运进来的。常识判断，当然是由管理所在别处订做的。学术机构，一切都要按预算办事，怎好为招待“战犯”而增加一笔不好报账的开销呢？

我们当中有个叫杨不平的，如果我不是记错了，他的女儿正在这所学校读书。经过管理所的沟通，她也知道他的来到。她来是来了，但不是他的女儿，而是他女儿的一位女同学，向他冷冷淡淡地说：“她有急事进城去了，特意让我转达：实在不得已，请您原谅！”掉转头，扬长而去。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心灵深处不禁感触万千。

前文已经提过，曾作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艾毓英，他的兄子也正在该校当共产党的宣传部长。许多事实表明，对于我们有亲人在北平的人，共产党都尽量想办法能使他们相会，艾毓英的儿子当然也不例外。老子在伦常观念支配下视他为骨肉，很盼得机一见，但他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视老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面拒不相逢，当然可以理解。

我们吃完中饭，稍事休息，就在原地由那位作介绍的人为主，召开一个参观座谈会。征求我们发表感想，我们经验地理解到：这是让我们作“应声虫”，大批国民党，狠批美帝。尤其对于那位曾是清华毕业的同犯，当然是一个必须现身自表的机会。什么“到旧地（他不敢说是‘母校’）一看，发展得令人大吃一惊！除了那一点点不成样子的红砖建筑还可辨出是原有的以外，其它全是在人民手里扩建起来的”等等，用新旧对比的方法，先大肆贬旧褒新一番，然后，就联系自己地担负起鹦鹉学舌的角色。什么“因为他是给地主作养子出身，所以亲美、

崇美、恐美的思想自幼就养成了。从而就一心想钻进这个学校，准备往上爬，骑到人民的头上，死心塌地做美帝的走狗……结果，他做了战犯，这是自己的阶级本质决定的，也是自己一念之差的必然结局……。所以他对美帝恨死了……”等。他翻来覆去足足讲了有一个钟头。

人民大会堂

提到人民大会堂，我想在海外的人士也可能有不少在报刊的照片上见其外貌，而不会感到十分陌生。顾名思义，它是“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另外，接待外国政要、举行庆典、宴会等也是它的附带用途。

根据介绍，我现在还能笼统记得的有：它是在全大陆有关部分协作下，除了准备工作以外，共费了大约十个月的时间建筑起来的。例如铜制的大门，就是由上海某工厂按设计图纸制造，运来安上就成功的。全部建筑的平方面积的总和，比整个故宫还要大些。全部电灯共有三万多盏，足可供应五万人口的城市之用。电线和管道共约 ×× 里。全部地毯，除了少数是订制的以外，大多都是由有关单位贡献的，一般面积都在一百平方公尺左右，大的有几百平方公尺，都是最上等毛料制成的。颜色、图案和光泽当然也是头等的。在介绍中还特别强调：“像这样的大会堂，施工期间之短，在世界上是头等的。而规模之大和现代化程度之高，也在世界上是头等的。起初帝国主义者们不相信中国能建设这样伟大的工程，可是有能力也有志气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但建成而且建得很好，并且比英国的国会和美国的国会都要好”等等。对此，我们当然相信。反正外国的这类建筑，我们根本没有见过，更谈不上比较。但是我有个胡涂的想法：

用谦虚一些的口气不是更好些吗？可是又一想：共产党管这叫做“实事求是”，我又何必伤此脑筋呢。

我们除了参观大会堂会议厅，还专为我们把常委办公室打开，让我们转了一周。带领我们参观的是位女青年，她对内部情形了如指掌。在指出朱德等的座位之后说：“这就是办理国家大事和批准特赦的地方”。由此可见，她对于我们的来历早有所知了。然后就参观各省市代表集会室。这些地方都分别冠以省市的名称。如新疆厅、湖南厅、上海厅等。内部装修都浓厚地具有各个地方的风土情调或物产特色。例如辽宁出产煤、铁等，该厅一进门迎面就是一架用不锈钢雕铸的大屏风。这件东西在事先就曾在报刊上大肆宣传过，说是只有辽宁才能用自己冶炼的不锈钢制造出几吨重的大屏风。这充分表明大陆的炼钢工业已经攀登世界的高峰。另外，还用煤雕艺术品以及几吨的一块作摆设。此外，墙上还挂着贝雕画屏以及柞丝刺绣等，总之都是为表现地方特有色彩而设计的。其它各厅，也都是如此。

我们只是约略地参观了五六个厅，并在广东厅和辽宁厅稍事休息了一下。当然，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同时也没有必要一一参观到。不过，我在此要提一下。后来，在报上见到傅作义这个大叛徒曾在所谓台湾厅开的什么会上向台湾发表过无耻的劝诱谏言这件事，我才知道人民大会堂又出了一个台湾厅。如果当时已有了的话，他们一定要我们这群国民党“战犯”到那里去一遭。问题是：为什么当时不设而后又设了呢？那当然是迫于政治形势的被动，才想出自我陶醉的一招吧？

在参观中，我老想能到那个能装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看一下。说真的，我倒不是想开开“眼界”，而是想起老百姓宴馈亲友都被说成“吃喝浪费”或是“私人拉拢”；我就很想领略领略这里的“势派”了，可惜没有如愿。

出了大会堂，我在台阶停步四望时，我就想：北平的适宜地方多得很，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国家中枢机关和供人参观的历史博物馆，建筑在面临群众纷杂的大广场和毗邻前门闹市的所在呢？从而又联想起，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这套设计的（有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审查这套设计模型的照片为凭），唔！我承认了毛泽东创造权威的天才，不但高人一等而且世无其匹！不是出自他，任何什么者什么家，也没有如此独到的预见和想象力。这两个建筑的重大寓义，在于一个表征历史是以毛泽东为转移，一个在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缔造的。当毛泽东在群众的海洋“山呼万岁”声中在天安门上出现时，大广场上训练有素的学生，在每个预设的小方格里用各种色彩组成和变化出“毛主席万寿无疆”等专供毛泽东个人赏心悦目（因为不站在他的位置谁也看不见）的祝颂之词，再由处在他脚下的两大建筑一烘托，毛泽东就不是“敢与天公试比高”，而是主宰人类命运的“天上神仙”了。如果不用或者没有这个“一整套”作陪衬，和后边的太和殿相比，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就显得是“沐猴而冠”了。现在，两相对照，三大殿如小巫见大巫；当年的“九五之尊”那赶得上今天的“伟大领袖”，如此“神圣不可侵犯”，难怪毛泽东要高歌“秦皇汉武……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套东西，不是“为人民服务”出发，而是为“树立毛泽东绝对权威”出发的。它使得人们不知不觉地把毛泽东当成“凌霄宝殿上的玉皇大帝”来崇拜，有形无形地把毛泽东当成不可抗拒的“神化象征”来看待，这套设计是起着妙用的。在此，我又想起列宁来。他每次在这种场合出现时，无论精神面貌或是一举一动，都无不显示他是在人民之中，而“伟大导师”毛泽东在天安门楼上出现，您看他那踌躇满志的神情肖貌，“透

过现象看本质”，灵魂深处，除了视自己在“九霄之上”哪有人民的地位。天安门外这套设计是毛泽东在北京“登极”以来五大得意杰作（其它四个是：“三面红旗”外加“文化大革命”）之一。那位“你办事、我放心”的继承者，也能深体斯旨，在此处修建“毛堂”，毛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历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不论就其名称、建筑本身或是陈列的内容来说，都是相连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一般性的历史博物馆，另一个是以毛泽东活动为中心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两个建筑物也是共产党夸耀建国十周年伟大成就的十大建筑中的两个，规模也是相当宏伟的。历史博物馆嘛，还不是按照时代过程有组织有系统地陈列一些历史文物。如所周知，从某一角度来说，无非都是些“干巴巴”的东西。可惜我们都是“一扫而过”，想要停下多看一眼都不可得，所以今天回忆起来，很是吃力。现在只能就残存的印象，简单地述其大要。

在历史博物馆的先民发明创造部分，有个模制的指南车，给我的印象很深。它是应用齿轮联动的原理，在出发之际，如果把车上木人伸出的手指指向南方，不管如何转弯抹角，也不管行程长短，他的手便永远指向南方。其妙处，就在于木人下边的齿轮，能够机械地跟着两个车轮在左右转弯时发生转数之差而使方向不变。这是三、四千年前的伟大发明，充分表明我先民的聪明智慧。

在铜器陈列室，有一个四足两耳长方大铜器，是我过去所不曾见过的。高有三尺上下，长有四尺左右，宽约三尺，看样子至少两千斤以上。周体绿锈斑斓，洵属珍贵。我没时间看说明牌，想是东周以前的器物。它表明我国的冶金铸造技术，在

两三千年前就已达到如此突出的水平，对于人类的文明，确是一大贡献。

所谓革命历史博物馆，当然是以突出毛泽东个人的共产党革命事迹为主体。在开始的一部分：什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共产党合作才有了发展，什么北伐的局面是以共产党为主力才打出来的，什么“四一二”事变是由于蒋的背叛而突然发动。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我还是在东北上高小或初中的时期。共产党向来都说自己一贯是正确的，可是，其中也展出，刘少奇在安原煤矿搞“工运”的“镜头”，那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了。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自己出来，说是他搞的。这，我就不能不说：“地球好像随着毛泽东的要求而任意转动”的。

当然，什么“井冈山会师”（据范园焱义士最近揭露：他们自己宣扬已久的“毛朱会师”，在文化大革命时改为“毛林（彪）会师”了），什么“五次反围剿”，什么“遵义会议”，什么“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强渡铁索桥、袭取茅儿盖等，更要为毛泽东大肆吹嘘一番。

至于对日抗战，也说成是毛泽东领导的。把抗战胜利硬说成是八路军在敌后浴血奋战（在敌前是谁它不提。）而来的。我作为这些事件见证人之一，便不能不说他们是毫无道理地颠倒黑白在扯漫天大谎了。这位“伟大领袖”连他自己所写的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接受改组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信誓旦旦“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共产党宣言，都不承认并从已发表过的“毛选”里砍掉不算了。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杰作”，“革命”的历史博物馆，当然要宣扬一番。奇怪的是：那里竟陈列着许多“人民来信”，

用以证明“人民公社”这一“伟大德政”，是由于各地人民的请求而开展起来。关于此事，人人都知道是毛泽东发表“人民公社好”五个大字而通令实行的。在大陆上有这么一条不成文戒律：如果对于“领袖”的号召不积极响应，那是要惹出“扣上什么帽子都难说”的大祸的。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谦虚，把“响应”变成“请求”，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伟大发明

我们在这次参观中，还有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干部特意领我们到附近的邮政总局去参观一项伟大的发明。我们进了门向左转，来到一台四尺来高二尺多宽像是小公文柜那样一个东西前，已经有一些人在围观，经有关人员向他们嘀咕一阵，人们就走开专让我们来开眼界了。据介绍：它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邮政有关人员在一无资料二无图纸的情况下，发挥革命豪情和冲天干劲，苦干加巧干，经过不断的实验和改进，终于发明和制成了这台“自动售票机”！唔！自动售票机？出发前不久就在人民日报上专文报导过，今日一见，果然奥妙非凡。辅币从一个小口儿丢进去，相应的邮票就从另一个口里掉出来。全大陆当时只有北京总局才有这么一台。我们这些“土包子”，听都不曾听过，今天居然出现了这么伟大的发明，真是了不起！但等到 1975 年我到香港一看，不由大吃一惊！自动售票机，不但到处都有，而且有的还只有十包香烟那么大。尤其各种娱乐场所，连冷饮罐头的出售都已自动化起来。我就想：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家伙，居然如此肆无忌惮地盗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明创造，实在太猖狂了。可是不久，我又产生一种胡涂想法：所幸我还没有回大陆，如果回到那里，顺口说出香港也有这玩意，那个“包”可就不知要“粘”多大了！

石景山钢铁厂

石景山钢铁厂，简称“石钢”，后来又改“北钢”，大概是因为改名为“北京钢铁厂”的缘故。据闻：现在又称“首钢”了（即“首都钢铁公司”）。从北平城内出发，由长安街出复兴门笔直向西，大约行 20 公里就到了。当我在北平读书时，就曾听说有这么一个公司，但那时已停产，所以未曾来过。我们在抚顺出发前，干部就吹嘘要到这里参观一个最尖端的成就，而且是经过特准的，所以我们都很注意。

例行的介绍是在一个临时性的建筑内进行的。作介绍的那位，看样子好像是一位比较重要的干部。态度表现比较和蔼与朴实。他的大意是：这个厂原是民国初年由一位政客（姓名已忘）创办的当年只有一座不像样子的高炉炼铸铁，产量既小质量又不好，销路竞争不过舶来品，所以时断时续，最后无法维持而停产。在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出于自己需要，又从日本运来些“袖珍高炉”恢复了生产，但是产量很有限。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过来，连工钱都付不出，勉强维持了一个时期也停产了。用他的话说：“这是该厂多灾多难的时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下，该厂才获得新生。生产数字连年上升，但他没有透露任何数字。所有高炉除了只有一座，是经过改造的以外，其它全是后建的。炼钢方面，除了以平炉为基本以外，现正攀登世界炼钢技术高峰，开始建造氧气顶吹转炉。也就是干部在抚顺向我们介绍的那个“最尖端”的成就。但因现在还没有投入生产，所以还不能供我们参观。最后，他还说为了遵守毛泽东“勤俭办企业”的教导，把一分钱都用到急需的地方，所以他们还都是在临时性的板棚式的房屋中办公。这可能是因为我

们曾对焦化厂的瓷砖办公大楼提出了“批评”意见，所以他对此特别着重加以介绍，表示他们可不是那样的。

这个厂的旧有面貌，已经完全不见了，规模很像一个有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厂内运输全赖铁路，据介绍人说：总合起来以百里计。我们首先参观的，是自动化铸管车间。它的程序是：铁块加热化成铁水，由管道输入一个圆盘结构上边的机口，随着铁水不断加入并增长的重量，那个铸管也就随着下沉。够长度了，圆盘依次一动就浇铸第二根。冷却到一定程度，铸成的铁管就自行跳出成了长约一丈多，直径约六七寸的成品。据说：这是该厂独有的技术，他们很以此自得。

这里的高炉，据我这个外行来看，和抗战时期的重庆大渡口钢铁厂的高炉，形式大小以及操作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铁水炼好之后也是用工具破开黄泥巴口，铁水由高向下流入预先做好的铁坯池。经过冷却成为大家所习见的铸铁坯。我事先以为，事隔二十多年，这种手工方式，一定会有不小的变化，孰知还是老样子。

有缝钢管车间是“流水作业”式的。它把厚约五六毫米、宽约七八寸盘成大卷的钢板送入一架机器，就陆续不断地卷成钢管，然后经过焊缝、矫正、切断，成为约两寸半粗和约一丈五尺长的钢管。对于焊缝问题，他们曾作重点介绍，说是苏修掐他们脖子，以前是用另一种焊法。现在他们采高频电焊也同样有效。

“三百”车间是不久之前，自行设计自行建成的。这里是轧制钢筋的地方所以用“三百”取名，大概是按钢筋的长度而言。那天正在轧制约一公分直径的钢筋。我们到那里，不知是怎么提起的，说是同犯尚传道的女儿在钢铁学院毕业后，就在这个车间当见习技术员。如是经过管理所干部的沟通，父女两

人见了面，根本不相识了。再经干部介绍，把他（她）们送到随我们行动的大巴士上，谈了足足两个钟头。

这个厂还设有“阶级教育馆”，特别是对我们，更是不可免的接受教育的项目之一。其内容，整个大陆都是一样：“旧社会是地狱，新社会是天堂”。千篇一律，我就不再重述了。

吃完中饭，那位介绍人特别引我们去参观两处地方。那就是办公室地带和职工宿舍区域。正如他所介绍的，办公室都是一排排板棚式的临时建筑，所用的桌椅也都是些将将就就甚至是残旧的。在每处地方他都要讲述一下特点，用以表明他们是严格遵守“勤俭办企业”的“英明教导”。但是有一个地方，他好像是故意地忽略，停也不停地在房前走过去。门旁挂个小牌：“保卫科”。

职工宿舍是在厂区的外缘上。先看的一部分是很多排已经建了多年而又很低小的红砖房子，据他说：这都是“复工”之初的建筑。上车行约两里，来到一处新式楼房建筑区。看样子刚完工不久，一般都是三层到四层。十几栋楼房的方向与外形都不一致，乍看好像是横三竖四似的。有的还有阳台，相当美观。据介绍人讲：这就是最近建成的宿舍楼，我们曾进入一所楼房看了一下。我的感觉是：除了室内比较拥挤之外，大致还是合用的。出来后，他又遥指办公室说：“请大家看看：我的办公室是那样的，可是我们却为职工先建成这么漂亮的宿舍。这就是我们严格遵守‘勤俭办企业’的具体说明嘛。”

我们上车后，他还很热烈地向我们鼓掌，表示欢送，并恳切地说：“再见！”我们也同样地表示感谢。

清河毛织厂

提到清河毛织厂，老一辈的还会记起，它就是原来军政部

清河制呢厂。在抗战前，凡是军用的毛呢、毛毯等，多数都是由此织造的。另外，还出一些毛哔叽之类的一般产品。就拿军用毛呢来说，甲种草黄色毛呢（一般称之为“将校呢”），质量水平还是很高的。可是有关人员向我作介绍时，竟说：在国民党时代只能生产些“不像样子”的东西。

厂房一般都是重建的，在院内有一块大约三四千平方米，地基还未平整的空场。据说：那就是原来厂房的所在，后来好像是火烧掉（已记不清）了，现在正计划另建。

厂内的纺织机器，我所见到的厂牌，都是日本制造的。关于这一点，介绍人可能是忽略了，未加说明。

产品是以商品为主，也有部分供军用。毛毡种类不少，花样也多。据说：有位刚满 20 岁的青年，所设计的图案销路最好。特别还选出几种给我们看，也的确雅观大方令人喜爱，夸他“很有天才”。但不知后来批判“天才论”时，“捧”他的人们是否也遭了殃？有一种外橘黄内粉红的平面毛毯，很漂亮的各色绸缎包边，结上丝带用玻璃纸包好，这样一打扮，就更显得鲜艳。据他们说：这是专为运销南洋一带华侨，用以换取外汇的。在那里，这是一种畅销品，因为那里的华侨很喜爱这种毯子。他们叫我用手摸摸说：“这都是人造毛（尼龙）织的！嘿嘿！”

毛呢也是多色多样。他们说：主要是销香港。在那里英国商人打上“英国制造”的标记，就可以充英国货推销世界了。这一方面是讥讽资本主义商人什么都干，另一方面是暗示他们的产品可以比美英国毛织品了。

所有产品的原料分：纯毛、混纺（即羊毛和人造毛混纺）和人造毛三种。据说：还是纯毛质量高，混纺次之，人造毛制品，虽然柔软，但是不能经久耐用，但价钱便宜，所以销路不

坏。

我们是在该厂的职工食堂用的午餐，看样子，也是由该厂招待的。我们也曾在那里作了一次参观。在设有传递窗口的食品部，工人凭证按价目表交钱后，早已做好的面条、米饭、小菜等就马上递出来了。小菜大都是素的，肉类很少，买的人也不多，大概也许是定量分配的缘故吧？

吃完饭，又在原来作介绍的那个小会议室集合。经金所长介绍，由一位名叫童景梅并且是“人大代表”的女“劳模”给我们讲话。她在大陆上相当有名气的，人民日报常有她的消息，她的态度比起“国棉二厂”的那位显得更是严峻。除了在个人历程方面有所不同外，对于国民党的痛骂和愤恨，虽然大同小异，但是显得更加恶狠。最后，她还下个命令式的警告：“你们不肯真诚改造，人民是不能答应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认罪服法，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语声一落，她开腿就跑了。这也许是在“国棉二厂”取得经验的结果，免得干部窘于征求发言了。

电子管厂

该厂位于东郊，是苏俄援建的工厂之一。建筑较新，规模也不小。据说：这是“保密”单位之一，偶尔也只是对“友好国家”的政要开放一下。看各处张贴的欢迎标语，知道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前一天曾到这里参观过。

接待室虽不大，但很考究，四周有许多样品陈列橱。据说是为了处我们能够领会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才特许到此参观的。

介绍一开始，首先对国民党讥讽奚落一番。他当然知道我们的来历，所以就对我们作了大肆嘲笑的文章。他说：提到电子工业，在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可悲而又可耻的空白。在国民党

统治的时代（他还用眼四处望了一下我们）就是普通的照明用的电灯泡，不是外国造的“亚司令”，就是外国造的“奇异”牌，更不说电子管了。可是，他就不懂那时中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的天兵天将，他们那时候也不是只能制造土枪土炮吗？要不是国民党领导抗战，解决了历史的关键问题，会有今天吗？谁叫我们作了阶下囚，什么凌辱谩骂，也只有洗耳恭听。唯一的办法，只等有朝一日插翅飞到台湾，看看那里的今天，到底谁高谁低。他讲到苏俄援助建设该厂的经过时，就不是 1956 年参观那样，到处都是什么“苏联老大哥的援助是忘我无私的”和什么“苏联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等等，而是什么“苏修把兄弟国家当成销售落后产品的市场”，和什么“苏修很怕中国强大，尽把落后技术输入中国”了。在讲到这些时，并从橱柜里拿出两支大电子管，对一个较大的说：“这就是苏修给我们设计制造的广播用的电子管，这家伙又大又笨又不管用！”然后又指那个较小的说：“这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别看他小，可是它又灵、效率又高。我们的广播苏修想尽办法也破坏不了。他们很莫明其妙，中国是怎么搞的？他言之凿凿而又得意，真好似苏俄在什么地方说这种话，用无线电通知过他似的。反正我们都对此根本不通，随便他怎么说，我们都照例通过。

在讲到职工现况中，他提到：该厂的工人，一般水平都是中学毕业，因为建厂不久和作业的要求，平均年龄都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设施等，我就不加赘述了。

我们曾到装配板极和瓦斯封管等等车间，我们都对之一窍不通，只是浏览一遍，领略一下生产过程而已。我们在炼熔玻璃车间，曾见到几名男女工人在那里吹制“灯泡”。其办法是用一根约三、四尺的长管子，把尖端向熔液里一沾，就像吹喇

叭一样把两腮吹得鼓鼓的，憋得脸红脖子粗，一口气把头上的熔液吹成“灯泡”。这玩意，我也是第一次见过。就想起：幼年时听说，所玩的“噗噗叮”（即是小孩吹着玩的一种玻璃制的响器），就是这样吹成的。那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我就不知道落后技术该是什么样的。我只觉得：这种吹法，对于工人的健康，不是没有研究的余地？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厂，要用这种吹法，又怎么可以满足需要呢？唔！又一想我明白了，这是苏修如此教的，他们还没有改良呢。

最后，我们参观幼儿园，这里到处都贴有毛语录。一进门就有这么一条：“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我想：仅仅几岁的幼儿，还不能有这种理解力，如果不是为工作人员，便是为参观人贴的。不过我觉得，说这话的毛泽东，他就首先不曾实行。

这里是两层楼，楼下是低年级，高年级在楼上。作息室、游戏室等等，设备都还完善。幼儿自己的用具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在一个室内，看见一组小孩，也和在其它地方所见到的一样，都是坐得规规矩矩不声不响地在吃橘子和点心。这里的所有儿童，我没有看见有任何一个是离开“群众”而活动的。走则同走，食则同食，唱则同唱，玩则同玩。总而言之：都是集体化、规律化，从个体来看，每个儿童都十分可爱！从整体看，我又很感觉他（她）们都好像玩具店里的各种“洋娃娃”一样，被拢得整整齐齐，听凭人们的意志被拿来移去。她（他）张口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闭口唱：“我爱天安门！”初看起来，觉得从小就养成“守秩序、爱集体”等习惯不是很好吗？可是归途中细想，这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对于幼儿来说未免太那个了！

工人体育馆

工人体育馆也是所谓“十大建筑”之一，而且也是招待外宾欣赏的重要地方。它的主体建筑是那个像大形“蒙古包”（即蒙古人所住的帐棚）式的体育馆，另外有室内游泳场、露天游泳场、露天体育场等。我们只到两个室内的馆、场参观了一下。

这个室内体育馆的直径，大概在一百公尺上下，四周设有许多出入口，通往看台的相应座位。它的周缘好像分四层，因为内部看台是喇叭口式的由下向上张开。所以第一层分别作为办公室、储藏室等之用；第二第三两层设有运动员寝室及食堂；第四层大概为看台及走廊所占用，就只剩墙壁了。我们曾被引导到第二层几个地方看了一下。运动员寝室，据称是为临时招待之用，大约在不到十五平方公尺的面积内，设有两张单人床位，铺有一块小地毯，床下还放着比较精致的拖鞋，床是一般弹簧床，被褥之类都很整洁清爽。食堂也是相当高级的，我们走过时，正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好像是吃点心。照大陆的水平来看，运动员的享受是“贵族式”的。

据说：看台的座位，上部是固定式的，下部可以依照场地使用的需要而调动。座位都是黄色胶合板制成的，很新。他们对于屋顶，曾作重点介绍一番。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圆形屋顶，下边没有任何支撑物，如果出问题，那结果就不堪设想！设计人员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这句话在这种场合是绝对不能少的），拿出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精神，应用自行车轮的原理，把一根根钢辐条的一端，成之字形结合在中心成为立体的钢制圆周上，而另一端成为直线结合搭在周围墙上的钢制大圆周上，这就好似一个巨形自行车轮横架在屋顶上了。他并且说：每一根辐条的距离和接合点都必须做到高度的精确，

否则，失去力量平衡就要出问题了。每一根辐条都有几百斤重，整个房顶可想而知。他并强调：这是他们独创的，光是在高空安装，就极不简单。

我模糊地记得，这个建筑是为一次国际乒乓球赛而赶工完成的。当时，共产党自我吹嘘，它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

室内游泳场，据我的水平，不感到它有什么特异之点。初春时节的北平，室外温度也只有摄氏五至十度左右。除了我们这群参观的不速之客而外，场内所有的人都是着游泳装，水也相当温，有几名女教练正在指导几位女孩学基本动作。看样子，那天可能是女生练习日。池中有三五女孩在练习蛙泳，她们（女生）的年龄大概都在十二、三左右。由此推测：她们可能都是专业练习生。这是一进门就可一目了然的事。

从这次参观，我们发现和我们不是一伙的两组人。一组有六七个人，都是和我们同车来去，服装也大致同我们一样。后来才了解：他们乃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也住在秦城监狱。不过是居住在一个特定的范围，未曾和我们交谈而已。另一组只有三、四人，其中有一个穿着蓝袍红边和长筒靴蒙古装的大块头，其他都是穿中山装，看样子是汉人。他们都是另由干部陪乘小轿车单独来去，吃饭也不和我们在一起。后来才知道前者是 1963 年特赦的前伪蒙古军总司令德木楚克鲁布（即“德王”），后者其中之一，是 1964 年特赦的前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等。另据有关方面透露：在我们之前不久，“山东团”（即山东战犯管理所）也曾到北平参观。而关在秦城监狱的“战犯”，又曾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观。由此可见这次的参观是有用意和进行过周密的安排的。

四季青公社

这个公社是共产党夸示农业集体化优越性的展览橱窗，凡是到北平访问的外宾，有不少人都被引导到这里参观（指当时，后来就多数到大寨了）。它是以生产蔬菜为主的公社，所谓“四季青”就是表示无论春夏秋冬都能生产新鲜蔬菜的意思。

它地处西郊机场的南边。公社之下要分多少个大队，大队之下又有多少个生产队，所辖地区较广。我们只是以公社为中心及其附近的一个大队所办的温室，大体参观了一下。

作介绍的是一位 30 岁左右的青年人。大概他是经常搞这一套，从容不迫又有条不紊。态度谦和，又不是“照本宣科”，给人以“朴实的农民气质”之感。除了“历史沿革及新旧对比”那个老套无必要再述外，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有以下几点：一、这个公社是供应全北平市蔬菜主要基地之一。二、就是在冬季，他们也能用温室培植出大批蕃茄、茄子、黄瓜、豆角等新鲜蔬菜，供应市场的需要。三、所有能参加劳动的男女社员，一概是同工同酬。四、自己设有机器工厂，凡是公社所用的一般机械，基本上可由该厂制造或修理。五、社员的收入已接近消除工农差距的水平，就是说：仅比工人的收入稍低一些。

我们乘巴士曾到附近一处温室去参观，那里是一排排朝阳玻璃窗的温室，每排面积大概有二百平方公尺，总计就有几千平方公尺了，窗高平均及人，因为坡度关系就前低后高了。水由“小龙沟”引进来灌溉，这种经营方法，在全大陆北方，基本上都一样。几年后，这种玻璃温室就改成用塑料薄膜搭成拱型的架棚了，据说效果比玻璃还好些。

我们参观了一个种蕃茄和一个种黄瓜的温室，有几个人正在“下架”（即摘果），据说在市场上只卖约两毛钱一斤。据介绍人带有讥讽嘲笑的口吻说：“这在苏俄或美国人按人民币至少要两元钱一斤才能买得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处处为人民

设想，才能吃到这么便宜的东西。……夏天最贱，才只卖一二分钱，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性嘛！”对于在美、苏为什么贵得这样不可理解？我一方面怀疑介绍人是故意奚落夸张，另一方面觉得“苏修的新资产阶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许只求个人发财而不管别人的死活。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我思想上的一个“症结”，我老想找机会把它解决，所以到美国两年多来，总想找个答案。近来，听说美国农业工人的工资，一般说来每月有千元左右。蕃茄的市价平均是五毛一磅，批发价格当然还要有个很大的折扣。就算平均是一毛钱，那就需要一万磅，才够支付他一月的工资。据我在劳改中的经验，每人一年顶多生产八千斤，平均以五分计算，才共约四百元。两相比较，美国的农业工人所以能过一般水平的美国式的生活，而大陆上的公社社员所以老过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这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我不承认自己天生是资本主义奴才，我不能不说：大陆上的人民太苦了！他们所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剥削也确实太重了！也就是说：那里的工资待遇，实实在在比资本家残酷多了！

因为时值农业生产的淡季，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些。

他们的机器工厂，规模虽不大，但就一个公社来说，是够用的，里边设有 4.6 尺车床，牛头刨床以及钻床等，操作者多半都是年轻的女工，我们来了，她们都像若无其事地聚精会神地干自己的工作。该厂还设有小型铸造部，当时正在筛沙，这部分大都是男工，在院中有一个样子不到二十岁的女工，抡着八磅铁锤敲一块铁板，她表现很有力气又很熟练。这对于我老以为“女人不适于干重活儿”的旧观点来说，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教育。中共说：“女人是半边天”，我认为这话是正确的。妇女能在就业上和男人居于平等，生产劳动力可扩大一倍。过去，妇女的体力不如男子，未尝不是历史的许多因素积累的结

果。她们一旦得到机会发挥，这种情况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变的。我所目睹的现实，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并不是说：每个女人都应该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那是应该有具体条件之别的。话要说回来，我也不曾听说哪个中共男高干，从毛泽东说起，他们的爱人（邓颖超和蔡畅除外）曾独立性地就业过。“半边天”在他们本身就成了空话，那些女人还不仍是“妻因夫贵”的从属品吗？江青若不是作了毛泽东的“爱人”，还不仍然是个几流电影女演员，凭什么权倾一时，险些当上“西太后”了呢？

据他们讲：凡是城里有的，从这里的供销社都可买到，我们到那里也看了一下。是的，从糖果点心、油盐酱醋、日用百货到布疋玩具等等都有。可能是供不应求吧，有些儿童正在那里争购糖果。那里有不甚畅销的洗脸用的香皂，但不见几乎人人必需的洗衣用的肥皂。这种现象，在大陆是普遍的。就拿战犯管理所来说，我们用的那种油渣所做的肥皂，每月一块还时常领不到或者迟领呢。这不是别的，乃是油脂极为缺乏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可以买到香皂呢？那是因为它的块头小价钱又贵，一般人谁能买得起呢？那里只摆着极少一点化粧品，大概那只是为供应演节目，或者为女孩子们奉派出差迎接共产党所要“热烈欢迎”的外国政要时化粧用的是的，在全大陆上，烫发或擦胭脂抹粉的女人是很少见的。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或金钱，那就可能是在“争平等”的意识下，她们要和他们争“本色”，而搞那一套了。但我觉得：美的感受是人人都有的，今天又不是原始时代，不过分地打扮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特意到卖布疋的部分转了一圈，乍看之下，我简直分辨不出哪是男用，哪是女用。在整个地球上，中国大陆可算是最特别的地方，男女的衣着不但类似修女、教士那样都穿一个颜色的，而且连式样也几乎难以区别。对此，我想起两件事：一、

如果苏俄军队再有像当年对日作战进兵东北而入侵大陆那一天，他们可能不会再有那么骇人听闻的兽行犯罪，因为他们很不易分清哪是男哪是女的。二、我又想起江青来了。她后来忽然“反潮流”，穿起式样很讲究的女性裙式服装来，我想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也应该是“敢于创造、敢于革命”和“敢于打破旧框框”的一种“造反精神”表现吧！是的，“文革”后的女装果然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一件事，当然应该归功于他们那时呼得那么肉麻的“敬爱的江青同志”了。

我除了在去沈阳公路上，看到曾作为中共展览橱窗的高坎大队，和在照片上见到大名鼎鼎作为“样板”的大寨大队等处的农民住宅，有所更新以外，几乎所有农民住宅还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不是东倒西歪，就是敝陋不堪。经过历次修修补补，只能用“百孔千疮”一词来概括了，城郊的僻静处与离公路远的乡村，更是如此。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这些房屋的拥挤程度，事实上已和沙丁鱼罐头差不多了。在我的脑子里，像四季青这么出名的公社，地近“首都”，又经常接待外宾，情形一定会好一些，可是出乎所料，“依然旧家风”。我们小组曾到一名社员家访问，因为他们的成分是中农，而且人口又多，所以没有“扫地出门”，仍然住在从上三世就遗留下来的旧宅内。虽然都是青砖建筑，但是围墙已经快倒了，正房也已快塌了，因而三十来口人都挤居在东、西六间厢房内。

据那个年约 40 岁的男主人介绍，他们堂兄弟共五人，因为两个弟弟都已成为工人，所以把家都搬走了，就剩下他们三家住在旧宅。他指着接待我们的堂屋里摆着的一张床说：“我就住在这里。”但他对于拥挤的困境也显露出能够解决的喜悦。他指向院外一堆砖说：“翻修正房，组织上几年前就批准了，砖已运来两年了，只要木材拨到，就可乘农闲动工。”1975 年到北平，

我又想起了这件事，不知他的房子建好了没有？可惜没机会去看一下。

北京车站

据我在大陆上所见，北京车站算是最好的，也是“十大建筑”之一。除了站房站台之外，还有一个比天安门大约小一半的广场，公共汽车、小轿车和出租车等，都分别按规定停在那里。介绍者是一个约 40 岁的北平人，他在说明了建筑经过和内部各种设施之后，他的总评语是：“经过使用证明，各方面还是适用的。”他很少陈词滥调，态度也是比较朴实的。

楼下除设有售票室，候车室等外，我们还参观了以下三个地方：一、贵宾室。这个名称我现在虽然不敢说记得还准确，但它是专为迎送政要，那是没错的。那个地方普通人不能随便去，里边的设备也豪华，地毯、沙发和陈设都是极其考究的。它直通贵宾站台，在站台两厢天棚的檐上，相对按着专为拍照的照明设施，电钮一按，就是半夜也如同白昼。二、婴儿候车室。这个名称也恐怕记得不准确了，总之，它是为携带婴儿的乘客准备的。室内面积虽不大，但设有被褥整洁的摇篮式小床，备作婴儿休息之用。这既给妇女减轻麻烦，又为婴儿作了福利照顾；同时免得影响公共秩序。他们说：“这是为下一代设想。”我看到有六七个婴儿安安静静而又很甜地睡在小床里，我觉得：他们能在北京车站享受一番，真是太幸运了！不知他们到家后，是否也能这样。但婴儿候车室的光线和空气却不理想，也许是“为下一代设想”的人们，把这一点一时疏忽了。三、候车室的墙上，有那么一种设备，据说：人站在地上放着的一块板上，把你所要去的地，对着墙上那个像是小暗窗的东西一讲，譬如说：“我想去上海！”那个小窗口就会有人告诉：什么

时间？有那些列车？软席、硬席或卧铺票价多少？都答复得周周到到。我们之中，有人试验了一下，果然不错。为了免得弄错名称，我本着印象，就管它叫做“电视对讲问事处”吧！这也是我在大陆上第一次开眼界。

对一处高棚顶，介绍人也曾作重点说明。他指着说：“那上边用约二尺见方拼成的绿盖，是用塑料制成的，轻而耐用又美观，也是我们工程人员自己设计的……”。一九六几年才有了塑胶鞋底，1975 年才在市上出现，不易买到的黑色塑胶提包（我们去香港十个人所发的这种提包，是因“特别照顾”才买到的），1959 年就能制出这么漂亮的塑料瓦，当然是“可贵”的！

我们从自动电梯（这是我在北平所见的唯一的一处）上到二楼，又是一番天地。二楼候车室的设备不像楼下都是木板椅子，而是相当软的沙发式了，这大概是为软席乘客用的。除此以外，这里有一个规模相当大而又相当漂亮的食堂。这里的食品都很讲究，菜肴做得都很精致。白饭是那么白，面食都一概是“精粉”（即是顶细的面粉）做的，既白又有韧性。我们有一次曾被专送到这里来就餐，一桌十个人，吃了几样菜，确实够得上“高标准”，我特别爱吃那里的肉包子和豆沙包，十几年难得解这回馋！我们有次在动物园的食堂也是吃包子，不但全是黑色全面做的，而且连点肉都没有。两下都是公共处所，为什么差得这么悬殊？这个问题就只有天知道了。

从二楼通天桥可以到各个站台，据介绍人说：北京车站是全大陆铁路运输的总汇，由此到各个交通要点或省会都有直达列车，隔不了几分钟就有列车到达或开出，所以北京车站的通行口和站台是很多的。我们从天桥到各处站台看了一下，然后由隧道出来，就上专备的公共汽车回秦城监狱了。这我才明白，一、二楼的各口是光进不出，隧道是光出不进。这是我的猜测，

不知对不？我们除了参观上列各单位外，还曾去过颐和园、动物园等处。那只是一种“游览”性质，我就不加赘述了。

这次参观有一个突出之点，就是：凡是有亲人在北平的，管理所总是想尽办法找到并使之相见。那是一个一切都得仰共产党鼻息才能图求苟安的社会，我们这些被共产党关进监狱的囚犯，不少人的老婆都为“表明政治立场”而离了婚，至于儿女，就是未曾随母改姓，也已把老子当成敌人“划清界限”，互不闻问、两不相知。我们当中，除了尚传道和黄炳寰的家属和陈昶东的胞妹，都知在北平，管理所很容易给“拉上线”并都看出“没啥问题”，他（她）们才敢常到秦城去会见外；其他的人，管理所通过共产党的“内部关系”，虽然知道某些人的家属也在北平，但是具体情况就不是非主管部门所能搞得清楚的了，所以他们只能按照“特务”部门所提供的线索去“摸”。金所长除了只有几次是跟我们一起行动外，他的许多时间都是用在这上面。对此，他曾向我们作过一次“专题”报告。

李世荣是云南人，原是驻在锦州的云南部队（大概是九十三军）中工作，在那里他曾和一位当地女子结了婚。锦州易手后，他携眷回到云南，在卢汉集团中工作，这当中曾生了两个孩子。他虽是跟卢汉一起叛降了共产党，可是他不久就被捕了，辗转解到抚顺，和我们押在一起。他的老婆已和他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去什么地方了，但是共产党的特务机关还是掌握着她们的情况。为了保密，他们向局外不泄露具体真相，只向管理所透露：“她们在北平。”金所长确实费了不少周折，才把她找到。两个孩子也已随娘改姓，其一已在共产党为培植对外人员所设立的幼年外语学校三年级读了书。这样的学校，要不是特殊关节，有这种历史背景的子弟是休想入门一步的。另外，又没提到他老婆的现实情况和态度表现，这表明他的老婆

很可能改嫁给一个共干了。他的孩子也不愿来看他，已经划清政治界限，那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管理所为此，也确实费了一番心思。

此外，和上述情况一样，管理所还发现某同犯的女儿在北平，但是在什么地方，都无从得知。于是金所长就到北平市公安局查户口册子，结果，发现有好多是同姓同名的。他在这些人里，又按年龄、籍贯等去核对，发现三个人比较可能，他又前去一一造访。一个被发现根本与我们这位同犯毫无关系；一个他按照三次搬家的线索，虽然找到了，仍然毫不相干；最后一个据街坊邻居说，在某一农校毕业后，也已不知去向，但这个人，在许多方面都很像是他的女儿，金所长又到农校去访。结果，虽有此人，但毕业已经几年，究竟在何处，还得查查看再通知。过了几天，那个农校通知他：她现在南口附近某国营农场工作。金所长自己讲：“大海捞针地找到了，真是高兴。”他急忙前去，谈起来，她先是含糊其词地不肯承认她有那么一个父亲，经金所长一番交代政策和说词，虽然承认了，但坚决表示：她的爸爸既是“反革命”，她在共产党、毛泽东的多年教养下，他就是她的敌人，她要和他划清政治界限，绝不去看他！金所长要再往下讲，她真的就要翻脸了，所以金所长只好失望而归。不用说那个当事人听了心情根沉重，就是我们听了，也都感慨万分。我只有一个独生子，自从我被捕就拒不和我通信，邓小平不是还说过：“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吗？共产党的子孙是天生就应该被人尊敬的宠儿，国民党的子孙，便永远是世代相传的“混蛋”，就是我将来出监，有父子相见那一天，我对他也是处在“祸首”的地位，遗患真是无穷啊！

话还得说回来，既然说这种互相仇视又人人自危的局面是

共产党造成的，为什么他们这次又费这么大的周折，想方设法不厌其烦地撮合亲人相见呢？这我在前文早就交代过了。因为我事实上成了毛泽东、共产党向台湾打主意的政治筹码。和 1956 年一样，这次大参观乃是“走上自觉改造”（释放）的信号。“解铃还是系铃人”，为了给我们造成能和家属相安的气氛，他们就不能不出来做这个工作了。可是冰冻三尺，已非一日之寒。人们的戒心已结得那么牢固，估不透这种情况（也就是对共产党不摸底）的人，他们想到后果的可怕，就不能不“坚决站在人民立场”。这也是共产党自作自受，金所长的碰钉子，那是很自然的！

此外，在秦城监狱的俱乐部，举行过一次家属和已释放的同犯报告会。

前文提到杨不平在清华拒不相见的那个女儿，经过共产党进行一番沟通和说服，才到秦城来会见杨不平，并给我们做了报告。内容很冗长又不着边际，说了一大堆，都是空洞的大道理，不是她对于劳动的体验，就只是很冷淡地表示：如果杨不平能够很好改造争取到“人民的宽大”，父女关系自然能够恢复正常等。都是一些一口不由衷的“应景之言”，我就不加叙述了。

黄炳寰的第三子，年约二十七八，可能是因为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没有人肯嫁他的吧！所以还未结婚（这种情况很普遍，例如沈阳警察局长毛某的儿子，已经快要四十岁了，人们知道他是蒋家的亲戚，就没有那个女孩子敢沾他的边）。黄炳寰的这个儿子在师范学院毕业后，在北平当小学教员。他的发言很朴实，他在谈家庭情况时，对于他母亲在父亲被捕后的艰苦支撑，很表难过。大哥随空军幼校去台湾，下落不明，二哥又吊儿郎当，给母亲操心，并搬出另居，置母亲于不顾，他和弟弟们都

是母亲千辛万苦培养入学的。他每月只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但还不足家用。话里话外暗示：自从他的父亲被捕后，家庭生活已日趋绝境了。其它方面，他当然不敢再作任何的透露了。在谈到他对黄炳寰的态度时，他只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从骨肉的关系来说，他恨不得父亲立刻回到家中团聚；但从政治关系来说，他又不愿看到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爸爸回到家！"说到这，他已泣不成声，发言也就此结束。这况味是极其深长的，我至今不忘。

孟昭楹在第一批特赦后，就一直随老婆住在北平。据说他的表现很出色，所以这次特别请他来做就业后的示范报告。他是在一个街道试办的小型工厂做"打杂"工作，既要运货运料，又得随用随到。真是作到了"受伤不下火线，越是困难越上前"！别人都是按时上下班，他不但要早到晚退，而且还有临时突击。因为他有"反革命"的历史背景，又是经共产党特赦的家伙，不这样就不能表现"认罪感恩"，所以他必须时刻谨慎、加倍努力。他举的事例很多，其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有这么一次：那是一个严冬，北风飕飕，滴水成冰。他连早饭都没吃，赶起小毛驴车就向北出发。出门不久，就感到冻得受不了，可是他又没有足够的棉衣，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用他的话说："我还有管理所发给我的破棉袄，把这个恩物披到身上；再冷也是温暖的，我啥也不在乎了！"（在乎，又能怎样呢？）他出了德胜门，就很难见到人了。迎面风吹得驴子都不肯走，没办法，他只好牵着它走。没走几里，风越来越大，驴子的驴劲大发，无论如何不肯走，两下就玩起拔河比赛来。他筋疲力尽又饥肠辘辘，没走多远，又遇到一个人冻倒在地下。他一面牵驴子，一面又把棉袄盖到那个人身上。那个人苏醒过来，又扶他上车继续前进。所幸不远就到了目的地，完成任务，天黑回

城，那个人才下车离去。他到了家，一头扎到床上，不能动了，他老伴吓得嚎啕大哭。感恩认罪，他已做得无以复加。

当中共与印度，在西藏发生所谓麦克马洪线的疆界问题时，孟昭楹赶忙不迭把他过去当外交官所保存的有关这方面的地图献给外交部，用以表示靠拢共产党的忠心。这也就是殷勤、谨慎的具体表现。

他虽然如此勤勤恳恳，每月工资也祇有 20 元左右。他不因此气馁，反而要成天打通老伴的思想。就北平的当时物价来说，每人每月 10 元，衣物不敢买，出门两条腿，完全用在糊口上，也只能勉强维持饿不死而已。他的老伴听说他们第一批特赦的溥仪、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等都当上了政协委员，很是不服，成天闹情绪。对此，他在发言中，确实感到苦恼，而这苦恼的根源，就是在于他老伴思想觉悟的落后上。他说：他老伴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状态，原地踏步走，所以他要申请移居到农村去。据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后得知，他的请求已经实现，搬到乡下去了。

第二天，他是和我们同车进城的。发现他比起昨天确实大为容光焕发，大概他在秦城饱餐了几年来难得如此“丰盛”的佳肴，精神忽现充沛并为之一振吧！

在座谈这次报告时，很出于当局设想之外。许多人不但不以孟昭楹为榜样，反而为他的情况感到心寒。我的发言很简短：“听了孟昭楹的报告，我觉得出监比在监还不好过，我心里凉了半截！”我的言中之意是：大监狱比小监狱还苦难重重，在小监狱把这“一百多斤”（指身体）豁出去，反倒万事大吉，反正命中注定，蹲下去也算了，可是，我不能说得那么露骨。就这么着，我还不止一次地在针对同类情况的不提名批评中被指出“……也有的人，不但不能从孟昭楹的报告，受到鼓舞、力

争上游，反而说‘心里凉了半截’，就是说：他不想争着出监了……。”

我们从抚顺出发时，冰雪还未化尽；回来后，已经柳发新绿了。过了几天，第二批就出发了。

自从共产党放出“希望你们能进入自觉的改造”的空气，经过参观，包括我在内，尽管“心里凉了半截”，但还是留心静观释放的苗头。特别是在十月以后，就更加注意，结果，就连一般的特赦都未举行。这不会是别的，正如 1956 年一样，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又举棋不定了。

第二十七章　敲骨吸髓

到 1966 年，全所只剩下同犯 200 人左右，由于人数逐年减少和衰残日益增多，而劳动项目又是有增无减，我们的体力负担也随着越来越艰苦了。原有的这些劳动，我们本已难于应付，可是今年又不声不响地把我们赶入敲骨吸髓的奴隶劳动。

该年四月又举行一次（第六次）特赦，释放的，只有叶佛佑（曾任国军团长，广东淡水人，文化大革命中，不知何故又被枪决）、李汉萍（国军少将，湖南长沙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和只有一个多月即将刑满的田文奎（河北人，曾任河北省政府高级官员，从被捕一直当学习组长）等人。一句话：又在挤牙膏。

举行特赦不到两个月，忽然运进大量的沙子，把约两千平方米的操场，铺了约 15 公分厚。这是干什么，大家谁也估不透。接着又运进大批鹅卵石、沙子、水泥和粗细不等的钢筋。马上由北院抚顺监狱调来一名快要刑满的钢筋犯，教授我们如何把粗纲筋截短、如何把成卷的较细钢筋用人拉直，然后又教我们把这些准备好的材料，按照图纸要求进行结扎。后来才明白：原来这都是些钢股架子，准备浇铸建筑楼房的水泥部件啊！水泥搅拌机马上运到就开工了。我同另一个同犯被派担任搅拌工，除了“出锅”（即是把搅拌好了的水泥从机器里起出来），机器一秒钟都不能停。水是用导管引进就近的缸里，但为了配

料比例，必须再一筒一筒倒入机器里。在机器运行中要赶紧把水泥、沙子、鹅卵石一桶一桶提到机器旁准备装料。沙子要到 50 米外去取，水泥要从厕所里（存放在那里，避免雨淋）运出，每锅要 16 桶（共约一吨半重）。东北的夏天和江南是同样的炎热，从早晨到天黑，除了吃饭以外，两条腿没有一秒钟不在跑，汗水也没有一秒钟停止过，两手掌的老茧比大铜板还厚，指关节都肿得握不住拳了。

后来改用手推车运沙，自装自卸，每车要推六七百斤，又正好是上坡，很怕供不应机器，一锹一锹一口气装完，使出全身力气急忙推到现场，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面色惨白了。但是还得一锹一锹卸下来、装桶。对此，我曾计算一下，每人每天至少要经手 120 吨重量，每一粒沙、每一滴水，不经血汗的代价，它是不会自动走路的。就是到现在，我的晚餐仍然吃得很少，可有可无，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请想想：那样干了一天，只想休息，什么也难下咽了。可是，躺在床上，周身都是骨痛筋酸，没有一个地方好受，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尤其脚上忽然生了三个鹅眼，白天忘了痛，夜里它就大发脾气起来，又没工夫修，真是痛苦万状。

这个任务，从开始就没作任何交代，究竟是建什么楼，谁也不明白，一直快到完工，才知道是给管理所修建干部宿舍大楼。

与此同时，在监外离管理所约 100 米的南方的一块空地上，开始东西向挖楼基的地糟子。东西约 70 米长，南北约 12 米宽。大批沙子石头也一齐运到。地糟挖成压实之后，马上挑的挑、抬的抬，把沙子铺到约一尺厚，往里放足了水，用一种特制的尖器，用力向下一寸挨一寸地摇撼起来，把沙子渗实渗紧。干部说：“这是关系着百年大计，谁要是不注重质量，那就是蓄意

破坏”，并要大家互相监视互相检查。如此，同犯们时常发生纠纷。

沙基填到地平面，就来了一伙泥瓦工，开始砌石基了。我们被分配给每个人作小工，要水给水，要石搬石；稍有不对头或者迟了一点，他就狠狠瞪你一眼，说是误了他的工，被别人赶过去了。我们一句话不敢吭，聚精会神地侍候听差。张口闭口以“师傅”称呼，他们还带理不理呢！时间久了，才知道他们原来还是劳改队的刑满就业队。大概是为了防止我们互相串通，经过一番事先交代，他们的态度是不得不如此的。他们是处在“留队查看”的境况，工资既低，又不敢不勤劳谨慎、循规蹈矩。这种就业人，在大陆是到处都有。前文所提到从营口被劳改队“休”回来的刘荣第、李仲章等人，也是这样一点工资没有，在山上农园经过七八年的艰苦考验，才回到社会当等外公民的。自从这些就业人员的底细暴露出来之后，两下的关系也与前大不相同了。但为了免得给彼此惹麻烦，大家都怀着戒心，不到有十分把握时，谁都一本正经，不肯说出心底话的。他们也是满口“改造八股”，实际上把共产党恨死了。在大陆上，每个人的心底都压着一堆怒火，不过不到时机，都不敢发就是了。

石基砌好，建筑工程才算正式开始。除了就业担任砌墙和架子工的技术工外，其余的力工全部落在我们身上。只要能动的同犯都出动了，就连 74 岁的谢膺白都得干水泥搅拌工，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这时（七月初），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工程也就一天比一天加紧。一栋有 36 户套房的三层大楼，从正式开始，一共只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完完整整的交工了。除了只有一架龙门吊车算是机械，此外一粒沙，一

块砖以及一切所有材料，没有一样不是用我们的双手和双肩扛上去的。到晚上技术工收工了，我们还得挑灯夜战。过往的老百姓都异口同声地说："只有管理所，才能干得这么快!，"这个"快"字里边，不是别的，而清一色是我们这些"战犯"的血和汗啊!

大楼的脚手架子拆除了，就业队也调走了，我们这些累得疲倦不堪的老头子，望着干部们欢天喜地的搬进那么漂亮那么舒适的新居，心想：这该缓口气了吧？这是周身筋骨疼痛的一种心理反应，也是对于满口挂着"革命人道主义"的共产党一种冀其而然的期待。实际上是一种妄想，当然不能实现。楼是建好了，还要沿楼的四周墙脚挖沟、填石、灌浆，抹上成十五度角约一米二宽的护水坡，还要把约一千平方米的院子去高填洼，用人工拉碾压成像镜子那样平整，还要把楼后垫出半米高三米宽七十米长的平台做晒衣场，还要在后院重挖地台修建 36 个外仓库。正是因为就业队已经走了，所有这些工程，就由我们各尽所能地包下来了。这几项工程量都不是小的，对于我们这疲惫到了极点的身体来说，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负担；但是做了共产党的罪犯，谁要是敢吭一声苦，街上不断出现那种戴圆锥形大高帽子游街示众的可怕景象，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无言警告吗？

就在这些工程进行中，干部又围着这所大楼四周画上了地基线，每隔八尺还画上一个不到两米圆圈圈，那就是地基，然后挖下一米半深，就像打楼基那样地填沙用水撼实。原来是地基与基础之间，贴地面起拱砌围墙了。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厉害，我们的工程就越来越加紧，而天气又越来越冷，白天越来越短。扯起电线，挑灯夜战。水泥浇上不等砌砖就已经冻成硬的了。我们想：夜班可能取消，那就可以有点休息的时间了。但

是共产党要“人和天斗”，马上叫人烧热水和水泥，果然解决了问题。砖头都冻得成了冰块，抓不了多久，手指先由针刺般痛，渐渐就转为麻木不仁了。可是身上的汗还是不住的流，大多数人都只好脱下棉衣来干。结果，不少人患了感冒，发起烧来。就在这时，又唱出这样的口号：“坚决完成任务，负伤不下火线”！谁又敢请病假呢？

这是一圈六尺来高共约三百米的围墙。一切都是由我们这些老头子“自力更生”，空气是这么紧张，天气又这么寒冷，其艰苦，其惨痛，真是只有天知道。这个工程还没有结束，干部又叫我们在监狱南边接着监墙，把监外一片房屋包括在内，沿着大道挖了一列更深大的坑。也就是用同样方法，再砌上一道高约一丈二的监外套墙。这比上一道虽然短些，但厚度与高度都比前加了一倍，工程量当然比前更大。当了罪犯，不能也得能，不忍也得忍，不受也得受，敲了骨，吸了髓，把所有的体力都付尽，把墙砌成，又已进入严冬，心想再也没什么可干，总应休息一下，喘口气了，可是大谬不然，我们接着上山了。

在前文已经提过，我们不是在农园山腰上挖了两个一丈来深的大坑吗？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转到那里去修防空洞了。那时天已滴水成冰，又落了雪。即使用热水和灰，砖已冻成摄氏零下二十几度的冰块，就是神仙又怎么能用它砌墙呢？可是共产党有办法，把修楼所用的杉杆和跳板（都是管理所自己请领的）一起运到山上，在每个坑口上搭棚子，然后又在上边盖上一层约一尺厚的稻壳。因为风一来了就要把稻谷吹跑，如是又在稻谷上边，普遍蒙上一层芦席。就是这种工程，在如此天寒地冻的情况，不身临其境，任何人也不易理解该是如何的艰苦！

要知道，这个坑原本是挖个“荒子”，现在施工，还有许多地方要重行修整。并且为了运送建筑材料，还要另行开辟两条

相当宽的通道。对于这种坚硬的石化沙质，在夏天都很难刨得动，现在冻得像钢铁一样，真是叫人发愁。而且我们的十个手指和手掌手背以及腕部都裂了大口子，早已鲜血渗渗，但是谁敢不干。真是一镐一滴血，两个大坑合起来，至少也有五十立方米，我们就硬是这样刨成了。

整个天气都已严寒，就是搭起棚子，里边的气温也不会自动增高到可以施工的程度。如是就把两个出入口，各设两道门，挂起很厚的棉巾帘子，用汽油桶改造成两个火炉子烧得红红的，里边温度果然增到摄氏零上十度左右。水泥浆可以在屋里和，砖挑进来也可以化冻了。外边是雪地冰天，不久天棚上的凝水就像下雨般滴个不停。浑身湿透还不算，它和汗水流进眼里是辣的，流进嘴里又是咸的。烟雾弥漫，又没工夫揩一下，那种滋味，我实在没有这种才能把它形容尽致的。尤其是运输上，上山下坡转弯抹角挑上一百多斤，本是累得呵气成云，挥汗如雨，进到里边又弄得一身湿，出去立刻成了“白头翁”（结霜），而浑身的衣服又冻成了冰制的铠甲。由于袖管等处都冻成棒硬的东西，它又给动作增加了很大的体力负担，那真可以称之为“寸步唯艰”了。若把这情景拍成电影，中共的“革命人道主义”，也可以说是“世无其匹”的了。

按图纸，那是“四毗”砖厚（即是两块砖长度那么宽）的墙，因为上边搭的水泥预制板，每块一米二宽就有两吨来重，其上还要盖上一公尺半以上的土，所以质量要求很是严格。砖是头等的，水泥浆是一比一（水泥与沙之比），而且砖与砖必须严格保持一公分的缝间。初砌的几层，因为不合规定，又都重行返工。刚砌到约有一公尺的高度，就听有人拼命高喊：“不好了！赶快躲开，要塌方了！”说时迟，那时快，一丈多长的一堵沙石崖，轰隆一声塌了下来，要不是那个人发现得早，人们又

跑得快，那一下子至少要七八个人“就地活埋”！天棚也塌了一大块，那下边的工程也被埋上了。就光是这种清理和修复工作，干了两天才完。因为这种石道沙帮，含有一定的水分，经过冻结再融化到冰冻层，它就因本身的松软，很容易塌方。要不是在冬季硬要塔暖棚施工，这种危险是不易出的。

我们是在已挖好的那个三十米长的地槽先施工的，墙快砌到五尺多高的时候，别的一个二十米长的地槽，什么都已准备停当，火炉都已生了两天，里边的气温已经升过零度，眼看就要正式施工了，干部忽然下令：“马上清理现场，所有工具一齐理好带回管理所！”全部停工了！也就是说；我们这场大苦难突然遭到“赦免”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谢谢毛泽东，更重要的是，要谢谢红卫兵。因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红卫兵到处胡闹，整个社会发生大混乱，共产党对我们不放心，工程不得不中止。这种敲骨吸髓的劳动，不但连续半年多，而且是一步紧似一步，一步难似一步，一步苦似一步。人类的耐性已经推展到了极限，咬紧牙关为了求生，我们不能受也得受地挺了下来。可是干部说：“只听说有病死的，没听说有累死的”，“人嘛，练啥有啥，越练越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骨头是越来越硬，而骨髓又是越来越满了。那么，这不是一种苦难，而是一种赐予。我的天！此恩此德此生将何以为报？

第二十八章　“台风眼”内

据说：尽管台风刮得天昏地暗，但在它的风眼里有时却是风和日丽。从 1966 年夏到 1968 年冬，虽然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大陆陷入狂风暴雨，骇浪滔天，但我们在管理所这个小天地里，基本上还是处于风平浪静的特殊状态，所以我以此为题。

在 1966 年的前两三年，中共曾发动一个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颁布过所谓“双十条”，即两个“十条”。第一个“十条”是运动的大纲，第二个“十条”是运动的实施办法。据说，都是出之于刘少奇、邓小平之手。主要内容是搞“四清”和“四不清”，什么“多吃多占”等，是对地方小干部下手的，我们当时还曾学过一阵子。接着，所长又很严重地向我们宣读毛泽东亲手拟订的“二十三条”（可能记不准确了），主要内容是要向“党内当权派”开火。当时的空气很紧张，可是宣读过后，一点下文没有。我们当时莫明其妙，嗣后许多年我们才明白，毛泽东那时就要向刘少奇开刀，只因他估计到在党内不容易整倒刘少奇，所以他像演平剧中的某些武将一样，把剑拉出半截，吹胡子瞪眼，咬牙切齿地吼叫一阵又自己收鞘了。还是后来，另采途径发动红卫兵，把全共党全大陆砸得个稀巴烂，推倒刘少奇等一伙另起炉灶，才揭穿他的谜底。可是当时，包括刘少奇在内，谁也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就因为这“二十三条”是要向“当权派”开火，占全大陆

总人口 95%，对共产党敢怒而不敢言的人们，都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发生了可以有机泄愤的幻觉。红卫兵所以闹得那样无法无天，派系武斗搞得那样鬼哭神嚎，整个社会立刻陷入那样天下大乱，据我看都是与此有关系。当然，我不能强加于人，凡是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不妨研究研究看。

在我们给干部修楼的初期，就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专攻吴晗，进而转为批判“三家村”成员——吴晗、邓拓、廖沫沙，接着就揪出彭真等人，这是北平的情况。我们当时在抚顺所见的是：在运动开始时，一般老百姓错觉地以为是要“整”共产党的“风”，所以他们平日所积累的一肚子不满，一碰着共干就要发泄出来。有一天，有一位形容憔悴的老者，挑水累了，把担子放在路旁休息，大概是一名干部路过时把扁担碰了一下，这位老者马上把他喝住，指着鼻子痛斥：“你别走！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们把人整得要死，谁还不敢喘气的时候！这是文化大革命！人民要说话了，你们是当权派，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家狄气得脸都变白了，刚要辩驳，人就围拢来，虽不像老头那么严厉，但内心的愤慨，从他们硬是压低了的语气，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家伙已经发觉势头不妙了。我在远处只听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怎么？你还不服？你要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要老实一点！”那个家伙，在这势不可挡的情况下，马上低头认错：“老大爷！我走路没加小心，请您原谅我吧！”说着把担子挑起来，“老大爷，您家住在那儿？我给送去！”中国人的传统是讲恕道的，当然不会让你挑，他去了后，那位老者，还在嘟嘟囔囔。中共控制大陆以来，人民受尽了阴狠的“教训”，很怕事后被整，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有了这种情况，既表明人民的满腔怒火，也表明“双十条”和“二十三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人民对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一些

错觉。我当时对那位老者很担心，我无法走近去看，说不定到什么时候，定会被整得死去活来。接着，戴高帽子游街就纷纷出现，我无法走近去看，但不知是否有他？我想，这场灾祸他是躲不过的。

自从工程停止，我们的伙食标准，马上就开始降低了。早饭先由小米稀饭，进而降为玉米糊（即是由玉米面做的面糊），终而是粗高粱米粥。中饭先由全面加棒子面，进而每周只吃一餐全面馒头，再降而吃棒子面发糕。肉类当然更是难见的，就是偶而发现比肉丁稍大的几小块，它连皮带肉，还没有小指宽。有时皮比肉还厚，不管怎么看，肯定是猪肉，但非常不是味道，谁也不知是哪种肉。有一次因为劳动，曾去我们的大厨房，我发现在案子上摆着两具无头无四肢只有两尺多长干瘪的尸体，皮肤的表面黑一块红一块。在我一生的经验中，还不曾见过这样的怪物，而且很给人以“可怕”之感。我脱口而问：“这是什么？”我们那几位在厨房劳动的同犯，他们向来是不准透露厨房情况的，没有一个肯搭腔。事后在个别的私下场合，其中一个同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这回你真就成了‘窍门断（段）’了，连猪肉都认不出来，”“唔，原来是这种猪肉，那怎么可以吃呢？”他的回答是：“经过化验，保证不会食物中毒！”那都是些被淘汰的无法长大的猪，所以专供我们吃。就是这种猪，我们一星期，至多也只有三次，能够尝到点“荤腥”。一直到 1970 年底，我们都是处在这种状态。经验告诉我们，释放的影子，又在消逝了。一直到 1975 年全体释放，九年间除了几十个被送往火葬场以外，只在 1970 年，从刑满者当中选四个人送往山上农园从事半监禁的无偿劳动（另详后），不曾释放任何人。

文化大革命闹得越凶，他们就更不肯把我们放出大门，让我们跟实际有所接触。我们只能隔墙听到外边戴高帽子游行喊

口号，和成列卡车轰鸣，前后都安有许多强音喇叭的宣传车，由女声拼命狂喊：“某某什么罪，某某什么罪，……立即执行死刑！”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一墙之隔，外边已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内部的运动，我们虽不是对象，但怕我们发生思想波动，监管上发生麻烦，所以在初期，除了对我们暗中加意防范外，表面上尽力避免风吹草动。可是他们成天在开会、学习、斗争，除了按时到监房值班，其余时间很少见到他们。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也需要闹革命嘛！你们是处于保险箱里，人在福中不知福！”这表明他们自己都是处在斗争的痛苦之中，不过不能向我们透露其内幕罢了。以前，干部们中间常是说说谈谈，从那以后，偶然看到他们在一起，也都是愁眉苦脸，心事重重，相互间那种表面的假和气，已经被彼此戒备的表情代替了。运动一天高似一天，一天激似一天，人人自危，愁肠百结，他们内心的烦恼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到 1967 年夏，忽然发现有几个穿军衣的人，出现在管理所，他们和干部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避免跟我们接触，同我们连句话都不说。我们谁都明白，他们是由辽宁军区派来主持管理所内部的学习斗争的。可能是怕我们上到高处，看到监外的活动，他们和管理所的干部亲自动手，在监墙转角的墙头，把自从 1957 年就因撤销岗哨而拆除的瞭望楼，又重新盖个新的。岗楼与岗楼相对地安上强光探照灯，照得监墙内外如同白昼一般。墙头的电网也都另行更新，连各处监门的铁闩也都换上又粗又壮的了。这还用说：他们是对我们采取防变措施了。没有“路条”没有粮票，在大路上寸步难行，这是人人都有深刻的了解，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据我所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曾动过图谋不轨之念。如此说来，这种措施可能有人认为是“多余”的，其实不然，据我后来从“小路”得知，自从文革

（即文化大革命的简语，后同此）运动出现各种对抗派别之后，许多人就在我们身上转念头。有的想砸开管理所，把我们一下子开门释放，又有的想把我们一下子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管理所当然有情报，这种措施是有根据的。事实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不管发生哪一种变化，对我们都是非常不利的。

一天，我同一位同犯到锅炉房后边去劳动，隔看电网，忽然从北院抚顺监狱的监房里传来极其可怖又拖得很长的惨叫声：“哎……呀！”我还以为必是有人发生什么危险意外，接着就听到另一人显然压低喉咙又狠声狠气地斥骂道：“他妈的！谁准你出声！”然后就是一阵疯狂的猛力抽打！从声音判断，既不是鞭子，也不是用木棒，就好像“武打片”里抡刀弄棍那种嗖嗖作响的效果声音一样，至少也是一条很有弹性的藤条，足有三分钟，只听有“哼呀，哼呀”的忍痛声。

大概是实在忍不住了，才听到从脖子里发出一种哀恳声：“请—你—老—原—谅—我—呀！”但抽打声没有减缓，而是更加有如急风暴雨了。还边打边骂：“原谅你！你是坏蛋，他妈的，揍死你又是谁的儿子！”可能是那个被“惩罚”者发觉“称呼”不够尊敬、不讨悦意吧，就又改口哀恳道：“请—干—部—你—老—原—谅—吧！”从他声音趋于低沉来判断，已被打得死去活来了。我的那位同犯是个学习组长，起初他虽表现骇异，等他明白了个中情况，就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扯这道哪起来。我知道他是在用此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就更不便对他评论此事。这种情况继续约有 20 分钟，那个哀求者的声音，只是断续出现，显然已是皮开肉绽，昏迷无力了。大概那个打人者也许有些累了，抽打声也就忽紧忽慢地断断续续了。那个组长忽然想出了点子：“这个活兄，明天再干！”他领我走开了。我俩都默默无语，各想各的心事，他直接去值班室作汇报，我回到

屋中呆若木鸡般在沉思。鞭打声、哀恳声，在我脑际久久无法消失。我对那个人的命运担忧，我对这种残暴行为感觉一种无可名状的痛愤。尤其想到那人的今天和我们的明天，以及当前大陆同胞的处境，我的牙关就咬得紧紧的了！

从 1967 年秋开始，所内的重要干部大多数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参加抚顺市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学习”组织（不是五七干校），他们这一部分叫作“战犯管理所学习班”。也就是说，那是一个保持原单位的综合机构，连各种器物用具，都是由管理所带去的。不言可喻那是一个原单位进行检查然后再联合大批判的斗争机构。后来，大部分都没再回管理所，据我推测，那些人至少有大部分是“被整”了的。前文已经提过，战犯管理所乃是一个“红旗单位”，他们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共产党内部的人们，互相都貌合神离，提心吊胆，他们灵魂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啊！

那些干部走了后，我们的学习，都由过去的班长来掌握。共产党的语言，都是以上各级的层层录音带，当活的播放喇叭，他们也是训练有素的。

1967、68 两年，我们基本上是恢复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常态。劳动方面，大致跟以前的正常情况一样，我现在只谈谈学习。

毛语录在林彪的主谋下是早就出版了的，在文革中经林彪标榜，全大陆人，不论行走坐卧都要“红咚咚”的一册不离手。警察要举着它指挥交通，展览会的讲解员要举它当指示棍。种种千古未有的怪现象，我想海外人士从某些图片上早已看得恶心了。我们当然更要人手一册，不过平时并不是举在手里，而是必须放在随身衣袋中，说不上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就要双手捧着读。起床、吃饭、就寝、学习、开会都要全体肃立由人

必恭必敬地领导阅读。哪一页哪一段，都是指定好了的，领导人只要把“头子”念出，大家就照着指定的跟着读，所谓“头子”也就是“帽帽”。例如：领导人宣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这就是“帽帽”），这个“说”字刚一落音，大家就要齐声朗诵读正文。这个“帽帽”还有些千奇百怪的变化，很值得人们开开耳目呢！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接着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不久，不知是什么“国际”会议又晋封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很快又更上一层楼，不知是什么神灵又封为“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了！可能是毛泽东还觉得这些都不够伟大吧，又改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说”了，这的确够点样子。这四个“×（此字用黄用黑，我还不便决定）袍加身”，既表示他是塑造全世界人类灵魂的“教主”，又表示他是对全世界人类能一呼百诺的政治首脑。同时，既标示了他是指挥全世界武装力量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天大元帅”，又标示了他是操纵世界历史航向甚至宇宙运行的“真主”这四位一体的“王冠”是经林彪在某次会议上“行礼如仪”给加上的，“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对此是有御风凌霄的陶醉之感的。可惜林彪事件一发生，凡是沾上林的一点边的东西都一概完蛋，这顶“帽子”当然也戴不成了。对此，毛泽东是死不瞑目的。我们在读这些东西时候的滋味，是无法说得完道得尽的。总之，这种怪现象，不但是空前，而且一定也是绝后的。所以敢说它是绝后，理由很简单：若不是自大狂狂到失掉了理性，谁又肯搞这种丑态呢？

我们除了要随身携带那本官发的毛语录外，另外还由管理所为我们专编的一本，供在所内一般场合来读，所以也要精心地一同带在身边，为了这个，我现在已记不起，有多少人曾受

到批斗！

在全体出工时，先要到大操场集合，齐声朗读毛语录。谁若是忘了带，不但回号子去找要耽误时间，惹得干部批评和大家不满；还要在小组会上深刻检讨及由全组大力帮助一番，这个关是不好过的。有一次有个同犯忘了带，他怕检讨，如是两只手捧着像是张开的蛤蜊壳似的，假充在读，被身旁同犯检举，斗争了好几天，打得鼻青脸肿。因毛语录而惹祸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只再另举一个例子以概其余吧！有一次某同犯在厕所解便掏手纸时，忽把毛语录也带出掉落到地上。第二天，学习一开始，组长怒气冲冲地领导选读这样一条语录："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我们务必不要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然后就气汹汹问大家："有人在搞革命破坏和捣乱！怎么办？"社会情况是那么紧张，人人都感到自危，这正是自充"进步"的机会，都下意识地举起拳头喊："斗争！"那个弄掉毛语录的同犯，知道这是对他，所以只有他没举手。但是他急忙站起来说："我检讨"！接着说："我刚才在厕所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现行犯罪！由于我没有改造好，还没有像同犯们那样重视和热爱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思想感情，所以我刚才解便不慎把毛主席语录，在掏手纸时给带落到地上……。"组长把桌子一拍："你是不慎……带落到地上？你是对'红宝书（毛语录）'恨之刺骨，安心到厕所里让它跟脏地打交道以解恨！他是蓄意捣乱、破坏！大家说：是不是？"于是齐声高呼："是！"

有个家伙上去就是一脚，装着如丧考妣欲哭无泪地指着狂喊："你好狠哪！你忍心把'红宝书'那样跟大粪去糟蹋吗？……你是反革命本性发作了，恨不得用一切手段把毛主

席：……（此处应当是‘整死’，但他没说出口）！）乓的一声，又是一脚。“你还不跪下认罪？”那个人立即应声照办。更无耻的是，这个家伙竟说：“什么粗心大意？你看我的‘红宝书’就绝对不会掉？”说着他就把毛语录掏出来给大家看，以示他“热爱”毛泽东，接着大家进行轮流批判。这个说：“你是现行反革命，不承认绝对不答应！”那个说：“我见他每次读语录，都是口动声不高，他心里有抵触吗？他的蓄意捣蛋，乃是一贯的！”组长得此启示，如是就号召大家无情地进行揭发检举。有的说：“在劳动休息时，他屁股就把上衣当垫子坐，他是有意把‘红宝书’压在屁股下解恨！”有的说：“别人抄语录（指管理所特编者）两个钟头就抄得整整齐齐，他好几天还抄得乱七八糟，这是他思想抵触的具体证据！”甚至夜里睡觉，把衣服搭在身上，也说成是对毛泽东的大不敬。总之，非让他承认是蓄意进行捣乱破坏不可。第一天，无结果，学习结束时，组长交代两件事：第一、要这位同犯切实认真反省，不彻底交代，绝不能过关；第二、要大家对他敌视，不准和他说话。第二天，他在万般无奈之下说：“大家说我：‘蓄意捣乱、破坏’，我都承认了！”又惹起全体不满：“怎么？是大家说你的？你真混账，你是诬蔑大家逼你的？不行！你若有诚意认罪，就得老老实实承认是你早就蓄意捣乱、破坏，不然就不答应……斗争到底！”这个“噎脖子馒头”是谁都难于下咽的。但是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咬牙承认下来。可是，这还不能结束，还要接着“抠思想”！这更是“没头的官司”，你说这，他追那；你说近的，他要抠远的。整了五六天，他从曾祖父是举人，祖父作过知县，父亲当过联保主任兼恶霸地主，他自幼就投考国民党（当场，组长指出说：“得称‘匪党’”）军校，一心光宗耀祖，所以对共产党一贯誓不戴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思想更是抵触，

所以就拿语录来解恨等等，等等。这是经过五六天反复搏斗，最后被小组认可的大意，复杂曲折的细节，我就不必一一详述了。交代完毕，批判够了，还得写出“认罪悔过书”，通过小组批准，送交管理所，记上一大笔黑账。据我现在回忆，至少有五起此类事件，历历在目，毛泽东淫威所造成的罪恶，真是写不尽，说不完啊！

不特此也，凡是毛泽东的出版物，不管是成套的“毛泽东选集”或是单行本，一概都得包上红纸皮，由管理所发给每人一付书架，整整齐齐放在高处的墙台上，另外用一横条红纸写上三个黄字“宝书台”，贴在书上边的墙上，当成“神主”那样供起来，谁要是粗心大意碰倒了，就要像上述那样检讨批斗没完。

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当了“毛教通天教主”，是毫无疑问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封建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还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就请顶礼膜拜毛泽东的左派先生们去下定论吧！

我们在这期间的学习，除了毛语录已经成为“例行公事”外，就是要学习那些突如其来而又层出不穷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以及我们称之为“王母娘裹脚条”（又臭又长）式的批判刘少奇等的文章，这些东西，来势汹汹很有火药气味。管理所布置时，好像很“煞有介事”，必须“学深学透”不可。可是有的只初读一遍，甚至有的还未正式开始，就在“结合学习”的说法下并入另一题目，实际是“听其自然”。在学习过程中，管理所对我们有个中心要求，还是那句老话：“脑子不是真空的，在面对如此波澜壮润的运动中，每个人不能不产生各式各样的思想。若说没有想法，那就奇怪了。

旧的不去，新的装不进。有思想能大胆暴露，才是愿意接受改造的表现……”等等。在共产党监狱蹲了 20 来年，经验告诉我，这个名堂叫作“向我们搞‘思想摸底’”。过去不知因此惹了多少祸，遭了多少罪。可是照旧还有不少人硬是要“暴露”，特别是刘少奇被揪出之后，思想暴露就更大胆、更多。现已年去久远，已记不了那么多，只能就印象深者，概述如后。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叫陪他乘敞篷车的，一边是贺龙，一边是陶铸。这两个人当时还有“受宠若惊”之感，接着正是他俩首先被打进十八层地狱。有的同犯认为：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毛泽东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当面笑哈哈，腰里摸家伙”，这样阴狠毒辣，实在不够“伟大”！言外之意，一道是说：他连市井小人都不如。

我在前文提到在北平清华大学有个女儿的杨不平，是江西人，他曾当过政协委员和立法委员。他暴露的思想特别多，我现在所能回忆到的，有以下各点：一、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就凭毛泽东所发动的一阵广播喇叭给吹掉了，这既是违宪，又早把个人置于“国家”人民之上，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独裁！二、在他来看：刘少奇不但无过，而且有功。远的不说，就只批判“三自一包”也是将功陷罪；三年“自然”（应是“人为”）灾害，没有“三自一包”就过不了关，就要天下大乱。对于批评“黑修养”（即是给刘少奇所著“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文革中新加的“黑语”）中的“驯服的工具”（即是指共产党员应该对党对领袖作为百依百顺的盲从工具），他以为刘在文革中毫未抵抗而始终听从毛泽东处理，这是刘以实践证实了言行一致。“驯服的工具”这个名词也确有些“愚民政策”的味道，他不反对批判，但他又相信：过不了多久，不但不会再批判，而且还要变本加厉地实行。

杨不平又指出三个“大树特树的绝对权威”（这是杨成武奉承毛泽东的，即要树立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革命路线等三个绝对权威），就是共产党把所有人都看成理所当然的驯服工具的最好证明，这种“批判别人而自己行之”的理论，未免把辩证法搞得太离谱了。三、他认为刘少奇当年在武汉把“工人工作队”的千支枪交出去，毛泽东当时当然完全知道并且是同意的。那是当时情况使然，怎么能算“大叛徒”？如果是“大叛徒”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中能举毛当主席？而毛又为什么叫刘当代主席（毛离延安时）和第一副主席以及“国家主席”？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四、打天下时是同志是战友，得天下后是仇敌是对头，这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汉高祖杀功臣的重演。

1967 年夏，曾对“一些错误思想”，举行过“和风细雨”的批判，杨不平当然是典型的重点。据管理所交代：“错误的思想批判掉，正确的思想自然就可树立起来。所以既要和风细雨，又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共进行了约一个星期。在这个过程中，杨不平又自我揭发他曾作过许多“反动诗”，为了怕忘掉，在夜里他都要反复记诵和修改，以至久久不能入眠。并且还有几首都秘密地记在小本子上（也当场交出了）。这些诗，当时都已公开出来，确实够得上“血淋淋的”，可惜我现在连一句都记不起来。哪怕是能忆其一鳞半爪，也可以使读者得窥“战犯”们的心声和身处大陆人们积郁的一般了！这是我要向读者致歉的。据杨不平自己讲：他很同情王瓒绪并时常背诵王的诗篇（王对共党控制大陆后的所作所为，极端痛恨，遂于 1960 年前后，挽其数百首忧国爱民的诗篇，弃绝共产党委他为“四川省政府参事”的职位，从四川潜迹逃奔自由，准备对中共作无情的揭露。路经与香港交界处，被共军哨兵逮捕。并将“反诗”

作为罪证，在人民日报发表一部分)。他在会上也曾作了一些检讨，因为管理所不曾布置斗争，同犯们轻描淡写地帮助了一阵子，就过去了。杨不平对此发生了错觉，他以为共产党可能真是“与人为善”，遂写了认罪检讨书，立下罪状，嗣后心情很是坦然。他不懂这是共产党先摸他的底，准备后来跟他算总账的。只有别人曾与共产党为善，共产党又跟什么人为过善？这是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了人们，而杨不平的后果也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组里有个刘衍智，他一向摆出“进步”的姿态，专门“整”别人。只要叫他抓住机会，把人“一杠子打死”(即是狠狠分析批判的意思)，他还觉得不痛快。但他一贯不肯暴露思想，大家对他很有意见。他看到杨不平等人，暴露不少“血淋淋”的思想，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且干部还把敢暴露思想的人，说成是“要求进步的表现”，于是他也动了“表现进步”的念头。

他就在组会上暴露说：他对刘少奇的被“整”一点也不感奇怪。自古以来，不知发生多少次宫廷政变，虽是亲骨肉，为了争夺皇位，都曾互相残杀过，赵光义篡夺赵匡胤就是一例，何况毛泽东和刘少奇不过只是战友而已。我们那个组长是有名的“狠家伙”，在历次“年终总结”等场合，刘对那个组长他不知提过多少攻击性的恶毒意见，因为被提意见的人，必须严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毛训，不许反驳或申辩，这个组长一直隐忍在心。这回，组长抓住机会了。他首先领头分析说：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任何人都是应该有些思想活动的，刘能大胆暴露出来，这是难得，也是“要求进步”的表现。不过，拿毛泽东比作赵光义，实在太恶毒了。赵光义是篡兄焚侄的家伙，那不但是指批判刘少裔是篡位，而且要把刘少奇的儿子也置于

死地而后快。他认为："这是对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挖空心思的恶毒诬蔑：……"凡是肯于改造的人，不会有任何人同意的。接着就号召大家发表意见，这位刘同犯向来就不得人心，大家都纷纷提出意见。为此，主管干部还到号里旁听过。搞了几天，刘写出了"认罪检讨书"，也就暂时不了了之。请大家注意这"暂时"二字，我的意思是说：后头还有"戏"呢！

在这一期间，同犯们所暴露的思想的确不少，在管理所以外的人听来，都一定要咋舌的。为了少占篇幅，我只简述如上，以供读者了解概况，也就俗了。在此，读者可能产生一个问号：段克文在这期间一定也会有些思想，为什么不也写一下呢？这，问的有道理。我的确有些思想，但我连一个也没暴露。为什么？说来话长。简单说：我对于毛泽东总的看法是：好话说尽，坏（也可以用狠字）事做绝。他的话，非常好听。说的越好听，不是言行不一，就是别具用心。如果他不赞一词，有时反倒过得去。这是我从他的历史所得的个人总结，到今天我还没发现有不对头的地方。共产党在他的正面和反面的"教育"之下，也很不易说真话。就是偶尔被形势所迫说了真话，到一定时期也一定不算数。但他们当时还会像煞有介事地壮着胆子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说话向来是算数的。"那不用问：一定是个永远无法兑现的问题。话，可能扯远了些。我的意思是说：尽管管理所舌敌唇焦地号召："敢于暴露思想，乃是肯于靠拢共产党和接受改造的表现"等，我基于这个理由，肯定不是那里边埋着定时炸弹，必然会留下可怕的"后遗症"。经过 20 来年的教训，我才不上这个当！事到今天，我觉得倒有把当时思想向读者追述的必要了。

上述的一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同犯们所共有

的。另外，我还有以下、这些主要想法。

他们在中共的“两报一刊”上锣鼓喧天地批判刘少奇的一个了不起的证据是：在“黑修养”这本书里，引用列宁一段话时，把其“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给删掉了（因手头无资料，只引其大意），就一口咬定刘是蓄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想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明知这是“冤枉”，可是硬把这当成罪证，叫得天翻地覆，说“这是铁证如山，刘少奇自己也无法否认”。一些不明当时具体情况的家伙，也跟着“众犬吠声”起来。

刘少奇是中共重要首脑之一，越“无产阶级专政”，对他是越有好处（不，应是“越有便宜”），他怎么能发疯，把这句话砍掉呢？要知道，共产党在江西搞“苏维埃”失败之后，认识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搞不通，如是就撑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迷魂幡”，搞起诱骗一些对共党抱有某些错觉的非党人士入彀的“统一战线”的阴谋来了。请看：从中共到陕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这段时期中，他们不是口口声声大叫大嚷什么“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以及什么“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甚至于毛泽东还在其一篇大作中，公然提出如何实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及民族主义（可惜这篇大作在后来出版的“毛选”中被深具匠心地删掉了）。总之，他们是用这个“障眼法”，诱骗一些“天真”的人们堕入“统一战线”的迷阵，向被抗战给弄得捉襟见肘的国民党夺取政权。在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所有文件中，绝无一处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调子，他们不是忘了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他们要麻痹人民，不便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要搞这一套，刘少奇正是负起

“驯服工具”的任务，在列宁那段话里，才煞费苦心地删去了这一句话。这一点，毛是完全心领神会、赞同不迭的。事过境迁，抓这个当罪证，毛泽东的黑心和阴狠真是到了极点！他对于一生患难与共的战友都这样负心负义，哪能不像三国演义的曹操负尽天下人呢？这一刀子刺穿了毛泽东的黑心，比“兔死狗烹”要厉害得多。

薄一波在文革前是共产党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刘少奇在政府区搞地下工作时和刘发生密切关系的人，因此被打入刘派。凡是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可能还记得：薄被阎锡山逮捕后，因为搞假自首，就“打蛇随棍上”跟阎攀上关系并骗取了阎的信任。结果，营救了共党“悍将”王若飞，并如火如荼地在晋南组织起共党的庞大武装。

抗战胜利后把胡宗南队伍打败，把阎锡山搞垮的就正是这个薄一波，他对共产党立了大功，所以才当了什么主任委员。就因为他被打入“刘少奇的死党”，在文革中，就把从阎锡山档案里所翻出薄的“自首书”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共党地工廖承志也是经国民政府逮捕的，他在何香凝吵闹之下也同样写过“自首书”而释放了，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这一事实，还有和我们押在一起的施锦（曾是看押廖的主管）做活的铁证。虽然同样是写了“自首书”的，但论对共产党的“功劳”，我想廖绝不会比薄大。再保守一点说，“工作效果”也不会那么明显吧！可就因为廖走毛派，所以“整”薄当中，廖就开始“不露面”，我就已心中有数了。事情就是那么巧，大约到 1972 年那个活证人施锦因肺病一个人死在医院之后，也就是薄一波问题成为遗忘的过去之后，果不然廖以“久病初愈”为由，开始陪日本贵宾看“样板戏”！作为“官复旧职”的第一步了。请想想，如果不把这名之为“毛泽东式的是非”，普天之下哪有这

样的是非。这是铁的事实，不是段克文在美国栽赃吧？

当时我“暴露思想”的题目是这样拟出的：“我认为毛主席是：‘是我者昌，非我者亡’”。我怕我的脑袋不知什么时候要搬家，所以压根儿连一个字都没露头。这倒不是胆小，因为它既无用处，又无意义，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甘做“冒失鬼”呢？

在文革以前，大陆曾推出一部彩色影片，片名我现在记不住了，内容是以描写当年刘少奇在江西安源煤矿当工人俱乐部主任搞工运（这是为人所公认的事实）为主题。这对那一时期的共产党活动来说，他们认为是一段最光荣的历史。影片嘛，当然要有些“艺术性的夸张”，把刘少奇描绘成工人运动的“盖世英雄”，好像在共产党的“斗争史”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一样。按理，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人物，不但应该对于党内任何同志的成就，都应当感到由衷的珍视和高兴，而且应当很欢迎这种成就越多越大就越好吧！可是，毛对此却大吃其醋！如是就指使他的“写作打手”，在人民日报上大作“文章”说：安源煤矿工运是毛泽东亲身主持的，根本不沾刘少奇的边儿。并好似确有其事的说，毛泽东某年某月某日及某年某月某日，曾到过安源，仿佛该“打手”当时真曾参与其事似的。可是毛、刘二人那时都不过二十来岁，事隔五十多年，那种单身独干的事，如果毛泽东不指点“如此这般”，谁又说得出这一套？而事出毛之口，谁又敢否认其事呢？不仅如此，他还要指使一个稚气未退的年轻画家，凭着想象画了一张穿着蓝长衫，拿着一把伞，文质彬彬美少年的油画，并题上“毛主席（要知那时毛未当上主席）去安源”，用以表示毛泽东确曾在五十多年前“主持”安源工运，而刘少奇是“掠美”的佐证。更令人欲呕的是：不但要把这片油画翻印若干张，叫人民在家供奉起来，也不但要在机关学校迎着大门建立一个高约两丈的大影壁，把这张油

画放大在上边，以亲“领袖的光辉”；而且还要把油画原件送进“革命历史博物馆”，永远做为否定刘少奇主持安源工运的历史铁证呢！这个“伟大的领袖”竟“伟大”到自己当了“元首”还要对五十年前旧事和战友争功的程度，实在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奇观”，也实在不能不说是对“革命”二字的无情讽刺吧！刘少奇和他从小就在一起“搞革命”，五十年如一日，历尽艰苦患难，卒然打出局面。论友谊是刎颈之交，论“革命”是生死战友，这在人生该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谁能找出证据，刘少奇曾“私通外国”或“通敌”？共产党的地工（包括工运）对国民党所以搞得很得势，也都是与刘分不开的。就因为刘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做了不少“好事”，他就醋劲大发、丧尽天良，凭空给扣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三顶大黑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还有比毛泽东再阴狠再蛮不讲理的家伙吗？我根据这些事实作为思想，给毛泽东下了十六个字的结语是：聪明（诡谲型的）过人，阴狠无双，唯权是谋，杀人魔王。

我来到海外，时间还不及两年半，据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文章来看，对于以上几个问题不是很，少涉及，就是涉及也很含蓄、语焉不详。我写得是尖锐和“露骨”了些，但我要声明一句：这都是具体的事实，也确是我当时所形成的看法。我那时每次看到那张油画，我在感到肉麻的同时，又觉得“太岂有此理”！他作了大陆的霸主，就叫人们把他少年时期的模拟像都拿来供奉。如果再搞下去，到某个时机，恐怕还要画出像天主教圣母怀抱圣婴那样的模拟像，要两代齐尊地做为“宗教”画叫人顶礼膜拜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竟能干出这种事来，真可够得上今古奇观。记得当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在苏俄曾出了一份专辑画刊，封面上整幅刊印赫鲁晓夫的像片，阿尔巴

尼亚就据以大张旗鼓地攻击赫鲁晓夫是死不要脸地给无产阶级出丑。可是毛泽东除了搞上述的“洋相”之外，不论报或刊，凡是刊登毛泽东相片时必须顶天立地占满全部第一版，把向来刊在上头的“报名”、“刊名”，都得赶到下边去。那应该更是天字第一号外加三级的“死不要脸地给无产阶级出丑”，可是阿尔巴尼亚却大歌特颂“阿中两国两党的革命友谊是万古长青的”，“毛泽东同志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战友”等等。这种神妙莫测的“辩证逻辑”，我敢保险：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在全世界 30 亿的人口中，没有谁能够学得通的！

唔，我信笔写了下来，是的，提到毛泽东，我罄南山之竹也写不完。特别是通过文革，他的肺腑肝脏，都使我有了具体的认识。不然，我不会在将近古稀之年，抛弃三亲六眷和可爱的同胞，前途茫茫地只身远走异国啊！我对于一般共产党人，并不把他们和毛泽东等量齐观的。他们中不少人是不懈不惰地想为中国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他们我是由衷赞同和永远不忘的！对于他们在毛泽东淫威下，心灵深处所积压的悲喷和苦闷，我更是十分了解和完全同情的。像范园焱这样纯正爱国的人士，到处皆是，只是没得机会见诸行动而已。凡是关心祖国的人，对他们谁能不恭而敬之？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凡是能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好更自由的人，我没有理由不拥护他，但像毛泽东这类中国人民的“祸人精”，我也没有理由不反对他。

写到此处，我还有不能止于言的是：我作为“战犯”，总是毛泽东下命令释放了的。就中国传统的恕道精神来说，似乎应对毛那个一些。但我一想到大陆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一想到在毛泽东屠刀下落掉了几千万颗人头；一想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他谋取个人独裁的“招魂帽”；一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声中活活整死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千百万

生命，都是他建立个人霸业的冤死鬼；一想到他在莫斯科国际共产党会议上公然自得地叫嚣“中国有六亿（当时数字）人口，原子战争，死了亿把千万也没关系。”我若不反对他，总不能安于自己成为一个不知是非的人吧？

另一方面，如前所提到的，我自己对国家对人民不曾犯过任何罪，我所以被囚禁了 25 年成了“战犯”，唯一原因就是我曾是国民党的一份子。从我的“自述”里，（只有遗漏，没有夸张），谁都理解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不是好过的。我受尽苦难冒着危险最后走出大陆，赴台湾被拒，幸亏美国出于人道主义接纳我的避难申请，否则，我肯定是与张铁石（“战犯”之一，在港自杀）一道去了，到现在我还不能看望一下在台湾的故旧和同胞，我有位恩师最近死在台湾不得一见，我真是抱憾终身！若说我没有痛苦的感受，那我就成了没有知觉的僵尸！可是，后来从各方面的材料证实了：台湾人民的生活，不但比大陆高得多多，而且在亚洲也是第一流的；台湾人民所享受的自由，也确比大陆充分；台湾的建设成就，除了原子弹一项以外，只会比大陆高而不会比大陆低；虽然我也听说（不是看到）台湾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但两相对照，台湾人民在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下过着人的生活，而大陆人民则被共产党当做驯服的工具，过着奴役的生活，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我身心上的冰冻就融化了不少。真的，25 年的“改造”我还没有学通那种随心所欲漫无标准的“辩证逻辑”。我的标准是：谁能使中国人民过得更幸福、更自由、更心情舒畅，我就拥护谁！否则就反对！客观成败，主观恩怨不应和此混为一谈。

到 1967 年，全大陆就闹翻天地搞武斗。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发的公告（即是通令）：禁止向银行提存，禁止抢掠粮库、油库、军火库和一般仓库等来看，反映整个社会秩序已经大乱

了。就抚顺而言，我们在战犯管理所，见到听到的是这样：无论白天、夜里，步枪、机枪的声音，辟辟拍拍总是不绝。四周高大的建筑物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便服武装，口里还在厉声呼喊着像是警告或喊话的声音，一个不对头，就是一枪或是一排枪。我们正坐在床边上学习时，咔擦一声，玻璃窗子打了圆圆的一个子弹眼。大家都已潜意识地理解到，在这样情况下，如果谁先发生惊慌，引起骚动，那就定要戴上“祸首”的帽子，所以都是“处变不惊”。下了学习一看，一颗弹头正好钉在一位同犯背后的床板上。若是夜里，至少有人要遭无妄之灾了。这种事情，都发展到监狱来，外边情况的混乱可想而知。究竟有多少人，就这样白白送命，那就天知道了。特别是拂晓前后，步枪声、机枪声、呼喊声、手榴弹声以及许多工厂特设几十米高铁架上边安的强音喇叭的鬼叫声，在近处远处，组成一团惨烈火爆的“交响乐”。除此以外全市像死城一般的沉寂，无论如何，都不能发现其他任何一点别的声音。不言可喻，面临如此一场人为的大灾祸，所有一切能发声的动物都陷入恐怖之中，不约而同地屏气息声静待命运的决定了！但是，也有例外。在几次激烈的战斗中，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中弹后的哀叫声。这种情况继续了几个月，究竟全市死了多少人，我们无从估计。

一直到 1975 年我们被释放到北平时，我在东风市场曾遇见一位老友的儿子（他父母已死），在那里的川菜馆小吃一餐后，在路上谈及文革在北平的情况时，他透露出：有些胡同或街道，曾发生尸臭熏天，令人不敢接近的情景。那是毛泽东脚下的首都，其他各地就可想而知了。唐山大地震，他们都不肯发表死亡数字。对于由他们造成的特大人为灾祸，当然更是讳莫如深了。整个大陆已近 30 年不曾发生战争，但是我敢说：若把在历年不断的斗争，三年特大自然（这是特为掩盖“人为”而用

的两个字）灾害以及文革中，送在枉死城的同胞加在一起，至少不比在八年对日抗战中为国牺牲的总人数为少。要不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东方红”歌词）这样大祸星，那是不能想象的。中国历史传说：黄巢杀人八百万，闻者无不恨之刺骨。可是对于比黄巢更凶狠多少倍的毛泽东，都要建毛堂当“祖师爷”供奉起来，大陆同胞的脑袋是否可能又要大“搬家”，也的确叫人忧心忡忡啊！近来不是又接连传出成批杀人等的凶报了吗？在不久之前这些杀人者与被杀者，不也是亲亲热热地互称为“同志”的吗？始作俑者毛泽东的罪恶，真是大矣哉！甚矣哉！远矣哉！他的阴魂何日可散？